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挪威】文立·著

陈之宏 译

冷战与革命

——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挪威 文安立 / 著

陈之宏 陈 兼 / 译

冷战与革命

——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a Chinese
Translation Licensed by Odd Arne Westad
桂图登字: 20-2002-0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 [挪] 文
安立著; 陈之宏, 陈兼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02. 10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ISBN 7-5633-3495-5

I. 冷… I. ①文… ②陈… ③陈… II. 国内战
争—史料—中国—1919~1949 N. 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89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h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5 字数: 253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定价: 1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原籍挪威,现任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他于1989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获博士学位,曾担任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他是近十余年间在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中涌现出的最负盛名的中青年学者之一。本书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译者简介

陈之宏在德国科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语言文化系。

陈兼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研究讲座教授及历史系教授。

冷战国际史研究及其他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

“冷”战“作为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阶段^①，已经结束了。正是因为 20 世纪中叶出现的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已经成为历史，人们才有可能在冷战格局已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回过头来对于冷战的起源、美苏冲突的演变过程、中苏结盟和走向分裂的原因、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内部结构、冷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重新思考。于是，从 9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掀起了新的热潮。^② 在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西方学界把冷战史称为冷战国际史。^③

^① 对于冷战的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冷战发生的年代也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冷战发生在战后美苏对抗开始的年代，有的认为发生在战时后期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出现矛盾和裂痕的时候，还有的认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冷战时代就开始了。不过，一般说来，第一种看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尽管在导致冷战爆发的具体时间和事件上尚有分歧，但冷战的特定意义在于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世界两大集团的形成并处于对抗状态则是共识。

^② 有人统计，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仅 yahoo 一个网站中即有“冷战”网址 91 个，而有关冷战的网页则达 11.7 万之多。

^③ 我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曾与那里的学者讨论了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这一概念的含义，故有此说法。

80年代以前,东方^①各国,包括中国学者,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他们大多没有加入国际学界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②那时的冷战史研究似乎只是西方学者的专业特权,其研究的主体和中心则在美国。这不仅体现为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美国档案,而且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以美国在各个时期的相关政策及其得失为主。于是,美国学者在冷战研究中便自然处于明显的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的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不同学派。^③

在冷战结束后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其中特别是以前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开始大量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④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处于封闭的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世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而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史研究集中体现在冷战一方——西方学术领域的现象。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导致了相应的结果:其一,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国、中国以及原东欧国家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序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

^① 这里使用的是广义上的东方概念,包括了东欧、苏联和亚洲地区。

^②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教授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该书自1975年出版第1卷,至今已有9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③ 在冷战激化的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学派;美国反战高潮时期,产生了修正学派;到缓和呼声响彻世界时,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研究领域中的中心地位。

^④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载《历史研究》,1998(5)。

字,引入世界论坛;^①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思路,或者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反映苏联、中国、东欧以及西方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②

当然,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并不是自然和自发产生的,它离不开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过,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设立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1992年7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特点是通过由威尔逊中心出资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向会议和与会学者提供有关题目的俄国档案材料。作为该协议的执行人,冷战国际史项目与各国研究机构合作,连续组织了若干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③在这些会议上,各国学者不仅发表了许多优秀学术论文,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而且从不同国度和角度提供了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免费寄送给需要这些材料的各国学者。^④该刊物的最大特点是:一

① 尽管没有统计,但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的论著和有关资料,显然是空前的,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② 美国冷战史研究大家、耶鲁大学历史教授约翰·查迪斯1997年出版的那本专著的书名——*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③ 这包括:1993年1月的莫斯科会议(“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1995年7月的华盛顿会议(“朝鲜战争历史”),1996年1月的香港会议(“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1997年10月的北京会议(“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1998年6月的奥斯陆会议(“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等等。

④ 该刊物已经进入国际互联网,网站:yahoo,网址:<http://cwihp.ui.edu>。

方面发表各国学者对于冷战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的档案文献,从而大大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了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此外,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作数月的访问研究。^①该项目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②这些做法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互补和交流中提高各国学者的研究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史研究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如此繁荣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冷战思维(例如对抗)和冷战策略(例如遏制),并没有随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冷战时期的结束而结束。产生冷战现象的条件还存在,产生冷战思维的基础还存在,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冷战?对抗双方的主角会是谁?一旦出现新的冷战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萦绕在政治家和学者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担心。于是,人们需要历史,需要研究历史上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合成造成了人类对峙的冷战局面,究竟是哪些力量的聚合使得人类曾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特别是面对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人们力求历史给予答案,以避免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愚蠢行为,避免那些可能给自身带来灾难的不理智和不明智的举动,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世纪。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历史的某些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中苏同盟的起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就构成了我们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基础。然而,也正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础还显得十分薄弱。

^① 据我所知,自1993年起在冷战国际史项目作访问的中国学者有牛大勇、陈晓鲁、郑永平、张小明、任东来、李丹麓等人。

^② 我和李丹麓仅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国、俄国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首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我们还涉足不深或刚刚开始探索。例如,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共产党情报局、苏南冲突、核武器的发展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柏林墙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战争,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都与冷战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都是目前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而且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也已经陆续公布出来。至于有些领域,我们则根本没有涉及。例如,冷战与经济的关系:如何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冷战,或反过来,冷战如何影响了经济发展道路。^①在这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我们必定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我们较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冷战的历史,或者从冷战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冷战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冷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的框架进行考察,例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的恶化、台海危机及对台政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与越南的战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别是充分使用中国的档案文献,那么,我们无疑将对冷战国际史研究做出独到的贡献。

还有,目前中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和互补。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我们组织起来,加强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此,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建立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机构,组织专题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收集和介绍各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专业史料保管和利用机构,并以此联络各方面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① 不过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也刚刚开始。直到1997年美国才出现了第一部专门讲述经济在冷战中的作用的专著,即 Diane Kunz 的 *Butter & Guns: American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

这些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和组织出版这套“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论著的宗旨和出发点。本系列采取自由投稿方式,纳入系列的著作形式不限,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译著,可以是论文集,也可以是文献资料集。但无论何种形式,必须保证以足够的历史档案文献作为论著的基础,因为利用第一手史料从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条件,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①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才能把我国的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论坛中的热点,并且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但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的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一个对以往教训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更要求使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就迫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还没有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特别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②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1999年4月30日

^① 近年来,不仅中国的有关档案文献相继出版,美国的冷战史料不断引入中国,而且大量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档案也即将与学者见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拟于今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分卷出版。这套总计30卷、1500万字的大型文献集预计2001年出齐。

^②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中文版,28页,商务印书馆,1961。

中译本序言

为本书写序言,令我至为愉快。我撰写这一序言时有着三个主要想法:第一,试图将这部于1993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与进入1990年以来中国年轻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第二,试图将那些在撰写本书时尚未公开的前苏联的秘密档案资料与本书的有关分析进行比较,看看它们是否大体相符。第三,试图将本书的分析论述同我目前正在撰写的一部有关1946-1949年中国内战的著作所涉及的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讨论。^①

对于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们来说,一个真正令人感到欣慰的现象是,进入1990年以后,中国在这一领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海峡两岸,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正利用越来越多接触档案资料的机会以及日益宽松的政治环境,对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与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探讨。他们所取得的进展使人惊叹不已。直到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还只有在短期或长期出国时才能从事严肃的历史研究,而在国内,他们的才能往往会受到政治环境的限制,因而难以产生富有批判精神的学术成果。而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中国对外关系史这一领域里,许多最有意义的学术讨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展开。

至于本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美国与苏联这两个世界大国在二次大战结束阶段及中国内战开始时期的相互关系,

^① 自从1992年以来,我十分详细地查阅了莫斯科的苏联外交部档案和前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受益匪浅。为此,我要向这些档案馆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致谢。

也由于上述学术发展而具有了全新的特点。以往,在官方路线影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通常持有的论点是:美国一以贯之地奉行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苏联则至多只是对中国的事态发展抱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中国内战之所以爆发,其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特,因而拒绝进行谈判并公然对中共发起进攻。今天,年轻一代中国学者的看法已同本书所阐发的观点十分接近。他们所强调的是,中国内战的发生原因既在于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犹豫不定,也在于苏联所起的重要所用,同时,国共两党也都在不同程度与意义上负有某种责任。^①

为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以上这些问题,学者们对于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了极富批判性的研究,而这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在40年代的发展颇有助益。年轻一代中国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强调毛泽东在中共内外政策的制订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甚至超过了本书对此所作的强调)。早在40年代中期,中共上层的所有决策便已经围绕着毛泽东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那些对其他国家或今日中国的决策进程习以为常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根据我对中国历史学家们所提供的新证据的解读,至少可以说,毛泽东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并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看法。一方面,他本人从策略出发的考虑以及来自苏联人的劝告都告诉他,如果和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维护,将是对中共有利的。但另一方面,他那种急于推动革命的意念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却又使他认定,40年代中期是向国民党开战的有利时期。1946年早春,周恩来仍在为通过谈判让共产党人作出最小让步的情况下找到避免内战的方案而努

^① 在这批新的中英文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年》,重庆出版社,1993;章百家《周恩来——中国外交的缔造者和奠基人》(Zhou Enlai—The Shaper and Founder of China's Diplomacy),载赫德(Michael H. Hunt)和中军编《二十至六十年代中共外交史的特点及阐释方法》(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s - 1960s: 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 威尔逊中心(华盛顿), 1995。

力,但此时毛泽东却已对此失去信心。中共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做法实际上促成了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①

中国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也对我们理解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正如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杨奎松在其新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要把握中共同苏联的关系在40年代中期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必须搞清楚这一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与苏共模式的指导下,以苏共为榜样而建立起来的。在关于中共与苏联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20年间实际上有过怎样的合作关系这一问题上,我们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资料记载。然而,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当二次大战结束时,苏联与斯大林这两颗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还是年轻人时便已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无比辉煌的明星,依然像过去一样光彩夺目。苏联代表着希望与未来,苏联的模式是中国的榜样。^②

我在本序言的以下部分将对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作更为详尽的讨论。但我首先想做的是,正如本书在论及1945年秋天的历史发展时通过文献资料所证明的那样,我也将向一些见地不及此的人证明,尽管在中共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但它们之间同时也有着大量的矛盾冲突。毛泽东也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革命领袖一样,遵从斯大林的领导并不意味着他会服从斯大林的命令而采取对中国革命造成致命损害的行动。同那些将中国共产党人视为苏联“工具”的看法相反,在我看来,对某一理想与目标的信仰同一般理性并不相互排斥。

由资中筠这样的先行者所开创的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历史的严肃研究,帮助中国大陆学者认识到,美国政府在二次大战结束时还不是中共冥顽不灵的敌人,其对华政策则基本上处于踌躇不定的状态之中。1945-1946年间,美国政策的基本趋势既日益表现出与苏联对抗的意愿,又带有希望使内战避免在中国发生的理想色彩。正如牛军和章百家所指出的,当马歇尔在华使命的成功希望尚未完全破灭之时,影响美国政策的这两种

^① 关于对较早的中文著作的评论,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② 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

因素一直相当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但是,当调停终于失败时(而马歇尔本人作为主要调停者在这一进程中绝非无懈可击),华盛顿最终开始对中国内战奉行一种向蒋介石提供有限援助的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满意,但从美国政府内部的角度来看,这却被认为是一种明智与审慎的政策选择。^①

要撰写中国内战的历史,就必须将国民党也包括进来。有关这方面新的研究资料表明,本书的一些基本假设是站得住脚的。现在,我们已可以肯定地说,当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便决定要对中共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一系列的国内外力量却又在维护和平的问题上形成了对他的制约。根据从国共两方面所披露的新材料来看,如果蒋介石所发动的军事攻势不是为马歇尔使命所打断的话,他本来是有可能在军事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地位的。但是,蒋介石未能利用短暂的和平时期来加强自己的政权,中共却使得这一时期朝着有利于自己革命的方向发展,对此主要仍应从蒋介石政权存在的种种内在弱点来加以解释。

我同一些中国学者仍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例如,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由于英国的态度绝非不偏不倚,马歇尔使命在避免中国内战的问题上注定将无所作为。虽然我同意华盛顿并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调停者,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已对马歇尔使命究竟有多大的成功机会这一问题有了确定的答案。如果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春末夏初表现出撤回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支持的意愿的话,那么,和平也许还会有一线希望。说到底,尽管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行动确实起到了促成内战会面爆发的作用,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其实都并不希望看到内战的发生。

我还认为,苏联对中共的影响要比大多数中国学者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正如本文以下将要揭示的,斯大林对中共来说是一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决策者,中共所有的重要决定都是在同苏联人磋商后才做出的。同我有机会利用俄国档案前的看法相比较,我还认识到,中共领导人确实很把

^①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章百家《周恩来——中国外交的缔造者和奠基人》。

自己同莫斯科之间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当成一回事,而我以前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不足的。

最后,我不能不让那些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但却未对40年代中共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给予充分重视的学者们感到失望。虽然毛泽东是中共的核心领袖,但中共主要领导人却在很多问题上(包括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例如,彭真和林彪在对党在东北对苏联政策的问题上就有不同意见。任弼时(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刘少奇)则在中国革命发展模式的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们比毛泽东更倾向于模仿苏联的经验。党内的这些争论在当时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党的历史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些问题需要得到更为深入、更具批判性的探讨,而我们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

那么,从以前属于最高机密、近年来才开放的俄国档案所提供的新证据中,我们是否对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有了更多与更深入的了解?我所读到的新近开放的俄方资料证实,二次大战结束时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政策不仅目标不明,还带有即兴发挥的色彩。斯大林在确定对华政策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正如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他的主要的策略目标是要阻止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与美国直接结盟。而我们在俄国档案开放前所不知道的是,当他对蒋介石实行那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时,他其实真诚地希望这一政策能使得国民党领导人就范。而当这一政策未能生效时,斯大林实际上是非常吃惊的。

斯大林相信苏联有必要也有可能同国民党建立联盟关系。他的这种信念是以他对中国革命阶段性的认识以及对国民党政治特点的分析为基础的。斯大林直到去世时仍然相信,中国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这将在中国产生一个民族民主政权。直到中国1948年的军事形势发展改变了他的看法为止,他一直认为,从历史意识的层面来说,最适于领导这一阶段革命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如果苏联要想阻止美国势力渗入中国,它就必须同国民党打交道。国民党由于本身的特点,从长远来看是有可能被吸引到苏联这一边来的,而不会被任何帝国主义大国吸引

过去,成为它们控制中国的工具。^①

斯大林还坚持认为,只要美国仍然深深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革命的完成(即由一个由中共主导的政府逐步取代国民党政府),便是不可能的。正如斯大林反复向毛泽东解释的那样,中共要想有未来,就必须迫使美国人撤离中国。而在斯大林看来,要使这一点成为现实,中共就必须同国民党联合起来,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②

斯大林及其助手们从来便相信,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将最终在中国取得胜利。但在这一胜利何时才会到来的问题上,他们同中共领导人的看法简直大相径庭。关于斯大林的新文件的引人注目之处便在于,它们表明,苏联领导人在一个长时期里坚持认为,国民党应当在中国大陆发挥某种领导作用,甚至当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已变得极为明显时仍然抱有这种看法。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至少比我在未看到这些苏联文件前的想像要大一些。

我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全面论述1946-1950年中国内战历史的专著(我希望这将是一本简明的专著)。有鉴于此,在结束这一序言时,我将对一些既同本书所探讨的时期相关联,也同这之后的时期有联系的问题作进一步的反思:就对内战结局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在1944-1946年间的各种事态发展中,哪些具有真正的意义?

首先,我仍然认为,国际事务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所起的作用比大多数中外学者所认识到的都大得多。苏联从东北的匆匆撤军以及它在撤军过程中对中共所提供的战术及军事支持,是全面内战于1946年年中爆发的主要原因。中共与苏联在1946-1949年间所保持的紧密关系,则是阻止任何西方大国对中国进行干预的、有效的遏制因素。苏联的意见还在中

^① 关于斯大林的态度,见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编《战友:中苏同盟的兴衰,1945-1963》(*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威尔逊中心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该书收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学者(如杨奎松、陈兼、张曙光和牛军)的文章。

^② 莫斯科的档案馆正在逐步开放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密电。想查寻这些材料的英文件的学者可以翻阅威尔逊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史研究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Bulletin*),或通过国际互联网访问它的主页:<http://cwihp.si.edu>。

共制订接管城市以及建立一个由党所领导的新国家的计划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

就国民党而言,美国援助所起到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在马歇尔使华的第一阶段,由于美国人的存在,国民党很难对中共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后来,美国的经济援助虽然使得蒋介石政权能够在某种限度内运转下去,但在我看来,也阻碍了国民党的内部变革——而国民党政权若要在中国大陆长期生存下去,就必须依赖于这种变革。国民党中国经济结构的崩溃很容易地被美国的经济援助掩盖起来了。

国际事务是否也对中国内战的结局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我仍然认为,决定中国内战最终结局的是两大国内因素的结合。第一大因素,是中共在城市与乡村地区推行的政策所具有的灵活性与确定性。虽然中共曾经犯过诸如土改早期那样的“左倾”错误,而这些错误也曾使得中共有可能失去内战的胜利,但党的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从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并调整自己的政治理论,使之适应于中国的土壤。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国统区所面临的危机。这一危机起源于中日战争,并由于国民党在1945-1946年间所作出的一系列拙劣的政治与经济决策而进一步恶化。结果,普通中国人越是受到国民党政策的后果之害,便越是宁愿接受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即便这本来也许并不是他们的政治选择。

战争是使得这两个主要因素得以产生结果的工具。为了对这一时期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我们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对中国内战中的战略并对40年代中期与晚期中国内战中为人们所料到的和未曾料到的各种结果重新加以探讨。虽然本书论及了军事问题对于外交与政治结局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并未很好地涉及大小战役以及军事部署所产生的具体效果的问题。希望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能够将中国内战历史的这一局部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推向前进。

最后,我谨在此对好友陈兼教授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所作出的巨大

^① 韩德《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起源》(*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96。这是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共外交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努力,也对他和陈之宏博士翻译本书的杰出工作表示谢意。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于奥斯陆 剑桥

目 录

序 论 (1)

冷战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组合,而不仅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又“垄断”不了大国注意力,种下内战的败因;毛泽东既讲求实际又咄咄逼人,使中共成为内战的胜利者;要理解这段关于中国内战与冷战的故事,应采用“四维分析”模式对苏、美以及中国国、共的关系加以探讨。

第一章 雅尔塔与大国对战后稳定的追求 (7)

雅尔塔体系是大国合作的产物,也是蒋介石积极“参与”大国政治的结果;蒋介石得到了苏美两国站在他一边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保证;斯大林获得了美国对苏联在外蒙古和东北特权的认可;罗斯福得到了苏联对日参战和战后苏美在东亚进行合作的保证;谁能料到,这一前冷战时代形成的体系,已在为冷战到来准备条件……

第二章 中苏条约与大国合作的破裂 (35)

斯大林对宋子文说: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只能由蒋介石领导;华盛顿告知重庆方面:中苏双方无论达成什么协议,都要事先征询美国的意见;蒋介石盘算再三后决定:只要斯大林保证不支持中共,外蒙古可以放

弃；中苏条约签订之日——斯大林谈笑风生，蒋介石如释重负，严峻的挑战摆到了毛泽东面前……

第三章 七大与中共外交政策的缘起…………… (64)

毛泽东从未出过国门，但他从不怀疑自己具有全面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周恩来是个“国际派”，但从30年代后期起便一直同毛泽东全面配合；党的外交在1944年获得重大突破，美国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周恩来说：“这一回打通了，以后将不难来往。”不料赫尔利出尔反尔，毛泽东大发雷霆：“我们不会再退让了！”——抗战结束在即，国共内战的危险也迫在眉睫……

第四章 向沈阳进军：中国政治与苏联对东北的占领…………… (86)

日本投降，中共中央指示全党转入大反攻；斯大林为履行中苏条约义务，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延安审时度势，作出进军东北的决策；一位在东北的美国情报人员说，八路军是他见到过的纪律最好的中国军队，但苏联红军却处处限制中共部队在东北的行动；蒋介石深知东北重要，拼命企图挤进东北；苏美关系恶化，莫斯科对中共与东北问题态度发生微妙变化……

第五章 毛泽东、蒋介石和美国对华北的干预…………… (111)

日本投降后那几天，重庆的美国参谋人员乱成一团；蒋介石派宋子文出使华盛顿，为争取美国全面援助游说白宫、国会；华盛顿对莫斯科在远东的意图心存疑虑，美国陆战队在华北登陆；中共竭力避免与美军冲突，却依然“事件”不断；毛泽东在重庆发出指示：对国民党不要手软，“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在这里越安全”；美国人把中共看做苏联的工具，“冷战思维”开始主导美国对华战略。

第六章 马歇尔使命的起源 (134)

1945年秋,斯大林的全球战略缺乏明确目标,对华政策摇摆不定;蒋介石在东北对苏联又拉又打;苏联红军对中共部队态度忽热忽冷;苏军强迫中共撤出东北大城市,彭真吼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中共部队在山海关苦战,毛泽东称病退居二线;中国内战乌云密布,杜鲁门决定出面调停国共之争,派遣赫赫有名的马歇尔将军来华。

第七章 苏联撤军与内战的来临 (161)

蒋介石再派蒋经国去莫斯科,斯大林警告说:美国人想的是要把中国当做工具,你们注定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马歇尔到中国不过三周,便促使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但内战却并未止息;蒋介石为取得对中共大打出手的“行动自由”,在东北与苏联决裂;毛泽东与中共对和平不再存任何幻想,决心同蒋介石干到底;随着苏军撤出东北和四平战役打响,一场惨烈的内战终于不可避免。

结束语 造反、大国干涉和冷战 (191)

毛泽东和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是一场“人民揭竿而起”的革命的胜利;蒋介石的失败,是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崩溃的结果;与此同时,冷战在全球范围兴起对中国内战的结局也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得执政者难以垄断国际资源,使得造反者有可能获得外部支援;美国人不喜欢蒋介石,斯大林不相信中共能在内战中获胜,但美苏到头来依然站在国共背后卷入中国内战,这正是冷战的逻辑在起作用!

参考书目 (208)

译者后记 (247)

序 论

冷战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组合,而不仅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又“垄断”不了大国注意力,种下内战的败因;毛泽东既讲求实际又咄咄逼人,使中共成为内战的胜利者;要理解这段关于中国内战与冷战的故事,应采用“四维分析”模式对苏、美以及中国国、共的关系加以探讨。

本书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二次大战末中国的政治发展对美苏在东亚的外交与军事冲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个主题是,苏美冲突又对中国内部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角逐起到了何种作用。

这两个主题又引申出了一系列更为广泛,并在近年来的史学讨论中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①同第一个主题相关联的问题有:大国的控制政策,“附属国”对大国控制的反弹,以及苏美冲突走向全球化的进程。由第二个问题而派生出来的问题有:外交政策的相对重要性,对外政策概念的形成,以及国内资源的动员对大国行为的影响。

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在历史上值得关注,也在现实中令人感兴趣。从1945年到80年代早期,美国与欧洲研究对外关系的历史学家们一般均以

^① 关于这一理论新近的一篇综述,见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冷战在亚洲:新的综合分析趋势?》,载《外交史杂志》(*Diplomatic History*),1988年夏季号,307-308页。

冷战为前提来看待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冲突。只有寥寥无几的几项研究重点讨论了第三世界冲突的国内根源,而着眼于大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国内政治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属于凤毛麟角了。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除了要有能力打破处于统治地位的旧有的研究方式外,还要求研究者有语言方面的训练,有地区性的专门知识,并有接触外国档案的渠道——而所有这一切,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还是非常欠缺的。

随着冷战成为历史,越来越多既具备创新精神又经过专业训练的研究者,开始将对冷战时期的研究当做国际史来对待。在过去十年间,从事此类研究的资料基础也开始缓慢地获得改善,在40年代后期建立起来的“联盟与冲突”的研究模式已被打破。这就产生了一种迫切的需要,促使学者们不仅将冷战解释为苏美之间的冲突,更将它当做一个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来看待——其间,人们对构成冷战“战场”的亚非拉地区的外交政策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人们在把注意力集中到大国冲突的地区性方面的时候,对冷战分期的看法也受到了影响。现在看来,冷战的根源更应被看做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组合,而不仅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碰撞的结果。当冷战结束时(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人们也更容易发现一个特征鲜明的前冷战时期的存在:在这一时期,主导苏美两国行动的理念是同过去40年间冷战时期推动它们行动的理念迥然不同的。^①

战后,许多亚非国家的内部革命进程受到了苏美竞争的影响,中国则是其中的第一个。美国历史学家一般将研究视野集中于美国政策的作用上,并因而认定,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之所以能够获得华盛顿撑腰,是因为美国人对共产主义与苏联力量的崛起心存忧虑。但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存在着种种内在的弱点,尽管它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却依然未能在内战

^① 正如在本书第一章中将阐明的,我对“冷战时期”的界定是:这是一个以美苏两大国在各自的附属国家的辅助下展开全球对抗为特点的时期。有一部著作——以贯之地强调,就理念而言,前冷战时期与冷战是不同的,这就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著《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359-360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这一著作是在冷战的缓和时期写成的。

中战胜中国共产党人。^①

可是,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看待冷战与第三世界各国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我的一个看法是,苏美在中国的冲突使得蒋介石政权难以全面垄断来自大国的援助,从而使这一政权受到了削弱。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的弱点固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们也知道,只要蒋介石还能够同时得到来自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支持,中共就不可能在同其政府的武装斗争中获得胜利。直到1946年初,蒋介石利用了大国的支持与中共对内战的担忧,逐步改善了自己在国内中的地位。但到1946年年中,冷战使得蒋介石已不再能够同时获得苏美两大国的支持时,他发动了内战,而他的政权却未能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来。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40年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专著,本书的写作即由它们促成的。在马克·加里奇奥(Marc Gallicchio)论述美国对日作战的最后一年的著作中,他得出的结论是,早在1945年夏天,美国已在东亚开始了对苏联的遏制。^②拉塞尔·布海特(Russell Buhite)则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指出,1945年后美国对东亚的态度不仅杂乱无章,而且也常常踌躇不决。^③

在对中国的研究中,高龙江(John Garver)对1945年前国民党的外交作了重新探讨,他强调,蒋介石同大国打交道是成功的。^④詹姆斯·里顿·安德森(James Reardon Anderson)则对中共对外关系作了深入研究。在他看来,毛泽东既讲求实用,又咄咄逼人,他的目的在于推翻国民党,但同时在

^① 例如,沙勒(Michael Schaller)《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The U. 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尤其请注意该书的结论部分。

^② 加里奇奥(Marc S. Gallicchio)《冷战始于亚洲:美国的东亚政策与日本帝国的崩溃》(*The Cold War Begins in Asia: American East Asian Policy and the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

^③ 布海特(Russell D. Buhite)《苏美在亚洲的关系,1945-1954》(*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1954*),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1。

^④ 高龙江(John W. Garver)《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88。

向美国提出挑战时又持谨慎小心的态度。^① 在中国历史学家牛军的眼里，中共并非如此，毛泽东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推行温和的政策来达到避免内战的目的。^②

这些新近出现的研究成果，除了对于我形成自己的结论有启发意义外，也使我相信，要对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作出适当的解释，就必须对问题进行多视角和国际性的分析。因此，本书采纳了一种四维的分析模式，以求对中共、国民党、美国及苏联这四方的观念和行为作出一视同仁的解释。采用这样的方法，不仅能使人理解四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也能使人理解每两方之间问题成堆的双边关系。为了进行国际角度的分析，本书的研究将以中美两国新近开放的资料为基础。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和出版物已证明是内容丰富的资料来源，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出版流通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及其他文件集也同样如此。^③ 它同目前可以在美国得到的资料一起使用，这些资料也为重新评价苏联在东亚的意图和行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④

① 里顿·安德森(Lynton Anderson)《延安与列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1944-1946》(*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1946*)，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

②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

③ 1989年春天，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发现在中国可以相对自由地接近图书馆和档案馆，并获得批准利用只在该国才能看到的外交文献。关于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献，见韩德和文安立编《中国共产党和国际事务：一个关于新史料和旧的研究问题的专题报告》(*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Field Report on New Historical Sources and Old Research Problems*)，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90年夏季号，258-272页。

④ 由于缺少关于苏联外交的第一手材料，我们还不得不被迫自上而下地，即从那些能为外界观察者所认识到的行动出发去解释，而无法通过文件来阐释其外交政策的动机。也就是说，不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同标准的分析、解释手段相比，这种方法并非不合逻辑，在理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然而，因为这种方法的本质特征是假设，所以运用起来就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我们不可能通过探究个人(或群体)的立场来解释某些独特的动机是如何产生的。在解释某些事件的特殊背景时，这一方法显然同样缺乏说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用它来综合阐释外交政策时也必然缺乏说服力。对研究者而言，在同样的条件下，这种“假设的方法”作为一种手段是缺乏吸引力的，而且还会制造更多的困难。可是，如果外交政策的本质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那么，为了理解那些还不许外人研究其内部决策过程的国家，就必然要运用这一方法。斯塔弗拉基斯(Peter J. Stavrakis)《莫斯科和希腊共产主义，1944-1949》(*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 1944-1949*)，217-219页，麻省大学出版社，1989)，对类似的方法作了精彩的讨论。

本书的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第二两章,论述了从1944年年中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一时期苏联、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一章集中讨论了导向雅尔塔会议的一系列事件,第二章则着重讨论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谈判。我试图通过这些讨论揭示,罗斯福与斯大林是如何达成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协议的,而这一协议在以后的几个月间又是如何被打破的。第二章还特别对蒋介石之所以欢迎《雅尔塔协定》并寻求与苏联签订盟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本书第三章对毛泽东在1944-1945年间确立自己对外交事务看法的过程进行了探讨。同时,与里尔登·安德森的观点不同,这一章还探讨了中共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强调温和倾向而非采取革命行动的原因。本章还描述了毛泽东关于与苏美合作的信念对中共政策发生的影响,以及当蒋介石与斯大林签约后他又放弃了这一信念的情况。

本书最后四章集中讨论了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间国、共、美、苏四方在中国的互动关系,并试图显示,不断发展的苏美冲突给中国的国共两党都带来了问题。第四、五两章分别对莫斯科和华盛顿在中国进行军事干预以及国共两党试图赢得外部支援的情况进行了讨论。第六章揭示,在一个短时期内,蒋介石得以利用他与苏联人和美国人的关系来对付中共,而毛泽东的党则在外交与军事战略上受到了挫折。最后一章分析了美国试图通过在中国的调停来遏制苏联的影响,也分析了斯大林为挽救与国民党的联盟关系而采取的徒劳措施,以及蒋介石为什么最终决定通过诉诸武力来解决他与共产党人的冲突。

40年代中期中国局势在历史背景上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者采取一种多极的研究方法显得更为必要。正如入江昭(Akira Iriye)所指出的那样,太平洋战争在东亚结束了一个国际体系,同时又促成了一个新体系的诞生。^①直至30年代后期,美国与苏联都一直避免对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行动提出挑战。从1939年起,两个大国又一直在为遏制东京的野心作出努力。然而,苏联的努力在德国的入侵发生后便无以为继,而美国与日

^① 入江昭(Akira Iriye)《冷战在亚洲:历史导论》(*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98-99页,美国新泽西,1974。

本则卷入了一场战争,到1944年年中,这场战争看来已肯定会以日本的战败而告结束。

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苏美两大国都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中国人对东京的抵抗。但是,两国都没有向中国人提供太多的物质支援。相反,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想方设法,要使中国军队在自己同日本的冲突中助自己一臂之力。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曾向中共施加压力,要中共对威胁到蒙古及苏联边界的日本部队发起进攻,但他未获成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曾试图要蒋介石动用其最精锐的部队在华中及沿海地区与日本人对抗,但他同样也未能成功。

中共和国民党的部队都未向来自外国的压力屈服,但在1941年以后,它们互相提防牵制,未同日本人打过任何一场大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相信,美国到头来会打败日本;同时,他们也都知道,战后在中国围绕权力的角逐将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军事实力。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以及国际上对蒋介石政府的承认,都使得蒋介石似乎在这一角逐中占据了上风。可是,日本人出人预料地于1944年发动了一场新的攻势,将仍然盘留在中国中部各省的国民党军队驱赶了出去。这就使得蒋介石的地位受到了削弱,并重新吸引了国际上对中国战争的注意。

第一章

雅尔塔与大国对战后稳定的追求

雅尔塔体系是大国合作的产物，也是蒋介石积极“参与”大国政治的结果；蒋介石得到了苏美两国站在他一边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保证；斯大林获得了美国对苏联在外蒙古和东北特权的认可；罗斯福得到了苏联对日参战和战后苏美在东亚进行合作的保证；谁能料到，这一前冷战时代形成的体系，已在为冷战到来准备条件……

诚如路易斯·菲舍尔(Louis Fischer)所指出：“人们都说雅尔塔会议创造了历史，这其实是言过其实了。”^①就这次最高级会议在东亚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而言，这一论断尤为精确。这些协议都是会前几个月里大国间错综复杂的政治运筹的产物，受谈判本身因素的影响很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苏美两国领导人都试图用一种让双方政府都感到满意的方式对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加以规划，这是雅尔塔会议得以在东亚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基础。罗斯福希望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并把继续同苏联合作视为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最佳手段。因而，无论是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还是在对中国战后安排上，他都希望避免与

^① 菲舍尔(Louis Fischer)《通向雅尔塔之路：苏联对外关系，1941—1945》(The Road to Yalta: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41—1945), 215页，纽约，1972。

苏联发生冲突。斯大林也希望扩展与华盛顿的联盟,以便在实现打垮日本的目标的同时,也获得来自美国的保证,从而使苏联能在东亚获得外交和领土上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直至美英苏最高级会议在克里米亚召开之时,苏美两国的东亚政策都有着鲜明的前冷战特征,而这一点却常常为历史学家们所忽视。^①

大国间会达成什么样的协定取决于中国的事态发展。1944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正为自身的生存而抵御日本人的进攻。这位中国领袖已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敌国会来拯救他的政权。蒋介石还特别希望华盛顿能出面对他与莫斯科的紧张关系进行干预,从而使斯大林能支持中国政府,而不是支持中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对派。在雅尔塔,罗斯福和斯大林试图利用困难重重的蒋介石政权所面临的外交合法性问题来对大国之间的关系起到稳定的作用。结果,蒋介石得到了苏美两国将站在他一边反对他的敌人的保证,斯大林在日本问题上达成了他所需要的交易,而美国总统则因为苏联对日参战的决定与未来苏美在东亚合作的前景而受惠非浅。

1944年秋天,正当苏联军队在东欧节节获胜之际,苏联领导人自1941年以来第一次重新在东亚奉行一种积极进取的政策。当中国与西方国家结盟对日本作战时,苏联人压倒一切的考虑是通过严格恪守中立来防止日本攻打西伯利亚,结果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现在,随着欧洲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政治领袖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亦即为战后在东亚实现自己的两大战略目标而制订新的政策。^②

苏联政策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在任何有关战后的安排中降低日本的影响。虽然日本在太平洋与美国人进行的战争中吃了不少败仗,但斯大林还是觉得难保美国领导人不会与东京议和,而这就会让日本仍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向苏联利益提出挑战。只有苏联在远东参战并参与决定对日和

^① 例如,布海特《苏美在亚洲的关系,1945-1954》,5-8页。

^② 关于对1943至1944年间苏联战略的综合分析,见陶布曼(William Taubman)《斯大林的对美政策:从同盟到缓和再到冷战》(*Stalin's American Policy: From Entente to Détente to Cold War*),58-88页,纽约,1982。

平的条件,才能保证日本不会重新崛起。^①

斯大林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是,要避免中美两国针对苏联利益而在战后结成联盟。这位苏联领袖不喜欢听罗斯福翻来覆去说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之类的话。即使他知道蒋介石的中国距一流甚至二流的军事强国还相差甚远,他仍然担心,美国人意在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充足的军事装备并训练其军队,以便大大地提高它的战斗力。考虑到蒋介石与莫斯科之间过去的紧张关系和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苏联人不欢迎出现一个以美国为后盾的中国,也不希望看到中美友好关系使美国有可能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建立军事基地。如果苏联今后与美国发生什么冲突,这将使美国占据一种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并束缚苏联为支撑自己在东亚的外交活动而动用武力的能力。^②

斯大林及其幕僚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既防止日本发动进攻,又不致搞僵与美国通盘关系的情况下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到1944年10月,苏联领导人已经得出结论,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好方式是对日本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而由于在欧洲的胜利,他们不久就会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采取这项行动了。^③

^① 兰森(George Alexander Lensen)《奇怪的中立:二战中的苏日关系,1941-1945》(*The Strange Neutrality: Soviet - Japa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 - 1945*), 113 - 129页,外交出版社(英国佛罗里达),1972;库克斯(Alvin D. Cox)《诺门坎:日本对俄作战,1939》(*Nomonhan: Japan against Russia, 1939*), 2卷, 1057 - 1062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波伦会后备忘录,附录D,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波茨坦会议》(*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otsdam*), 2卷, 1584 - 1585, 1587 - 1588页,华盛顿,1960;哈里曼(Averell W. Harriman)、阿伯尔(Elie Abel)《前往会见邱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1941-1946》(*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 - 1946*), 350 - 315页,兰登书屋(纽约),1975。1944年初,据美国军事情报部门估计,为了战胜日本的军队,苏联需要一年时间来作准备。见《联合情报委员会,1944年1月13日,第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151/1,盖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梅尔(Paul D. Mayle)《最高级会议终于召开了:原则上的协议和德黑兰会议的三巨头,1943》(*Eureka Summit: Agreement in Principle and the Big Three at Tehran, 1943*), 110页,特拉华大学出版社,1987;高龙江《1937至1945年的中苏关系》,192 - 199页。

^③ 关于苏联对欧洲军事形势的估计,见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通向柏林之路:继续斯大林对德作战的历史》(*The Road to Berlin: Continuing the History of Stalin's War against Germany*), 422 - 430页,科罗拉多(美国),1983。

有三个原因促使斯大林在1944年10月作出了于1945年对日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首先,他希望通过继续维持太平洋战争中的大联盟来保证美国的进一步合作与物资供应。对苏联的战时努力和战后经济重建来说,美国人提供的战略物资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与美国的联盟还能防止西欧国家对苏联的东欧政策采取强烈的反对行动。^①

其次,在1945年实行军事干预将使得苏联在一切有关东亚的战后决定中取得正式的发言权,并有助于防止日美谈判求和。如果日美议和,那不但会把苏联人排除在东亚事务之外,还有可能让日本恢复元气,在亚洲大陆上追逐新的目标。德黑兰会议以后,斯大林就已经知道罗斯福总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来对付日本。现在他认为,如果苏联保证在战争后期对美国提供帮助,将鼓励美国人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如果罗斯福真的决定与日本议和的话,苏联早些动手在东西伯利亚部署军队,也会使莫斯科更容易在东京最虚弱的时候逼迫日本人作出让步。

第三,斯大林还希望通过至少部分地收回前俄国在东北亚所拥有的特权来提高苏联在战后的影响力。他希望先争取美国接受这些要求,那么中国即便想要抵制这些要求,也无法得到美国的支持了。这样一来,这位苏联领袖不仅能获得他想要得到的对方让步,还有望利用关于他所谓的“苏联政治要求”的谈判来离间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②

选择恰当的时机是苏联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1944年中,虽然欧洲的冲突已经接近尾声,但斯大林仍在担心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在击溃德国之前,他不能给日本人以任何进攻苏联的口实,哪怕必须以缩减东部的

^① 海林(George C. Herring Jr.)《援助俄国,1941—1946》(Aid to Russia, 1941—1946),144—167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3。德黑兰会议以后,罗斯福试图让苏联人认为自己对东欧问题持一种介于邱吉尔和斯大林两个极端之间的折衷立场。见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记录,1943年12月1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德黑兰会议》(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ehran),594—595页,华盛顿,1961;又见三方政治会谈记录,同上书,602—603页。

^② 斯大林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告诉他,在国民党和外国列强之间有矛盾,这些矛盾可以被用来为苏联的安全服务。这一想法可以从他17年前的谈话中看出来。那是在1927年,他认为在国民党中存在着强烈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因素。斯大林《关于中国》(Sochineniia),见《著作》(Works),9卷,331—362页,莫斯科,1947;又见乌拉姆(Adam Ulam)《斯大林其人及其时代》(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274—277页,纽约,1973。

备战来安抚东京。6月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在见到斯大林时提到了对日作战问题,这位苏联领袖只是含糊其辞地暗示说,他准备在打败德国后的某个时候参战。斯大林拒绝在东亚问题上对美国人作任何许诺,这是他自德黑兰会议以来的一贯做法。

到10月初,当哈里曼又来探询时,斯大林已经决定向美国人展示在东亚开展全面军事合作的前景。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是盟军在法国登陆成功预示着欧战会提前结束。另外,罗斯福在8月末的一封信件里敦促斯大林作出承诺。还有,这位苏联领袖也预期一次新的盟国最高级会议将会很快召开,因而希望能显示自己是乐于扩大军事合作的。最后一点是,斯大林刚刚收到中国政府的第一个直接暗示:它愿意和莫斯科谈判。^①

中国人的主动为这位苏联领袖提供了解决遗留问题的机会。斯大林初次卷入苏中关系是在20年代,当时他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建议: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这一建议不仅使中共损失了大部分党员,也差点毁掉了斯大林自己的政治生涯。1937年,斯大林向中共施加压力,要中共同蒋介石联合,以便打击在30年代晚期已对苏联远东地区构成威胁的日本。直到1941年,斯大林一直在帮助中国政府,向它提供用以抵抗日本的军事装备。尽管战时他和重庆在关于苏联在新疆、蒙古的军事存在问题上有着冲突,但他仍然相信与蒋介石签订一项战后条约是有利并

^① 哈里曼致罗斯福电,1944年6月11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4),1944,4卷,965-967页,华盛顿,1965;哈里曼致罗斯福电,1944年10月15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雅尔塔会议》(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Yalta),368-371页,华盛顿,1955;哈里曼致莫洛托夫电,1944年8月2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984页,1944,4卷;傅秉常致蒋介石电,1944年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3编2册,404-405页,台北,1980;高斯敦赫尔电,1944年7月31日,59组文件,国务院记录(核心文件),893.00/7-1344,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可行的。^①

1944年10月中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数次会见哈里曼时,十分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目标和难处。斯大林说,在同日本人开战之前,他想把远东的苏军力量翻一番,而这种集结可以在部队从欧洲腾出手来后的两个半至三个月内完成。但是,调集军队要求大量的食品、燃料,铁路设备必须在战事爆发前到位,抵达苏联远东地区。斯大林说,运贮工作应该马上着手进行,并向美国人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补给清单。斯大林的下一个建议肯定让哈里曼及其军事助手约翰·迪恩(John R. Deane)将军吃了一惊:这位苏联领袖不仅宣布美苏对日作战行动的共同策划应立刻开始,还提出苏联人在参战之后将会让美国人使用位于彼得巴甫洛夫斯克、滨海各省和堪察加半岛的空军基地。^②

斯大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于,苏联绝不能在完成位于远东的军事准备前便与日本开战。他下令,向东西伯利亚、滨海各省输送武器、补给以及苏联就参战问题与美、中两国政府进行的交涉均属最高机密。1941年德国的突然袭击几乎要了苏联的命,即使日本在1944年秋天已被太平洋战争大大削弱,但苏联和美国的专家们相信它仍然具有攻打苏联的能力。11月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如果日本部队选定当月发动进攻,它们有能力楔入东西伯利亚,切断苏联的生命线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而孤立滨海各省。对苏军来说,日本的进攻将意味着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役,也

^① 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夏莲荫(Julie Lien-ying How)《革命使者:苏联顾问与国民党中国,1920-1927》(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413-425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杨芸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关于30年代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概要,见列文(Steven I. Levine)为他本人翻译的卡尔亚金(Aleksandr Ya. Kalyagin)的《沿着国外的道路》(Along Alien Roads)一书所写的导言,1-13页,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1983年专题论文。

^② 哈里曼致杜鲁门电,1944年10月1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雅尔塔会议》,368-369页;哈里曼致杜鲁门电,1944年10月17日,同上书,370-371页;迪恩致参谋长联席会议,1944年10月17日,同上书,371-374页。

意味着要从激战正酣的东欧拨出装备和军队。^①这样的局面当然会使苏联领导人产生严重的担忧,并促使他们奉行慎重的东亚政策。^②

在同美、中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很明显地也同样小心谨慎。甚至当莫斯科已就共同对日采取行动的问题于10月间开始与美国人谈判后,斯大林仍然回避就此制订任何详细的计划。克里姆林宫也落入常套地拒绝了美国侦察小组访问苏联远东地区的所有申请。对于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的美国军事运输体系一事,斯大林完全不感兴趣。12月16日,苏军参谋长阿列克塞·安东诺夫(Aleksei Antonov)将军通知迪恩将军,苏联人必须对在滨海各省设置美国空军基地一事重新予以考虑,而这是斯大林早在10月间就已表示同意的。安东诺夫说,苏联自己的军队“需要使用该地区的全部海空基地”。^③

导致上述“重新考虑”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苏联不愿让外国部队驻扎在它的国土上,还在于苏联害怕这会刺激日本发动进攻。当10月间斯大林表示可以让美国建立这种基地时,欧洲的军事形势明确地显示出对德战争将很快就会结束。12月中旬,当安东诺夫将军屡次回绝美国在远东地区设立基地的请求时,正是德国军队发动其实是他们在战争中最后一次大攻势的时候,这使得苏联与美国对欧洲战争何时结束的前景估计大大地暗淡了下来。^④

斯大林遵循自己谨慎从事的政策,在从德黑兰会议举行到筹备召开雅尔塔会议的这段时间里避免提及苏联的领土要求。在苏联领导层看来,美国是由于受到中国军事形势的影响才对苏联对日参战问题发生兴趣

^① 俄国参加对日作战,1944年11月23日,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7页,1176,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在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认识到,在苏联的决策过程中,这一担忧起了主要作用。迪恩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45年1月22日,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1176,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③ 《在修正过的对俄政策指导下采取特别行动》,1945年4月16日,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1313/1,附件A的附录A,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④ 《堪察加调查报告》,1945年2月4日,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1176/8.3部分;迪恩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45年1月22日;情报分析,1945年1月22日,联合战略计划,603,附录A。均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的。所以,蒋介石的境况越糟糕,莫斯科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就越有可能得到华盛顿的支持。他们还懂得,苏联过分的索求会遭到西欧盟国的抵制,并很可能会降低美国政府在亚洲乃至欧洲与莫斯科合作的积极性。

正如斯大林所预料的那样,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状况于1944年底恶化到了七年抗战以来的最低点。日军攻克了中国政府方面在华中的许多据点,并对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和四川省会成都形成了威胁。国民党政要们已在公开讨论要把政府迁到位于偏远的西南地区的云南昆明去。1944年末,蒋军的处境一周比一周恶化。12月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策者们甚至不得不就此进行讨论:要是蒋介石政府活不下去了,或是移迁到了昆明,那么美国是否还能够在中国大陆上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① 斯大林了解中国在军事上的绝望处境,因而期望美国人能说服他们的中国盟友接受苏联的要求。

12月初,苏联领导人决定采取两项和东亚相关的重要步骤,这两项行动都是为即将来临的最高级会议所作的准备。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们满足了蒋介石派他的外长宋子文来莫斯科的愿望。从11月初起,斯大林就一直表示他对同中国人举行高层谈判感兴趣,现在已将这一会谈的时间定在1945年2月底。^② 斯大林这么做,也是向美国总统发出信号,表明他愿意与中国人达成协议,并同时强调了大国间在领土争议问题上达成谅解的迫切性。

12月的第二个星期,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大使哈里曼谈到了苏联在东亚的领土要求。这位苏联领袖以自己虚张声势但又讲求实际的典型风格,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根据哈里曼的说法,斯大林“走进隔壁房间拿出了一张地图。他说千岛群岛与南库页岛应归还俄国……他画了一条线,把包括亚瑟港(即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圈了起来,说俄国人意欲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

^① 联合决策团第182次会议,1944年12月6日,218组文件,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赫尔利致斯坦丁纽斯电,1944年12月24日,59组文件,893.00/12-2444,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接着,斯大林告诉美国大使说,苏联还打算要向中国租借联结苏联国境与大连的中东铁路。“德黑兰会议只忽略了一件事”,斯大林说,那就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亦即维持外蒙古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地位”。这些要求并不令哈里曼感到惊奇。他惟一的直接反应是提醒斯大林说,罗斯福更希望大连成为自由港而不是苏联的租借地。大使的回答对这位苏联领袖无疑是一种鼓励。^①

有的苏联领导人大概已经认识到,他们的计划存在着一个漏洞。当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省时,苏联人无力左右的中国政治形势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莫斯科需要避免使中国共产党人和蒋介石政府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因为苏联人觉得这会增加蒋介石与苏联签约的困难。1944年夏,塔斯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安纳托利·普拉夫金(Anatolii Pravdin)曾告诉美国记者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一旦俄国对日开战,“局势将变得非常棘手,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会提供合作,但俄国却必须特别当心,不可授人以柄,让人指责它的目的是使东亚布尔什维克化”。普拉夫金解释说,由于重庆和国民党远离战场,“由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区域将成为重心”。^②

在莫斯科眼里,解决中国政治纠纷的理想办法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订立政治协议,该协议可以为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或至少为组成一个共产党人能与之合作的政府开辟道路。它还会减轻蒋介石对苏联支援中共的忧虑,从而为中国和苏联达成谅解创造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每逢与西方人谈话时,斯大林总是蓄意淡化苏联共产党和中共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6月10日,这位苏联领袖在与哈里曼的会谈中便拿“人造黄油共产党人”来形容中共,这一称谓以后常常被人们引用。不过,

^① 哈里曼致罗斯福电,1944年12月15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雅尔塔会议》,378-379页。在给总统的电报里,哈里曼担心的并不是苏联人获得领土方面的特权这件事,而是他们在满洲驻军以保卫他们想要控制的铁路。

^② 李普曼与格鲁会谈备忘录,1944年5月17日,1944年5月的会谈,格鲁文件,MS1687.3.6卷,(3),盖哈佛大学哈顿图书馆。

斯大林坚持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应当利用他们来打击日本。^① 苏联领导人既希望让大家把毛泽东的党看做战斗中的盟友，又担心华盛顿会因为莫斯科和中共的意识形态联系便对苏联参战不感兴趣了。

一些开明的国民党政客也对中苏关系中政治意识形态与实际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少数国民党领导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和苏联进行某种合作的必要性——党的奠基者孙中山之子孙科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944年夏，孙科将国共关系视为能否与莫斯科实现谅解的关键，“这是因为苏联进攻满洲或华北时需要中共的配合，因此会给国民政府造成困难”——如果到那时两党之间的联合政府还未能建立的话。^② 然而，重庆最有影响的决策者们并不赞成孙科的观点。

到1944年，中国政府和日本的战争已逾七载。战场上的胜利却始终遥不可及，甚至连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胜利也难得一见。至于打不了胜仗的原因，人们经常提到的有三条：国民党军事机构内根深蒂固的腐败无能；国民党军队缺乏与包括华北共产党部队在内的地方抵抗武装合作的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斗力强劲、装备精良的日本皇军拥有战略上的优势。1944年暮秋，侵略者不但控制了东北各省、沿海地区、华北及华中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而且正对在战时的大半时间里是国民党政府基地的富庶的四川省构成威胁。^③

蒋介石需要抗拒的不仅是日寇这个敌人，来自分离主义分子和共产主义者向他那已经被战争拖得孱弱不堪的政权提出的挑战同日本人一样危险。自20年代以来，蒋介石便把为自己领导的政府设计的一项统一中

^① 《消息报》(Izvestia), 1944年11月30日；哈里曼致赫尔电，1944年6月22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6卷，799页；哈里曼致罗斯福电，1944年6月11日，同上书，97页。

^② 高斯致赫尔电，1944年7月27日，59组文件，893.00/7-2744，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③ 齐锡生(Hsi-sheng Ch'i)《战时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77-81页，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2；易芳逸(Lloyd E. Eastman)《毁灭的种子：战争和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138-146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

国的战略当做首要任务。直到1937年日本入侵,他似乎已成绩斐然,至少以今昔对比的眼光来看,这一评价并不为过——当初国民革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他的党成不了气候;结果他不仅迫使大多数地方军阀臣服于中央政府,还通过在中国西部连续追剿红军,令其严重减员,终于将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困于北部山区。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政权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对日战争则破坏了所有这些成就。^①

20年代后期,蒋介石及其政府制定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是,不让中国国内的反对派获得任何外来援助。作出这项决策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虽然国民党领导人分别属于不同的宗派和地方团体,他们却一致认为,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军事上的成功赋予了党的元首统治中国的权利。蒋介石和他的拥护者们坚信,人民已经认可了这一权利。接下来的结论当然就是:中国任何致力于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党派几乎全都是受了外国势力的操纵。另外,国民党领导人还认为,与他们在国内对手相比,他们享有可以摧毁一切与他们作对的党派的巨大军事优势。只有当一个或多个反对派集团获得了国外的积极支援之时,国民党的这种军事优势才能丧失。^②

在蒋介石看来,在1944年推行该战略就意味着要依靠盟友美国和英国来打败日本。他认为,随着日本的失败,得到日本支持的南京汪精卫政权与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各省后在东京扶植下建立起来的满洲国也将寿终正寝。但是,除此之外,他还需要防止苏联对中共、新疆的暴乱分子和外蒙古的自治政权提供帮助,以便为国民党统一中国廓清道路。同样,他还必须防止美国人改弦更张去支持别中国政府。尽管他深知一些在华供职的美国人对他的独裁政权怀有敌意,但他仍有把握断定,除非他的

^① 齐锡生《战时的国民党中国》,227-233页。

^② 蒋介石《战争和革命中的胜利》,载中国国民党宣传部编《蒋委员长战时通讯,1937-1945》(*The Collected Wartime Messages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2卷,803-807页,纽约,1946。关于国民党对民族团结的理解的引人入胜的讨论,见韦慕庭《国民党政权领导下的军事分离主义与重新统一的进程,1922-1937》(*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1937*),1卷,203-263页,载何炳棣和邹说编《危机中的中国》(*China in Crisi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

政府在军事上崩溃,或者美国和苏联在创立一个新政府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否则华盛顿是不会取消对他的援助的。^①

甚至在与日本斗争的百忙之中,蒋介石也能利用其他大国的弱点从中渔利。1911年以来,中国政府首次控制了辽阔的西北新疆的大部分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正逢苏联面临的形势异常困窘,没有哪个中国地方政权有可能取得来自莫斯科的支援。即使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西方盟国答允放弃自己的条约特权以及在华租界,这也成了蒋介石的一次胜利:似乎帝国主义国家渐渐明白了,它们只有通过与其的政权合作才能在将来和中国建立外交与商贸关系。最后,蒋介石还成功地向美国人摊牌,迫使美国人应他的要求召回了在华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对国民党领导人而言,这一成功象征着罗斯福总统在中国找不到其他可接受的权力中心。^②

蒋介石为了度过战争结束前那几年所面临的危机,通过由国民党控制一个为国际上所承认的中国政府来击败自己在国内的敌人。要推行这一战略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需要美国政府继续提供支持。蒋介石知道,无论是为了打垮日本的军事进攻,或是为了平息国内对他的政权的挑战,他都离不开美国的援助。第二,需要国民党政府维持足够的地盘以保持来自大国的承认。如果蒋介石政权能坚守住它现有的已获承认的地位,那么所有想在中国捞点好处的外国势力都得与重庆打交道。至于这种地位到底有多么重要,国民党领导人早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就从他们的对手对国外影响的娴熟运用中领教了。

1944年,最有可能庇护蒋介石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是苏联。蒋介石讨厌苏联人,在20年代中期国共合作及1927年后国民党的剿共行动中,苏联一直鼓励共产党人同他的政权对着干。尽管在30年代初的内

^① 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24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546-547页,台北,1978。

^② 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中国中亚地区的军阀和穆斯林:民国时期新疆政治史1911-1945》(*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1911-1949*),157-163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高龙江《1937年至1945年的中苏关系》,164-177页;梁敬德《史迪威事件》,271-306页,台北,1982。

战期间,莫斯科并未向中共提供物质上的援助,这位国民党领袖仍然相信克里姆林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因此共产党将来十有八九能得到苏联的援助。蒋介石还认为,要是没有莫斯科的鼎力支持,新疆和蒙古的自治政权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并怀疑其他地方派别(主要是在满洲)希望跨过北部边界同苏联勾结。在以上各方面,蒋介石发现了苏联对中国领土的潜在威胁,他焦急地盘算着怎样才能挫败他的政敌或不安分的少数民族团体取得苏联援助的企图。^①

虽然国民党领导人大都觉得苏联在亚洲参战是迟早的事,但他们为此所作的相应的政策调整却十分缓慢。直到1944年夏季,国民党领导人才开始放弃通过国内国际的反苏宣传向莫斯科施加压力的政策。坚持反苏宣传的部分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对蒋介石和大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来说,苏联恰恰代表了他们在自己国内加以抵制的阶级斗争与社会激变思想。于是,这个北边的邻居就成了他们的基本价值观的敌人和他们寻求政治平稳、社会安宁的羁绊。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又被存在于国民党内(其实不妨说是更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知识阶层内)的一种普遍疑虑所强化,那就是,俄罗斯一贯觊觎中国领土。最后,重庆政权在中苏关系中缺乏新的主动精神应归咎于其外交政策制订上的惰性,而造成惰性的原因则在于党内各派系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随之而来的提心吊胆——生怕提倡改变外交政策会招来争论和指责。^②

1944年秋,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蒋介石就如何才能使外交战略发挥最大作用所进行的重新评估导致了国民党对苏政策的变化。那几个月里,美国人一直在加紧努力改善中苏两个盟友之间的关系。在5月11日的一次会见中,罗斯福总统告诉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重庆政府与苏联实现谅解是完全必要的。他说,假如没有这种谅解,战后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就危险了。他还着重指出,美国愿意帮助中国与苏联相互接近。6月1日,驻

^① 董彦平访问记录,藏台北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② 魏道明致蒋介石电,1944年4月30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3编1册,170页;张玉法、沈松桥《董文琦先生访问记录》,台北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之十二,59-61页,台北,1986。

苏大使傅秉常从莫斯科向重庆报告，那里的美国代表们正迫使中国修改同苏联的关系。美国显然已经为中国派代表与斯大林举行会谈扫除了障碍。^①

蒋介石认为，1944年中期是取得美国人积极援助对付莫斯科的好时机。他先是向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发出呼吁，请美国在中国与苏联人的谈判中支持中国。然后，他又提议派遣宋子文出访克里姆林宫。国民党报刊仍在不停地攻击苏联，据此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希望斯大林回绝这第一次试探，接下来重庆就能以苏联领袖拒绝谈判为由来引诱美国提供进一步援助。^②

蒋介石在6月间采取的主动行动一无所获。这位中国领袖辩解说，美国人误导了他。罗斯福总算听从了国务院的一次建议，驳回了蒋介石要美国立刻派华莱士在重庆和莫斯科之间进行斡旋的恳求。罗斯福告诉蒋介石说，如果国民党未能“就在华北切实开展抗日战争问题与中国共产党人达成行之有效的协议”，华盛顿将不会担任调停人的角色。^③美国没有在答复中作出再次向斯大林直接提出倡议的保证，这被蒋介石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倒退。^④

不过，蒋介石在6月采取的主动行动确实标志着中国政府政策的转变。公开的反苏宣传逐渐减少了，蒋委员长还连续会晤苏联使馆的代表。在这些会晤中，他试图弄清，作为两国政府间交易的一部分，他能指望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些什么东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苏联是否会对“解决中共问题”提供帮助。苏联代办对他却无可奉告。很明显，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是：

^① 魏道明致蒋介石电，1944年5月11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3卷1册，173-174页；傅秉常致蒋介石电，1944年6月1日，同上书，2册，404-405页。

^② 梅里尔致赫尔电，1944年6月28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年，6卷，235页；高龙江指出，蒋介石在7月中旬下令国民党的通讯社停止攻击苏联。高龙江《1937至1945年的中苏关系》，206页。

^③ 赫尔致高斯，1944年7月14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年，6卷，245页。

^④ 谈话记录，1944年7月19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765-767页。又见高龙江《1937至1945年的中苏关系》，204-205页。

不管这位中国领袖说些什么,尽量少同他搭腔。^①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领导人卷入了一场内部争吵,主题是怎样和苏联人打交道。随着军事局势的恶化,争吵愈加激烈。11月中,蒋介石政府的成员王世杰在给委员长的一份备忘录里强调,主要是出于“解决”中共问题的需要,有必要改进与莫斯科的关系。但是,王世杰的备忘录也表明,要让国民党领导人提出同苏联重新接近的具体方案在政治上是极其困难的。备忘录显示,发生在1944年秋的这场争吵所涉及的并不是如何作出政策选择的问题,而是一场有关对苏态度的论战。王世杰和宋子文等人主张靠拢苏联,他们同不管情势如何都拒绝考虑向苏联敞开大门的守旧派展开了辩论。^②

10月中旬,驻英大使顾维钧汇报了他与罗斯福的首席军事顾问、海军上将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的谈话,此后似乎蒋介石本人的想法便发生了变化。顾维钧写道,李海告诉他说,如果莫斯科成为战胜日本的盟国之一,美国将不反对苏联接管东北港口旅顺。李海还相信,不管怎样,苏联很快就会在东亚参战。^③读了顾维钧的电报,蒋介石断定,美国和苏联显然已开始考虑苏联参战的条件问题,而美国人则期望中国至少会同意他们将就不冻港旅顺作出的安排。^④

当时,蒋介石对于美苏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商讨苏联参战问题并没有丝毫不满。正是战事的发展迫使华盛顿与莫斯科探讨东亚的战后安排问题,从而也使得美国在中苏关系中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在这位国民党领袖看来,等到他和莫斯科谈判时,美国的这一新角色可以为他的政权增添新的筹码。^⑤

^① 蒋介石与苏联代办谈话备忘录,1944年9月14日,《中苏外交问题专辑》,同上书,十位数档案062.235000.3(2);蒋介石与苏联代办谈话备忘录,1944年10月12日,十位数档案062.235000.3(2),均藏台北史证编译局。

^② 王世杰致蒋介石电,1944年11月13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3编2册,538页。

^③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4年10月14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3编2册,539页。

^④ 蒋永敬《宋子文史达林中苏条约谈判纪实》,载《传记文学》320期,79页,台北,1988。

^⑤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629页。

由美国代表向蒋介石传达的苏联要求并没有使他感到吃惊。早在1944年1月份自德黑兰返回后,罗斯福就告诉魏道明大使说,美国支持大连港的国际化,也支持让苏联获得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蒋介石一定认为,尽管当时对斯大林在大连与中东铁路问题上有些什么具体想法还不清楚,尽管这位苏联领袖已经把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旅顺加进了他开列的清单中,然而只要能和莫斯科达成协议,这些条件便还是属于相对宽厚的。他希望,作为交换,最好能由美国充当中苏条约的担保人,以便杜绝苏联向中国的一个敌对政权提供支持的可能性。由于蒋介石当时在对日作战时所处的局面,以及他与史迪威的争论而造成的中美关系的紧张,美国的这种新角色是一个受他欢迎的转折点,而且说明事情有了新的进展。^①

期待美国采取主动行动大概是11月初蒋介石不接受斯大林要他访问莫斯科邀请的主要原因。既然他指望美国人提供斡旋,那么在华盛顿引诱苏联提出全部要求之前,拖延去见斯大林便是上策。蒋介石盼望能从美国人那里得知莫斯科是否补充了什么新的实质性要求。欧洲的形势发展也使国民党领导人希望欧战不久便会结束,而莫斯科和华盛顿或许会在解决欧洲问题上闹翻。他们认为,无论出现哪种情况,苏联在东亚参战的前景便会出现疑问。另外,蒋委员长可能觉得明智的做法是把中苏莫斯科会谈与史迪威危机之间的时间间隔拉大。假如他要会同美国人一起对付斯大林,也应等到重庆和华盛顿关系好转后再付诸行动比较合适。^②

结果,罗斯福并不像蒋介石所盼望的那样富于合作精神或健忘。11月16日,罗斯福接见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时教训他道,要是中国军队不团结一致反击正在挺进的日军的话,中国就会面临一场军事灾难。据孔祥熙向蒋介石报告,罗斯福着重声明,苏联并不支持中共,现在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的时候了。罗斯福对重庆的警告一清二楚:苏联人必须参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868-869页;又载高龙江《1937至1945年的中苏关系》,208-209页。

^② 《机密外交部通讯》,1944年10月25日,8期,1-2页,藏中国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1-6-342组文件。

战,你们应该预先收拾好房子。^①

蒋介石把罗斯福的警告理解为总统重申了以前的条件:如果国民党立即着手和中共谈判,美国人将代它向苏联人求情。蒋介石目前需要让美国总统明白他已经领会了华盛顿的条件,因而他于1944年11月通知罗斯福的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说,他愿意与延安的共产党总部谈判。由于这一“愿意”说明蒋介石至少表面上还是服从美国人的,一些历史学家便感到奇怪,在雅尔塔最高级会议前关键的几周里,国民党何以未能通过外交途径更积极地同华盛顿交流它对苏联人的要求?这种明显缺乏主动性的行为很可能是因为蒋介石相信,假如苏联还有尚未通知中国人的其他要求,罗斯福是会与他磋商的。另外,12月头几个星期对日战争的军事局势已经严重恶化,蒋介石或许认为,向美国人施加任何压力都会减少美国保卫国民党在中国西部岌岌可危的据点的意愿。^②

尽管蒋介石并未在高层采取主动行动,但在雅尔塔会议前的数周里,中国官员们确实在对美苏就中国问题所展开的接触进行研究,并试图对之发生影响。1月4日,中国民主党领袖张嘉森(即张君勱)及其弟——长期任蒋介石助手的张嘉璈会见了美国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张氏兄弟着重指出:“俄国可能占据满洲,中国对此非常焦虑。”同时,他们强调中国十分愿意为苏联提供经该地区通往大连或旅顺的过境权,并希望这两个城市中的一个能被宣布为开放口岸。^③两周后,蒋介石的心腹之一邵毓麟力图让格鲁详述美国重建东亚战后秩序的计划,但格

^①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44年11月16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3编2册,202-203页。罗斯福在两天后给赫尔利的一封信中继续写道:“我希望你告诉委员长,我坚信俄国人和我持同一看法,那就是,如果委员长与华北的共产党部队达成一项行之有效的协议,它将会大大加快实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这一目标。我现在不能对你说得太多,但他会接受我的这番话的。你不妨向他强调‘俄国人’一词。”罗斯福致赫尔利函,1944年11月18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年,6卷,703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44年12月2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3卷下册,645-646页;胡世泽日记,1944年12月8日,胡世泽文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③ 张嘉璈、张嘉森与格鲁谈话备忘录,1945年1月4日;格鲁谈话,1945年1月1日至4日,格鲁文件,MS1687.3.6卷,(11),藏哈佛大学哈顿图书馆。

鲁故意不作具体答复。^①

到雅尔塔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召开时,中国紧急的军事状况略有和缓。日本人撤出了南方广西的部分地区,这多半是重庆与东京进行政治交易的结果。^②但蒋介石知道,他的军事溃败将使苏联人在答应对日参战问题上提出愈加苛刻的要价。就如同1944年底宋子文所说,国民党领导人认为罗斯福原本要让中国担负起解放东亚大陆的重担,可是过去一年的经验已使美国总统明白国民党军队对此是无法胜任的。宋子文认为,正是这一战略上的转轨,美国人才觉得有必要拉苏联参战。^③

宋子文是在哈佛受的教育,他比其他大多数中国观察家更了解美国的用意。到1944年夏末,正当美国在太平洋及欧洲捷报频传之时,东亚大陆的战事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失利,这使得华盛顿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大大为光火。美国官员们怪罪蒋介石政府抵挡侵略者进犯时不但不卖力气而且无能。在华任职的美国官员对国民党腐败和派系斗争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他们认为这会削弱中国的战斗力。中国政府并没有打一场美国式的战争。随着美国人步履艰难地在太平洋上夺取了一系列胜利,罗斯福总统不得不考虑:要在中国击败日本,有哪些可行的选择,每种选择又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影响。

理查德·曼塞尔(Richard Manser)在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中证明,从珍珠港事件发生到1944年中期,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总统期待着中国助战,盼望美国的训练和供给能使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某些方面打击日本人。这种战时合作还会为战后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奠定基础。正像英国在西欧和中欧所做的那样,中国可以与华盛顿合作控制东亚,这样就免得美国直接出面动武了。罗斯福似乎根本不操心他本人的政治理想和蒋委员长的政治理想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异。^④

^① 邵毓麟与格鲁谈话备忘录,1945年1月27日,格鲁谈话,1945年1月27日,格鲁文件,MS1687.3.6卷,(19),藏哈佛大学哈顿图书馆。

^② 曼塞尔(Richard Manser)《罗斯福与中国:从开罗到雅尔塔》(*Roosevelt and China: From Cairo to Yalta*),坦普大学(美国)博士论文,252-256页。

^③ 蒋永敬《宋子文史达林中苏条约谈判纪实》,80页。

^④ 曼塞尔《罗斯福与中国:从开罗到雅尔塔》,200-201页。

在华盛顿,很少有谁理解中国为什么总是试图将美国人眼里的苏联形象搞得更加可疑。中国军队的处境已经够惨了,大部分美国官员实在搞不懂,为什么重庆看上去仍然热衷于刺激莫斯科。例如,蒋介石把1944年春天在新疆爆发的种族暴动描绘成受到苏联煽动、获得苏联援助的对中国的侵犯。美国驻华使馆及驻当地领事馆均认为,叛乱的真正起因是地方问题以及来自外省的国民党官员对问题处理严重不当。他们未发现苏联合谋煽动暴动的证据。国务院赞同这些论断。^①

罗斯福与他的军事顾问们在战争初期就告诉莫斯科,他们希望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不过美国人知道,苏联在对德战争完全结束前参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告诉罗斯福,苏联无力从事两线作战。所以,罗斯福的盘算大概是,当苏联可以参战时,中国军队已趁日本军队调兵抵御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强劲攻势之机收复了大片失地。当中国和苏联发起攻势时,其结果自然是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溃败,美国也就用不着在这条战线上投入数十万部队去打仗了。^②

到1944年初秋,事实证明这些期望只是幻想。一方面,国民党政权甚至连攻击日本的计划都没有。另一方面,斯大林仍要为进攻东亚做各种庞杂的军事准备。如果美国政府坚持要彻底战胜日本,罗斯福现在就得打算要么在中国战区动用美国部队,要么设法调遣中国军队,并要克里姆林宫开始备战。8月末,当罗斯福试图催促斯大林在东亚采取主动行动时,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到那时为止最令他振奋的答复。

在中国方面,罗斯福从1944年初夏以来便一直试图迫使蒋介石让史迪威将军统辖全部中国军队,以便统一指挥,激发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增加这种压力,罗斯福决定派遣他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和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Nelson)到中国去。为了争取斯大林作出苏联支持蒋介石政府的保

^① 1944年6月重庆美国驻华使馆政治报告,1944年7月17日,59组文件,893.00/7-1744;美国驻迪化领事馆致斯坦蒂尼斯,1944年12月10日,893.00/12-1044。均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43年11月28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德黑兰会议》,499-500页;又见曼塞尔《罗斯福与中国》,127页。

证并欢迎美国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赫尔利和纳尔逊途中在莫斯科作了停留。斯大林允诺了上述两点。9月16日，当中国的军事形势继续恶化之际，罗斯福提出要蒋介石同意让史迪威出任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因为罗斯福很清楚，假如一个美国将军当上了蒋介石部队的指挥官，那么这一地位就能提高美国对中国制订作战方案乃至制订外交政策时的影响力。^①

9月23日，蒋介石答复美国总统说，他不能接受史迪威。两周后，这位中国领袖又回绝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妥协建议。蒋介石的态度使罗斯福确信，中国目前的局势已经是无可救药了。这一信念对罗斯福在东亚地区的长期战略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在蒋介石就史迪威问题作出最后答复的当天，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自莫斯科告知罗斯福，一旦打败德国，斯大林肯定会立即对日宣战。罗斯福下定决心了。几天以后，他与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谈到，他已决定美军将不在中国登陆。他对史汀生说：“至于中国大陆上的战斗，我们必须把它留给俄国人去打。”^②

罗斯福现在就等着斯大林作出反应了。斯大林在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对美国驻苏武官迪恩将军说，苏美两国应当立即动手共同筹划东亚的战争。他还答应，当苏联向日本发起攻击后，他将在滨海各省和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地区选出供美国空军使用的机场。斯大林的这些保证不仅意味

^① 对苏联的后勤方面的支持，1944年6月9日，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901，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哈里曼致莫洛托夫电，1944年8月20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年，4卷，984页；斯大林致罗斯福电，1944年8月22日，同上书，985页；哈里曼致赫尔电，1944年9月5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年，6卷，255页；罗斯福致蒋介石电，1944年9月16日，同上书，157-158页。

^② 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Stimso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629-642页，纽约，1972；邱吉尔致罗斯福电，1944年10月11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年，4卷，1010-1011页；史汀生日记，1944年10月13日，藏耶鲁大学图书馆；唐纳森(Stein Tomnesson)认为，在1944年底，罗斯福仍然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登陆这一前景感兴趣。参见《1945年的越南革命：战时的罗斯福、胡志明和戴高乐》(*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of 1945: Roosevelt, Ho Chi Minh, and de Gaulle in a World at War*)，202-212页，伦敦，1991。

着苏联人已经许诺参战,还表明他们准备同美国协调作战计划,并与美国空军配合发起进攻。对罗斯福而言,苏联的承诺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这是莫斯科首次允许美国或英国空军使用苏联或欧洲苏占区的基地。总统盼望和苏联的联盟能够持续到战后,他既把斯大林突然乐于开展军事合作的举动视为苏联意向出现了令人鼓舞变化的标志,也把这看做促进两国之间战后合作的一条新的纽带。^①

现在,罗斯福认为他已经为赢得对日战争的胜利设计好了战略。这本来并不是他心目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但看来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战略抉择。尽管如此,中国问题依然棘手。在1944年底第三次当选总统后仅仅几天,罗斯福便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商量,应当如何处理中国问题。虽然他不再指望中国发动任何军事上的大反攻,但却仍然期待不必依靠苏军去打满洲以外的日本军队。在谈及中国时,他对哈里曼说:“要是俄国人进去了,他们还会出来吗?”^②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有着雄厚的武装力量,要想在这一地区组建起可以用以驱逐日本人的非苏联的武装部队,唯一的手段便是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和解。哈里曼向罗斯福汇报说,斯大林也需要这样的协议。这位苏联领袖意欲运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付日本人,如果他们不加入国民党军队,事情就比较麻烦。据哈里曼讲,斯大林将向中共施加压力,要它同意蒋介石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另一方面,哈里曼又告诫道,假如国共和解不能实现,苏联最终大概会支持共产党反对政府。^③

哈里曼的报告提醒了罗斯福:即使他通过军事合并的捷径来谋求解决国共之间问题的愿望未能奏效,国共两党达成政治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有证据表明,罗斯福确实既想让共产党人在中国的战争中扮演主要角色,又想让它参加联合政府。他不相信中共被莫斯科操纵,因而继续称呼中共为“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或许他甚至希望“在华北的中国武装部队”能在苏联红军将要开进的地区证明中国民族利益的正统性。美国青年军

^① 达莱克(Robert Dallek)《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1932-1945》(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504-505页,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79。

^{②③} 哈里曼《前往会见邱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1941-1946》,370-371页。

官埃文斯·卡尔森(Evans Carlson)曾向罗斯福简要介绍过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晤情况。11月15日,总统写信给他说:“祈盼与所谓的共产主义者认真地探讨形势,商议对策。”^①

11月8日,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去了延安,为国共间达成协议做工作。三天后,他返抵重庆,不但成功地带回了如何平息冲突的建议,还带回了中共杰出领导人周恩来亲自同蒋介石进行谈判。罗斯福不知道,由于赫尔利不熟悉中国复杂的政治游戏,他的斡旋努力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破坏。总统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中国的政治局面有所改观。他以为,正处于苦斗中的重庆政府终究会获得中共军队的援助,而用罗斯福的国务卿爱德华·斯坦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的话来说,这种援助将是“有力而普遍的”。^②

接下来罗斯福将要面对的困难问题是就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提请他注意的“政治要求”作出决定。其实,罗斯福宁愿让中国人与苏联人自己去解决这些事情。但是眼下已来不及了,斯大林已提议于11月底举行大国首脑会议,即便会议推迟至2月初,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既然斯大林在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之前有理由不与中国人会谈,而蒋介石又明确表示他本人不愿采取任何主动行动,那么,现在罗斯福就不得不让苏联人进一步明码出价了。在11月10日和哈里曼的谈话中,总统让他的大使尽快摆出“苏联的要求”这一问题与斯大林进行讨论。哈里曼说,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不会令人大吃一惊的。很显然,罗斯福和哈里曼都认为他们对斯大林愿望的大致轮廓是了解的。^③

与此同时,曾使罗斯福激动不已的苏美联合军事计划却进展极慢。美

^① 罗斯福致卡尔森电,1944年11月15日,分类档案“中国,1945”,38盒,总统秘书文件,藏罗斯福图书馆。

^② 斯坦丁纽斯致罗斯福,1945年1月4日,分类档案“中国,1945”,38盒,总统秘书文件,藏罗斯福图书馆。这是斯坦丁纽斯附加在一份赫尔利发自重庆的报告后面的评论。1月3日,众议员曼斯菲尔德(Michael Mansfield)在访问中国后也向总统报告,国共合作“对实现美国的目标来说是必要的”。曼斯菲尔德致罗斯福函,1945年1月3日,分类档案“中国,1945”,38盒,总统秘书文件,藏罗斯福图书馆。

^③ 哈里曼《前往会见阿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1941-1946》,371页。

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0月18日任命了美国军事计划小组,但苏联人却让他们在华盛顿等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发给他们访苏签证。当美国人终于到达了莫斯科以后,苏联将军们又拒不透露丝毫有关苏联红军战略计划的情报。直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任命这一小组两个月之后,安东诺夫将军才同意指定苏联方面的代表,从而让双方联合决策的活动得以运转起来。可是,不顾美国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将军几番抗议,六个星期又过去了,双方直到1月26日才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在会上,苏方人员提出,对联合决策小组的具体议程要推迟到雅尔塔会议之后再作安排。^①

尽管有这些耽搁,罗斯福还是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推进向苏联提供在东亚参战所需给养和装备的计划,亦即“里程标”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企图通过这一行动改善苏联远东部队的后勤状况,激励苏联人及早就开始实施联合作战计划。11月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原则上接受了10月斯大林对哈里曼提出的全部要求:石油制品、铁路设施、军舰、运输船以及飞机。但又提出警告说,即使美国能于1945年上半年交付大部分物资,重武器要在初夏前运抵苏方却是不可能办到的。^②

11月末,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苏联在东亚参战的前景作了重新评估。它现在的看法是,苏联将在欧战胜利后三至四个月对日本发起进攻。虽然它提出告诫说,莫斯科可能决定等到战争最后关头才在亚洲参战,但仍断定,“苏联在远东与战后世界政治中的利益无疑将迫使它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应当要求苏联尽快参战,这尤其是因为,在预定进攻日本本土的日期已推迟到1945年秋天的情况下,战略轰炸的价值以及与此相关的使用远

^① 美苏“里程标”联合行动计划,1部分,1945年2月4日,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1176/8,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哈里曼《前往会见邱吉尔和斯大林的使,1941-1946》,383页。

^② 联合后勤委员会《“里程标”计划的供应和设备概要》,1945年2月4日,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非正式备忘录360,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途经太平洋进行的非军用物资的运输工作始于1944年夏初,其目的在于在远东地区储备一些物资以供进攻日本之需。参见《对苏联的后勤方面的支持》,1944年6月9日,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901,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东空军基地的问题已经变得更为重要。^① 罗斯福同意这一看法。11月18日,他告诉哈里曼说:“没有俄国,要击败日本极其艰难,代价太大了。”所以,美国应尽一切可能支持斯大林的参战计划。^②

来自情报部门的报告使得罗斯福越来越重视苏联在东亚的作用。根据军事情报部门的估计,德国的失败“不会早于7月1日”发生,在那以后,苏联人将其军队东移需要四至六个月的时间。^③ 1945年1月11日,美国战略情报局报告说,苏联政府已下决心废弃《苏日互不侵犯条约》。1月25日,它又汇报说,日本驻苏大使已从莫斯科通知他的政府,如果斯大林对雅尔塔会议就欧洲问题达成的解决方案感到不满,他就会拒绝对东亚问题进行讨论。2月7日,战略情报局又报告说,假如斯大林决定与美国人合作,日本就会求和。^④

1944年12月,中国的军事局势跌到了谷底。美国武装部队制订了万一蒋介石政权垮台便撤离中国战区的应急措施。陆军部长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要是我们不能甩开蒋介石,我们就无法与中国目前仅存的生气勃勃的军队即共产党人取得联系。”^⑤ 军事上的危机使史汀生设法和中国非政府武装进行合作,同样也使罗斯福愈发感到有必要达成一个协议,以便当战后来外势力对中国进行干预时,可以对他之作调解规划。在华盛顿,1944年底中国前线发生的事件使人们更加强调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担心

^① 《俄国参加对日作战》,1944年11月23日,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1176,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迪恩电,1945年1月18日,218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1176/5,附件A,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哈里曼《前往会见邱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1941—1946》,371—372页。

^③ 情报分析,1945年1月22日,218组文件,联合战略计划,603,附录A,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④ 多诺文致罗斯福电,1945年1月11日,170盒,总统秘书文件;多诺文致罗斯福电,1945年1月25日;战略情报局给总统的备忘录,1945年2月7日,均藏罗斯福图书馆。后来,这份由一个在梵蒂冈的官员所提供的情报被发现是伪造的。参见《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80年8月3日。战略情报局很可能(但不能肯定)在总统在国外时向他汇报了这些情报。

^⑤ 史汀生日记,1944年12月14日。

来年的中国会变得更加支离破碎。12月,罗斯福要他的一个助手准备一份援助中国的详细纪录,显然是为了一旦蒋介石政府崩溃,也好对国内的批评有所交代。^① 尽管国民党政府无能且腐败,但此前罗斯福仍然把它当做战友。现在他转而将蒋介石政权视为某种危险的、与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相类似的政治真空。正如罗斯福的亲密顾问劳克林·居里(Lauchlin Currie)在雅尔塔会议前给他的备忘录中所警告的那样:“俄国与美国可能被搞得被迫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站队。”这或许会造成新的国际困难,并破坏国共冲突达成和解的前景。居里建议罗斯福应在“不干涉”中国的问题上同苏联谅解,两大国谁也不能在一场内战中向中国人提供资助。^②

罗斯福同意,为避免将来在中国问题上发生冲突,他需要与莫斯科达成一项一般性的协定。现在蒋介石政权存亡未卜,他想让各大国在中国应有什么样政府的问题上取得谅解。在欧洲,大国在为罗马尼亚,尤其在为波兰的战后发展作出安排时遇到了麻烦,这就使得保证苏美能够在东亚进行合作的任务变得更加急迫。^③ 既然斯大林现在已经向美国人表达了他的要求,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就必须讨论苏联在东亚参战以及中苏关系问题。罗斯福不知道斯大林是否会与美国配合参战,也不知道他是否会支持美国人找寻一个能解决中国国内困难的办法。正如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几个月后所记述的那样,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搞清苏联对日开战的确切日期和范围。霍普金斯回忆道,对美国而言,保卫中国利益很要紧,然而更要紧的是,“如果远东出现不安

^① 这份报告后来出版了,见埃尔塞(George Elsey)《罗斯福与中国:白宫故事》(*Roosevelt and China: The White House Story*),威尔明顿(美国),1979。

^② 居里致罗斯福函,对“即将到来的会议”一信的答复,1945年1月19日,分类档案“克里米亚会议”,142盒,总统秘书文件,藏罗斯福图书馆。

^③ 关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前的一段时间里对波兰及东、中欧问题的态度的讨论,参见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464-466页、469页。

定”，那么盟国间的合作就可能毁于一旦。^①

1月22日，罗斯福动身离开美国，在马耳他短暂会晤了邱吉尔，然后于2月3日抵达克里米亚半岛。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看得出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认为他的病情对会议结果产生了严重影响则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的健康问题仍然使他的顾问们感到担忧，并使他们比前几次举行最高级会议时起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也保持着更大的警觉。霍普金斯自己在雅尔塔卧床不起，没能安排罗斯福在会见斯大林之前与邱吉尔举行进一步的会谈。霍普金斯对陪伴在罗斯福身旁的总统女儿说，恰恰是罗斯福本人“想要办这件事，现在他必须证明他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②

罗斯福在雅尔塔的政策并没有受到他日趋恶化的健康状况的左右，却为他在外交上的一些压倒一切的考虑所支配。他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使美国和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达成相近的看法。正如在德黑兰会议期间那样，他想让斯大林明白，美国与苏联人的共同利益决不少于美国与英国的共同利益。在整个会议期间，哪怕是就一些小事情，罗斯福也试图同斯大林达成协议，以便在今后若干年里把苏联和美国联结起来。至于在诸如波兰新政府这一类较大的问题上，罗斯福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但最后总是能够与斯大林取得协调。

关于东亚问题的谈判议题是由苏联人所确定的。美国参谋人员于2月5日同苏联总参谋部人员在雅尔塔首次举行会谈时，竭力想从苏联人那里获得军事上的承诺。这时，安东诺夫将军明确答复，这个问题要等到领导人们讨论过以后再作商谈。斯大林的打算是先谈欧洲，再谈东亚，最后

^① 关于雅尔塔的记录，1945年10月19日，霍普金斯信件（缩微胶卷），第20卷，藏罗斯福图书馆。罗斯福在雅尔塔时，国务院为他编辑了一个文件简报，其中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应致力于让苏联和中国在中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基础上达成一个协定。苏联参加远东作战的情况下将面临的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雅尔塔会议》，351-352页。没有证据表明罗斯福曾经读过这些文件。

^② 手写记录，分类档案“雅尔塔会议”，第58卷，哈尔斯塔德文件，藏罗斯福图书馆。关于雅尔塔会议上对东亚问题的其他讨论，参见克莱门斯（Diane Shaver Clemens）《雅尔塔》（*Yalta*），244-258页，牛津大学出版社（伦敦），1970；布海特（Russell Buhite）《在雅尔塔的决定：对最高层外交的评价》（*Decisions at Yalta: An Appraisal of Summit Diplomacy*），85-104页，威尔明顿，1986。

才讨论苏联作出对日参战的承诺问题。如前所述,不管雅尔塔会议对欧洲和东亚问题达成了怎样的协议,斯大林都不会打消对日开战的念头。然而,双方关于欧洲的讨论一定使斯大林意识到,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但美国仍然会继续与苏联合作。2月8日,斯大林在同罗斯福举行会晤时,当场勾销了去年12月对美国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空军基地所持的保留态度,重新对这件事表示赞同。他还重申,支持双方在莫斯科进行联合制订战略计划的活动。^①

接着斯大林转向了他的“政治要求”。罗斯福决定同他达成交易,立刻答应将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归还苏联。但是,他也告诉斯大林,他想将大连与旅顺“国际化”,而不是租借给苏联。对中东铁路也应该作同样的处理,即在中苏共管下运营,也不是租借给苏联。当罗斯福追问斯大林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时,斯大林回答说支持中国的“统一战线”,并表示他不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停止了合作。^②

雅尔塔会议上关于东亚问题的正式谈判实际上到此便结束了。这次会议肯定没有让斯大林就下一步该怎么办获得明确的认知。闭会前,他询问罗斯福是否愿意在离开雅尔塔之前就东亚问题签署一项书面协定,罗斯福“认为可以”。就在总统的任期将要来临之际,斯大林在一份书面建议里重复了自己的要求。这份文件经过几处重要改动便成了双方有关东亚的最后协定。其中,斯大林采取了令人惊讶的步骤,正式许诺在欧战胜利后二至三个月内与美国和英国配合对日开战,并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他提出的条件本来已在同罗斯福的谈话中作了概括。但在美国进一步施加压力后,第二天上午,他又同意用“国际化”替代“租借”大连(但旅顺依旧),并答应由中苏共管中东铁路。驻苏大使哈里曼认为,罗斯福应该要苏联人

^① 第一次三方军事会议记录,2月5日中午,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雅尔塔会议》,593页;罗斯福和斯大林会谈记录,1945年2月8日,同上书,766页。这一明显的策略转变很可能是斯大林谈判技巧的一部分。如果他料到要遭到抵制,他经常会在前面的讨论中尽可能多地作出让步,这样,一旦他后面的要求被拒绝,他就可以显出受了污辱的样子并收回前面的让步。

^② 罗斯福和斯大林会谈记录,1945年2月8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雅尔塔会议》,768页。

作更多的修改与让步,但罗斯福否决了他的意见而接受了同斯大林的这一交易。罗斯福还表示,所谓苏联在满洲的利益是“突出的”,以及莫斯科的要求应该得到“无可非议的满足”,等等,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没有人会由于美国负责让蒋介石同意斯大林的对华要求而评头论足,现在这已是条约文本的一部分了。海军上将李海看到协定后对哈里曼讲:“有了它就不虚此行了。”^①

出于战后在东亚寻求大国间关系稳定的需要,罗斯福与斯大林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两位领导人都不希望亚洲的地区性问题对自己国家历经战争赢得的地位造成威胁。双方取得这种地位的方式是不同的,但却都相信,相互承认彼此在战争中的收益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罗斯福与斯大林并不认为对方的短期目标与自己的短期目标存在着冲突,也没有将中国的各个党派视为各自国内政治体制的延伸。换言之,这些协议是前冷战阶段的产物。

《雅尔塔协定》应被看做是莫斯科、华盛顿和重庆三方达成交易的结果,也是在雅尔塔会议前几个月便已开始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因素。蒋介石为他的政权争取外援以弥补其军事虚弱的尝试成为这一进程的驱动力。通过这样的做法,他把自己政府的命运同这个于1945年初诞生的国际体系绑到了一起,而《雅尔塔协定》正是这个体系形成的标志。在当时中国发生军事大溃退的情况下,苏美协议使得蒋介石在面对同他争夺权力的革命力量时,有可能重建起自己作为中国最具信用的国家领袖的形象。

^① 哈里曼《前往会见邱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1941-1946》,399页。

第二章

中苏条约与大国合作的破裂

斯 大林对宋子文说：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只能由蒋介石领导；华盛顿告知重庆方面：中苏双方无论达成什么协议，都要事先征询美国的意见；蒋介石盘算再三后决定：只要斯大林保证不支持中共，外蒙古可以放弃；中苏条约签订之日——斯大林谈笑风生，蒋介石如释重负，严峻的挑战摆到了毛泽东面前……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曾试图使蒋介石的中国变成一个横亘于苏联控制的中亚、东北亚地区与美国控制的太平洋地区之间的缓冲地带。然而，这一大国合作的尝试不满四个月就失败了。因此，入江昭所谓的“雅尔塔体系”，充其量不过是东亚苏美关系发展中一段短暂的插曲而已。^①

导致合作破裂的原因很多。第一个因素是协定本身固有的含混性质。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希望达成妥协，因而接受了这种模糊性，期望他们能在以后再涉及解决各种细节问题。但在罗斯福逝世后，当美国新政府试图在东亚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协定的模棱两可性质很快对双方都成了一种负担。

^① 入江昭《冷战在亚洲》，98-99页。

葬送“雅尔塔体系”的另一因素是1945年春欧洲的政治、外交发展。在欧战临近结束的几个星期及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华盛顿、莫斯科和重庆各有不同的盘算，但总的来说，三国政府对亚洲大陆上正在形成的大国关系的看法对它们各自的东亚战略发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当罗斯福逝世时，国民党政权的领导人便认识到了其中所包含的机会，立刻利用《雅尔塔协定》和美苏在欧洲问题上的冲突着手重建中美外交关系。

最后，有些美国官员相信雅尔塔会议关于东亚的协定是有缺陷的，应当予以废除。由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压力，使得蒋介石在同苏联谈判时得到了美国的更大支持。与美国强迫蒋介石同意苏联要求这一雅尔塔会议的前提相比较，美国的新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退却。这一退却标志着1944年至1945年冬季倾向于大国合作的雅尔塔方式到1945年秋季已被一种更倾向于冲突的政策所取代。在日本投降前后的几个星期中，一种可以根据中苏谈判的举行地点而称之为“莫斯科方式”的新架构为美苏在东亚进行的一场激烈竞争布置了舞台。^①

围绕着《雅尔塔协定》产生过许多神话，其中之一是，蒋介石是到四个月后中苏谈判即将开始时才首次得知苏美在2月间达成的交易的。^②高龙江最近证明，最高级会议刚刚结束几周，美国人和苏联人就把《雅尔塔协定》告诉了蒋介石。^③早在2月21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便已经根据苏联官员的暗示而猜出了协定的梗概。^④3月15日，罗斯福总统向驻华华盛顿的魏道明大使简要介绍了雅尔塔会议的情况。由于总统提供了足够

^① 与入江昭(《冷战在亚洲》，165页)一样，我也认为“大国竞争”和“冷战冲突”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后者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多极冲突，其特点是，它的参加者意识到，苏联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抗，在每一处都得到了它们各自的地方代理人的支持。

^② 邹谠(Tang Tsou)《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251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关于这一神话是如何影响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解释的例子，见库夫斯(Peter M. Kuhfus)《友道的风险：中国与雅尔塔神话》(*Der Risiken der Freundschaft: China und der Jalta-Mythos*)，载《波鸿东亚研究年鉴》(*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247-286页，1984年7期。

^③ 高龙江(1937-1945的中苏关系)，209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21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680页。

的信息,因而魏大使能将会会议的轮廓相当完整地传达给重庆。^①

蒋介石本人则相信,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了交易,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卷入了中苏关系。由于这种干预早就是蒋介石的战略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的这位领袖对《雅尔塔协定》是欢迎的,尽管他当然不希望向苏联人作过多的让步。蒋介石主要担忧的是他和白宫的恶劣关系。罗斯福对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顽固态度可以毫不费力地恶化外交关系,使华盛顿不愿拥护中国对苏联人所持的立场。蒋介石害怕大国间会签订新的协议,向中国政府索取更多的特权。

令蒋介石进退维谷的是他很难将美国的要求与他打击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调和起来。罗斯福想要中国成立联合政府,想提高抵抗日本人的战斗力。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全部反共战略则依赖于能否剥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能否使他自己的队伍时刻为国内的总决战做好准备。但是,正如2月中旬蒋介石在日记里所记,中国国内问题为美苏两国所十分关注,因而要避免同共产党人和解又是很难的。^②

蒋介石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顾问们都力主在外交部长宋子文去莫斯科前达成国共协议。2月6日,宋子文、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以及当时负责与共产党人谈判的王世杰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他们都认为早些同中共和解将有助于政府与莫斯科谈判。^③然而,蒋介石却始终强调苏美关系演进和国共关系未来发展之间的联系,他的意思是,如果大国联盟破裂,国民党也就没必要被迫与延安联姻了。^④

接着,通向获取大量美援的门突然打开了。4月12日,罗斯福逝世。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尽管罗斯福绥靖俄国、庇护中共,他仍然是美国国家的伟大领袖,他写道:“中俄关系,因罗之死,更应审慎处之。”^⑤然而,谨慎很快便为喜悦所代替。4月16日,魏道明自华盛顿汇报,他预料新总统哈

^① 魏道明致蒋介石电,1945年3月15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686-687页。

^{②④}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8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678-679页。

^③ 胡世泽日记,1945年2月6日,胡世泽文件,第2盒,藏胡佛研究所。

^⑤ 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13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696页。

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将对俄国人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在抱怨完罗斯福关于共产主义的一般见解和对苏联人的特殊看法之后,魏道明得出结论:杜鲁门不同,他不大可能与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开始谈判,而国民党领导人担心罗斯福已经在这么做了。魏道明认为,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了解苏联和中共的联系。他最后提议:“我国对苏一般关系,自须随时努力调协,但对重要具体问题,似待此间形势显明后,再加考虑为宜。”魏道明极力敦促政府适时制定一项对付美国及苏联的新战略。^①

魏道明第二天见过新总统后继续持乐观态度。这位中国大使承认在他们会晤时杜鲁门的腔调十分严厉,但他把总统的措辞归咎于某些反国民党的官员和报刊的影响。魏道明告诉蒋介石,他还相信杜鲁门会摒弃罗斯福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理解“大国之责任,乃为世界民族服务,而非统治世界民族”。^② 外交部长宋子文从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报告,他也认为新总统将制订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对中国而言,该政策要好于罗斯福的政策。宋子文提到美、苏官员们的一种说法:中共不是“真正共产党”,他建议重庆政府仍然可以通过与延安达成协议而取得外交上的实惠。^③

罗斯福去世之后,蒋介石比以往更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给共产党人。要他向“叛乱分子”作出一点让步,他都发自心地不情愿。此外,刚刚度过最严重的战争危机的蒋介石还必须防范右派对手挑衅他在国民党内的权威。最后,蒋介石坚持不让步的主要原因是他希望即使他同中共合作失败,美国的外交支援也是指日可待的。他又猜测日益紧张的大国关系能使苏联人在将要来临的莫斯科谈判上变得比较容易控制。假如有关欧洲问题的冲突加剧,那么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弃置不顾就不符合斯大林的利益。^④

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的头几周里,华盛顿的高层官员展开了讨论,要是

^① 魏道明致蒋介石电,1945年4月16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3编1册,206-207页。

^② 魏道明致蒋介石电,1945年4月17日,同上书,207-208页。

^③ 宋子文致蒋介石,《来自旧金山的报告》,1945年4月17日,同上书,208-209页。

^④ 王世杰日记手稿,1945年4月30日,台北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以下简称王世杰日记。

国民党的领导人知道这些讨论的细节,他们会更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哈里曼越来越不满意罗斯福的对苏政策,他率先在高级官员中发起一系列会议,为新总统谋划一份外交政策纲要。在探讨过的计划里,有一项新的东亚政策,它要大大降低在对日战争中与苏联合作的重要性。

但是,杜鲁门并不准备改弦更张,做任何令公众觉得是打破了他前任政策的变动。相反,他将自己的首要任务视为:向国内外证明他正秉承着已故总统定下的路线。杜鲁门决意保持那种他既不理解也不赞成的对苏政策,接受了国务院的提议,派罗斯福所信赖的顾问霍普金斯去莫斯科。霍普金斯要叫斯大林放心,保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持续不变,而杜鲁门本人却在全神贯注地研究前总统的路线到底通往哪里。^①

霍普金斯出使莫斯科是美国为影响苏联领导人,使其扩大合作所作不懈努力的最后一次。从表面上看,这次努力似乎极成功。当他们商议东亚问题时,霍普金斯要苏联进一步保证中国对满洲的主权,斯大林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苏联领袖不仅重申他同意把在满洲的权力移交给蒋介石政府,如果中国人签署了中苏条约,他还将答应在开始进攻日本据点后允许国民党官员们随行辅佐苏联军队。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告诉了霍普金斯苏联进攻的日期:1945年8月中旬。^②

与霍普金斯的会谈让斯大林有机可乘,他得以利用中国转移对在东欧问题上暴露出的大国冲突的注意。在2月、3月间,美国已经就苏联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提出外交抗议,斯大林尚未反应。不过,美苏合作的美方创始人罗斯福的去世使莫洛托夫(V. M. Molotov)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大厅里就像疯子一样来回乱逛”了一夜,打听“杜鲁门这家伙是谁”。^③ 斯大林希望现在中国既是一个焦点,又是一个能试探美国新政府

^① 国务卿顾问委员会会议记录,1945年4月20日、21日,哈里曼文件,分类档案“4月17-24日”,178盒。

^② 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罗斯福与霍普金斯》(*Roomers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2卷,595-602页,纽约,1950。

^③ 梅尔比访谈记录,1986,第99页,藏杜鲁门图书馆。

意图的工具。这位苏联领袖认为,令华盛顿担忧的是苏联大概会武装占据满洲,或支持中国的反政府派别。他将美国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增援解释为是美国要设法防止局势如此演化,而对蒋介石政权作出坚定承诺的明确标志。所以,这位苏联领袖若不想今后和蒋介石及其美国靠山发生冲突,他便须要在他的部队进入满洲前与重庆订立条约。

6月15日,赫利大使最终正式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协定》。和大使自以为是的观察相左,蒋介石的日记里没什么情绪激动的表示。^①与斯大林谈判是避免不了的了,这位中国领袖几个星期以来已数次会晤苏联新任驻华大使阿波伦·彼得洛夫(Appolon Petrov),为的是给谈判作准备。蒋介石现在真正开始担心在抗日战争结束时他将遇到的国内挑战。他最怕中共能够串联起满洲的苏联军队,从而为他们同他的政府进行斗争汲取力量。蒋介石打算从彼得洛夫嘴里搞清楚苏联人对何种协议感兴趣,以及要签订一个孤立中共的条约,他得给斯大林多少好处。^②

在6月已经过去的这几周内,蒋介石面临着两种选择,因而踌躇不决:要么指望利用美国外交援助向苏联大使施加压力,要么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中国并不依附于美国,以便和莫斯科谈判。他不敢断定美国是否会支持他,也不晓得斯大林与中国签约的愿望到底有多迫切。6月22日,杜鲁门拒绝了蒋介石要美国插手管理旅顺海军基地的建议,这让委员长认识到美国的援助并不会马上到来。^③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几位幕僚告诉他,苏联人确实想和他的政府签约。军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讨论了苏联支援中共的可能性。该报告指出,假如苏联军队开进满洲,他们需要与一个地方机构合作。控制着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是这类机构惟一的权力来源。此外,这份报告还说,莫斯科若要在东北获取特权,只有通过和国民政府签订条约才能获得国际认可。换言

^① 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15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726-727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12、24日,同上书,724页,731页。

^③ 宋子文和赫利谈话备忘录,1945年6月25日,同上书,743页;又见高龙江《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214页。

之,如果国民党有求于斯大林,那么斯大林也有求于国民党。^①

当1945年6月30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抵达莫斯科中央机场时,他一定觉得他来到了漫漫旅途的终点。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这样讲。中苏两国政权均为大革命的产物,处理它们彼此间几经兴衰浮沉的关系一直是宋子文20余年政治生涯的一部分。作为孙中山的内弟,他目睹了孙中山在20年代初期为与苏联结盟所作的努力。孙中山死后,宋子文辅佐妹夫蒋介石,废除了国民党同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定,在中国建立了一党独裁。若干年后,在蒋介石的战时内阁里担任外长的宋子文醒悟到,无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的角度出发,为了他所代表的政权的安全,都有必要与苏联人签约。宋子文来莫斯科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这样一个条约。^②

6月30日傍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中国外长宋子文、大使傅秉常、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乘寒暄之机,宋子文机敏地插叙了他与美国人的亲密合作关系。接着,斯大林强调苏联方面肯定两国政府能达成协议。他说:“以前,为分裂中国,俄国想联合日本。现在,为遏制日本,我们要联合中国。”^③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中国代表团确信斯大林真的打算签署一个协定,问题是他的要价有多高。^④

两天后,斯大林会晤了宋子文,谈判就此开始。苏联的这位领袖先拿

^① 军事委员会致蒋介石报告,1945年5月3日,062.235000.3(1)(《中苏外交问题专集》,臺北史政编译局。

^② 关于宋子文的背景,参见布尔曼(Howard Boorman)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卷,149-153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

^③ 斯大林元帅和宋子文博士的第一次谈话,1945年6月30日,胡世泽文件,分类档案“中苏关系,1945-1946”,2盒,藏胡佛研究所。我得以接近两组会谈记录。胡世泽的英文打字记录与他的文件一起保存在胡佛研究所。部分中方记录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3编1册,577-635页。胡世泽的记录比《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的记录详细得多,国民党政府外交都有可能就是依据胡世泽的记录来建立中方记录的。书中的引文如无特别注明,均来自胡世泽的手稿。与我的分析不同,高龙江和梁敬鐸早些时候对第一阶段会谈的分析主要是根据官方材料作出的,他们不大强调美国干预的问题,认为斯大林的要求更咄咄逼人。参见高龙江《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214-222页;梁敬鐸《中苏友好条约与1945年的联盟:秘闻》,裴英光前(Paul K. T. Sih)编《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373-397页,纽约州,1977。

^④ 胡世泽日记,1945年7月1日。

起一份《雅尔塔协定》的复印件丢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桌子上。“你们熟悉这个文件吗？”斯大林问。宋子文回答说美国人已经向他通知了文件内容，同时他们也把斯大林对霍普金斯作出的承诺告诉了中国人。随后，中国外长立即提出外蒙古问题，强调说他的政府不想在谈判中涉及该问题，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已经向彼得洛夫强调过。

斯大林的答复突出了蒙古的战略位置，并表示他坚信将来日本会东山再起。“我们必须在外蒙古地区取得合法的自卫权利。”斯大林说。接着，他加上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论点：一个独立的蒙古共和国能够降低在外蒙古以及内蒙古爆发民族主义叛乱的危险，而这类叛乱将会“损害中国和我们的利益”。另外，斯大林说：“要是我们攻打日本，人民会说什么呢？我们刚打了四年仗，你又掀起一场新的战争。日本没招惹你而你却去进攻它。我该怎样为进攻行动辩解呢？”因此，他需要中国作出让步。^①

但是，宋子文在蒙古问题上立场坚定，当论题转至满洲时，他依然如故。斯大林提议最好是以1898年的中俄条约为蓝本，“做些改进”。宋子文迅速回到《雅尔塔协定》本文，指出大连是一个自由港。斯大林笑着说，他可不想干得比沙皇分子还过分。会谈的第一晚，斯大林始终要收回沙皇俄国曾在满洲享有的“权利”。他的要求不很具体：他暗示愿意共管大连和旅顺，而通往这些港口的铁路则归苏联拥有。另一方面，苏联的这位领袖决定避免提出让美国人不快的要求。他放弃了沿路驻军的权利，强调红军并未计划“到北京去”。^②

在第一次会议上，宋子文采取的谈判策略是淡化满洲问题，其用意在于使斯大林退而接受中国对蒙古问题的看法，那就是，如果斯大林不提出正式独立的问题，中国不反对苏联在蒙古的军事存在和对蒙古的实际控制。斯大林方面对蒙古寸步不让。宋子文反复争辩，讲起中国的公众舆论，并说中国一旦退让，将给以后开不好的先例。他又提到，早在20年前

^① 1945年7月2日晚8点至10点30分，1945年莫斯科中苏会谈记录，胡世译文件，分类档案“中苏关系，1945-1946”，2盒。

^② 1945年7月2日晚8点至10点30分，1945年莫斯科中苏会谈记录，胡世译文件，分类档案“中苏关系，1945-1946”，2盒。

苏联人就已经承认该地区为中国的一部分了。可是,所有这些统统无用,谈判搁浅了。斯大林坚持尽快签约。宋子文却说,关于蒙古问题,他不得不征求蒋介石的意见。^①

会议临近尾声时,宋子文摆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斯大林说,他们是“优秀的爱国主义者”,至于“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就难讲了”。“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他继续说道,这个政府应由国民党“领导”。这位苏联领袖对宋子文的愿望一清二楚,他再次建议蒋介石可以“派代表到我们的部队里来,随着我们部队的开进创建地方政府机构”。在与霍普金斯举行的会谈中,斯大林就这么干过,眼下他故伎重演,又把中共作为筹码摆上了桌面。^②

第二天,中国代表团聚会商议对策,与会者一致期望蒋介石现在作些让步,以便使谈判能进行下去。胡世泽在日记里写道,重要的是让斯大林确信中国的诚意。他担心要是俄国人觉得中国人总在闪烁其词,那将增大签约的难度。对中国政府而言,有签约的必要,这在谈判代表团中差不多已达成共识。中国是弱的一方,需要和苏联人做一笔极廉价的买卖,使他们捞到足够的油水,才能阻止他们打中国领土的主意。^③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胡世泽与苏联高层领导人的会晤又让这位外交次长很困惑。外贸人民委员阿纳思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热切希望签署中苏协定,却似乎完全没准备提出苏联的贸易特权。和克雷蒙特·伏罗希洛夫(Klement Voroshilov)元帅的会见给胡世泽留下了相同的印象。这位元帅特别强调他非常“盼望能一起打日本”。经过这些会晤,胡世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协定不只在中国人眼里是必需的,对苏联领

^① ③ 外蒙古的地位问题是《雅尔塔协定》中几个含混未决的问题中的一个。苏联人认为,协定中的“现状”一词即是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罗斯福一方认为它意味着苏联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但不是正式控制;蒋介石则认为它表示苏联和美国接受了中国对全蒙古的正式的宗主权。又见高龙江《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216-217页。

^② 胡世泽日记,1945年7月3日。胡世泽的优势是能流利地说俄文。他生于美国,在巴黎受的教育,30年代曾经担任中国驻国联代表,1942年成为外交部次长。他用法文手写的日记是关于1949年前后中国外交和公共生活的一份引人入胜的记录。

领导人来说,它几乎具备同样的价值。^①

在等待蒋介石拍板决定蒙古问题时,宋子文接连几次会见哈里曼。事后证明,这些非正式的谈话对中苏谈判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宋子文本不指望从大使那里得到多少东西。赴莫斯科前,他在华盛顿咨询磋商的结果表明,美国不会支持中国谈判代表。当宋子文于7月5日、6日在莫斯科两次见过哈里曼之后,他一定感到这种态度正发生变化,并且越变越快。7月4日,新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奈斯(James Byrnes)向哈里曼重申了美国原来的立场:“本政府试图充当《雅尔塔协定》……解释者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尽管如此,贝尔奈斯还是准许大使告诉宋子文,“美国的意见是,外蒙古的主权仍属中国”,即使重庆“实际上”没有行使这一权力。^②

贝尔奈斯在南卡罗莱纳的法院学会了搞政治,他对谈判妥协艺术的精通和他对国际事务的无知不相上下。新国务卿明白,美国可以利用它对中苏谈判的影响力在下次大国首脑会议上或奖赏、或惩罚莫斯科。^③7月6日,贝尔奈斯照例再次告诫哈里曼要表明美国的不干涉立场,然后又让他向宋子文提出三点新的意见。首先,“作为《雅尔塔协定》的签字一方”,贝尔奈斯说,美国“希望中苏双方无论达成什么协议,都要事先征询美国的态度”。其次,苏联在大连港享有的权利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否则,美国不予承认。第三,苏联提出占有通向辽东半岛的铁路,美国政府认为斯大林的这一要求超出了《雅尔塔协定》的范围。^④

在宋子文听来,这些消息宛如他所酷爱的美国西部片中的那些牛仔

^① 胡世泽日记,1945年7月5日。

^② 贝尔奈斯致哈里曼电,1945年7月4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7卷,914-915页。

^③ 关于贝尔奈斯对外交政策的基本理解的简要介绍,见叶尔金(Daniel Yergin)《破碎的和平:冷战和安全国家的起源》(*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109-111页,波士顿,1978。

^④ 贝尔奈斯致哈里曼电,1945年7月6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7卷,916-917页。宋子文在7月3日就已经告诉哈里曼,“如果某个中国政府胆敢承认外蒙古,那么这个政府必定不会长久。”因此,蒙古问题是谈判“最大的障碍”。7月3日与宋子文的谈话,手写记录,哈里曼外交,分类档案“7月1-16日”,100盒,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骑士们吹响了冲锋号。如果美国即将站在中国一边干预中苏谈判,他就用不着接受那些令他和他的国家都感到屈辱的条款了。他现在希望,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得到一个比预想要好的协议。突然间,宋子文不必仅仅靠他的谈判技巧来苦撑了,因为苏联人签约的愿望似乎出人意料地迫切。他给重庆的报告流露出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并示意可以开始实施一项新战略。那周早些时候,他希望蒋介石作出让步,现在则不要紧了。^①

身居嘉陵江畔的陪都重庆,蒋介石心里清楚国际局势正在急剧变化。日本人的上一次进攻已于4月份结束,蒋介石断定日本很快就会提出和谈。现在委员长满脑子想的全是“共党问题”。他一定得想办法,要么通过动武,要么经由和谈来迫使中共接受他的政府的权威。不管哪种办法,成功与否均取决于他能不能阻止中共获取外援。即使美国人在战后继续帮助他的政府(对此,蒋介石半点儿把握都没有)也不足以抵消苏联援助中共所起的负面作用。蒋介石越从这方面来考虑莫斯科谈判,就越觉得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宋子文的第一批报告告诉他,如果苏联人通过与中国政府签约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大部分东西,斯大林愿意抛弃中共。但是,蒋介石能满足斯大林的要价吗?^②

蒋介石同意宋子文的估计,即谈判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首先解决双方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冲突。委员长的日记表明,放弃这块领土的念头同他重新统一中国的使命感是相互矛盾的。无奈之下,他只好搬出孙中山的信条来聊以自慰:各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体。最后,蒋介石发现,问题并不在于蒙古人独立的想法是否“公正”,而在于苏联是否有权利代表“他们的”蒙古人来提出这一要求。^③

7月5日晚,国民党领导层开会讨论斯大林的要求。大多数与会者反

^① 哈里曼致杜鲁门和贝尔奈斯电,1945年7月8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7卷,919-920页;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7月7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752-753页。

^②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7月2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745-746页;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5日,同上书,747页;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6日;又见蒋介石日记,7月28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5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747页。

对放弃蒙古,蒋介石告诉他们,他会考虑他们的意见。但是第二天上午,强烈反对对苏让步、颇有影响的国民党右派头子陈立夫去拜望蒋介石,发现委员长已经作出了与他们的建议截然相反的决定。为了换取迫切需要的东西,蒋介石愿意牺牲他得不到的东西。他告诉宋子文,要是宋子文能获得苏联关于满洲的长远保证,他愿意放弃外蒙古。7月7日,蒋介石进一步降低了他的条件。在一份给宋子文的电报里,他说这些谈判提供了一个一劳永逸地解决共党问题的办法。如果斯大林愿意完全放弃对中共的支持,蒋介石就允许宋子文在莫斯科解决蒙古问题。^①

7月7日午夜,宋子文再次会晤斯大林,此时中方的谈判战略正摇摆不定。由于尚未收到蒋介石的最后一份电报,并且相信美国的援助就要到来,宋子文决定在蒙古问题上尽力坚持。他告诉苏联人,让蒙古独立是不行的,不过中国可以同意苏军驻扎在外蒙古。他还强调,美国支持这一提议。最后,他告诉斯大林,在中国,若有哪个政府胆敢“承认(蒙古)独立”,那么这个政府必定要“完蛋”。他还说,《雅尔塔协定》也支持他的观点。斯大林恼怒地纠正道:“这是我们的方案。他们签了字的……我们对它的理解是,中国会承认(蒙古)独立。”宋子文仍然寸步不让,斯大林终止了会议。谈判好像已经破裂了。^②

然而,蒋介石迟到的最后一份电报使宋子文不得不在克里姆林宫继续经受折磨。宋子文本人一定也认识到,在蒙古问题上彻底谈崩对中国并没有好处,至少目前如此。7月9日,宋子文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政府的新立场。他引用了蒋介石电文中的一段话,表示中国愿意“作出最大牺牲”以实现中苏合作。“牺牲”即指蒙古独立。作为交换,蒋介石希望斯大林能同意中国关于满洲的方案,并保证不支持中共。蒋介石这时建议中苏联合使用旅顺,大连则保持自由港的地位,两地均由中方管理。铁路主权“应属

^① 陈立夫采访记录,中国口述史资料,分类档案“战争和战后时期”,52盒,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5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5年7月6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747-748页;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5年7月7日,同上书,753-754页。

^② 1945年7月7日晚11点至11点45分,胡世译记录。

于中国”，但可与苏联共同经营。蒋介石提议，条约有效期为20年。^①

中方的新战略置苏联人于困难的境地。由于柏林郊区波茨坦召开的首脑会议即将来临，斯大林不想叫美国人有机可乘，利用中苏谈判迫使苏联在东欧作出让步。为了避免这一局面，他想去波茨坦之前就与宋子文签约。因此，即使蒋介石不向苏联人作出什么让步，斯大林也一定要开始谈满洲问题。现在，为了推动谈判，斯大林在中共问题上作出了承诺。“我们不支持，也不想支持”中国共产党人，斯大林说：“对我们来说，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别的什么人自称政府，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②斯大林于是准备达成协议。他立即提出的反建议包括：条约有效期为30年；苏联管理旅顺；铁路所有权归苏联。他还暗示，要是因为签约的缘故非得耽搁他晚几天去柏林，那也无妨。^③

第二天下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匆匆会晤了宋子文。他表示愿意在一系列主要问题上考虑中国的建议，这多少有些违反他一贯的外交风格，同时也说明苏联领导人决定尽快签约。然而，在每个主要问题上宋子文都不愿屈服，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得更强硬。当莫洛托夫试图在满铁的管理问题上达成协议时，宋子文反对说：“《雅尔塔协定》也不是圣旨。”^④

在7月11日的会议上，对中国成功的抵制战略，斯大林表现出了不耐烦。他粗暴地说：“照这个谈法，两年也不会有结果。”于是，他试图说服宋子文，中国靠拖延战术是什么也捞不到的，为了签约，苏联愿意作出新的让步。斯大林误以为美国不想往中国领土上派遣军队，他不相信美国会插手中苏谈判。宋子文一直打算利用美国支持中国的立场，对此，斯大林毫不掩饰他的恼怒。

苏联其实并未作出什么新的大幅度的让步，但即便如此，也说明斯大林急于要把条约搞到手。现在，斯大林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同意严格限制苏军向旅顺的调动，只用中国武装部队守卫铁路。苏联人还答应两到三个月内就会从满洲撤走他们的军队。可能苏联领袖现在比以往更加担心美国会在即将到来的首脑会议上干预中苏谈判，他的让步旨在安抚中国

^① ^③④ 1945年7月9日晚9点至10点40分，胡世译记录。

^② 1945年7月10日下午2点至4点，胡世译记录。

人的同时,也安抚美国人。他仍希望口袋里揣着中苏条约去见杜鲁门。他再三强调:“我们必须在去柏林之前解决问题。”^①

但是,宋子文却没有任何在波茨坦会议前解决问题的打算。7月12日,斯大林放弃了。这位苏联领袖现在只好退而求其次,避免给外界造成谈判已经破裂的印象。宋子文同意在官方发的消息中只说谈判“不得不推迟”,斯大林很高兴。双方商定待波茨坦会议之后再见。宋子文离开前,斯大林告诉他苏联人发现蒋介石的对手、国民党左派孙科正在莫斯科把电报的内容传达给延安的共产党人。斯大林说,这种向中共报信的行为“糟透了”,必须停止。^② 很难讲斯大林此举用意何在。或许是不想给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在莫斯科谈判尚未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或许是希望通过背叛“旧好”来取悦新欢,也未可知。^③ 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国民党代表团表示了感谢。^④

宋子文已经把他关于满洲的新计划告诉了哈里曼。大使向华盛顿报告,宋子文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是渴望听听你(杜鲁门)的意见。他希望你能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使斯大林接受中国的立场”。^⑤ 宋子文确实希望杜鲁门能成为国民党的新盟友。

杜鲁门没有关于中国的任何知识背景,对中国也没有任何兴趣。1943

① 1945年7月11日晚9点至11点30分,胡世译记录。

② 1945年7月12日凌晨0点至0点45分,胡世译记录。

③ 类似的例子还有斯大林在1939年对德国共产党人的背叛,关于这一事件的有趣的分析,见里德(Anthony Reed)《致命的拥抱:希特勒、斯大林和苏德条约,1939-1941》。(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 248-255页,纽约,1988。

④ 胡世译日记,7月18日。后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送行晚宴上,斯大林提议为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团结干杯。斯大林看看蒋经国说,如果父亲不能完全成功,儿子会完成他的事业。

⑤ 哈里曼致杜鲁门和贝尔奈斯,1945年7月13日,哈里曼文件,分类档案“7月12-19日”,180盒,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年,在评论中国形势时,他承认“外交,特别是大国外交总是令我不堪忍受”。^① 尽管哈里曼对美国在东亚与苏联人合作的政策提出质疑,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已使苏联同意作出让步,这一成果已足以使这一问题告一段落,离开总统的案头了。杜鲁门对他的前任政策的理解是:与苏联人结成反日同盟,同时,在斯大林参战前要苏联人与中国人签约。他也坚守这两条。因此,宋子文6月份会见杜鲁门时没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总统告诉宋子文,不管愿不愿意,中国必须同莫斯科签约。

在波茨坦会议前的几周里,格鲁与其他人一道尽力敦促杜鲁门改变罗斯福的政策。6月底,这位美国代理国务卿告诫总统说,现在莫斯科正强迫中国政府承认共产党人的平等地位,过去这些共产党人不是积极用武力反抗中央政府,就是去当叛徒。格鲁还暗示,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共,“十分胆大妄为”,居然要求有权独立控制自己的武装力量。格鲁相信,这些新动向是与美国利益背道而驰的。^②

美国陆军部也警告杜鲁门注意共产党的企图。7月初,杜鲁门接到陆军部情报局提交的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综合报告,其中说,中共受莫斯科“资助和指导”。它还声称,苏联人计划利用中共在满洲和华北建立“苏联控制区域”。通过反复对比东欧的局势,该报告警告,不能容忍苏联在中国也建立一个势力范围。^③

在去波茨坦的路上,总统与他的幕僚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来商讨对策。

^① 杜鲁门致索特,1943年2月9日,参议员/副总统文件,分类档案“中国局势”,51盒,藏杜鲁门图书馆。这里引自梅塞(Robert L. Mesner)《罗斯福、杜鲁门和中国:综述》(Roosevelt, Truman, and China: An Overview),载何汉理(Harry Harding)和裘明编《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对关键十年共同进行重新评估》(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68页,威尔明顿,1989。

^② 格鲁致杜鲁门电,《共产国际和极左派活动复兴的可能性极其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影响》,1945年6月27日,白宫核心文件,分类档案“字母排列-C”,36盒,藏杜鲁门图书馆。

^③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陆军部军事情报局,1945年7月5日,埃尔塞文件,分类档案8,2盒,藏杜鲁门图书馆。当然,总统并不知道该报告与现有的大多数G-2和战略情报局提供的关于中共同苏联的联系的情报是矛盾的。见《中国共产党为应付中国内部危机所作的准备》,战略情报局第32号研究报告,1945年7月27日,哈里曼文件,分类档案“7月27-31日”,181盒,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一路上，气氛和在别处旅行时大相径庭……简直就是在办公。”^① 国务院的官方简报过于模糊、笼统，对总统没什么帮助。格鲁的建议又太不留余地，他说，美国可以接受中苏关于旅顺的协议，但其他的地区协定则“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向丑恶的帝国主义复归的趋势。……因此，从美国的利益、政策和理想出发，这些协定令人大失所望”^②。

一大批美国官员越来越怀疑斯大林的动机。中苏在满洲问题上争执不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渠道，使他们的怀疑得以在波茨坦会议上发泄出来。这个问题的实质关系到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信条：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抵达波茨坦的当天，在1931至1932年的满洲危机期间曾任胡佛政府国务卿的史汀生就已经应哈里曼的建议告诫杜鲁门不要让苏联人控制大连。这位现在的陆军部长说，同意苏联控制大连，就意味着“放弃一项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美国政策”^③。杜鲁门也焦头烂额，一方面，他想遏制苏联在满洲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斯大林进攻日本却“不”与美国合作。经过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再三，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实现了《雅尔塔协定》规定的条款。”关于大连问题，美国不应向苏联人妥协，而应要求在同该港有关的一切协议中获得自己的地位。^④

虽然总统听到了许多可怕的警告，可是此后东亚事务在美国、在波茨坦的外交中仅仅占了一个很次要的位置。首先，斯大林在与杜鲁门会晤时玩了漂亮的一手。这是他和新总统的第一次见面，握手寒暄没过几分钟，斯大林就急急忙忙地解释他的亚洲外交政策。他告诉杜鲁门，他的军队准

^① 波伦致爱维丝·波伦函，1945年7月17日（邮戳），波伦文件，分类档案“给妻子的信”，36盒，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② 格鲁致贝尔奈斯电，1945年7月13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波茨坦会议》，870页。

^③ 史汀生致杜鲁门总统备忘录，1945年7月16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7卷，943-944页；又见史汀生日记，1945年7月15日。

^④ 哈里曼致杜鲁门，《日本：占领和军事政府》，1945年7月15日，哈里曼文件，分类档案“7月12-19日”，180盒；哈里曼致杜鲁门，《雅尔塔协定影响中国》，1945年7月18日，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备在8月中旬进攻日本,但他首先要与中国签约。他强调苏联的要求并未超出《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他还说,他不但明确承认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还保证绝不帮助中共。当贝尔奈斯迫使斯大林对旅顺以外地区的军事控制问题表态时,这位苏联领袖回答说,除了在该海军基地周围,莫斯科没有要求享有在其他任何地区驻军的权利,并且,莫斯科已经同意大连为一个自由港。

斯大林的最后一点意见引起了总统的注意。杜鲁门立刻声明这意味着苏联人接受了美国在满洲的地位。会后,总统显然相信他既“捍卫了满洲的‘门户开放’”,又得到了苏联人参战的确切日期,因此,他觉得不必亲自去解决宋子文在莫斯科遇到的麻烦了。^①关于中苏条约问题,“以一种比我的预想要好的方式解决了”,总统这样告诉他的妻子。^②

尽管杜鲁门处理外交事务极其幼稚,但与他的大多数幕僚相比,他在许多方面更接近罗斯福的观点。这位新总统明白,罗斯福政策的基石是与苏联合作,他想继续保持这种合作。新任国务卿贝尔奈斯在外交方面的稚嫩也只有杜鲁门才能与之媲美。他的主要顾问们要求变革现有的政策,他试图把这些要求与总统的意愿调和起来,希望延长了的中苏谈判能阻止斯大林进攻日本,直到原子弹打击的毁灭性力量令东京确信除了无条件投降外别无选择。他认为,“这将拯救中国”。7月23日,贝尔奈斯请杜鲁门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劝告委员长不要向斯大林屈服,但又要把谈判继续下去。^③

动用原子弹打击日本以阻止苏联参战,贝尔奈斯的战略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这一设想上的。但即便如此,这种考虑也决不是总统决定于8

^① 史汀生日记,1945年7月17日,戴斯特林纪念图书馆。

^② 杜鲁门致贝丝·杜鲁门函,1945年7月18日,戴菲雷尔(Robert H. Ferrell)编《亲爱的贝丝:哈里·杜鲁门致贝丝·杜鲁门的信件》(*Dear Bess: The Letters From Harry to Bess Truman, 1910-1959*),519页,纽约,1983;又见杜鲁门日记,1945年7月17日,戴菲雷尔编《不供公开发表过的文件:杜鲁门私人信件》(*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53页,纽约,1982;亦参见哈伯特(Fraser J. Harbutt)《铁幕:邱吉尔,英国和冷战的起源》(*The Iron Curtain: Churchill,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14页,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88。

^③ 贝尔奈斯文件,1945年7月20日,分类档案602,戴克莱森大学库伯图书馆。

月初扔原子弹的主要原因。近来的研究显示,只要准备工作一就绪,杜鲁门就会下令投弹,而不会在乎同苏联的关系。通过增强蒋介石对美国外交援助的希望来阻挠苏联进攻满洲,这是极其幼稚的计划,它最充分地暴露出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美国主要领导人缺乏经验。不过,这个松散的计划同时也说明杜鲁门政府正走上在东亚与苏联对抗的道路。^①

与柏林相对,在地球的另一侧,蒋介石从他的军事顾问那里得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一份提交给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详细而精确地研究了苏联在东北亚的进攻计划。该报告称,苏联想要占领满洲,并且它完全有能力在任何时候说到做到。报告预计日本只会略微抵抗一下,因为与它为防止西方盟国征服日本本土而布下的重兵相比,它在满洲的军队根本就不算一回事。苏联在蒙古和黑龙江沿岸集结了庞大的部队,表明斯大林也准备攫取华北的部分地区,诸如北京和天津。^②

该报告把一种恐怖的前景呈现在蒋介石面前。苏联不仅要占领东北,还要占领华北的一些要地,这意味着将由斯大林来决定对待蒋介石与毛泽东两股力量之间的天平到底向哪一边倾斜。明白了这一点,委员长被迫进一步迁就苏联人。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大使,强调虽然要向杜鲁门通报,但中国的外交政策终究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他试图传达给彼得洛夫的一点意见是:只有当苏联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后,中国政府才能平安度过外蒙独立造成的危机。蒋介石暗示,联系到他已在中苏谈判中许给苏联的那些东西,他的政权要是保不住,对莫斯科也没什么好处。他还重申,中国有很强的势力无条件反对与苏联签约。^③

1945年夏,国民党政权面临着内政、外交的一系列挑战。秋季就要召开新的国民大会。王世杰负责为国民党继续把持领导地位做筹备工作。他注意到,莫斯科谈判的结果关系到国民党政权在这次大会中的力量。另

^① 参见沃克(Samuel J. Walker)对近来新出现的证据的综述。《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研究新成果》,载《外交史杂志》1990年冬季号,97-114页。

^② 军事委员会致蒋介石报告,《苏俄对日攻势作战之研究》,1945年7月14日,十位数档案546.44439.2,藏台北史政编译局。

^③ 蒋介石和彼得洛夫谈话备忘录,1945年7月19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765-770页。

外,蒋介石必须团结全党支持他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是,国民党领导人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同共产党人抢夺地盘的任务越来越紧迫。^①

1945年7月间,蒋介石花了许多时间来思考国际局势会如何影响他和中共之间的这场竞赛。他感到,苏联已经将美国当做敌人来看待了。他同时肯定战后的东亚将经历一个苏、英、美三国竞争的时期。虽然他相信美国已不再可能在中国问题上奉行孤立主义的态度,但仍然不敢确定在打败日本后美国是否还会继续向他的政府提供大规模的援助。在他看来,上策是不与任何一个大国结盟,却要利用他们之间的分歧为中国谋利益。蒋介石尤其想要找到一种既能孤立中共并迫使它“服从”国民党的统治,又能保证国民党的团结并“使苏联在远东感到安全”的对苏政策。^②

宋子文于7月20日向国民党领导层提交的关于莫斯科谈判的秘密报告在重庆并未获得广泛接受。这位中国外长在国外已经一个月了,当谈及满洲时,他所强调的是经济问题,而并不是每个国民党领导人在过去几周里都在思考的与中共发生冲突的问题。在三天后召开的党的最高层会议上,很可能还有人宋子文的方案进行了批评。同时,根据王世杰的说法,会议还指出了“内外问题”对党的团结造成的巨大压力。蒋介石曾告诉彼得洛夫,他的党内许多人反对割让外蒙,他并没说错。面对这些抵触情绪,宋子文是一个理想的替罪羊。陈立夫认为宋子文是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外国人”,并与其他对条约持反对意见的人一起,指责这位外长应为中国丧失领土负责。^③

会后第二天,宋子文告诉王世杰他欲辞去外长职务,因为若想与苏联签约,派一个新的外长去莫斯科或许会更容易些。翌日,他向蒋介石报告了自己辞职的决定,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并让王世杰取代宋子文。蒋介石接受他内兄辞职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首先,这样可以给莫斯科谈判提供新的动力,同时又能平息国民党内对蒋的批评。另外,同意宋子文辞职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14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8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771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23日;陈立夫采访记录,分类档案“战争与战后时期”。

也是保护他的一个办法。蒋介石对王世杰在许多国内问题上所持的“自由”观点是不满的,并且认为与宋子文相比,更应该牺牲王世杰。正如宋子文在7月29日对赫尔利讲的那样:“这个计划要与苏联签署的协定将毁灭签字人的政治前途。”^①

但蒋介石需要得到他想要的条约。他对新外长的主要训令是斩钉截铁的:在莫斯科签约。他告诉王世杰,党内在外蒙问题上不存在真正的政治冲突。他还表示,“外蒙脱离我国已经很久了”,其重要性也远不如满洲。当前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在满洲维护中国的主权。^②波茨坦会议发出的要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并未使蒋介石改变自己的满洲战略。他和王世杰都想知道的是,假如日本接受了最后通牒,美国会怎么办呢?美国人会派部队在满洲登陆吗?在国民党领导人看来,这极不可能。^③

8月5日,新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此时宋子文尚保留他的行政院院长职务。蒋介石说服他陪同王世杰一起去莫斯科,事实上又恢复了他作为中国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只是他不必在最后的条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然而,在过去三周里,谈判的气氛已经改变了。在机场,莫洛托夫告诉中国人,他们的八年抗战已经接近了尾声,日本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胡世泽此前一直留在苏联首都,忙于阅读各种报纸。他发现报上与满洲特别是与旅顺有关的文章在增加,这说明苏联领导人已经决定开战了。他向宋子文和王世杰汇报说,对《波茨坦宣言》期望过高是错误的,就算日本投降了,苏联人也会“找到其他办法和借口捞取他们想要的东西”。^④

除了同苏联人之间的麻烦外,中国人同时还得对付美国大使越来越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24、25日;赫尔利致贝尔奈斯电,1945年7月29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7卷,952-953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25日。蒋介石上一次同彼得洛夫大使会晤是在恢复莫斯科谈判之前,与此相关,无论是对他的顾问们,还是对大使,他都强调他非常希望谈判取得成功。

^③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8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771页;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26日。

^④ 胡世泽日记,7月27、29日。

多的干预。根据早些时候在莫斯科的经验以及杜鲁门的电报,宋子文知道,即使中国方面想这么做,目前也不可能把哈里曼排除在谈判之外。他和王世杰都希望利用美国对莫斯科的压力为蒋介石争得一个尽可能好的协定,但他们同时又害怕华盛顿基于自己的考虑会反对蒋介石对苏联人作出的新的让步。8月间,宋子文虽然继续与哈里曼合作,但已不再向他通报谈判的细节了。^①

在哈里曼这一方面,他继续向华盛顿施加压力以获得可以直接干预谈判的指示。7月31日,他向贝尔奈斯报告,宋子文不会在满洲问题上屈服,否则将同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他请求贝尔奈斯准许他尽快告诉斯大林,大连港既不能由苏联来控制,也不能划入苏联的军事区。如果斯大林拒绝这些要求,哈里曼建议美国正式提出组建一个国际委员会来控制这一城市。^②

8月5日,贝尔奈斯同意了哈里曼的请求。大使得到指示,要他告诉苏联领导人,在美国看来,宋子文已经满足了《雅尔塔协定》的要求,斯大林不应该再“要求中国作出更多的让步”了。而且,哈里曼应以美国官方的名义通知斯大林,如果不事先征询华盛顿的意见,中苏之间不应签订任何“可能违背我们利益的”协定。最后,斯大林应当签署一个文件,保证尊重满洲的“门户开放”。哈里曼的祈祷终于被上帝听到了,他立刻把美国的新立场告诉了宋子文。^③

宋子文眼看时间越来越不够了。第一颗原子弹已经丢在了广岛。若想要美国人逼迫斯大林让步,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了。8月7日,他通知哈里曼,请他第二天务必要要求会见斯大林。^④

当晚,宋子文和他的谈判代表团会见了苏联领导人。中国人走进房间

^① 8月初,英国人通知重庆,他们认为苏联人已经“走得太远了”。胡世泽日记,1945年8月8日。

^② 哈里曼致贝尔奈斯电,1945年7月31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7卷,953-954页。

^③ 贝尔奈斯致哈里曼电,1945年8月5日,同上书,955页。

^④ 宋子文致哈里曼,1945年8月7日(手稿),哈里曼文件,分类档案“8月1-7日”,180盒,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时,斯大林问:“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消息?”宋子文陈述了中方关于旅顺的立场。斯大林并不感到意外,答应“好好考虑一下”。真正棘手的地方是大连。宋子文坚持该市为自由港,由中国管理。莫洛托夫反对,坚持大连该由苏联控制。他说:“港口的各项装备和设施都是俄罗斯修建、购买的。”宋子文像他在三个星期以前做的那样,再次提醒苏联人关于大连的旧条约已经废除了。斯大林抱怨说苏联人从来没能利用这一港口。宋子文讽刺道:“我们无能为力。谁也料不到日本会发动侵略战争,我们不提供这类保险。”

于是,斯大林转回到他的老预言:“日本会投降,但将东山再起……至于中国的主权,我们将为它浴血奋战,连你们都没这么做过。”斯大林说,从20年代起,苏联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莫斯科不能对日本开战,但现在它能。大连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后,斯大林评论道,波茨坦会议“不错”,贝尔奈斯是“一个聪明人,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想借此提醒中国人,他们已经被孤立了。^①

就在这天晚上,斯大林下达了进攻日本的最后命令。过去的九个月里,他一直在敦促苏军尽快地作好准备,这时,苏联沿着它与满洲的边界展开的攻击准备已经几乎全部完成。之所以单单选定这个时候,一方面是基于斯大林得到的情报部门关于日本计划投降的报告,另一方面还因为此时美国已开始警告他不要再从蒋介石那里榨油水了。显然,斯大林不能允许东京在他参战之前就向华盛顿投降。广岛被炸以后,苏联人看到日本正在放弃努力。另外,苏联领导人无法确定第二天的会上哈里曼将向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根据从蒋介石和宋子文处得到的信息,他们猜测最有可能的是美国大使会给将要签订的条约附加某些美国方面的条件。这样一来,斯大林迫不得已就会同美国总统发生直接冲突,不然的话,就得同意在条约中加入一些承认美国地位的条款。因此,他索性先采取行动攻打日本。华盛顿自从1941年以来不是一直催他这么干吗?现在,他遵命了。

^① 1945年8月7日晚10点至11点30分,胡世泽记录。

美国还好意思向他施加其他的压力吗？^①

中国人和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的美国人早就认识到，何时对东京宣战一直是斯大林的王牌，他能随时利用它为自己在这场游戏中占便宜。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现在开始自问：“苏联的进攻目的何在？”“这一军事行动要多久可以取胜？”王世杰预计“数日内”满洲的大部分地区就会被占领。胡世泽则表示，哈里曼与中国代表们都希望苏联在月底发动进攻。“而现在，”他说，“我们无能为力了。”^②

外交总是不及军事行动来得迅速。哈里曼渴望已久的同斯大林的会晤如期举行了。结果，双方不但都一无所获，而且这次会晤反而加剧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猜疑。斯大林竭尽全力强调，按照他对苏美签定的《雅尔塔协定》的理解，他提出的要求并未“违反”这一协定。像他在同宋子文的谈判中所做的那样，斯大林对美国人着重指出，他并没有要苏军驻扎在除旅顺、大连港以外的满洲地区。而大使则对斯大林试图表明苏联在满洲拥有租借地并不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粗鲁做法感到不快。哈里曼实际上比贝尔奈斯给他的指令走得更远，他告诉这位苏联领袖：“杜鲁门总统大体上已经接受了宋子文的方案。”斯大林显然生气了，他回敬道，他准备只同意和平时期不在大连派驻苏联军队。不过，他答应签署一个议定书，表示他支持满洲的“门户开放”。会议结束前，斯大林告诉哈里曼，美国只接受中国的方案，对苏联的意见却毫不支持，这种立场令他很遗憾。^③

当这位美国大使和斯大林一起离开会场时，他实际上正在关闭一扇大门，苏美在东亚的关系经由雅尔塔会议发展到1945年8月，终于告一段落了。现在，在克里米亚签定的那个协定的含混措辞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假合作全部由于近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而灰飞烟灭了。美国对苏联在中国的地位进行了外交干预，接着斯大林又决定在进攻日本时不与华盛顿

^① 甫诺琴科(L. N. Vnuchenko)《在远东的胜利》(Pobeda na dal' nem vostoke), 69页, 莫斯科, 1971。

^② 王世杰日记, 1945年8月8日; 胡世泽日记, 1945年8月6日。

^③ 哈里曼致杜鲁门电, 1945年8月8日, 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7卷, 533-535页, 1945。

协调行动,这些事件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在这个新时期里,两大国之间将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拉开冷战的序幕。莫洛托夫随后于8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美国大使,为的是通知他苏联将在大约10分钟后对日宣战。^①

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不知如何继续谈下去。美国大使的建议自相矛盾。因为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哈里曼忽而强调美国反对苏联控制大连,忽而又强调中国显然需要尽快签约。当8月10日中国人再次会见斯大林时,有谣言说日本已经宣布愿意投降。根据王世杰的提议,代表团为这次会晤制定了一个孤注一掷的二元战略。一方面,他们要强调中国愿意在新的条件下继续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让苏联人借助斯大林的军事行动来强迫他们作出任何新的重要让步。^②

因为担心美国会进一步施加压力,斯大林本人也急切地需要完成谈判。在8月10日晚会见中国代表团时,苏联人告诉他们日本想要投降了。“我们将签约吗?”斯大林问。宋子文承认他渴望在日本投降前签约,但仍然不作出任何新的妥协。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斯大林现在就铁路以及将要划入苏联军事区的地带等问题作出了许多微小的让步。^③在王世杰为中国对大连的主权作了一番雄辩而激情四溢的辩护之后,斯大林重新阐述了苏联的立场。这位苏联领袖说,在大连,“我们不设军队,没有军舰,也不会沿地区布置炮兵”,中国则负责管理该城市的民政。斯大林还说,关于其他问题,莫洛托夫和宋子文应“对中国的草案逐条进行讨论”。^④

斯大林的这些让步令中国人吃了一惊,现在他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他要宋子文和王世杰在友好条约里写进一个声明,说中国中央政府将为中国的统一和民主化作出贡献。斯大林的动机或许是使中共领导人更容易接受这一协定,这样,要是他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再度恶化,苏联人也不至

^① 哈里曼致杜鲁门电,1945年8月9日,同上书,537-538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9日;哈里曼文件,手写记录,1945年8月11日,分类档案“8月8-12日”,180盒,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③ 斯大林同意由中国人担任两铁路董事会主席。他还放弃了渤海湾中有战略价值的小岛非军事化的要求。

^④ 8月10日晚9点至11点30分,胡世译记录。

于无话可说。斯大林告诉宋子文，“如果你们继续打共产党”，会给苏联人出很多政治难题。对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宋子文和王世杰激烈反对。斯大林退让了。“好吧，”他说，“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作出了多少让步。中国共产党人该骂我们了。”

但是，斯大林的让步还是没能给他换回一个条约。这次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蒙古边界。国际上对该地区边界的承认莫衷一是。王世杰猜测由于美国人的缘故斯大林仍然渴望签约，他便利用这一混乱状况威胁要推迟谈判。斯大林冷冷地说：“现在是远东时间五点。我们的部队将继续前进。”^①

撇开斯大林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不谈，双方都明白，只要蒙古边界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就准备签约。8月12日，中国人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整天的会谈，宋子文常常敦促王世杰先搁置一下他的反对意见，以表明他们愿意在其他小问题上妥协。当天深夜，王世杰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说他愿意用诸如“现存边界”一类用语来绕开边界问题。宋子文和蒋经国告诉王世杰，他们觉得时间就要不够了，中国不得不立刻签约。^②

最后的谈判从午夜开始。在谁控制铁路以及中国在大连、旅顺的影响等问题上，斯大林作出了进一步的让步。^③谈判结束了。中国人准备签约，可是苏联人莫名其妙地试图在俄文文本中再占几处小便宜，于是又耽搁了几小时。8月15日凌晨3点，条约签署。^④王世杰、莫洛托夫相继在条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斯大林告诉胡世泽他需要休息一会儿，就离开

^① 8月10日晚9点至11点30分，胡世泽记录。

^② 1945年8月12日下午4点30分至6点45分，胡世泽记录；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5年8月12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3编1册，647页；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2日；1945年8月13日凌晨0点至1点30分，胡世泽记录。

^③ 斯大林同意中国人在铁路董事会中占多数，并拥有大连的港口设施。这位苏联领袖还同意在棘手的大连港务长的任命问题上作出妥协。港务长将由铁路的经理（苏联人）任命，但要征得大连市长（中国人）的同意。旅顺市政府的中方领导人的任命要得到苏联军事指挥官的同意。

^④ 在被会说俄语的胡世泽发现后，莫洛托夫把这一试图取得额外收获的幼稚教法解释为“一个错误”。这一插曲表明，苏联人对最后的协定很不满意。胡世泽日记，1945年8月27日。

了大厅。他实际上是去给他的将军们下命令：他准备接受日本的投降。

一小时后，斯大林回来了。他谈笑风生，拿出香槟酒招待感到意外的中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斯大林已经证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幸存者。与一群刚和他结成一个并不算和谐的同盟的人一起庆祝他的胜利，这虽然有些讽刺，倒也意味深长。这时，斯大林谈到了他的政权历经九死一生仍能幸免于难的原因。他说，出于两个原因，日本人选择了攻打美国，而非苏联。第一，东南亚比西伯利亚富饶得多；第二，希特勒想自己解决苏联。元首从不要日本插手他的东部战线。斯大林一再说：“就是希特勒本人不要。”^①

最后几天的中苏谈判以及最终的协定让美国大使十分沮丧。他多次尝试着影响谈判的结果，最后一次努力是在8月12日，他向莫洛托夫坚持说，苏联在大连港口设施过多的所有权将“危害美国的利益”。但他的抗议未产生任何效果。^②

早在8月10日，哈里曼就已经向华盛顿紧急呼吁立即派美国部队占领大连。^③大使把“丢失”满洲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倒退。令他更担心的是，假如美国不“彻底调整我们对苏联政府的态度以及同它打交道时所采取的手段”，“接下来的30年就会作为苏联时代”而载人史册。^④雅尔塔会议过去仅仅六个月，哈里曼就已经建议美国动用武力遏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了。

就在几个月以前，美国官方的政策还在热切地推动中苏之间建立新的密切关系，现在，杜鲁门总统也看到了其中的危险。8月18日，杜鲁门在华盛顿接见了宋子文。他强调，尽管他欢迎这一条约，但正是他杜鲁门

^① 胡世泽日记，1945年8月27日。

^② 哈里曼致贝尔奈斯电，1945年8月13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7卷，970-971页。

^③ 哈里曼致杜鲁门和贝尔奈斯电，1945年8月10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7卷，967页。正如加里奇奥指出的那样，由于日本投降造成了巨大的后勤方面的问题，美国陆军都不得不放弃了抢在苏联之前占领大连的计划。加里奇奥《冷战始于亚洲》，63页。

^④ 写给总统的信的草稿（标有“未发出”字样），哈里曼文件，分类档案“1945年3月14-21日”，177盒，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迫使斯大林公平地对待中国的。总统是在点明美苏之间的对立。他说,美国才是中国最好的朋友。然后,杜鲁门宣称他本人“尤为关切”中苏谈判中的中共问题,并强调苏联人还必须表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正意图。这让宋子文感到意外,但他很快就弄懂了总统这些并不令人费解的外交辞令的含义:别太相信苏联人。对宋子文而言,有了美国总统这番提醒,特别是还保证向国民党政权进一步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他觉得自己在莫斯科的苦到底没有白吃。^①

决定美国态度变化的因素当然不局限于莫斯科谈判本身。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官员从亚洲局势联想到了欧洲问题——早在波茨坦会议前,美国的决策者们就已经把中国同波兰、罗马尼亚作全面类比。中苏谈判举行的时候,正值美国正将关注的焦点由对德、日作战转到如何建立战后的世界秩序上来。格鲁和哈里曼现在觉得罗斯福设计的苏美在东亚合作的方案已经过时了。他们认为苏联的要求是进攻性的,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的。他们相信,中共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这些观念为东亚的冷战铺就了关键的阶梯。^②

斯大林绝不想让他和中国签订的条约损害他与美国的关系。罗斯福逝世后,这位苏联领袖力图利用中国问题来改善他和华盛顿的关系。他在谈判中的战略是,避免提出让美国人认为是直接威胁他们在中国的地位的要求。因此,他既不要在满洲派驻苏联军队,也不要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政治上的让步。斯大林想,他的其他要求不会使杜鲁门感到不快,因为与这些要求相伴的,还有一个他本人同蒋介石之间的同盟条约。由于这一条约保证了重庆政权有能力应付来自中共的挑战,斯大林相信,

^①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8月18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25-26页。在美国的档案中,我没有发现有关这次会议的任何记录。

^② 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报纸不同意对中苏条约的这种看法。见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徒有其名的联盟: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1945》(*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578页,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78。

它不但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也同美国的目标相一致。^①

不过,随着谈判的进行,斯大林的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在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主要还是把对满洲的要求当做讨价还价的筹码,用来同列强解决在东欧的争执。然而,随着蒋介石的合作态度日益明朗,斯大林的计划就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安排。这位苏联领袖确信,中国共产党人连同其他那些按照他的理解是处在西方列强统治之下的国家中的共产党都不可能夺取政权。基于这样的判断,他渴望与国民党建立一种有益而稳定的关系。苏联人觉得,在由二战的终结所造成的种种条件的制约下,离开了苏联红军的积极援助,无论哪个共产党政府都不可能生存下去。正如伊沃·巴纳克(Ivo Banac)所指出的那样,不久以后,当斯大林在南斯拉夫的支持者们声称“孤立的”斗争是错误的,只有“团结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击败帝国主义时,这一信念便被推到了极端。换言之,本国土生土长的、而非从外面引进的革命其实都是反革命。^②

既然如此,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苏联政府不仅力图从重庆的蒋介石政权那里获取特权,而且还要让它认识到与苏联合作是最符合它自己利益的。即使斯大林承认美国在中国的优先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他也要尽力得到他自己的权利,并要保证中美合作不能反苏。

但是,就像斯大林以前的一些外交活动所显示的那样,他的外交风格与他的总体目标是相悖的。独特的决策方式、目标上的不一致和斯大林本人对待对手的粗鲁态度等,全都只起了负面作用。对历史学家以及斯大林的同时代人(无论是苏联的还是外国的)而言,他的整个外交政策是支离破碎的,如果从局部考察,倒还不那么令人费解。

因为密切关注着美国对谈判的态度,同时因为蒋介石又出人意料地

^① 苏联没能理解美国确实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抱有普遍的关注,这一点可以从8月中旬斯大林的翻译巴甫洛夫(Pavlov)与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谈话中看出来。巴甫洛夫说,中国不过是哈里曼个人关心的问题,接着,他又描述了这位大使“在提到中国问题时两眼放光”的情景。戴维·斯坎伦备忘录,1945年8月18日,哈里曼文件,181盒,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② 巴纳克(Ivo Banac)《和斯大林一起反对铁托: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问题上的分裂》(With Stalin against Tito: Cominformist Splits in Yugoslavia: Communism), 128-129页,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

表示愿意与莫斯科达成协议,所以斯大林采取了灵活的谈判策略。随着蒋介石态度的明朗化,斯大林对签约的兴趣进一步提高,但他对条约文本的细节也越来越专注,尽量避免任何模糊不清之处,以防止美国日后利用它们向他在满洲的权益发起挑战。正是斯大林的这种过分担心使谈判一直拖到了8月份。美国打败了日本,杜鲁门威胁要直接干预谈判,这些因素导致了苏联参战。甚至在此之后,斯大林为了签约还不得不对宋子文作出几项让步。与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美国所实行的东亚政策一样,它在1945年对苏联军事力量的遏制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代表团有它自己的内部问题。它之所以强调条约的形式而不重视它的政治内容(这一点在蒙古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并不仅仅是基于外交方面的技术考虑,更多的是由国民党国家所代表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像清朝时候一样,官员个人被认为要对不得人心的决策承担政治责任,哪怕他们是直接奉最高统治者之命行事的。宋子文知道,与苏联人订立的这个协定会激起众怒。因此,他本人不愿意出面签字。他改变谈判策略,又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持一种隐秘态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考虑的结果。

作出与斯大林签约决定的是蒋介石,而不是他派往莫斯科的使节们。出于对中共的恐惧,作为权宜之计,蒋介石同苏联人达成了协议。到1945年夏天,蒋介石的政权已在表演走钢丝了。它试图用国际援助来抗衡共产党人地盘的扩张和军事力量的增强。通过《雅尔塔协定》,列强已开始向蒋介石提供援助,他若要尽可能地垄断这些援助,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斯大林签署一个协定。六年前,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来对付欧洲的革命性政治变革的,同样,蒋介石和斯大林签署的协定旨在防止中国的革命性变革。这几位领袖都相信,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帮助,左派政治运动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在延安的中共统帅部里,毛泽东正在自问这个假设是否能够成立。

第三章

七大与中共外交政策的缘起

毛泽东从未出过国门,但他从不怀疑自己具有全面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周恩来是个“国际派”,但从30年代后期起便一直同毛泽东全面配合;党的外交在1944年获得重大突破,美国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周恩来说:“这一回打通了,以后将不难来往。”不料赫尔利出尔反尔,毛泽东大发雷霆:“我们不会再退让了!”——抗战结束在即,国共内战的危险也迫在眉睫……

1945年4月23日,当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进入延安那个简陋的会场时,他们知道,就政治和军事力量而言,他们的党已经达到了一个在过去24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①中共把这次大会称作“七大”,它是在一种崭新的形势下召开的。与一年前相比,党员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党的部队的规模更是翻了一番。^②从地域方面来说,中共的军队已深入敌后,渗透到了日本人控制的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

^① 对于对此次大会多次推迟召开的解释,见李勇《中共七大推迟召开的情况和原因》,60-61页。

^② 范力沛(Lyman Van Slyke)《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载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费惟恺(Albert Feuerwerker)编《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13卷,708-709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

和山东,并填补了由于国民党部队被日军击溃而在长江南北两岸地区造成的政治真空。对于一个短短几年前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夹击下几乎濒于绝境的革命运动而言,中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无异于是在庆祝自己所取得的一系列空前的胜利。^①

在中共外交事务中,这次大会也是一个分水岭。毛泽东自30年代后期起便开始成为党的领袖。但是直到1944年,他对外交政策仍不甚重视,也未去努力争取获得外国的援助。然而,中共地盘的扩张以及苏美对1944年中国战局关注的日益增长,导致毛泽东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45年春,他已经认识到大国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认定他的党现在已有可能得到外援。因此,毛泽东越来越全神贯注于如何在4月份的大会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进一步分析、拓展自己的外交政策。

“七大”是1928年以来党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的许多秘密讲话都是用来讨论苏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以及中共与大国合作的可能性的。他的关于外交政策构想与避免全面内战的愿望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现在相信,苏美联盟将有助于此。

1944至1945年,中共外交政策的动力在于党在国内取得的成功。共产党人利用了1944年日军向国民党政府发动的进攻。蒋介石的部队无法对日军进行有效的军事抵抗,在撤退时也很少能得到地方上的配合,这表明国民党政权在政治、行政方面存在着问题。所以,共产党的部队能深入日军薄弱的后方,并从中渔利,得以开发新的地区。一旦占领新区,他们便树立起自己作为抵抗民族侵略者的形象。^②

共产党力量壮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决策集权化以及在党控制下的大多数地区实施了温和的改革政策,这两点都同1942年底进行的整风运动有关。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毛泽东利用这一运动清除了党

^① 见陈永发(Chen Yong-fa)《制造革命:1937-1945年华东与华中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499-509页,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刘汉等《罗荣桓元帅》,518-5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聂荣臻回忆录》,575-5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

^② 关于对中共力量壮大争论的综述,见哈特福德和戈德斯坦《导言: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3-33页。

内对其领导权威的最后抵抗。这一抵抗来自王明一伙，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在莫斯科受的教育。毛泽东命令中共一些主要的行政和军事首脑长时间地呆在延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两年，以接受严格的调查和政治训练。这一“整顿作风”的运动在通常由延安派来的工作组的领导下，被中共干部们推广到了共产党控制的其他根据地和边区。尽管地方上的许多军事指挥官并不愿意从自己的日常活动中抽出时间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和斯大林的著作，但延安来的人（这也许是他们多年来的首次光临）还是受到了地方上的欢迎，因为他们毕竟使地方干部有机会听到中央关于下一步政策的指示。^①

这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第六、第七个年头，关于如何执行延安制订的同国民党联合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共的干部们特别盼望能得到中央的指示。统一战线建立于抗日战争初期，事实证明，在它的掩饰下，国共之间的内战仍在继续，只不过是换一种较为有限的方式进行罢了。^② 尽管毛泽东在原则上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领导地位，但他还是坚持中共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一立场与蒋介石的要求背道而驰。委员长要把共产党的部队整编到国军中去。从1941年初开始，中共军队和政府军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但延安还是能恪守统一战线的原则。毛泽东发现，团结的政策不仅是对付日本人的有效武器，也有助于打击他在国内的敌人。^③

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首次出版。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宣传了对中国社会所作的分析，而他的统一战线思想就是与这一分析密切

^① 关于延安整风的内部报告，见《萧荣臻回忆录》，576—586页。在某些地区，这一运动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达成了妥协。见鲍尔森(David Mark Paulson)《华北的战争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War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The Shandong Base - Area, 1937 - 1945)，斯坦福大学1982年博士论文。

^② 在30年代末，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民族主义理想以及共产国际宣传促使中共愿意建立统一战线。参见高龙江《第二次统一战线的起源：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载《中国季刊》，113期(1988年3月)，29—59页。

^③ 近年来，中共党史专家们越来越强调统一战线中蕴藏着的没有被发掘出来的潜力。见居之芬(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综述》，载《党史通讯》，1987年3期，33—41页。

相连的。在该书中,毛泽东把国民党视为天然的盟友,同为“觉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毛泽东写道,这些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是资本主义的,但同时又受到政府规划调控的工业经济以及温和的土地改革。^①为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实现这些政策,中共要与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合作。

然而,毛泽东坚决主张,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来临之前,还是在“新民主主义”期间,中共在统一战线内部要继续进行政治斗争。他写道,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②这一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不但在战术上有助于实现毛泽东同国民党建立同盟的目标,在战略上也有助于实现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

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分析差不多就是他对中国社会分析的某种机械反映。他从未出过国,在1944年之前,他所接触的外国人仅限于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一些到延安访问的不速之客。通过中共新闻机构和周恩来、陈伯达等人专门为他准备的报告,毛泽东是知道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可是,由于对国际外交缺乏了解,他未能就大国间的关系问题形成一整套坚实、连贯的看法。尽管如此,这位中共领袖却从不怀疑自己具有全面分析国际事务的能力。^③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直接起源于这种与统一战线思想伴生的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就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理解而言,苏联代表共产党,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就像国民党,又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愿意同苏联结盟的,另一部分是反对结盟的。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同样可以发现“进步力量”与“反动派”的对立。因此,在毛泽东眼里,苏美联盟的意义就在于它是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集》,7卷,147-205页,东京,1983。

^② 《毛泽东选集》,2卷,387页,人民出版社,1966。

^③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553-55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许全兴等《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338-37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国共统一战线在国际上的翻版,其中同样并存着斗争和团结。^①

1941年后,一个难题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那就是,与日寇作战的不是苏联,却是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共与美国人的接触进展缓慢。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官方对此不感兴趣,而中共主要控制区域的地理位置又过于偏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共对美国人在中国的意图心存戒备。到了1944年,中共在根据地同美国的接触主要是通过来访的美国记者或偶然碰到的美国军方人士来进行的。^②让很多中共地方部队感到自豪的是,他们在日军后方营救了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从而为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作出了贡献。^③然而,位于重庆的中共南方局的干部们仍然觉得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想避免与共产党人亲近。

1944年初,正值整风运动进入高潮之际,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党的外交工作。党的领导层认识到,有必要多请外国客人来延安。在重庆同美国进行接触的尝试已被证明并不成功,因为根据整风的精神,任何敏感的问题都必须由中央来解决。毛泽东告诉重庆的工作人员要小心行事。延安所担心的是,中国的公众舆论会怀疑中共企图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或是指责中共向外国人“出卖”国民党政府。^④

1944年夏天,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毛泽东认为,这一美军观察团的光临说明中共吸引美国军事援助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突破。在依然十分孤立、闭塞的共产党人的总部延安,美国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中共的军事指挥员们立即着手制订进一步的合作计划。周恩来写信给他的一个助手说:“这一回打通了,以后将不难来往……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⑤共产党的通讯社还预言,9月初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的到来标志着

^① 王益《抗战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初探》,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3期,31-35页。

^② 见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和弗里森(Oria Friesen)《中国报告》(*China Reporting*),149-150页、154-155页,纽约,1977。

^③ 李小莉(音)《管敬美国飞行员纪实》,载《山东文史资料》,1986年18期,67-69页。

^④ 谢寅林《1944年中外记者团延安行》,载《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1期,14-17页。

^⑤ 周恩来致王炳南函,1944年8月6日,引自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3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华盛顿对中国局势越来越感兴趣。^①

由于在对美关系中取得了这种明显的突破性进展,党中央发布了一项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国历史学家何迪认为,这是党的“第一份重要外交文献”^②。除了简化了党处理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程序外,1944年8月18日发布的这份指示还说,罗斯福代表了美国政府中的“进步力量”,中共赞成他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中央认为,这一方针是反日、反内战、支持民主改革的。该指示还说,迪克西使团来访,就是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成功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国共统一战线已经加强了中共的力量,同样,国际统一战线也将有助于实现党的各项战时目标。^③

中共的对苏政策是党惟一一项由来已久的外交政策,也在1941年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应在国际事务中主要采取什么立场一直抱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当然,这一分歧的双方在面临党内的其他分歧时,往往还会发生新的组合,结成不同的阵营。一种倾向可以被称作“国际派”。虽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委员王明、《解放日报》的编辑博古以及周恩来在别的问题上有分歧,但他们都属于这一派。在他们看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国际进步力量和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将为中共政治上的胜利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④

另一种倾向可以被称作“中国中心派”,毛泽东、任弼时以及“白区”战略家刘少奇等人属于这一派。他们认为,中国革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产物。对这一派而言,国际上的支持或反对不容忽视,但是,党自己的政

① 《解放日报》,1944年9月14日。

② 何迪《1944-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载何汉理、袁明主编《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33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卷,573-57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党内发行。

④ 关于王明,参见 Shum Kui Kwong《中国共产党的夺权道路》(*The Chines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Front*),156-158页,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88;关于周恩来,参见《周恩来传》,491-492页。Shum 断定,毛泽东战胜王明也意味着“国际派”外交观念的失败。我认为,毛泽东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影响,他不仅接受了一些“国际派”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关系的看法,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间,在党内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中还能发现这些看法的存在。参见高龙江《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237-238页。

策才是第一位的。^①与“国际派”相比较，“中国中心派”并非不尊重苏联，对苏联的援助也并不是不感兴趣。不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首先关注的是国际事务对中国的影响。由于苏联知道他们的这种态度，当遭到来自对立派的攻击时，他们便会在争取来自莫斯科的支持时遇到困难。^②

因此，在30年代中期同王明争夺中共领导权的斗争中，毛泽东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同情。另一方面，王明试图利用他在共产国际的关系来击败毛泽东，却没能争取到苏联人的决定性干预，于是他也失去了问鼎中共领导权的机会。1937至1938年，毛泽东完全控制了中共，不久又使莫斯科认可了他的这一领导地位。然而，同王明的斗争不可能令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产生更多的好感。^③

在40年代初，毛泽东的“中国中心”态度导致了同莫斯科的一系列政治分歧。1941年初，当国民党部队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安徽南部发生激烈冲突时，毛泽东要求苏联人停止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却决定要通过支援蒋介石来遏制日本，因而继续向他输送武器，并要求中共不要向政府发动任何进攻。围绕着德国攻打苏联后中共应采取什么战略这一问题，苏联与中共之间又出现了分歧。苏联人想叫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攻蒙古边界沿线的日军据点，但毛泽东担心此举会给中共军事力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便没有理睬莫斯科的要求。^④

没有证据表明苏联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实质性

^① 关于毛泽东，参见施拉姆(Stuart Schram)《毛泽东思想》(*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42-47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关于刘少奇，参见朱元石《刘少奇与抗战结束后争夺东北的斗争》，载《近代史研究》，1968年1期，124-126页。

^② 参见Shum《中国共产党的夺权道路》，114-133页；高龙江《第二次统一战线的起源》，29-59页。

^③ Shum《中国共产党的夺权道路》，138页。

^④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五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战争期间，在延安一直有苏联代表。他们最重要的任务除了向莫斯科报告中共的情况外，还要开通一个电台，以便延安和苏联进行直接联络。到目前为止，有关苏联代表团的资料只有团长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r Vladimirov，即孙平)的日记。当中苏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这一日记在莫斯科出版。它并不可信。大多数情况下，在研究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时候，我更愿意使用中共的文献。

的物质援助。用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话说,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加起来不过是三五飞机的毛毯和药品。^①莫斯科不允许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撤入苏联境内,也不允许中共动员组织生活在中苏边界苏联一侧的中国人。在30年代,中国的一些小股武装被日本人赶出了满洲,流亡到苏联的远东地区,这一问题导致中共与苏联之间特别不和。斯大林不让这些队伍与中共建立联系,甚至不允许那些本来同中共有关系的部队恢复这种关系。他把这些武装编入苏联红军,并引导其领导干部加入苏联共产党。^②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是为了抵制莫斯科的政治和战略观点。尽管在40年代初毛泽东和苏联人之间确实存在分歧,但这一指责是没有说服力的。相反,由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他能够在接过“国际派”某些外交主张的同时,将问题转变为如何把来自苏联及其他外国的援助用来支持中共在中国国内所从事的政治斗争。另外,毛泽东之所以倾向于采取他在整风运动中所鼓吹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模式,是为了在不损害党的团结的前提下使延安同国内外的盟友密切合作。^③

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苏美结盟对他们其实是有利的。1944年秋,这一念头比以往更加强烈。如同延安的一位发言人在9月中旬所说的那样,整个世界正趋向于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重建那些毁于侵略的国家。这一全球趋势也会对即将来临的国共谈判产生影响。在一份内部报告中,临时负责与重庆联络工作的董必武说:“国际形势对中国非常有利。”他希望美国压服蒋介石与延安达成协议,以便更好地抗日。中共应该利用美国的地位,要求蒋介石不仅从军事上,还应从政治上(例如,在选举国民大会的问题上)向美国学习。延安自己也应该加紧努力与美国人合作。^④

① 华庆昭《中国人眼中的杜鲁门对华政策》(*Truman's China Policy as Viewed Through Chinese Eyes*),提交给1989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旧金山)的论文,4页。

② 赵豪芬《周保中年谱》,载《中共党史资料》,25期,239-250页。

③ 在刘少奇从这时开始写的几篇文章中就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见他的《肃清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载坎普顿(Boyd Campion)编《毛泽东的中国:党的整风文件,1942-1944》(*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1944*),255-268页,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西雅图),1952。

④ 《董必武关于参政会的报告》,1944年9月24日,中央统战部 and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卷,754-768页,档案出版社,1986。

周恩来是一个“国际派”，但从30年代以来一直和毛泽东紧密配合。现在，为了促成美国对中共的援助，他在党内开展工作。10月初，在中共一个根据地的一次演讲中，周恩来首先罗列了那些不去打日本人却来围剿共产党根据地的国民党部队，然后气愤地质问道，他们“不都是装备了美国的枪炮么？何以败得那样快，那么惨”？周恩来指出，美国人的确在向国民党供应各种物资。但是，他的愤怒却不是指向美国人，而是指向蒋介石政权的。他强调，国民党正在滥用美国的援助，而美国人对此也有所察觉。从与赫尔利的会谈来判断，他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将来会有一部分美援给中共而不再给重庆。^①

作为对美政策的一部分，中共在11月试图让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古怪、乖僻的赫尔利来充当延安和重庆之间的调停人。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赫尔利，接受了这位美国大使提出的关于政府改革的五点方案。后来当赫尔利在重庆屈服于委员长的压力同意对该计划进行修改时，毛泽东大发雷霆。他对来延安的美国人说：“假如我们任凭委员长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即使我们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对我们也没什么实际好处。”“我们不会再退让了！”毛泽东咆哮道。^②

赫尔利声称中共领导人把他骗进了一个作为调解人无法容忍的境地。当他否决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军方提出的与延安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时，毛泽东怒气未消。在赫尔利徒劳地进行调停的同时，延安和在华美军司令部直接讨论了这些令毛泽东极其满意的计划。当获悉赫尔利甚至已经排除了那些赞同与中共进行合作的美国军事官员时，毛泽东向周恩来抱怨美国口是心非，还说赫尔利这个人不值得信赖。^③

^① 周恩来《如何解决》，769-780页。

^② 包瑞德致魏德迈电，1944年12月10日，第332组文件，美国陆军记录，中国战区，分类档案“电报及观察记录专辑，中国战区政策，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1542盒，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③ 迈克莱尔致魏德迈，1945年12月18日，332组文件，中国战区，分类档案“电报及观察记录专辑，1945年12月23日至1946年2月23日”，1538盒，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周恩来传》，580页；又见沙勒(Michael Schaller)《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The U. 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195-206页，哥伦比亚大学，1979。

虽然私下里很担心,但中共领导人还是小心翼翼地不公开在美国和国民党之间画等号。毛泽东告诉美国观察团:“即使美国不给我们一枪一弹,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在1945年1月末于重庆举行的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仍然希望美国最终能压服蒋介石同意建立联合政府。为了推动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持续发展,周恩来主动采取了很多措施,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让美国邀请毛泽东访问华盛顿的尝试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①

周恩来觉得,如果中共作出一些新的让步(特别是在统一军队的问题上),就能更有力地向美国人表明延安是真心想与政府达成协议的。然而,毛泽东对此表示反对。对毛泽东来说,接受国民党任何要中共放弃军队指挥权的要求都是危险的,并且也不可能让蒋介石或赫尔利作出积极的回应。毛泽东坚持政治解决必须先行。^②

在1945年2月3日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毛泽东解释了国际形势是如何影响他的观点的。他说,雅尔塔会议表明三大国间的联盟将更加紧密。另外,“红军逼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对德胜利很可能意味着苏联将更多地参与东亚事务。毛泽东预言,一旦苏联人变得更加积极,则美蒋将“均急于同我们求得政治上的妥协”。所以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必要急匆匆地与政府达成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协议。^③

指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始终是中共领导人战略考虑的一个要素。随着欧战的结束,在近期内获得苏联援助的希望大增。与重庆政府一样,延安毫不怀疑斯大林已经决定在打败德国后攻打日本。1945年初,人们问的问题是苏联人会在什么时候发起进攻,以及苏联参战这一前景将对中国

^① 包瑞德致魏德迈电,1944年12月10日,第332组文件,中国战区,分类档案“电报及观察记录专辑,中国战区政策,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1542盒,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如果毛泽东曾来到华盛顿》,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72年10月号,44-64页;又见章百家《1937-1945年中国对美政策》,载何汉理和袁明主编《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24-25页。

^② 《周恩来抵渝后的声明》,1945年1月25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788页;毛泽东致周恩来,1945年1月28日,载同上书,789页;《周恩来传》,582页。

^③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3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790页。

的政局产生什么影响。在给重庆的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王若飞的一份电报中,中央指出,必须先估算出苏联可能参战的时间,然后再据此制订谈判策略。^①

然而,寄希望于苏联的支持并没有使中共丧失与美国人发展关系的兴趣。首先,毛泽东在1945年1月仍然相信,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两年;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政治将有重要影响。其次,虽然中共领导人看到,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英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但他们还是断定三大国在战后将继续长期合作。^②

1945年初,在毛泽东对于国际关系及其对中国影响的理解中,一个根本点是他相信大国联盟将维持下去。2月15日,大概是作为即将来临的党代会报告的预演,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宣称:“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几个大国是不是能够团结到底消灭敌人法西斯。”他相信大国联盟不但会在战时一直存在,而且还将在战争结束后保持下去。毛泽东的这一断言是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上的。第一,各国的“老百姓”要求和平;第二,现在苏联是国际舞台上的“主力军”,它在欧洲的军队比西方列强的部队加在一起还要多,将对所有主要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第三,由于强大的苏联支持和平,所以不会发生新的国际冲突。^③

毛泽东认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美国政府想要与苏联结盟的确凿证据。美国人和苏联人都认识到,如果不联合起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太平洋战场,都不会取得胜利。毛泽东断定,罗斯福之所以能再次当选总统,部分原因就在于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美国工人运动的支持,该运动要求继续与苏联结盟反对法西斯主义。^④

3月初,在一份给党的高层干部的通知中,中央委员会借助欧洲的例

^① 《中央关于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给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2月25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793页。

^② 潘仲群《读〈对日寇的最后之战〉及有关文献的札记》,载《党的文献》,1988年1期,58-61页;《中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1945年3月15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卷,802-804页。

^{③④} 毛泽东《时局及其他问题》,1945年2月15日在党校演讲,重印于《毛泽东集补卷》,7卷,219-247页,尤其见219-222页、223页。

子来探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央认为,盟国在欧洲解放区建立的政权本质上是民主的,这些政权将成为亚洲和中国解放后的样板。美国明白,若要切实、彻底地解决“太平洋问题”,就必须让苏联参加进来。如果共产党的“威信”足够高的话,美国自然会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①

中共要取得“威信”,首先要让人看到它能有效地打击日本人,进一步讲,还有能力攻占并守住某些地区以备盟军登陆。经过比较盟军在欧洲采取的战略和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后,中共领导层预计美军不久就将在中国沿海某处登陆。2月底,中央委员会通知华中局,“美军登陆是必然的”,华中局应该充分做好迎接美国人的各种准备。^②毛泽东希望这些登陆行动会结束美国只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并使美国和中共部队有可能在沿海地区展开战地合作。^③

正如里顿·安德森所阐明的那样,中共想在沿海地区迎接美国人的策略到头来是失败的。毛泽东误解了华盛顿的意图,他不知道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11月就已经反对把在中国登陆列入到美国的全盘战略中去。另外,延安很难让地方负责人将他们的部队动员起来,发动一场从地方军事局势来看既无目标又极端危险的战役。比较典型的是,2月至3月间中共内部发行的小册子对与美国人会合的可能性只字未提。相反,这些小册子强调,“只有加强民主力量(即建立更多的根据地),才能实现建立联合政府的目标”。党的军队将推进到沿海地区,为的是从日本人手里解放该地区的人民,并证明共产党人即使没有海军也有能力驱逐侵略者。^④

中共的确扩展了它所控制的区域,这在长江以南尤为明显。但是,日

^① 《中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1945年3月15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卷,802-804页。

^② 《中央关于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2月2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7页。

^③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3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790页。

^④ 里顿·安德森《延安与列强》,87-91页;无题无日期文件(可能出自福建省委),332组文件,中国战区,分类档案“中国共产党文献”,2463盒,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些文献似乎是在1945年中期由国民党军队调查局提供给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其中一个文件显然是国民党伪造的。

本人和国民党对中共军事行动的抵抗使它的部队遭受重创。例如，共产党人在福建希望占领几处新的地区，结果牺牲了不少战士，损失了许多装备，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对此痛悔不已，认为1945年春的战役彻底失败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希望国际形势的发展会弥补他们的损失。5月初，他认为苏联可能很快就会参加对日作战。他相信，这将对中共有利，但也会刺激日本人加强抵抗，还会导致“国际反动势力”加紧努力颠覆中共。对这个远离共产党主要根据地的南方地方省委负责人而言，寄希望于苏联的干预并不能起到多大的安慰作用。^①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美国拒绝援助中共军队，1945年春，中共领导人详细研究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毛泽东试图把美国政策理解为进步和反动势力相互较量的结果。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表明进步力量正在壮大。因此，当他发现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越来越反共时，他和别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早在1944年12月，美国便中止了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谈判；此后，尽管国共谈判尚处于停滞阶段，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物资供应却大幅度增加。1945年2月间，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他确信，赫尔利大使已经决定同中国共产党人作对，而上述变化就是他在幕后操纵的结果。周恩来对延安的几位外国人抱怨道：“一个国家的大使可以信誓旦旦地许诺、签字，几个星期以后又矢口否认；对这样的国家你还能怎么样呢？”^②

赫尔利于1945年3月间回国述职，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届时能从中看出他的政策是否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赫尔利4月2日在华盛顿发表的声明令毛泽东很沮丧。这位大使夸夸其谈，鼓吹进一步支持蒋介石，反对美国给中共任何援助。然而，毛泽东仍希望这次声明的非官方形式表明它并未获得白宫批准。罗斯福于4月12日突然去世。赫尔利与美

^① 罗同志《最近两个月来的工作检讨与今后工作问题》，福建省档案馆和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整委会闽浙赣办公室编《闽浙赣党史文献资料选编》，251-252页。“罗同志”即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

^② 李效黎(Hsiao-li Lindsey)回忆录，打字稿，365页，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李效黎是曾在延安工作过的英国人林迈可(Michael Lindsey)的妻子。

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官员再度失和。这些都令延安越来越摸不准美国政策的走向。^①

由于搞不清美国政策将向何处去,对中共来说,把握住苏联的意图就变得空前重要。在那些中共部队已经同国民党军队交火的地区,中共地方负责人希望苏联对共产党人的支持能抵消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5月初,中共更进一步担心美国对华援助实际上已经转变成对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派的援助了,因为“自苏联攻占柏林后,反法西斯阵营中的斗争加剧了”。^②

延安认为,如果说美国政策正在向右转,那么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时取得其支持。3月末,在中共部队中散发的一期杂志以全部内容介绍苏联红军的情况,包括它的战略和武器装备。该杂志还反复宣讲苏联军队的行为和目的与以前那些沙皇军队是不同的。延安告诉它的战士们,这是新的军队,是“红军”,不应将其视为外国人,而应当把他们当做全体劳动人民的队伍来看待。^③

延安的领导层还讨论了如何利用苏联新的外交力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苏联在欧洲取胜后,随着红军节节胜利的抗日同盟,莫斯科以后将在一切同中国有关的问题上取得重要的发言权。现在,中共领导人想要知道的是,莫斯科究竟希望中共在苏联对华政策中扮演什么角色。毛泽东很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想要中共同国民党联合抗日。虽然他有时感到苏联人要他的党为实现团结而作出的让步太多了,但他对这一政策在原则上还是同意的。然而,要是蒋介石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情况会怎么样呢?且不管美国是否支持蒋介石,只说斯大林,他能向中共提供帮助吗?

在“七大”正式开幕前,毛泽东已经对与会代表们讲过话了。对他和会场内的所有代表而言,此次大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中共在党外取得了成功,还象征着毛泽东战胜了他在党内的竞争对手。尽管他的语气像往常一样随便,但主席十分明白他的讲话的重要性,因而作了精心准备。他简要

①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70-71页。

② 《国浙赣党史文献资料选编》,1卷,252页。

③ 《新华论坛》,1卷,第5期,1945年3月16日。

地总结了党的24年历史,表明“正确的”路线(也就是毛泽东的路线)终于把党从失败中挽救了出来,并引导党走向胜利。毛泽东说,胜利已经近在咫尺。中国共产党已取代了国民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动力。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1945年不仅将带来抗日战争的高潮,也将使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①

在他向大会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正式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对外交事务作了大量的描述。该报告将被用作此次会议的主要公开声明。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重申了他对战后在全世界实现和平的期望,表扬了大国的联盟。报告说,中共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打败日寇及中国的法西斯分子,避免内战,成立广泛的联合政府。党欢迎一切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外来援助。毛泽东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他提醒重庆不要忘记苏联是第一个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并在20年代支持过中国大革命;抗日战争初期,苏联人还向中国提供过物质援助。

一方面,毛泽东重申他相信没有苏联的参与,太平洋战场上的冲突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他也特别感谢美国在过去四年间对中国的帮助。不过,他在赞扬美国之后紧接着提出警告:中共不会容忍外国违反中国人民的利益,对中国事务进行干预。最后,毛泽东提到了菲律宾,说美国让菲律宾独立为其他殖民国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他引用罗斯福的话指出:“世界已经缩小了。”他并举例说:“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感觉是住在十分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现在感觉成了近邻了。”^②

毛泽东认识到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美国在华角色的看法。在“七大”上,无论是公开讲话还是作最后的秘密报告,他都详尽论述了美国在战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他指出,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是向下的……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

^① 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4日,载《毛泽东集补卷》,7卷,257-270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4-8页,73-79页,无出版地出版者,1945。以下称《“七大”文献》。关于这一报告,现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在官方的北京版《毛泽东选集》(1029-1100页)中,论述对外关系的段落被修改了,为的是删除大部分对美国的积极评价。《毛泽东集》(9卷,183-275页)中的该报告文本与我引用的这个差不多。

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在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他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资本主义在美国会永久生存下去?并非如此。毛泽东指出:“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但他又指出,只要美国的经济依然强大,它就会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①

在毛泽东讲话以后,大会着手工作。三项任务被列上了议事日程:使党组织集中化;检讨过去的错误并制订新政策;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使主席和他的支持者们取得彻底胜利。所有这些任务对中共外交政策及其实施办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所希望的是,当外国军队来中国参战时,党内在执行延安决定的问题上能避免出现混乱和延误的现象。他相信,通过采取加强党的纪律、疏通党内的信息流通渠道、明令规定将所有外交问题都提交给延安解决等手段,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批评以前同毛泽东争夺中共党内领导权的那些对手的重要工具。该决议由主席的年轻门徒胡乔木起草,并在“七大”前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这主要是一份用以谴责30年代王明及其追随者的“左”倾错误的文件。“七大”上的许多讲话都围绕着它进行。例如,30年代中期同王明有过密切关系的周恩来几乎在所有的演说中都对“左”倾路线加以谴责,对毛泽东和“新民主主义”进行歌颂。^③然而,毛泽东并不想让别人认为该决议是在隐晦地对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者提出批评。这一决议其实应该是对党内某些领导人的一个警告,叫他们别再企图利用“外面的关系”来支持他们在党内的观点。毛泽东及其助手们这么做,是出于对当前党的任务的考虑。^④

关于“七大”所批准的国内政策,最近几位学者在研究中令人信服地表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45年5月30日,载《毛泽东集补卷》,8卷,27-29页。

② 徐焰《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的发展研究》,1-7页。

③ 《周恩来同志演说》,载《“七大”文献》,10-11页。

④ 关于对该决议的起源及意义的精彩讨论,见冯惠《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经过》,10-16页。

明,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缓和,而非进行革命动员。正如 Shum 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的地位上升到同“新民主主义”这一观念的发展联系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党的任务是“保护富裕中农,向富农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机会,也让普通地主能生存下去”。^①“七大”的官方政治报告在论及如何在城市地区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时强调:“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是一种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②

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政府的温和态度也反映了这些社会、经济政策。在这一点上,政治的理论和政治的实践是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所作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对如何才能最快地把中国从封建主义推向资本主义所做的估价,都是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主席早就认识到,共产党若要与国民党一起成立联合政府,就不能执行革命性的政策。毛泽东想要让他的党加入这一联合政府,就像苏联加入大国联盟一样。虽然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在私下里对能否实现联合这一目标很悲观,但他们在“七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表明,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发展到现阶段,正确的策略是联合,而不是争取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③

最后,“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称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一样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此举在各国共产党中是前所未闻的。这意味着,单独某一个党不仅能确定自己的政治目标(其实自1941年起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在这么做了),还能独立发展自己对社会的基本认识,而无需事先获得莫斯科的首肯。同样重要的还在于构成中共这一主张的基础,即成功地抵抗了日本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毛泽东用他过去的成就和当前的目标来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发展的现阶段的方针政策,凭借这种手段,他在树立自己的形象方面取得

① Shum《中国共产党人的夺权道路》,224页。

② 《“七大”文献》,55页。

③ 见前引毛泽东4月24日的讲话。高龙江等人相信,毛泽东重新强调与国民党合作主要是为了安抚斯大林。高龙江《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261页。

了巨大进展——在党员们及党的支持者眼中，他已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权威。^①

在“七大”的诸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中共越来越独立于莫斯科。此次大会不但彻底挫败了党内一伙人想借助斯大林的权威来争夺中共领导权的企图，而且完成了最初由党内发起的党的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工作。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这一在“七大”上完成的政治进程几年前就在中共党内开始了。当时，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进攻，中共要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更加灵活，其中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在作出重要决策时不能依赖于党外的某个权威。

然而，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并不想脱离莫斯科为资本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国家共产党所制订的政治总路线。相反，中共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策略与斯大林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议基本上是一致的。从公开发表的“七大”报告的内容上看，党的领导人甚至有可能已对其措辞作了修改使其更贴近莫斯科的路线。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七大”召开之际，却是毛泽东断定苏联终于就要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时候，也是斯大林的建议总算有一次和中共领导人的计划一致的时候。然而，“七大”的政治进程却基本上排除了中共党内接受外国影响的可能性。^②

1945年5月，苏联和美国军队击败了德国，但这一胜利只是促成了两个盟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在中共召开“七大”期间，美国报纸开始讨论联盟解体的可能性，苏联通讯社也加紧抨击美国和英国的决策。大国在欧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中共领导人对此感到震惊。如果联盟破裂，苏联在东亚的影响力将急剧下降，斯大林就有可能不参加对日作战。苏美关系的危机还会导致蒋介石不愿通过谈判来解决国共冲突，并使他更有可能在

^① 《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4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52-70页；《解放日报》，1945年5月15日；范平、姚恒编《中国共产党党章研究》，29-4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② 关于国际的比较，见吉尔伯格(Trond Gilberg)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联合战略》(Coalition Strategy of Marxist Parties)，1-28页，杜克大学出版社，1989。斯大林也向意大利共产党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参见厄本(Joan Barth Urban)《莫斯科与意大利共产党》(Moscow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184-221页，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

同共产党人作战时获得美国人的援助。在会议的最后几周里,毛泽东已经指出,由于大国联盟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态度越来越嚣张。随着“七大”结束,毛泽东日益关注如何制订一项更灵活的外交政策,不再一味强调大国间的合作是中共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①

5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闭幕会上作总结报告。他一上来就再次断言大国间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欧洲已进入和平时期。”他又补充道,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和平也会降临。他说,和平依赖苏联的力量,“现在世界上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同中国国内一样,国际上也有两种力量相互斗争。一方面是苏联和“世界人民”,另一方面是反动派,甚至在美国和英国国内,反动派也只是一个小部分。毛泽东说,即使西方盟国撕毁《雅尔塔协定》,也不意味着反动派集团已经取得了胜利,要与苏联展开第三次世界大战。主席告诫他的听众:“相信苏联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②

然而,毛泽东继续指出,莫斯科的军事实力是苏联能够在国际上取得“主动”的惟一原因。他说,要不是赢得了战争,苏联决不会取得它在1945年夏天这样有利的地位。接着,毛泽东引用了列宁的话,说明战争总是促成革命。他又补充说在中国也会如此。主席的意思很明白:战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都极有希望实现和平;为了实现和平,必须拥有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中共不会为与蒋介石达成协议而放弃自己的军队。相反,党将继续扩大它的军队和地盘。^③

大国联盟有可能崩溃,中共对此必须有所准备。毛泽东因而制订了一系列措施,并在“七大”最后几周里经党的高层会议批准通过。6月间,中央委员会对中共在重庆的首席代表王若飞发出警告:蒋介石可能要发动内战,中共必须让美国明白它对蒋介石的单方面支持增加了内战的可能性。共产党人不得不通过强烈抗议美国武装蒋介石打内战来向美国 and 世

^①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45年5月30日,载《毛泽东补卷》,8卷,25-28页、26页、28页。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45年5月30日,载《毛泽东补卷》,8卷,25页、26页。

界舆论发出呼吁。同时,《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美国的现行政策。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日战争七周年发表公开声明,严正警告美国 and 英国政府,要它们认识到人民军队的力量,正视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前景。^①

6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又决定加紧筹备中共各根据地的联合代表大会。其实该项准备工作早在“七大”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毛泽东想在6月份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借以警告蒋介石和美国人:如果国共冲突得不到解决,中共有能力另行组建一个政府。党中央还下令,为了对国内外表明将解放区置于人民控制之下的决心,要及早排定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日程。^②

最后,期待着苏联发起进攻的毛泽东开始为中共挺进满洲作准备。这一“东北战略”是对中共在其主要根据地以外地区军事处境日益恶化作出的反应。毛泽东明白,不管受不受欢迎,在满洲与苏联人联合抗日是对付正在华南、华中地区发展壮大之美蒋联盟的有力手段。1945年6月,毛泽东和中共军方领导人仍然相信,抗日战争将持续到第二年。国民党和美国的基本政策要到战争结束后才会变得清晰起来——而那时苏联人应该早已对日宣战了。因此,东北将可成为中共的避风港和谈判的资本。^③

对党的领导人来说,主要问题在于,延安得不到关于苏联计划的确切消息。如同一切革命政党一样,中共要动员其支持者,必须先说服他们。因此,党还要向它的指挥员和干部们解释其制订政策的根据是什么。1945年夏天,党的领导人甚至向中层干部们承认,他们不知道苏联将会怎么做,

① 《中央关于美、蒋反共发动内战给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6月17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卷,807-808页;《解放日报》,1945年7月10日、12日;《中共中央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1945年7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97-100页。

② 《中共中央七届一中全会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1945年6月19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卷,810-813页。

③ 徐培(“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解放全东北的必由之路),37页;《军委关于建立南方战略根据地问题给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1945年6月15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89-90页;《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和广东区党委工作的指示》,1945年6月16日,同上书,91页。

也不知道眼下苏美关系会怎样发展。但是，延安告诉党的干部们，国际上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的意义已更加重大，他们应该研究欧洲局势的变化，以便从中推断出东亚事态的进展。中央委员会解释道，苏联正通过向美国公众舆论发出呼吁来保持联盟的完整。^①

7月，中共领导人注视着宋子文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谈判，越来越感到震惊、沮丧。斯大林可能是对的，那就是有人在向延安通风报信，使得延安对莫斯科谈判的情况了如指掌。中共对这一谈判并不感到意外。1944年底，当蒋介石与苏联代表进行磋商时，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报告，获悉委员长正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太低而烦恼，因而准备加强他和莫斯科的关系。^②然而，到了1945年夏天，蒋介石的这番尝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对中共的重要性已远非九个月前可比了。中共领导人相信，现在美国人看起来已经在坚定地支持重庆，只有苏联能够迫使国民党政权放弃内战的计划。

宋子文回国以后，毛泽东发现重庆就要与苏联签署一项广泛的协定了。该协定中似乎没有任何致力于解决中国国内冲突的条款。毛泽东在震惊之余断定，这个条约可能是蒋介石下令向中共控制区发动全面进攻前的最后一招。7月22日，他写信给王首道和王震，指出：“宋子文赴苏谈判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毛泽东最后强调：“你们惟一的任务是……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③

在日本崩溃前的最后三周里，中共全力以赴地为同国民党政府爆发全面武装冲突作准备。毛泽东认识到，他的和平预言落空了。遵照他的命令，中共地方部队已准备好与国军开战。然而，正当中共军队准备进攻作战之际，东京却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宣布投降，这可以说是国共冲突全部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巧合。8月11日，中央委员会致电各地党组织：“苏

^① 冀鲁豫工商第九分局《时事研究提纲》，1945年6月，藏台北调查局档案。

^② 《董必武关于参政会的报告》，1944年9月24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卷，765页。

^③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完成创立五岭根据地任务给王首道和王震的指示》，1945年7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07页。

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①

在“七大”召开前的一年里,为抵消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给它带来的优势,毛泽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共的这些努力主要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致力于同中国国内各派势力及美国人结成一系列联盟。该项政策是完全建立在苏美联盟将在未来几年里维持下去这一前提之上的。起初,延安把1944年底至1945年初中共与华盛顿发展关系上遭致的失利归咎于美国大使。到了5月,因为延安仍然确信美国人会阻止蒋介石进攻共产党根据地,所以还是按照抗战结束后长期和平会得到实现这一设想来制订政策。另外,毛泽东真心相信,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不但能巩固大国联盟,还有可能在中国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

在“七大”上,这一联合的战略成为党的国内政策的核心。但毛泽东本人并不敢过于相信他在大会上所作的分析。欧洲发生的事件以及蒋介石日益强硬的态度使中共领导人断定,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共产党人必须加紧向美国人和国民党施加政治压力。延安与华盛顿及重庆的交涉毫无进展。到7月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斯大林愿意同蒋介石结成一个广泛的联盟。对毛泽东而言,最后一轮莫斯科谈判似乎彻底推翻了他自己在“七大”上对形势所作的分析。于是,他把中共投入了狂热的备战浪潮。^②

① 《王首道回忆录》,382-383页、386页。

② 例如,里顿·安德森相信,中共在“七大”上“决定切断它同重庆的联系,并开始武装夺权”。参见《延安与列强》,84页。但是,“七大”实际上是在为和平而不是为内战作准备。

第四章

向沈阳进军：中国政治与苏联对东北的占领

日本败降，中共中央指示全党转入大反攻；斯大林为履行中苏条约义务，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延安审时度势，作出进军东北的决策；一位在东北的美国情报人员说，八路军是他见到过的纪律最好的中国军队，但苏联红军却处处限制中共部队在东北的行动；蒋介石深知东北重要，拼命企图挤进东北；苏美关系恶化，莫斯科对中共与东北问题态度发生微妙变化……

1945年8月9日清晨，当第一批苏联士兵开始越过中苏边界的时候，他们几乎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遇到日本军队怎样的抵抗。苏军并未从事过多少战地侦察活动；参与进攻的大多数部队在攻击开始前调入远东地区只有几个星期，而他们沿着中苏边界的部署直到两天前才完成。在这些部队的师级指挥官接到代号“闪电”的命令后不到两小时，入侵行动便开始了。^①

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为制订对日本发起攻击的计划已准备了一年多时间。从4月中旬起，他们便开始从欧洲向远东调动部队，但直到7月下

^① 格兰茨(David M. Glantz)《八月风暴：1945年苏联在满洲的策略与作战行动》(August Storm: Soviet Tactical and Operational Combat in Manchuria, 1945), 16-17页、48页、145页, 美国军事指挥参谋学院, 1983。

旬,他们既未完成军事方面的准备,亦未就进攻作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发动进攻的计划,看来本来是以8月下旬为目标的,但由于美国人使用了原子弹,也由于华盛顿威胁要对中苏谈判进行干预,斯大林才将这一日期推前了一到两个星期。8月7日傍晚,苏军远东司令部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Marshal Vasilevski)接到了斯大林关于开始行动的命令。这之后,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自己所有的资源,以便准时采取行动。苏军甚至没有机会像通常发起攻击时那样进行先期的炮火袭击和空中轰炸。^①

显然令斯大林感到吃惊的是,苏军的主要进攻行动不到一个星期便结束了,150万苏联大军从三个方面发起进攻,压倒了既无对抗力量又无抵抗意志的日本部队。斯大林要求苏军继续其进攻行动,直到他们控制东北的所有战略要地为止。这一决定也意味着零星的战斗将持续到8月下旬,尽管东京在苏军入侵发生后几天就已作好了投降的准备。这位苏联领导人全然无视美国人对这场没有敌人的战争所表现出的不快。对他来说,对满洲的军事控制是对王世杰与莫洛托夫于8月14日所签订的中苏条约必不可少的补充。^②

在延安,人们已在为内战的发生而全力进行准备。苏联参战的消息,只是使得这种准备活动变得更为突出了。这是一个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等待的时刻。苏联人已经参战,他们的进攻行动已为党在东北各省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开启了大门。后来出版的一些回忆录叙述了苏联参战的消息在延安产生的令人激奋的影响;每个人似乎都急着要离开延安了。或者骑马,或者乘骆驼,或者步行,人们潮涌般地告别延安,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去,

^① 格兰茨(David M. Glantz)《八月风暴:1945年苏联在满洲的策略与作战行动》(*August Storm: Soviet Tactical and Operational Combat in Manchuria, 1945*),20页;格兰茨《八月风暴:1945年苏联在满洲的战略》(*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XVII页,美国军事指挥参谋学院,1983;华西列夫斯基(A. Vasilevski)《远东的胜利》,载《军事历史杂志》(*Voenna istoricheskii zhurnal*),1970年8月号,8-10页。

^② 萨哈罗夫(M. V. Zakharov)编《最后一幕:1945年击败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历史回忆汇编》(*Final: Istorika - memuary o razgromе imperialisticheskoi iapanii v 1945 godu*),63-85,莫斯科,1969。

到东北去。^①

苏联显然愿意与蒋介石签订一项协定这一点,现在对共产党人来说,意义也并不那么重大了。延安并没有将苏联与蒋介石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视为推行毛泽东的东北战略的障碍。中共领导人想到,苏联参战意味着斯大林决定不与蒋介石订立盟约——当苏联已经获得了对满洲的控制之后,这种同盟对莫斯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在任何情况下,正在进行的中苏外交谈判使中共更有必要发展与莫斯科的直接接触,并同东北战场上的苏军建立工作上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8月9日给斯大林的贺电中指出的那样: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军民,将全力与红军合作。^②

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了全党转入进攻的简要指示。中央指出,苏联已经参战,日本仍在继续抵抗。“在此伟大历史突变之时”,党应该“迅速扩大解放区”,并“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当天晚些时候以及8月11日的整个夜晚,当延安获悉日本正在考虑投降时,党中央向全国不同地区的部队发出了一系列军事指令,详细阐述了党的各项计划,要求党所领导的部队应在特定地区通过解除日伪军的武装并接受他们的投降来扩大解放区。这些地区包括华中的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以及北方的一些中心城市。然而,中共最希望得到的还是东北地区。延安发出命令,要求所有在山西、河北以及山东省设有重要任务的部队都立即向东北进发。^③

党的地方干部现在已经知道,对日战争的结束并未减少在中国发生内战的危险。毛泽东在一份党内通报中解释说:“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蒋委员长已经令其军队向中共的根据地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将使国内的伪军向解放区进攻。毛泽东命令中共各部,如果发生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它们应集中主力,而“脱离分散游击

^① 李敦华(Hsiao-li Lindsay),未出版的回忆录,385页,藏胡佛研究所档案。

^② 《毛泽东、朱德致斯大林元帅电》,1945年8月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14页。

^③ 《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15页;《延安总部命令》,第一—第四号,同上书,116—119页。这些命令是以朱德的名义发出的,但看来可能是由毛泽东起草的。

状态”。有些地区，特别是南方与中南的某些地区，则不能完全放弃。但是，毛泽东又指出，通过加强党在城市中的工作，这些损失应该是可以得到弥补的。^①

此刻，毛泽东仍然受到他在“七大”上所做的关于国共合作的预测的影响，但过去一个月的观察又告诉他，国民党将全面发起进攻。一份党内通报指出：国共谈判存在着恢复的基础，“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缓和态度”，以便促进谈判的恢复。各地“对美国遇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感”。但是，这份通报又警告说：正如毛泽东在四月间就指出过的那样，美国方面在国民党一边进行军事干预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因而，党必须保持警惕。^②

然而，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仅仅是“保持警惕”已不足以应付外国对中共战略形成的挑战。蒋介石的政府在发出要求除满洲地区以外的所有日军指挥官只向国军代表缴械的命令后，立即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日本人则有一切理由同那些在他们成为战俘和遣返者时负有责任的政府保持合作，因而也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命令。由于国军与美国人都尚未抵达日本人占领的地区，结果，日本皇军在很大程度上仍与8月10日前一样，继续与共产党部队作战。除了个别例外，在日本崩溃后的几个星期中，中共未能占领任何主要城市和交通枢纽。^③

由于在其他地方斗不过蒋介石和他的盟友，延安领导人将希望集中寄予东北。中苏条约的签订（延安是在8月15日才知道这件事的）对中共来说是一种双重的灾难。这一条约看来不仅排除了苏联在满洲向中共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同时，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一条约又一次表明，列强已让蒋介石政府放手发动内战。正如周恩来于8月15日下午告诉美国驻延安

^① 肖锋《战地日记几则》，481-483页；《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23页。

^② 《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23-125页。

^③ 这方面的例外有北京以北的战略城市张家口及华北和华中几个靠近中共根据地的城市，见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15-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

观察组组长伊万·耶顿(Ivan Yeaton)的那样,中共认为,政府军将在几天内发起进攻。周恩来紧急向美国人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不然的话,华盛顿就要对内战在中国的爆发承担责任。^①

虽然周恩来与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因蒋介石的政策而对美国人提出指责,他们其实完全知道,苏联人也负有责任。毛泽东曾一再告诉莫斯科,对蒋介石提供援助将会导致内战。然而,他的多次警告均未获重视。现在,斯大林甚至在没有通知延安的情况下,签订了一项保证将对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条约。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②

从周恩来向耶顿发出呼吁的第二天起,从莫斯科开始传来各种信息。考虑到党当时面临的危急情势,对延安来说,这些来自莫斯科的电报中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苏联人表明,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一项大国间的国际谅解。莫斯科告诉延安,由于来自苏联的压力,美国人将不会让蒋介石发动内战,相反,他们现在将支持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中共也获悉,斯大林为了取得这些让步,已经作出保证,入侵东北的苏联军队只会将由他们所控制的地区移交给蒋介石政府。莫斯科还劝告中共不要采取任何可能破坏这一交易的军事进攻行动。^③

在得到苏联关于这些新近发生的外交事件的说法之后,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对于苏联人所要加于他们的政治与军事限制尽管依然很不高兴,但却转而对斯大林的主动行为表示欢迎。同不得不在一场全面战争中与国军,甚至可能与美国人对抗的情形相比较,莫斯科的解决办法看上去是一种对中共比较有利的选择。在一系列的政治局会议上,面对某些反对意见,毛泽东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计划进行了辩护,并决定,他本人将前

^① 耶顿致魏德迈,1945年8月15日(关于周恩来谈话的报告),332组记录,1539盒,盖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参见刘立凯、杨开葆(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载《党史研究通讯》,1984。

^③ 耶顿致魏德迈,1945年8月15日;毛泽东《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谈话》,1945年8月29日,载《毛泽东集补卷》,8卷,65-66页(出处为张镇呈蒋介石的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38-139页。

往重庆同蒋介石举行谈判。他指出，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①。

然而，如同去年冬天进行谈判时的情况一样，毛泽东不愿为了与国民党达成协议而对中共的军事力量作任何削弱。在8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党的谈判策略进行概要的总结时，曾在1945年1月赞成过作出这种让步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立场表示了支持。周恩来指出，为了取得和平，中共既需要军事实力，也需要争取人心。他还说：“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有可能是一面谈，一面打。”^②

谈判于8月29日在重庆开始。毛泽东刚刚到达重庆，就向那里尚不知道苏联方面动向的中共人员解释了中苏签约及中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真正”原因。毛泽东认为，苏联与蒋介石签约有四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加强反对日本法西斯及美英反动集团的斗争。第二，是为了避免因中苏边界问题而发生进一步的反苏行动。第三，是为了消除反苏情绪产生的基础。第四，是为了为苏联进一步向中共提供帮助和支援铺平道路。他指出，虽然中苏条约表明苏联以后的援助将给国民党政府，这对共产党看来似乎是不利的。但事实上，苏联今后将更积极地支持中共，帮助中共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

毛泽东将国共双方已经开始谈判视为斯大林曾在莫斯科会谈期间就此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证据。他说：“此次本人来渝与国民党商讨，亦为苏联之暗示，盖苏联希望国共能有合作机会，此种政府固不甚合于苏联理想，但较发生剧烈之内战为佳。”毛泽东完全相信，苏联会对谈判予以协助。^③

毛泽东用以处理苏联干预的方法，是私下或公开地对莫斯科政策中对中共有利的部分大声喝彩，同时却对那些对中共有害的部分大都予以忽视。只要毛泽东相信斯大林有能力在谈判及不使美国干涉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说到做到，他就没有理由冒险对苏联进行公开的批判。此外，毛泽

^{①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591页、591-592页。

^③ 毛泽东《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谈话》，65-66页；关于重庆谈判第一阶段的概况，见郭荣超（Jung - chao Kuo，音）《在重庆的失败：战后中国的政治谈判》（*Failure at Chongqing: Political Negotiations in Post - War China*），41-69页，牛津大学1987年博士论文。

东也需要对存在于中共地方组织及军事单位干部中的恐惧情绪予以疏导,因为这些干部既为中苏条约感到震惊,也对之持怀疑态度。^①

毛泽东既要从正面来解释苏联的政策,同时又要表明党在何种时候应当对莫斯科的愿望视而不见,对他来说,完成这样的任务在东北问题上特别重要。毛泽东在限制自己的部队在长城以南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同时,决无放弃实施党的东北战略的意图。当国共谈判在重庆拉开帷幕时,数以万计的中共战士继续步行或乘船向东北进发。共产党人在长城以南扩展解放区的计划受挫后,东北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险系数,也是谈判桌上的一张王牌。^②

在8月29日给晋察冀当局的一份电报中,中共中央对毛泽东所采取战略的背景情况交了底:“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③

但另一方面,党中央又指出,只要中共的活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军就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以伟大的同情”。因此,各部队在进入东北时,不应要求苏联红军的批准,也不要请求红军给予帮助。只要苏联指挥官不提出反对,这些部队就应继续占领各战略要点。但中央又指示:“为红军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国民党在东北的力量并不强大,而苏联军队还要在那里留三个月。如果党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就“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④

进入东北的第一支中共部队在遭遇苏联红军部队时境遇不佳。苏联军方告诉指挥这支部队之一的曾克林说,红军得到的命令是解散一切“非正规部队”,而他们也把曾克林的部队归到了这一类。曾克林抱怨道:“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部队的素质,而只是一味害怕国民党会说他们

① 关于来自同东北交界的一个根据地的反应,见陈平《从坚持“无人区”到进军东北——论冀热辽的特殊战略地位》,未出版论文,53-54页。

② 李运昌《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2卷,540-564页。

③ ④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38-139页。

违反了中苏条约。”语言问题，再加上许多苏联军官对常常身着便装、装备很差的中共部队持轻视的态度，造成了曾克林和其他中共指挥员同红军初次会面时的不满情绪。^①

同苏军采取军事行动时的雷厉风行相比较，苏联对东北的占领政策在最初几个星期里看上去既自相矛盾又目标不明。在某些场合，红军直接与中共部队合作。但在另一些场合，苏联军官甚至拒绝与中共部队的指挥员见面。部分地由于苏军的进攻是仓促发动的，因而缺乏计划性，再加上日本投降出乎人们意料地突然间便到来了，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混乱局面的形成。一些经过战斗洗礼的“地方党组织”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并保证与红军精诚合作，他们的出现，使苏联军官们面临着困难的选择。^②

曾克林部队后来的一些行动，进一步提供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显示出在红军占领满洲的最初几个星期里，苏联在满洲当地的政策有多么混乱。8月29日，曾克林的部队与苏军合作占领了山海关，此后，他们就乘着在当地苏军指挥官的默许下而获得的火车，向辽宁省的主要城市沈阳进发。当中共部队于9月6日到达沈阳时，负责那一地区的苏军指挥官先是拒绝他们入城。曾克林为了进城，只能虚张声势坚称他的任务是经过莫斯科批准的。只是在这以后，红军才作了让步，同意让他的部队下火车。

中共部队进入沈阳，无论是对中共的战士们或是对路边的旁观者来说，都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在从火车站出来的路上，中共部队经过了主要街道上的一个地方，那里挂着一道横幅，宣称苏军的使命是为中国国民政

^① 曾克林《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2期，6页。

^② 中共部队和红军之间的几起类似的冲突在杨从烈(音)的文章中也有描述。见《兵发日寇、师出关东——冀热辽东路部队进军东北始末》，载《军史资料》，1985年8期，53-55页；郑旭《接收承德》，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2卷，590-593页。并不准备处理“政治”问题的红军在朝鲜也造成了混乱。参见李(Erik van Riee)《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朝鲜政策，1945-1947》(Socialism in One Zone: Stalin's Policy in Korea, 1945-1947)，79-99页，224页，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88。

府光复东三省。中共部队的战士们大都装备着日本武器,身着便服,戴着俄文“八路军”字样的臂章。他们在帽子上佩带的,则是蓝白色的国民党徽章。尽管他们的外表邋遢,但一位美国情报人员还是说,这是他所见到过的纪律最好的中国军队。^①

中共的干部们到达沈阳后,马上就开始在谨慎地与苏联当局合作的情况下,着手接管城里的市政管理事务。9月10日,曾克林接到命令,要他去红军指挥部报到。一开始,苏联指挥官就抱怨中共部队连帽徽,甚至连军服都没有。然后,苏军司令考夫顿·斯坦科维奇(Kovtun Stankevich)将军通知曾克林说,他已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答复,其中强调说:“苏联已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条约,规定,国民政府将接管东北的主权。”莫斯科还表明,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与美国与英国的问题。考夫顿·斯坦科维奇对曾克林说:“回你们的根据地去吧,让我们来管这件事。”^②

在没有向党的领导请示前,曾克林拒绝服从苏方的命令。在沈阳、莫斯科以及驻长春的苏军司令部之间,又经历了一轮电报联系,苏联人决定,派出一个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Marshel Malinovskii)的参谋人员所组成的军官小组,同曾克林一起前往延安,直接同中共领导人商谈。9月14日,刘少奇(在毛泽东不在延安期间,由他代理主席职务)对苏联客人表示衷心的欢迎。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苏联的官方小组首次访问中共首脑所在地。但是,在最初交换了一番客套话之后,当双方坐下来会谈时,双方的谈话决不会是轻松的。一位苏联红军上校告诉刘少奇,苏联并不坚持要求中共部队马上离开东北由苏联红军所控制的地区,但中共干部必须服从苏军的命令,并在莫斯科提出要求时撤出这些地区。对延安领导人来说,这些要求给他们获得苏联直接援助的希望浇了一桶冷水,但也给他们留下了喘

^① 美国国务院临时情报研究分析处地区备忘录第924号,1945年11月19日,满洲文件1.7盒,洛克文件,藏杜鲁门图书馆。

^② 曾克林《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7页。

息的空间。刘少奇曾私下告诉曾克林说，他很好地应付了这些苏联人。^①

斯大林为什么对中共作出这一让步？很明显的是，在1945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为斯大林所特别喜欢的党——他不仅刚刚向反共的国民党作出了提供援助的保证，而且，中共也几乎完全从苏联的官方宣传中消失了。在苏联报刊所列出的成功的外国共产党的名单中，中共不在其列；在庆祝战争在亚洲结束的社论中，中共也未被提及。不错，《真理报》是印发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在重庆谈判开始时发表的声明，但不要忘记，这一谈判正是莫斯科采取行动的结果。^②

斯大林仍然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同时，他也不认为中共在满洲的存在对自己的外交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在苏联控制区的中共干部是会遵循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的，这也包括，如果斯大林发出指示的话，他们就会离开苏联控制区。与此同时，如果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变坏，或者满洲问题成为大国全面谈判的一部分，中共在满洲的存在可能还会对莫斯科有用。^③ 此刻，既然斯大林发现自己的部队已在军事上无可争议地控制了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他所希望的是，他可以在与杜鲁门和英国人达成全球性的战后解决方案时，利用满洲来和他们讨价还价。

在苏联军官与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举行的会谈中，刘少奇说服苏联代表让几位中共高层领导人搭他们的飞机一起回沈阳。刘少奇的说法是，他们到东北后将会简化红军与中共部队之间的联络。中共选派彭真和陈云（两人均为由十三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去沈阳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他们两人从延安出发前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作准备。飞机在沈阳降

^① 伍修权《往事沧桑》，155-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8页；杨国庆、白刃《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15-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牛军《从赫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128-129页。

^② 巴尔蒂斯基(N. Balticky)《爱国主义》，载《新时代》(New Times)，1945年1期；《真理报》，1945年8月31日。鲍利索夫(O. B. Borisov)和科洛斯科夫(B. T. Koloskov)重印，1945年初秋斯大林和刘少奇在莫斯科举行了秘密会谈，见《苏中关系，1945-1980》，莫斯科，1980。我没有发现表明曾进行过这次会谈的其他证据。

^③ 1945年初秋，斯大林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利用希腊共产党，见斯塔弗拉斯《莫斯科和希腊共产主义》，83-89页。

落后,彭真对曾克林说,他们的初步任务是“在我方与苏方之间进行协调”。^①

东北的中共新领导面临着一大堆紧迫的任务。除了试图改善与苏联人的关系外,彭真及其助手还必须想方设法将在满洲活动的不同的中共组织统一起来。在这些组织中,只有那些刚刚从南方来的部分是在延安的直接统辖之下的。在其他的那些组织中,有的曾在苏联多年,是与苏联红军一起回来的;还有些更小的组织(主要是在城市里),则在日本占领期间通过地下活动而生存了下来,现在开始公开活动。东北抗日联军(这是从苏联回来、身着苏联军服的人对自己的称呼)和党的地下组织同党在延安的领导只有很薄弱的联系,而且,他们对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没有什么了解,因而他们的政治经历是同来自长城以南的党员们很不相同的。^②

9月下旬,10月上旬,当苏联红军中的中国部队与其他的中国部队实行合并时,苏联人看来是提供了帮助的。斯大林也许相信,让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军官们加入其他中共部队,会有助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8月12日,他曾对红军中中国部队的指挥员周保中说:“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你们的任务是建设东北。”斯大林所希望的是,周保中和其他曾流亡苏联的中国同志在参与重建自己的国家和党的时候,表现出对苏联的感激。^③

对于延安和中共在东北的地方代表来说,红军中中国部队同他们自己部队的合并是一件利弊相参的事情。一方面,他们欢迎来自红军的这些装备精良的部队加入中共部队,特别是因为他们还带来了大批缴获的日本武器。但另一方面,这些部队并没有受过中共军事战略原则和毛泽东的

^① 曾克林《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8页。参见马涛《刘少奇同志在创建东北根据地中的重大贡献》,载《党史纵横》,1988年6期,15-18页。

^② 张一波、袁鲁敏《八一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载《中共党史资料》,15辑,173-188页;冷青(音)《大连抗盟分会组织武装活动》,载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大连地下党史料选编》,1986。

^③ 曾克林《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7页;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40页;陈平《从坚持“无人区”到进军东北》,56-57页;赵素芬《周保中年谱》,252页。

政治主张的训练。于是，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实现和保持战场上作战行动的有效性便成为令满洲的中共领导人头痛的问题。由于苏联人有时还坚持以前曾在红军中工作过的中国军官仍与莫斯科保持着特殊的从属关系的认识，所以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①

中共的干部与部队于9月上中旬进入了沈阳、哈尔滨、长春、吉林和大连等东北各城市，并同苏联占领当局发展起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根据延安的指示，党的干部们试图在执行红军作为临时市政当局所发布的命令方面，对苏联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而苏联指挥官则以承认中共干部在大多数城市所组织的临时政府来作为回报。比之让那些曾与日本合作过的人和国民党的同情者来组织政府，这对苏联人也更有好处，因为，同这些人相比，中国共产党人是新近才从外面进入东北的，在满洲各城市没有什么根基，他们因而也更易于执行在当地居民中常常并不很得人心的苏联人的命令。^②

但是，在苏联军队占领满洲各城市的初期，他们对当地平民的野蛮行为给中共在东北的宣传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使得中共处在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中共需要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并在国民党强行进入东北之前就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基础，但它同时也需要从苏联指挥官那里得到多多益善的支持。并不仅仅是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中共的宣传“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苏联“解放者”表示感谢。中共干部们知道，他们需要“老大哥”的批准，才能在城里待下去；同时，他们也知道，这种批准能延续多久取决于中共的服务对红军来说有多大的价值。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军士兵所犯下的强奸、杀人与抢劫的罪行在政治上是无法解释的。但是，他们也知道，当地人民越是不喜欢苏联占领军，苏联人也就越需要依靠中共的帮

^① 张一渡、袁鲁毅《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184-195页。

^② 关于在这些地区的发展，见傅立民（音）《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沈阳的地下工作》，载《党史纵横》，1988年8期，28-32页；王书庆（音）《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载《哈尔滨文史资料》，8期，205-216页；《解放初期的伊兰》，载《吉林市文史资料》，6期，6-15页；徐志《接管锦州概况》，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2卷，585-589页；郑旭《接收承德》，同上书，590-593页；又见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资料。

助来管理地方事务。^①

中共与苏联人的合作程度及合作的成功程度在不同的城市间是不同的。在北部的哈尔滨,这种关系相对来说发展得比较平稳,到10月初,中共的行政当局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在沈阳,由共产党人占主导地位的地方行政当局9月下旬就已接手管理,但是,尽管中共中央东北局就设在这里,这个地方行政当局却常常为苏联当局所忽视。中共的干部们抱怨说,他们同苏联指挥官几乎没有什么接触。9月下旬,彭真告诉一个苏联红军将军说,他感到苏军司令部在中共中央的代表们来到这里后,一直对他们“抱有一种很冷淡的态度”。在苏联军官这一方面,则把中共看做沈阳“不请自来的客人”,但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同其他各色人等相比较,同共产党人的合作要容易得多。一名苏军军官告诉美国情报人员,红军必须同某个当地组织一起工作,而苏联人员没有责任在中国的一场内部争端中为保卫远在天边的国民党的利益而反对近在眼前的共产党。^②

在大连,由于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协定赋予这个城市的特殊地位,中共同苏联人的关系也特别复杂。8月下旬,苏联当局通知刚从监狱中出来或摆脱地下状态的当地的中共领导人,红军将不允许他们在城里公开活动。相反,苏联人更愿意同以前的亲日当局的残余分子合作。红军也禁止中共在没有得到其批准的情况下在半岛上调动自己的部队;有一次,他们甚至还怀疑中共从大连城外由苏联控制的仓库偷取武器。中共的反应是,不让苏联人知道中共党员的情况,重新准备开展地下工作,以及将自己的部队集结到葫芦岛和营口等苏联军官对中共不那么敌视的地区。^③

9月中旬,莫斯科通知延安,红军根据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协定,将于11月下旬撤退。这样,中共就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来为因控制东北而可能与国民党发生的对抗作准备。为了加强党在东北的力量以及延安对

① 伍修权《往事沧桑》,163-164页。

② 伍修权《往事沧桑》,159页;美国国务院临时情报研究分析处地区备忘录第924号,1945年11月19日,满洲文件1,7盒,洛克文件,藏杜鲁门图书馆。关于年代问题,见丁晓春等编《东北解放战争大事日志》,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10期,8-26页。

③ 冷寅《大连抗盟分会组织武装活动》,405页、410页、412-413页;张寿山《大连民间抗日同盟分会的活动》,载《大连地下党史料选编》,371页、377页。

于东北中共部队的控制，中共中央于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命令华东和华中的党组织加紧向东北调派部队。大批的部队乘船从山东北部抵达满洲东部的各个港口。^①

到10月上旬，这一新的部署面临着又一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几个团占领了河北和山东的一些港口，从而对中共部队进一步向东北的调动形成了威胁。山东地区的八路军指挥员罗荣桓对爆炸性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在随着第一批中共部队渡过渤海湾时，罗荣桓本人所乘的船只就被一艘外国海军巡逻舰截留。罗荣桓对手下的人说，这“可能是苏军的巡逻舰，也可能是美国的。是苏军的就好，万一碰上美国军舰，大家一定要沉住气，不要慌张”。^②

当罗荣桓和其他人发现截住他们的是一艘苏联的、而非美国的军舰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是，最能说明当时的满洲形势的是，当罗荣桓的部队到达大连—旅顺地区时，苏联人却拒绝让他们下船。一位苏联军官对罗说：“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请你们改变航向。你们可以在除旅顺、大连以外任何一个港口登陆。”尽管他们提出了抗议，但罗荣桓和他从山东带来的部队仍在苏军的护送下离开了港口。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航程后，他们才在辽东半岛更北端的皮口登陆上岸。这一次，他们已作好准备，如果苏军还要让他们离开的话，就马上分散从事地下活动。^③

然而，对罗荣桓和数以万计于1945年10月跟随罗从山东来到东北的中共战士们来说，幸运的是东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并未被苏军占领。中共因而得以在并未遭到苏联人多大干涉的情况下组建农村根据地，而他们所采用的，则是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在长城以南地区获得成功的同样的政治纲领。这包括温和的土地改革，同富有影响力的地方团体与领袖人物合作，以及推行有助于扩展共产党的实力的政治教育和一般教育。到1945年的初秋季节，党已经在一系列地区（尤其在东满和北满）确立了自

① 李运昌《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540—564页；刘汉等编《罗荣桓元帅》，604—617页。

② ③ 杨国庆、白刃《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31—32页、33—34页。

己的控制。^①

日本投降后的社会与政治权威的崩溃,对于中共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扩充军队这两项任务都是有利的。日本曾控制东北十多年,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效而相对稳定的合作控制体制。现在,日本倒台了,曾同日本人合作过的“满洲国军”的大部分部队以及地方保安队都试图维护自己的完整性及保持自己的影响。中共领导层在略微犹豫了一阵之后,同意将这些部队中的一部分在基本未经改编的情况下并入中共部队,其条件则是这些部队的军官和士兵必须同意以后接受政治整训。^②

1945年秋天,在满洲的中共部队是由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的不同成分组成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经历的是不同的军事训练。10月下旬,以林彪为司令员的指挥部的建立确实加强了中共部队之间的协调合作,但诸如缺乏装备之类的其他问题,仍在继续造成战略上的种种困难和内部的矛盾。^③

8月下旬和9月初,中共获得了大量的日本武器和装备,而当苏军中的中国部队参加进来时,其装备又进一步得到了改善。然而,从9月中旬起,大多数的苏联指挥官加强了对苏军控制区内及周围的日本军火库的控制,并拒绝让中共从那里获取装备。对于从南方来到东北的中共部队来说,这种苏方控制的加强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中共的后勤人员曾认为,党的部队能够从东北苏军那里得到武器,新来的中共部队都只装备着轻武器。当新来部队的干部们发现苏军控制的军火库大门紧闭时,便责备曾克林和其他已在满洲的部队指挥员的情报工作做得不好。曾克林在自己辩护时,则谴责说这是苏联态度的改变造成的。^④

一些中共干部发表了对苏方态度的批评,而这是延安阻止不了的。一

^①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几个月》,载《党的文献》,1989年1期,3-10页;马洪《刘少奇同志在创建东北根据地中的重大贡献》,15-22页。梁思文也对中共在东北根据地的发展作了深入的分析,见《胜利之砧:满洲的共产主义革命》,87-121页、197-207页。

^② 参见梁思文《胜利之砧》,102-103页。

^③ 《中央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1945年9月2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49页;丁晓春等编《东北解放战争大事日志》,13页。

^④ 《董荣坤回忆录》,602-603页;李运昌《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540-549页。

个有名的例子是，一名地方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说他“对苏联的政策不能理解”。中共晋察冀根据地极有权力的军事指挥员聂荣臻在10月上旬于张家口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则表示：“我们党的政策不会受到苏联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制约。”然而，党的领导层也认为，对莫斯科的批评不仅有害于自己争取从苏联人那里获取支援的努力，也对维持党员的士气不利。延安因而尽了最大的努力从积极方面来解释苏联的行为，但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很不平衡的。^①

在东北的某些地区，例如在沈阳以北一些产煤产铁的矿业城镇，当地人对红军的抢劫暴力行径的反应使得中共不可能将自己与苏联人放到一起。在这里，中共干部也确实对红军缺乏纪律约束提出过批评。一名干部评论说，这些外国部队一心一意想的是为自己捞取钱财，而根本不管这对中共在政治上有什么影响。在另一些地方，苏军的作为引起了当地人有组织的抵抗，这就又使中共处于困难的境地。^②

东北当地人的抵抗矛头大都既指向中共的统治又指向苏联人。中共干部在当地社会几乎没有任何根基，并常常发现，自己要同诸如地下帮会或地方强人的民兵之类的其他组织争夺权力。有些干部抱怨说，当地人认为由于中苏条约中共是什么权力也没有的。有些（但肯定不是全部）进行抵抗的组织同国民党建立了联系。为了弥补自己政治上的弱点，中共便试图向苏联人求援，将进行反抗的组织描绘为“反苏匪帮”。^③

在遭到苏联和外蒙古部队入侵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中共还遇到了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苏联和蒙古指挥官们在自己部队所控制的地区，允许

^① 胡锡奎《时局变化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30日，藏调查局（台北）档案；该引述又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美国观察员和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66年35期，47页；又见里顿·安德森《延安与列强》，103页；《中央关于集中主力与国民党争夺辽宁、安东的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76页。

^② 杨易辰《铁岭中心县委工作琐忆》，载中共铁岭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烽火前沿》，2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③ 梁思文《胜利之砒》，66-67页、139-143页；伍筱叔《〈后方的前线〉序》，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8期，19-20页；又见《黑龙江党史资料》，7期，其中收录了一系列关于“剿匪斗争”的回忆录。

蒙古青年组织之类的地方独立组织吸收成员并取得影响。当地的中共干部早已为中国在外蒙古影响的消失而感到担忧,现在又向党中央请示对上述情况应作何反应。党中央于10月下旬答复说:“我党对内蒙古的各种政策,必须适时而慎重;”对付蒙古分离主义者的最好的途径是必须懂得,在历史上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压迫激发了他们独立的要求。中共部队应当避免对地方习俗和法规进行干预,即使这意味着放弃土地改革及组织农民的努力。归根到底,党的干部应当认真地避免公开地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批评。^①

中共也必须就苏联人的行为对了解情况的党外群众作出解释。对于重要人士,如中国各非共产党的反对派组织的领导人,党的做法是尽可能将自己同苏联在东北的行动脱钩。9月4日,王若飞在重庆对民主同盟的干部说,只有苏联自己才能对在满洲发生的各种事件负责,在延安和莫斯科之间不存在特殊的联系。但是,在公众场合,党又为中苏条约辩护,并对那些由于“暂时的困惑”而对条约发表过不正确言论的党的同情者提出批评。党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人们不应当只是着眼于狭隘的民族损失,或是只看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而是必须认识到,苏联是拥护和平与民主的,“不干涉将导向和平”。^②

当年秋天的晚些时候,党遵循上述相当蹩脚的“解释”,但作出了加倍的努力,以便说服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同情者。左翼杂志《新大众》的一篇文章承认,甚至连一些中共党员也难以理解苏联的动机,并认为对蒋介石提供任何支持都是错误的。但这篇文章又宣称,正因为蒋介石是反动的,苏联才必须同他签约,以便阻止他“出卖我们祖国”。把他束缚起来,使他难

^① 《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对内蒙解放委员会的指示》,1945年9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86页;《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3日,同上书,184-185页。

^② 王若飞和民盟官员的谈话,1945年9月4日,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826页;宦乡《中苏同盟条约及背景及其意义》,载《群众》,1945年10月1日,10期,633-639页;引文又见杨(Emily Young)《雅尔塔协定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1945-1946》(The Impact of the Yalta Agreement o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1945-1946),134-135页,宾特州立大学博士论文,1979。

以放手反苏，这难道不好吗？文章的匿名作者指出，不管怎么说，莫斯科之所以有兴趣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支持，只是为了帮助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条约的这一部分对于战后形势已不适用。在反驳关于苏联忽略了中共的批评时，文章又轻蔑地提出：“我们不需要苏联的援助。”公众应该对美国参与华北的战事提出抗议，“而永远也不应指望俄国重复美国人的行动”。^①

1945年秋苏联在东北的军事干预对中共来说是利弊相参。这确实使得中共得以进入东北地区进行活动，并在某些地区导致了中共与苏联部队之间起码是有限的合作。同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它阻止了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共领导人是欢迎红军对东北的占领的。但另一方面，苏联的政策也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困难。中苏条约使人们知道了党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并不仅使人担心国民党将会发起进攻，而且担忧美国和苏联将在一场内战中向国民党提供支持。这一条约和此后苏联在东北的行径也给党带来了舆论方面的问题，在城市地区尤其如此。可是，延安并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而只能继续对苏联的政策和中苏条约公开表示支持，并同时希望红军能够容忍中共组织在其占领地区的存在。

对蒋介石来说，战争的突然结束同时也带来了可能性和危险性。当日本帝国崩溃时，蒋介石已经同莫斯科签订了条约，这就使得中国在他的领导下获得统一有可能成为这个胜利季节的最后的胜利。为了反对国内外对其政权构成的威胁，蒋介石已经奋斗了二十多年，但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接近于战胜这些威胁。

1945年8月中旬，在蒋介石的外交中依然未获澄清的是美国这一头。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对于杜鲁门政府将会继续对他的政权提供支持并无疑问。但是，华盛顿究竟愿意提供多大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当战争已经结束，他与斯大林的条约也已签订时，蒋介石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决定派遣

^① 《怎样认识中苏友好条约》，载《新大众》，1945年10月31日，10期，1-6页；《群众》和《新大众》里面的文章最早被杨在前面提到过的她的重要的博士论文里引用，我的译文和她的略有出入。

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宋子文到华盛顿去,以取得美国人将向他提供援助的专门保证。

结果表明,蒋介石选择的时机是正确的——尽管并不是由于他本来设想的原因。杜鲁门总统对美国与苏联之间为争取中国政府的友谊而日益展开的竞争相当敏感,因而就进一步提供美援向宋子文作出了广泛的保证,其中包括提供军事物资和军事训练。对蒋介石来说,杜鲁门的态度证明了战后苏美在中国的交锋将是激烈的,而他则可以操纵大国之间的相互猜疑来为自己的政权谋利。^①

同毛泽东的想法相反,蒋介石在8月中旬认为,共产党必须同他的政府达成妥协,他因而可以暂时不动用武力。在莫斯科谈判后,斯大林就曾经通知蒋介石,苏联已告诉中共应与政府合作,而重庆也满意地注意到,在中苏条约签订后的那个星期,延安的公开声明也变得温和多了。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前夕相信,毛泽东几乎肯定会同政府签订一项政治协定,而可能有困难的是迫使各地的中共军事指挥员们遵从谈判的结果。^②

在蒋介石的眼里,中共内部的分裂反映的其实是自己党内的情况。从日本宣布投降意愿的那天起,一些国民党官员就力促蒋介石借助日本军队的帮助对中共的根据地发动攻击。国民党右翼甚至背着蒋介石制定了在华北依靠日本人的帮助对共产党人发起进攻的计划。只是由于蒋总司令坚持进行谈判,才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阻止了一场内战的爆发。^③

蒋介石之所以选择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使延安对之服从,有几方面的原因。如果内部的冲突继续下去,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受到损害,从而加大得到美国经济援助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战争可能会给将军们

^①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8月18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25-26页;蒋介石致宋子文电,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834页。

^② 《外交部呈蒋介石抄送美驻苏联大使哈利曼与斯大林谈话电文摘要》,1945年8月30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26页;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6日、28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813页、815页。

^③ 据陈立夫回忆,1945年8月他同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何应钦数次会晤,讨论国民党军队应该怎样和日本人合作,立即北上围剿中共。陈立夫访问记录,40号,50盒。

和地方上的强人带来更大程度上的自治，而这正是蒋介石希望在中国的战后时期予以避免的。同延安进行谈判将使蒋介石有时间准备接管以前日本人控制的广大地区，并因而保证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能对这些地区实行控制。

8月10日以后，国民党军队移动的缓慢同延安方面的急速发展形成了惊人的对照。蒋介石所押的赌注是，日本军队的存在与苏联在谈判解决问题上所施加的压力会阻止毛泽东推行军事扩张的政策。在8月29日给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蒋介石命令他的将军们在没有恰当准备的情况下不得匆匆地向中国的任何地区进兵，而在最初阶段，应当集中力量解放上海，特别是解放南京。^①

蒋介石相信，在命令国民党的部队向华中和华北进行任何大规模的运动前，取得美国在后勤方面的帮助是极其重要的。首先，中国政府自己几乎没有任何运输能力；其次，使用美国的军用飞机和海军船只等于是使美国人明确公开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因而，如果国内出现任何武力的反动派，这都会起到进一步的阻遏作用。在8月11日与魏德迈将军的会谈中，蒋介石就曾为得到美国的这种帮助而对魏施加压力，他补充说，直接使用美国军队暂时占领华北及沿海地区的城市和交通中心将有助于阻止内战的发生。^②

看来，蒋介石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几乎马上就表示愿意将国民党军队运往华北，也意味着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将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蒋介石相信，有这样的帮助，再加上他同苏联人达成的交易，就能保证国民党成功地接管满洲。因而，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蒋总司令并不认为有必要给东北以军事上的优先考虑。相反，他对自己的将军们提出警告，要他们在政府准备接管东北的时候不能允许共产党人在南方发展，而要讲

^① 蒋介石致国防最高委员会，1945年8月29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30页。接管中国的战前首都南京对蒋介石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着象征性的意义。

^② 魏德迈致马歇尔电，1945年8月11日，332组文件，1539盒，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究方法并抓住时机地重新进入东北。^①

8月下旬,蒋介石和他的主要智囊人物都相信中苏条约会得到维护。国防部长何应钦对美国朋友说:“中俄条约对共产党来说是一大失望”。外交部长王世杰则在日记中写道,他在莫斯科签订的这项条约大大减少了中共的回旋余地。看到近来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在王世杰于9月初前往伦敦参加外长会议时指示他,不要让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出现在会议的日程上。^②

然而,蒋总司令很快就对自己的苏联伙伴的动机发生了怀疑。9月6日,他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说,苏联人以前曾经多次违反条约。两天后,在获悉中共与苏联人联合占领了山海关之后,蒋介石愤怒地写道:“俄国已经破坏同盟。”9月12日,他在给正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的电报中说,本月必须将尽可能多的部队运往东北,这对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指示宋子文紧急呼吁美国人帮助政府运兵。第二天,蒋介石又提示宋子文,他应当利用美国人对苏联将取代日本在满洲的地位的担忧,以此为手段,促使华盛顿派遣美军在中国登陆。^③

与此同时,政府正稳步地重新占领华中及华南沿海的各个省份。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日本军队的铁的纪律一直十分赞赏。现在,当上述省份的前占领者将这些富饶的地区转交给国民党而并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时,蒋介石懂得,在接管东北时,皇军也能够成为极有价值的盟友。在很多地方,日伪军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在以重庆的名义守护城镇,因而,他们在这些地方的投降并不像是政权的更迭,而更像是新老政权

^① 蒋介石致国防最高委员会,1945年8月29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2册,30页。

^② 韦格尔(Richard D. Weigle),1945年8月26日的笔记《伊迈访问何应钦》,未出版的日记、回忆录,韦格尔文件,燕胡佛研究所。韦格尔上校当时任职于美国陆军驻华战斗指挥部。亦参见王世杰日记,1945年9月6日和8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6日和8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827-828页。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5年9月12日和13日,同上书,832页、834页。

的融合。^①

在蒋介石对斯大林产生了新的不信任的情况下，重庆加快了在东北建立国民党行政机构的进程。9月中旬，以熊式辉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在重庆开始工作。熊将军是江苏人，主要是因为派系的缘故而被选择担任这一职务的。制订政策的实际任务便落在了他的主要助手、经济顾问张嘉璈和外交代表蒋经国的身上。小蒋在参加莫斯科会谈后刚刚回国，对于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乐观的。但另一方面，他也告诉宋子文，如果同苏联的关系破裂，中共就会占领东北。^②

东北行营建立一个多月后，直到10月13日才抵达长春。与此同时，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情报来源向蒋介石报告说，红军已经开始在东北的不少地区同中共合作，共产党的行政机构已在许多城镇出现。外交部抱怨说，无论是从莫斯科还是从苏联大使那里，他们都没有得到关于满洲的任何消息。此后，在10月1日，亦即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在华北沿海地区登陆的第二天，彼得洛夫大使通知宋子文，苏联将马上开始撤军，红军将在12月1日前离开满洲。他同时敦促东北行营尽快移来长春，以便就撤军的安排问题开始进行谈判。^③

蒋介石意识到了美军突然登陆引起了苏联人的警觉，便决定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要求让国民党军队拥有在东北最好的港口大连驻军的权利。中国外交部也进一步澄清道，在中国军队中将会有美军人员。在等不到彼得洛夫的答复的情况下，蒋介石指示傅秉常在莫斯科直接捅到斯大林那里去。斯大林立即拒绝了上述要求。根据苏方对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的

^① 参见梅尔比日记，1945年11月3日；梅尔比(John F. Melby)《天命：中国内战实录，1945-1949》(The Mandate of Heaven: Record of a Civil War, China 1945-1949), 35-36页，纽约，1971。

^② 张嘉璈《在满洲的最后机会：张嘉璈日记》，68页(此后称为“张嘉璈日记”)；蒋经国致宋子文电，1945年9月11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15-116页。关于东北行营及相关机关建立的有关文件，同上书，32-40页。

^③ 军事委员会呈蒋介石报告，1945年9月12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5编，4册，315页；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20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2册，837页；彼得洛夫致宋子文照会，1945年10月1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16页。

解释,大连不能被当做军港使用。很显然,莫斯科意在阻止中国的任何武装部队进入俄国的前领地。^①

当东北行营的成员终于抵达长春时,他们继续就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问题向苏联人施加压力。在10月16日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熊式辉将军概要地叙述了国民党将于11月初派遣四个军进入东北的计划,其中两个将由海路在大连登陆,两个则由山海关出关。马利诺夫斯基没有提到大连,而是告诉中国人,在苏联人没有从某一地区完全撤走之前,他不会允许国民党的任何主力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他还警告说,红军可能不能为国民党军队的先头部队进入东北地区提供协助,其原因是苏联在这一地区只驻有很少的部队。最后,马利诺夫斯基又让来访的国民党将领大吃一惊——他宣布说,苏联人将东北由日本人所拥有或共同拥有的所有工厂和其他工业设施视为“战利品”,对它们的处置将通过苏联与中国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来解决。^②

在接下来同国民党代表团的谈判中,苏联人继续奉行强硬路线。10月21日,驻长春的苏军司令部再一次明确地拒绝让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同一周的晚些时候,苏联宪兵搜查了国民党在长春的办公室,并整夜扣押了办公室的几位官员。当国民党东北行营提出视察由苏方控制的铁路线的紧急要求时,马利诺夫斯基也予以拒绝。^③

在东北发生的这些事件造成了10月下旬重庆的一场政策辩论。王世杰和宋子文两人都已对自己参与谈判的中苏条约感到失望,因而提议对苏联的行为公开提出批评。然而,蒋介石虽然已对斯大林的动机发生了怀疑,却仍然相信自己能够使苏联人继续与国民党合作。在他同毛泽东的会谈于10月10日在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结束以后,蒋介石已决定,应使用军事压力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迫使共产党人屈服。他完全知道,当他开始向中共发起军事进攻时,是不能冒同莫斯科关系破裂的风险的。

蒋介石认为,苏美关系的恶化削弱了莫斯科在远东的政治地位。同

^① 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照会,1945年10月1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17页;驻苏傅秉常致外交部电,1945年10月6日和7日,同上书,118页、119页。

^{②③} 张嘉璈日记,1945年10月17日、24日、25日。

时，蒋介石还对儿子说，斯大林未能在日本建立苏联的影响力这一点，也减少了苏联对中国政治进行干预的机会。10月25日，蒋介石会见了彼得洛夫。这位苏联大使就美国军队对东北的潜在“侵略”发出了长篇大论的抱怨，这使得蒋介石相信，正如同他需要莫斯科的合作一样，莫斯科也需要他的合作。蒋介石没有提出公开的抗议，而是命令国民党在东北的所有党部都立即停止活动，这使他所有的顾问都吃了一惊。10月29日，蒋经国又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举行了一次会谈，他会后向父亲报告，根据他的看法，苏联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苏联将会在国民党接管东北时提供合作。^①

11月1日，斯大林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看来为蒋氏父子的乐观情绪提供了支持。在接到这份电报后，蒋总司令通知儿子说，斯大林希望继续合作，因为苏联人很想保持他们通过莫斯科谈判已经得到的东西。蒋介石表示，在外交上苏联在中国与欧洲都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他们因而担心自己同美国关系的恶化。蒋介石要熊式辉通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国民党进人东北越是困难，重庆就越是必须依靠美国的援助。^②

现在，蒋介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美国也参加进来，对莫斯科施加压力。11月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发出的抱怨不仅针对着“俄国阴谋”，而更针对着“复杂的、难以掌握的美国舆论”以及美国驻华代表竟然看不见苏联人与中共的“弱点”。美国海军已经拒绝运送国民党部队在东满由中共控制的两个港口登陆。这位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苏联人故意将这两个港口交给了共产党人，以阻止国民党军队早日在那里登陆。在蒋介石看来，美国人在为帮助他的部队在东北向中共发起进攻的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清”，这

^① 蒋介石致蒋经国电，1945年11月1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869-870页；王世杰与彼得洛夫谈话记录，1945年10月25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25页；蒋介石致东北各地党部电，1945年10月26日，同上书，128页；蒋经国致蒋介石电，1945年10月31日，同上书，133-134页。亦参见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30日。

^② 蒋介石致蒋经国电，1945年11月2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37-138页；斯大林的电报可能是《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2册，870页所载的那一个，但时间错为11月14日；蒋介石致蒋经国电，1945年11月1日，同上书，869-870页；蒋介石致熊式辉电，1945年11月1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35页。

是一种迹象,表明华盛顿仍有可能通过同苏联达成协议来破坏他的计划。^①

到11月中旬,蒋介石处于共产党领导人在三个月前就认为他已经处于的那种地位。他已决定要对共产党人发动军事进攻,并早已开始为此而进行准备。蒋介石也希望,动用武力将会对苏联产生更大的压力,使其在红军撤出满洲时同国民党合作。他认为,苏联人由于害怕美国力量在东北亚的增加,将不会让自己的部队卷入中共与得到美国支持的国军之间的冲突。蒋总司令所指望的是,美国在华北的军事存在将对东北的苏军构成一种朦胧的威胁,尽管他并不怎么相信华盛顿会对他的新战略持完全支持的态度。蒋介石玩弄权力政治于股掌之中的能力,又一次使他看上去像是这场牌局的赢家。

^① 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9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879页。

第五章

毛泽东、蒋介石和美国对华北的干预

日本投降后那几天，重庆的美国参谋人员乱成一团；蒋介石派宋子文出使华盛顿，为争取美国全面援助游说白宫、国会；华盛顿对莫斯科在远东的意图心存疑虑，美国陆战队在华北登陆；中共竭力避免与美军冲突，却依然“事件”不断；毛泽东在重庆发出指示：对国民党不要手软，“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在这里越安全”；美国人把中共看做苏联的工具，“冷战思维”开始主导美国对华战略。

1945年秋天，是美国东亚政策作出决定的时刻。由于苏联的东欧政策以及斯大林不愿意承认美国在满洲的地位，杜鲁门政府深感沮丧。它因而决定，不仅要将红军排除于占领日本的行动之外，也要在朝鲜半岛上尽可能地将红军的影响推向北方。^①同时，华盛顿还迅速地采取行动，以便遏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但是，美国人的这种努力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国民党政府虽是美国的盟友，但它却相信在同自己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中应当努力争取苏联的支持，而并非同莫斯科对抗。中共已经占领了

^① 参见沙勒(Michael Schaller)《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冷战在亚洲的起源》(*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17-19页，57-6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85；卡明斯(Bruce Cumings)《朝鲜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1卷，130-131页，209-213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

紧靠满洲以南的地区,并正对美国接管这种地位的企图予以抵抗。此后,美国的决策者们很快还会遇到美国军事与后勤能力有限的问题。正如驻华美军指挥官们早于1945年8月便已认识到的那样,仅仅具有对国外事件发生影响的政治意愿,并不意味着就能在实际上影响别人的意愿。

对在重庆的美国军事参谋人员来说,日本投降后的那些天真是乱成一团。早在7月下旬,当时担任驻华美军总司令及蒋委员长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就已经将内战的威胁看做是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开始制订撤退美国人员的紧急计划。8月10日,当无线电广播宣布日本投降时,魏德迈突然间便面临着美国应如何卷入战后中国事务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①

魏德迈的第一个忧虑是,如果政府军不很快进入华北与华中解除日本人武装并建立新政权,那里就会发生行政机制与社会秩序的崩溃。早在8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就魏德迈的部队在战后的新任务,向他发出了他早就要求并希望得到的命令:“你应协助中国中央政府,迅速将它的武装部队运往中国的关键性地区。”

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告诉魏德迈,“美国太平洋战区部队”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对中国的“关键性港口和交通线的控制”。^②正如加里奇奥所指出的那样,对战后美军部署的计划早在日本崩溃前便已开始,并至少是部分地与华盛顿限制苏联在战后中国的影响的愿望联系在一起。早在7月中旬,国防部和马歇尔将军便已开始认识到,甚至在苏联采取进攻行动以前,日本就可能崩溃。军事指挥官们担心,莫斯科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将会让苏联在东北亚取得战略上的统治地位,国防部作战行动司因而开始制订尽快占据大连和旅顺的计划。这些计划也包括占领华北其他港口的行动。^③

国防部不得不几次推迟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的计划。首先,陆军与海

^① 魏德迈致处于指挥地位的将军们,1945年8月2日,“只供阅读”的文件,1539盒,332卷宗,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中国战区美军司令,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档案之一,10盒,海军援助文件,藏杜鲁门图书馆。

^③ 加里奇奥《冷战始于亚洲》,60-63页。

军在由谁占领这些港口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其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因为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星期里缺乏交通工具而推迟采取行动。哈里曼大使获知这一军事计划后,便敦促美军应立即在大连登陆,但未被接受。在太平洋的美国海军指挥官们看来,立即在日本登陆远比在华北登陆重要得多,他们因而不愿意将运输力量用于日本这一主要目标以外的地方。结果,在中国的登陆行动便不得不推迟了。^①

8月下旬,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国高层官员进行了首次会谈,他们对他提出的援助要求所表现出的巨大同情使他受宠若惊。自从他两个月前访问华盛顿以来,美国首都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似乎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哈里曼直至最后一分钟还试图与莫斯科进行谈判的行动中,宋子文知道,发生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对中苏条约的签订感到满意,而是出于对苏联在东北地位加强的恐惧。作为一个老练的外交家,宋子文现在要设法使美国的这种恐惧达到最大限度。^②

宋子文为得到美国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而努力进行游说活动。从白宫和国会成员那里,宋子文的经济援助要求获得了积极的反应,在这之后,他立即便为得到军事方面的援助而发出呼吁。在蒋介石的推动下,宋子文将自己的努力扩展到了最大限度。他提醒杜鲁门总统说,罗斯福总统曾在开罗会议上保证将立即为30个中国师提供装备,并“在以后”再提供60个师的装备。宋子文表示,中国政府现在很乐意接管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所拥有的物资。此外,宋子文还要求美国向中国派遣一个永久的军事使团,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军事训练及“组建中国的兵工厂和供应服务体系”。^③

诸如此类的要求若在几个星期前提出,是会使得行政官员们急得浑

① 加里奇奥《冷战始于亚洲》,63页。

② 蒋永敬《宋子文斯大林中苏条约谈判纪实》,载《传记文学》,1988年(第320期),79-80页。

③ 宋子文致杜鲁门信,中国档案之八,2盒,艾尔赛(Elsay)文件,藏杜鲁门图书馆。任东来在题为《不平等的同盟: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1937-1946》的博士论文(南京大学,1988年)中,对战后国民党为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而采取的战略作了精辟的分析。见该论文224-228页。

身发抖的,现在却得到了华盛顿的认真考虑。如同通常的情况那样,罗斯福所作出的保证并没有留下书面记录。既然如此,总统的顾问们就必须让现在行将就木的霍普金斯来对证这件事情。霍普金斯是宋子文的朋友,他回忆道,罗斯福在开罗确实如同中国特使所提及的那样,在向中国提供大批装备的问题上作出过“明确的保证”。9月14日,杜鲁门在与宋子文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处于守势,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60个师的问题,但他保证将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使团及提供全面的军事援助。宋子文真是不虚此行了。^①

在对日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华盛顿已作出了几项重要的决定,使美国成了蒋介石反对共产党斗争中的盟友。蒋介石要求美军在中国登陆并在运送国民党军队方面提供帮助,这两项他都得到了。除此之外,美国人还向他保证,将以提供武器及建立由美国驻华永久军事使团予以协调的训练中心的方式,向他提供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同过去四年间华盛顿与重庆之间常常处于紧张僵硬状态的关系相比较,这些决定的作出意味着美国与蒋介石的政府开始了一种新的关系。

同重庆建立紧密的战后联盟的各项决定全部都是由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起的头,而白宫与国务院则是旁观者。杜鲁门和贝尔奈斯显然都相信,美国向蒋介石政府作出新的承诺,只不过是在实现罗斯福建立一个强大而亲美的中国的战时愿望。10月19日,当杜鲁门总统轻松地告诉赫尔利和魏德迈“我的政府支持蒋介石”时,他正是这样来看待形势的。然而,1945年8月以前与以后的中国是不同的,那就是,蒋介石需要武器装备来反对的已不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同时,向蒋介石提供援助也就意味着在中国的内部冲突中支持国民党,这正是罗斯福曾试图予以避免的。^②

^① 《为瓦达曼所准备的备忘录》,1945年9月3日,中国档案之八,艾尔赛文件,2盒,藏杜鲁门图书馆。在与总统会面后的第二天,宋子文给霍普金斯送了一封信,要求美国在军事装备上向中国提供进一步的支援。宋子文致霍普金斯函,1945年9月15日,霍普金斯文件,藏罗斯福图书馆。

^② 1945年10月19日的记载,1945年9月至12月总统会见活动记录,艾耶斯(Eben Ayers)文件,1盒,藏杜鲁门图书馆。

在重庆与华盛顿的美国军事指挥官们并非对这一点视而不见。魏德迈在要求对国民党政府提供广泛援助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醒自己和其他人,美国人不应卷入中国的“兄弟阋墙”之争。魏德迈从国防部所得到的命令也极为强调美国不应国共冲突进行干涉。然而,华盛顿的许多军界要人早从8月中旬起便已开始私下将中共视为敌人。8月17日,马歇尔将军告诉魏德迈,加快遣返日本军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防止他们向中共提供武器。^①

许多美国军界要人对苏联在远东的意图心存忧虑,这也促成了美国人与重庆建立战后联盟的愿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斯大林在7月至8月间所采取的许多行动解读为是直接针对美国利益的。苏美之间缺乏对日作战的共同计划,苏联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提出的要求,以及红军在满洲的战争行动,拼凑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苏联日益对美国抱有敌意的图画。国防部认为,苏联人正重蹈他们在欧洲的覆辙,在亚洲也在单方面地采取行动。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好几个星期以后,苏联人仍继续在满洲采取进攻行动,这在华盛顿造成了人们特别的愤怒与猜疑。国防部作战行动司认为,斯大林的目标在于占领东北以外的地区;它还抱怨说,美国对此却是无能为力。^②

就在这种对于苏联意图的恐惧在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不断抬头的同时,美国人也变得更愿意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对蒋介石的军事计划提供支持。魏德迈制定了并开始实施通过海空两路将国民党的五个军从华南与南亚运往华北的计划。根据在重庆的美国军事参谋人员的建议,马歇尔批准了蒋介石利用日本军队在华北“维持秩序”的政策。尽管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的行动暂时被推迟,但华盛顿接受蒋介石要求的那种速度已经让委员长在面对自己的国内敌人时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有利条件。国民

^① 魏德迈致马歇尔,1945年8月17日。“只供阅读”的档案,332卷宗,1539盒,藏美国国会图书馆;马歇尔致魏德迈,1945年8月7日,国防部作战行动司档案,144盒,133宗,165卷宗,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林肯(Lincoln)致麦克阿瑟和魏德迈,1945年8月17日,日本投降档案之二,海军援助文件,10盒,藏杜鲁门图书馆。

党争取外援的能力使其又一次如愿以偿。^①

斯大林并不知道他的亚洲政策在华盛顿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他于8月29日接见了哈里曼，向这位美国驻苏大使保证，苏联仍将在中国问题上和美国合作。斯大林表示，红军不会再超出它已经占领的地区，而且“不久”就会开始撤军。他希望蒋介石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向满洲派遣军队，并向哈里曼保证，红军没有发现这一地区有共产党的任何游击部队。斯大林的主要论点是，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应促成国共冲突的迅速解决。美国方面得到的情报肯定了斯大林的上述意图。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向杜鲁门报告说，苏联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人将在其中拥有正式的代表权，但实际上又只是起某种相对次要的作用。^②

无论是斯大林的保证还是多诺万的报告，都没有对华盛顿在最后批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沿海地区登陆时所进行的辩论产生多大影响。一些国务院官员——尤其是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确实曾建议停止登陆行动，因为在中国正处于内战边缘的时候，这可能会造成美国站在国民党一边进行直接的干预。到9月下旬，魏德迈将军和国防部终于成功地说服了贝尔奈斯，使他相信，为了加强国民政府在对付国内外对手时的地位，美军的登陆是必要的。在公开场合，中国与美国的官员们解释说，登陆行动的目的在于加速解除仍在中国的日本军队的武装并将他们遣送回

^① 比塞尔(Bissel)致参谋长，1945年8月26日，国防部作战行动司档案，143盒，171宗，165卷宗，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哈里曼致杜鲁门，1945年8月29日，日本投降档案之三，海军援助文件，8盒，藏杜鲁门图书馆。多诺万的情报来源也许是战略情报局于战争结束后在满洲展开的一系列情报活动。这些活动中最大的一项是“红雀行动”(Operation Cardinal)。它以沈阳为基地，目的在于协助对美国战俘的释放，并“建立一个情报人员网络，以搜集有关德国人与中国人的行动，可能发生的叛乱以及秘密的政治组织的发展等方面的情报”。同战略情报局在华北与东北的其他情报活动一道，这一网络持续地向华盛顿提供大量的(但并非总是准确的)关于苏联与中共意图的情报。“红雀行动档案”，战略情报局档案，7盒，148宗，226卷宗，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关于战略情报局在1945年秋天的活动，见戴维斯致魏德迈电，1945年8月19日，“重庆地区活动之一”档案，同上，4盒。

国。登陆行动于9月30日开始。^①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海外的首次军事干预动用了五万以上的海军陆战队,并派出了坦克、飞机和海军舰只的支援。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美军控制了河北、山东沿海地区的战略港口,并占领了华北的两个主要城市天津和北平。除了个别事件外,整个登陆行动没有发生意外,海军陆战队很快便展开,接管其驻扎地区附近的交通线。日军在美军登陆时仍控制着华北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地区,其指挥官对美军表现出了惊人的合作态度,并常常与美军共同承担防卫铁路沿线的任务。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们抱怨道,他们完全不知道将在中国待多久,甚至也不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执行的究竟是什么具体任务。然而,大多数军官们仍相信这只是一项短期使命,最长不会超过两个月。^②

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到来时,中国正处在一场军事与政治危机之中。重庆谈判也许阻止了一场内战的发生,但却完全没有结束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9月间,国民党的部队开始通过陆路向北移动,东面的一路指向共产党在豫北地区拥有的根据地,西面的一路则指向共产党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拥有的一块核心根据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因为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而产生一种可以接受的妥协,而选择了避免与国民党军作战。但与此同时,延安也向这两个地区的中共部队发出命令,要他们为着手反攻而进行大规模的准备。^③

9月间,当傅作义将军的部队通过山西向着长城和内蒙古迅速推进的时候,延安将之视为国民党军队各部中最具威胁性的运动。如果这一行动取得成功的话,就能切断延安及中共在山西的根据地同华北与东北的联系。毛泽东确信,即便重庆谈判仍在进行,中共也不能不为此而战。他在给当时正主持山西防卫战的聂荣臻的一份电报中阐明:“你们越多打胜仗,

^① 文森特致艾奇逊电,1945年9月20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7卷,566-567页;艾奇逊致文森特电,1945年9月28日,同上书,571页。

^② 肖(Henry I. Shaw)《美国陆战队在华北,1945-1949年》(*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 1945-1949*),1-5页,华盛顿,1968年重印本。

^③ 《聂荣臻回忆录》,596-597页;《军委关于彻底破坏和控制铁路、公路、迟滞蒋军行动的指示》,1945年9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53页。

我们在这里越安全；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谈判越主动。”然而，即便在这里，中共也一直等到重庆谈判结束后才发起重大的反攻。^①

在东北以外地区，中共尽管受到了日军力量的阻碍，并小心翼翼地不夺取任何主要城市，但还是在战略上取得了某些进展。通过接管华北一些战略要点，延安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军队向满洲的中共部队发起进攻。在河北和山东两省，中共部队接管了一些港口和铁路；在北平与蒙古之间，则占领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张家口。^②

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将立即在华北沿海地区登陆的消息传来时，中共领导层大吃一惊。直至9月下旬，毛泽东仍然相信在美国人与苏联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双方均不对中国进行干涉的秘密协定；他也相信，因为杜鲁门总统并不愿意在此刻冒与莫斯科关系破裂的风险，他也不会增加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当美国军事人员于9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从华南撤退时，毛泽东将此视为美国不会进一步进行干涉的证据。^③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决定不对美军的登陆行动提出一般性的抗议。中共的最初反应只是限于向美军司令部发出警告，要美军不要在事先未与延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便在由中共控制的山东北部港口登陆。以中共军队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出的一项声明表明，这种行动“将引起中外人士怀疑美军干涉中国内政”。同样，当美国海军舰只于9月30日下锚于天津港口外时，中共的公开反应只是限于发表一项措词含糊的声明，表示美国无权决定应由谁来控制这座城市。^④

中共中央军委在向前线指挥人员通报美国将要登陆的情况时强调，

^① 《董荣臻回忆录》，606—609页。

^② 中共山东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224—227页，232—23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③ 《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1945年9月26日，中央统战部和中档案馆编，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14页，档案出版社，1988年。中共领导似乎没把魏福运早些时候关于美军登陆的暗示当回事。

^④ 叶剑英致耶顿电，1945年9月27日首次发出，10月6日再次发出，《中国概况，1938—1945》，1盒，梅尔比文件，藏杜鲁门图书馆；《新华社记者为美军将在天津登陆事发表评论》，1945年9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57页。

美国新的干涉行动标志着它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根据军委的看法,美军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占领位于通向满洲的主要东部通路(亦即长城与渤海湾相交的山海关周围地区)的港口与铁路枢纽,阻止中共在东北发挥作用。延安深知,当国民党军队将要进入东北之时,控制这一通路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现在看来,美国人已准备站在重庆政府一边占领这一地区。中央军委认为,这就意味着国民党部队对于东北的入侵即将开始,中共则必须对自己的军事战略重新加以调整,以便应付这一威胁。^①

延安马上便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军已经登陆的地区,应当如何处理中共部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所有这些地区都位于或靠近中共部队的活动区域。中共中央宣传部于9月29日发出指示,其中解释道:“赫尔利、魏特美耶(即魏德迈)是很反动的,他们的方针是纵容日本,坚决扶持蒋介石反苏、反共。但美国政界及舆论界同情我们的甚多。”指示进一步强调,中共迄今为止并未对赫尔利和魏德迈的政策采取公开揭露的态度;今后,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共党员在有争议的地区对美军情报及军事人员“均应采取友善态度,不要敌视他们”。该指示还指出:

如有美军在解放区登陆,应以主人翁地位予以欢迎,接待……如有美军向我开炮进攻,非法行为,或携带国民党军队登陆等事,应将其地点、时间、番号情形尽量确实详细报告,以便向全世界宣布其干涉内政的行为,同时我们在行动上则要忍耐一时,目的是为了将来很有理、有利地回击之。^②

对于美军进一步的登陆行动,是应当予以忽视还是予以反对,这是一

^①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51页;《军委关于彻底破坏和控制铁路、公路,迟滞蒋军行动的指示》,1945年9月29日,同上书,153页。

^② 《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宣传方针问题的通知》,1945年9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55页。

个更具有紧迫性的重要问题。中央委员会知道,中共军队实际上并无力量打退美国人,但仍希望能够阻止美军在对实行党的军事战略利益攸关的地区登陆。毛泽东相信,如果美军和中共部队之间的关系能在大多数地区保持缓和的话,那么,华盛顿就不会发出向共产党发动攻击的任何命令。出于这一希望,共产党人并未从军事上采取行动向美军提出挑战,而只是通过新闻公报和传单对美军接管天津和塘沽提出了抗议。^①

然而,当10月上旬美国海军陆战队试图在山东北部登陆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个地区,中共部队控制乡村已有多年;在日本投降后,党立即接管了大部分的城镇。在那以后,共产党人又将大批部队调入这一地区,希望经由渤海湾将他们运往东北。山东北部沿海地区因而是中共东北战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从这里,中共部队可以乘船前往东满地区,而不会受到国民党人或苏联人的干预。烟台港则是最方便的登船点。10月6日,当美国海军舰只出现在烟台港之后,中央委员会对当地的中共部队发出命令,如有必要的话,就使用武力阻止美军登陆:

只有在不能击退美军并无法阻其登陆时,我军才予撤退……只有我军采取强硬态度,并在世界上引起舆论大风波之后,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②

由于当地中共领导人的努力,烟台危机平息了下来。尽管有中共中央的指示,烟台地区的中共指挥员们仍作出保证,如果美国军队不对由共产党领导的行政机构进行干预以及不带入国民党部队的话,烟台就向美国人开放。美国人在对烟台市进行了视察后,便从那里撤走了军队。他们并

^① 《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期目前时局的通知》,1945年10月1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17页;《新华社记者为美军将在天津登陆事发表评论》,1945年9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57页。

^② 《中央关于采取强硬态度拒绝美军登陆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61页;又见黄容海《跨海北上》,509-515页,载《战斗在渤海平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林明琴(音)《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荣桓同志》,载《罗荣桓传》编写组编《回忆罗荣桓》,473-4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

不愿意在一个看来只具有次要意义的城市冒同共产党军队发生冲突的风险,而这场冲突有着潜在的爆炸性。^①延安又回过头来从这一事件中看到,通过既坚持自己的立场又表现出合作的意愿,就能够防止美国人对国共冲突直接进行干涉。对中共来说,如果国民党军队、美国人以及日伪军共同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才是一切可能性中最坏的情况。中共中央于10月9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必须对这些敌对力量之间的矛盾加以利用。^②

尽管烟台事件得到了解决,中共领导层仍然特别对山东地区的干部提出警告,要求他们不要与美军冲突。就在不久前,中共曾因为位于这一地区的根据地在土改问题上表现得过分激进,而对他们提出过批评。现在,刘少奇又对华中局提出警告说,不要在山东推行咄咄逼人及对抗性的军事战略。他还警告地方党的领导不要在惩罚当地的汉奸时做得太过火。^③

延安对于山东地区长期以来便存在的排外仇洋情绪是很了解的。刘少奇的担忧可能同发生在8月下旬的一个令人不快的事件有关。在战争结束的那个星期,美国的约翰·伯奇(John Birch)上尉在执行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向国民党游击队提供补给的一项任务时,跳伞降落在山东西部地区,然后在与中共部队的冲突中被打死了。战略情报局和中共对这一事件的调查都得出结论,伯奇上尉实际上是在一个检查点动手殴打一名武装的中共军官后自杀的,但这对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帮助。延安知道这一事件对助长反共宣传的潜在价值,因而决定道歉,并防止在这一

^① 《陆军中将洛奇访谈记录稿》,19页,1962年,藏华盛顿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档案;驻华美军司令部致马歇尔电,1945年10月8日,332卷宗,1540盒,中国战区,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庞朔志(音)《反对美军在沿海登陆的胜利》,载《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6-7期,68-69页。

^② 《中央关于争取敌伪军向我投降的指示》,1945年10月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62页。

^③ 《中央关于各战略区货币流通问题的指示》,1945年10月4日,同上书,159页。在如何对付美军威胁的问题上,党的领导层可能也存在分歧。

地区发生进一步的冲突。^①

美军进占后,华北各城市便成为中共试图对美国代表发生影响并打破美国与国民党同盟关系的一个主要舞台。天津的例子为理解中共的战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到8月下旬,中共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已经包围了天津,并准备对之发起进攻。但是,如同别的大城市的情况一样,中共中央要求这些部队的指挥员停止进攻行动,并命令他们转向“加强城市内部的地区力量”。当美军到达后,党又加强了对城市进行渗透的政策,并在郊区秘密组织游击队。中共晋察冀分局指出,“为了消除存在于群众中的对于美国的幻想”,在市内的宣传活动尤为重要。^②

为了清除群众的这些幻想,中共党员将宣传工作集中到对国民党在美军占领地区大量不得人心的行动提出谴责上。中共散发的传单抨击蒋介石对前汉奸表现出的宽厚仁慈,以及他将光复各省的重要职位都给了外来的国民党高官的行为。中共的地方支部也对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腐败提出指控。但中共在对美国的军事干预以及支持国民党政府反民主、反人民的行为提出指责的同时,却避免过度倡导民族主义及排外情绪。党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宣传会使人联想到美军占领区与苏军占领区的相似之处。此外,中共也不希望因此而失去向美国人直接发出呼吁,要其反对蒋介石对共产党动武的机会。^③

中共在好几个城市建立了委员会或联盟性质的团体,以直接对美军

^① 《董副官关于伯奇上尉之死的证词》,226卷宗,战略研究室记录,148条,16盒,燕京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董副官是陪同伯奇的国民党官员之一,他作证说,伯奇不愿中共和国民党部队之间正在进行的战斗,坚持要进入该地区。他引用伯奇的话说:“不碍事,我想看看共产党人怎样对待美国人。即使他们杀了我我也不在乎,因为那样美国就会用原子武器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同上引文件)中共关于伯奇之死的报告结论来自情报人员。又见加卡德威尔(Oliver J. Caldwell)《秘密战争:美国人在中国,1944-1945》(*A Secret War: Americans in China, 1944-1945*),182-184页,南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72。

^② 晋察冀分局的指示,引自易克(Joseph Kang Sang Yick)《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战略:对1945-1949年的北京和天津的个案研究》(*The Urban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ase of Beijing - Tianjin, 1945-1949*),1卷,265-266页,加利福尼亚大学,1988年博士论文。

^③ 赵建国(音)《青岛解放前夕的社会状况与民主运动》,载《山东文史资料》,1983年,1期,48-53页。

官兵做工作。这些团体所发出的呼吁内容大致相同。它们都对美军在战时对中国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并都指出:“在过去八年中,几乎全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任务都是由中国人民承担的,现在胜利也应当是属于我们的。”^①在给驻北平的美军军官的一封信中,在叙述“坐着你们的飞机而来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行径时,引用了美国国父杰佛逊的话。这封信还说:“人民是受到地方当局的强迫才出来欢迎你们的。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厌烦了。我们并不是说他们已对你们美国人感到厌烦了。作为美国人民,而不是作为携带武器的美国士兵,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这封信的作者“北平人民协会”在信的结尾指出,北平“现在已为被国民党政府称为‘叛逆’的人民军队所包围。你们从飞机上,或者出城六七英里,就可以看到他们。他们欢迎你们去。他们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也包括你们美国人”。^②

中共也必须就美国干涉的背景以及党的自我克制的反应,向城市地区的非党政治团体作出解释。在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重要分析文章强调指出,对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应予重视,而美国“反动势力”正企图“将全世界人民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本的经济和政治控制之下”。这篇文章随后列举了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声明,从中发现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上述理论,并发现在美国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反动”力量与“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但这篇文章又说,“整个来说,世界政治的趋势……是朝着和平,而不是朝着战争方向”发展。^③

与此同时,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几乎没有获得进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双方都指责美国人应为另一方的不妥协态度负责。蒋介石宣称,关于美国对他的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的谣言使得中共的立场变得强硬起来。毛泽东这一方面则认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到来使得政府更不愿意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的感觉是,国共双方本来已经朝着形成协议的方向行动,但经过六个星期的谈判后,当他离开重庆回延安时,却没有形成任何

① 传单,克里斯蒂安(Sutton Christian)文件,1盒,藏胡佛研究所。

② 北平人民协会《致美军军官的信》,克里斯蒂安文件,1盒,藏胡佛研究所。

③ 《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11月3日。

的结果。这使他感到愤怒,但并不失望。在回到延安后第二天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认为,有必要同蒋介石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他指出,双方在原则上已经达成了某些协议;但更重要的是,重庆谈判前所未有的地建立了一种两党间“平等的模式”。^①

自9月初以来,当毛泽东不愿在一项广泛的政治解决达成以前便将共产党的根据地由政府方面开放时,蒋介石便一直认为谈判已经失败。这些谈判更加深了蒋介石个人对毛泽东本来就很差的想法,并使得他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政策更感到愤怒。他发问道:如果他连“此种变相汉奸”都不能惩处,又怎么能要求军队和人民服从政府?但蒋介石发现他“不能不为国相忍”,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为了不仅向美国人,而且尤其是向苏联人显示,他是讲道理的。^②

国民党政府并未等待下一步的谈判,便开始重新占领华北并为进入东北进行军事方面的准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行动(尤其是在冀东为保卫交通线而采取的行动)也构成了这种准备的一部分。中共部队已得到命令,要为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而破坏公路与铁路,这就使他们与美军发生了对抗和冲突。^③

从唐山地区的事态发展中,便可以看出整个冀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的一个团占领了唐山市本身,而中共八路军的部队则控制了唐山周围地区。10月11日,中共根据地党委的代表给美军指挥官送去了一封信,其中宣称,八路军控制着唐山,但共产党部队愿意“同贵部共同采取行动粉碎伪政权”。美国人对此未予理睬。两天后,当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发现共产党部队正向火车站靠近,便命令美国军用飞机飞过

^① 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20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837页;赫尔利致贝尔奈斯电,1945年9月20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7卷,565页;《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及目前时局的通知》,1945年10月1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17页;亦参见《周恩来传》,602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20日、27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837页、838页。

^③ 肖《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945-1949年》,3页。

中共部队的上空,以阻止他们发动进攻。^①

10月17日,当地中共中央分局的代表宋任穷访问了美军司令部。美军指挥官命令他立即下令中共部队停止运动并不得干预铁路交通。但宋任穷却告诉美国人说,希望美方能够解除当地那个“在过去44年里一直在盘剥人民”的伪军司令的职务。会谈未获结果。^②

第二天,一支中共部队在唐山附近伏击了一列载有美军陆战队的火车。在战斗中,七名中共士兵被打死,两名美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延安几乎马上就为这一事件提出了道歉,零零星星的冲突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一直在发生。到11月14日,一系列的冲突达到了顶点。当时,一批政府员工正对唐山与秦皇岛之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进行抢修,一支中共地方部队对他们发动攻击。在场护卫修理工作的美军陆战队打退了这次进攻。驻华北美军陆战队第二号人物德维特·佩克(DeWitt Peck)将军正在现场的一列火车上,他要求对被他认为中共指挥中心的村庄进行空袭,但飞机机组人员得到的命令是只能假装对村庄进行轰炸。^③

就在唐山事件发生的同一天,在东面不过几英里处,中共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由美国军队在过去两个月里从海空两路运至河北东部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共在山海关的阵地发起进攻。争夺满洲的战争开始了。

到国民党发起进攻的11月中旬,美军在国民党战略中所起的作用牵扯了中共中央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延安抱怨说,美国人正在取代日本人在华北的地位,并可能会参与国民党对共产党阵地的进攻。中共中央一方面指出,内战还没有成为事实。在美国人“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我之权益时,则必须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该指示并强调:“凡美军部队强行

^① 《G2第7团第3营日志,1945年9月30日至12月31日,中国》,1945年10月11日、13日记录,藏华盛顿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档案。

^② 同上,1945年10月17日记录。

^③ 《G2第7团第3营日志,1945年9月30日至12月31日,中国》,11月2日、14日记录;佩克(DeWitt Peck)文件,1945年11月14日星期三记录,引自佩克致韦德(Wade),1961年9月3日,华北海军陆战队简报第五部分,藏华盛顿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档案。

向我区推进,或协助国民党军队修筑交通,我当地军政当局应即正式通知美方,加以拒绝,同时应有武装抗击其前进之准备。如美军不听劝阻,强行推进,迫使我军不得已而需自卫时,我应坚守自己立场,决不先开枪。”中央表示,为了避免战争,必须减少树敌。^①

当毛泽东从重庆回来后,他向党的其他领导人提出,中共军队应当对正在河南和陕西向前挺进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反攻。中央通知各中央局和分局说,对党和军队的生存至关重要,中共军队必须成功地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河南漳河战役中,由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中共部队包围了正在挺进中的国民党军队的三个军,其中一个军的司令率部投向中共,而另两个则在11月初投降。在陕西北部,战斗则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仍未见分晓。^②

中共领导人认为,党在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打的这几仗中相对获得了胜利。即便这种看法是对的,他们还是认识到,蒋介石通过让美国人将国民党部队运送到河北而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从而绰绰有余地抵消了中共部队在南线所取得的胜利。延安在战略上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它既需要加快将部队运往东北,又需要在紧靠长城以内的地区部署足够的部队,以延迟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企图。除了这些后勤上的困难外,中共还担心的是,怎样才能既在河北占有一席之地,又不同美军直接发生冲突。^③

当延安获悉美国人在山海关战役之前和战役期间向国民党军队提供了援助时,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美国已在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上迈出了一大步。几位中国学者曾将山海关之战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指出,从此延安便将美国同蒋介石政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看待了。中共领导层将山海关事件看做是自己在军事和外交战略上的一个重大挫

^① 《中央关于对待在华美军的方针和应注意事项的指示》,1945年10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87-188页。

^② 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44-56页。

^③ 《中央关于集中主力与国民党争夺辽宁、安东的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76-177页;《中央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同上书,182-183页。

折。这一事件因而在延安导致了一种危机感的产生。然而,不能把山海关危机及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与同时发生的中共与莫斯科关系中的危机分割开来。从11月中旬起,这两方面的事态发展将中共置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①

经历了8月至9月间异常热烈的双边接触之后,蒋介石与美国的关系在10月份开始冷却下来。虽然美国根据原有计划增加了对国民党的实际援助,但美国在中国的很多指挥官在协助国民党接管广大地区时,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腐败和管理不善,并对此甚为反感。1945年秋天,在华北广泛流行的一句双关语,将“接管”说成是谐音的“劫管”。此外,蒋介石以明显的宽大态度赦免了很多汉奸,并将伪军整建制地并入国军,这也使一些美国人感到不安。一个例子是,在河北,当地亲日政权的“绥靖部”部长成了本身就是由伪军摇身一变而成的国民党河北先遣军的司令。^②

“光复”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常常存在着很多问题。正如易克(Joseph Kong Sang Yick)所指出的那样,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国民党就得罪了光复城市中的各个社会阶层。美国则由于自己同蒋介石的紧密联盟关系,常常使自己同接管中不受人们欢迎的种种事物联系在一起。战争现在已经结束,很多中国人开始反对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存在。国民党对光复地区的处置更促成了这些人的批判态度。^③

早在9月上旬,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协助他直接将军队运往东北,以此来牵制中共在华北的部队。美国人同意了他的要求。蒋委员长还要求苏联人同意让由美国舰只运来的国民党部队在东北最大的港口大连登陆。由于中苏条约的有关条款模糊不清,蒋介石希望尽快地在东北建立起国民党某种形式的权威。他之所以选择大连,还因为他相信,不使大连完全被苏联人控制也是美国人的利益所在,他们因而愿意为此对他提供最

^① 金董芳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问题上三方四国的关系和斗争》,载《中共党史资料》,1988年28期,167-168页、170页;唐凯《解放和保卫山海关之战的重大意义》,载《党史通讯》,1987年8期,35-37页、19页。

^② 易克《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战略》,1卷,217-232页。

^③ 同上书,251页;伍德(Louis E. Woods)面谈记录(1968年),322页,载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

大限度的支持。然而,满洲的苏联当局拒绝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蒋介石极不情愿地同意让自己的部队在渤海湾的另两个港口——营口和葫芦岛登陆。^①

当载有国民党部队的美国军舰在营口港外下锚时,他们发现,控制着城市的是中共而不是苏联人。中共指挥员们表示,对于国民党部队的任何登陆企图他们都将进行抵抗。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因而决定放弃在东北登陆,而代之以让国民党军队在冀东北登陆。金凯得海军上将对魏德迈说,在营口的登陆行动“将会违反我们关于不参与一场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战争的政策,并将使我们因积极地参与这样一场战争而受到正义的谴责”。^②

当10月中旬国共之间的战斗在长城以南开始后,魏德迈将军本人开始担心他会因使得美军卷入与中共部队的战斗而承担责任。魏德迈认为,苏联人还不大可能马上便从满洲向南推进。他希望能从华盛顿得到更多的人员以及更灵活的行动指令,因而决定要迫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作出要么进一步对中国进行干预,要么全面撤军的决定。11月5日,魏德迈在提到华盛顿关于不要卷入中国的“兄弟阋墙之争”的决定时向国防部建议,美国应当拒绝蒋介石请美国运送另一个军到河北的紧急要求。他同时向华盛顿发出呼吁,或者开始从华北撤出美国陆战队,或者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力量。魏德迈将军仍然认为美国应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武装冲突中对之提供帮助,但他希望在从华盛顿得到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才这么做。^③

10月上旬,魏德迈回了一趟美国,他因而清楚地了解到华盛顿存在着反对美国对华进行军事干预的强大批评意见。曾经数次访问中国的众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的意见在总统那里很有分量,他就曾在对这种批评意见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杜鲁门说:“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地试图置身于中国的内部事务之外,我们还是

^① 蒋介石致熊式辉、张嘉璈电,转引自1945年10月16日张嘉璈日记。亦见1945年10月21日张嘉璈日记,86页。

^② 金凯得(Kinkaid)致魏德迈电,1945年11月6日,332卷宗,中国战区,1534盒,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③ 魏德迈致蒋介石电,1945年11月5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7卷,603页;魏德迈致马歇尔电,1945年11月16日,同上书,635-636页。

可能会卷进去。如果我们卷进去的话,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件坏事。这将违反我们关于不对别国内政进行干预的基本政策,也将在世界各地引起对我们的反对。这还将在已经存在着不满情绪的美国部队中造成麻烦,我们的一些指挥官担心这会导致最坏情况的发生,已经因此而引起了警觉。”^①

以曼斯菲尔德为代表的自由派的批评意见,开始使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产生担忧。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杜鲁门第一次感到有必要在美国对华政策上采取主动行动。他认为,对付批评的最好办法是发表一项声明,就他的政府在中国的目标问题作出澄清。但是,杜鲁门对于自己在中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并不是特别清楚,因而,在起草这一声明前,他仔细地阅读自己所有的有关文件。^②

从杜鲁门起草这一声明的情况来判断,有两份关于中国的报告曾引起他特别的兴趣。第一份是由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在1945年7月准备的长篇报告,其目的是在于对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有可以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国防部报告到,中共军队在军事上依然软弱,很少同日本人打仗,但却曾经从事过破坏盟军的战争努力的活动。这一报告还宣称,中共受到莫斯科的“资助和指导”,苏联人则计划“将满洲、朝鲜,可能还有华北地区变为受俄国人控制的地区”。报告的结论是,一个强大、稳定、免于分裂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有着基本的意义”,而如果失去了满洲与华北的资源,这样的中国就难以存在。^③

杜鲁门从中得到启示的第二份报告是由他的朋友埃德温·洛克(Edwin Locke)于1945年8月下旬所写的。洛克曾以罗斯福总统代表的身份到过中国,很了解中国的情况。与国防部的报告不同,洛克对于中国政府是否能在内战中获胜存在着强烈的怀疑。但他同时注意到,如果美国不对蒋介石

^① 曼斯菲尔德致杜鲁门,1945年11月7日,官方文件第150号(1945-1946年),藏杜鲁门图书馆。

^② 艾耶斯日记,1945年11月5日,艾耶斯文件,6盒,藏杜鲁门图书馆。

^③ 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45年7月。埃尔赛文件,2盒,藏杜鲁门图书馆。这就是所谓的Peabody报告,它后来在1951年举行的麦克阿瑟听证会上名声大噪。

石施加强大的压力以阻止他采取行动的话,那他一有机会就会对中共开战。洛克还相信,苏联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因而建议华盛顿应同莫斯科进行磋商,以便为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和平谈判作出安排,并迫使他们达成解决方案。^①

杜鲁门的声明是利用这两个报告的一些观点写成的,但又未就这两个报告所提供的不同结论作出明确的选择。11月中旬,杜鲁门在声明的第一稿中主要以国防部的报告为基础。他表明,美国陆战队在中国的惟一目的是帮助遣返日本军队。然而,他又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的政府“曾在与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与我们并肩作战,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所谓共党分子非但没有对我们提供帮助,有时甚至还向日本佬提供帮助”。杜鲁门在就声明同自己最接近的白宫助手进行讨论后,又请自己的法律顾问塞缪尔·罗森曼(Samuel Rosenman)准备一份完整的稿子。这一稿于11月9日完成。

同杜鲁门的那一稿相比较,罗森曼的这一稿不那么咄咄逼人。这一稿依然强调,美军陆战队到中国是为了帮助对日本人的遣返工作,蒋介石的政府则受到了各大国的支持。它也得出结论,蒋介石是美国的老盟友,“而目前处于蒋介石的反对派地位的力量……则没有对我们的战争努力作出过任何贡献”。罗森曼还在声明中加入了在杜鲁门的那一稿中漏掉了的一项保证,声明“除非美国军队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则我们预期他们将作出有力与有成效的反应,不存在我们的军队卷入中国内战的危险性”。罗森曼还去掉了杜鲁门关于中国政府在遣返日本人时将会得到“一切实际的帮助”,以及“在中国的美军部队将不会在一场兄弟阋墙的战争中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笼统说法。包括乔治·艾伦(George Allen)和麦特·康纳利(Matt Connelly)在内的几位白宫助理仍然反对发表这项声明。康纳利评论道,声明中关于中共的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好几位军官告诉我情况其实正好相反”。由于助理中存在着不同意见,杜鲁门于11月的第二个星期决定将

^① 洛克《致总统的备忘录:一项为避免在中国发生内战而提出的建议》,1945年8月20日,洛克文件,藏杜鲁门图书馆。洛克是一位银行家,战时曾在罗斯福总统麾下参加过好几个重要的经济顾问咨询小组的工作,在其他问题上,他的任务是就中国的形势发展作出报告。

发表一项关于中国问题声明的想法搁置起来。^①

正当白宫为制订对华政策进行探讨的时候,美国政府中的高层外交政策官员也以魏德迈提供的情况为基础,就美国军队在中国的未来去向展开了讨论。在11月6日举行的一次最高层的会议上,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罗伊(John McCloy)使劲地鼓动对蒋介石进一步提供援助,包括将陆战队留在中国以及向北方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军队。麦克罗伊指出,蒋介石所希望的是在同共产党的对抗中增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避免让苏联人制造继续留在满洲的口实。这位助理国防部长还告诉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海军部长说,他仍然对苏联在东北的意图存在着强烈的担忧,并认为国民党需要美国的支持来应付这一形势。然而,国务卿贝尔奈斯似乎对增加对蒋介石援助的问题仍持怀疑态度。会议决定,在作出最后的决定以前,要从参谋长联席会议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咨询意见。^②

1945年深秋,贝尔奈斯仍然希望能够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以减少美苏关系中的紧张。9月间伦敦外长会议的破裂使美苏两大国的关系达到了战后的最低点。莫斯科和华盛顿不仅在东欧,也在伊朗和东亚发生了冲突。贝尔奈斯是一个曾被说成是“早上要拿出三顶帽子,以便在中间的那顶帽子上发现妥协方案”的人。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同斯大林达成交易,他希望能够通过美国方面的让步,换得苏联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撤军和限制进一步干预的问题上。10月下旬,他建议杜鲁门告诉斯大林,如果斯大林作出相应回报的话,美国将于11月15日开始从中国撤军。杜鲁门总统未就此作答。^③

在莫斯科任上的哈里曼大使与贝尔奈斯的意见不同。他在给自己的朋友、新上任的副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指

^① 杜鲁门声明的第一篇见菲雷尔编《不供公开发表的文件》,74页。总统所写的一篇以及罗森曼法官的那一篇(包括附在上面的手写评论),见罗森曼档案,1盒,藏杜鲁门图书馆。艾耶斯在日记中对讨论有记述。见1945年11月5日艾耶斯日记,艾耶斯文件,6盒,藏杜鲁门图书馆。

^② 《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海军部长会议记录》,1945年11月6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7卷,606-607页。

^③ 罗森曼致杜鲁门的备忘录,1945年10月30日,罗森曼文件,2盒,藏杜鲁门图书馆。

出,苏联将会对中国的任何国内危机都加以利用,所以,美国必须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哈里曼认为,这种援助必须包括将国民党军队运往满洲。他对艾奇逊说,除非蒋介石的军队作好了进入东北的准备,否则斯大林是不会撤走苏联军队的。但是,艾奇逊却回答说:“在此军队的复员几乎已造成了军队的瓦解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必须以谅解和协议为基础,并不能仅仅使用武力。”^①

11月中旬,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接到了几个部的部长提供咨询意见的要求后,立即把球踢回给了这些政客们,要求国务院提供看法。贝尔奈斯随后于11月19日对自己的态度作了概括。同往常一样,他提出了一项妥协折中的建议,其中包括让陆战队留下,但拒绝再向北方运送更多的国民党部队。他希望不要直接使用美军同共产党人作战,但也承认,美军的存在本身“在声誉上起到了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某种支持作用。”^②

在第二天的一次会议上,国防部长和海军部长都对延续在中国的干预行动表明了更热烈的支持态度。国防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完全否定了贝尔奈斯对于干预会造成美军的重大伤亡的担心,“认为在那里的六万名陆战队士兵可以不受严重阻碍地便从中国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海军部长詹姆斯·福瑞特尔(James Forrestal)则补充说,他不喜欢看到美国“由于来自俄国的压力”便撤军。这两位部长都同意,美国已为支持蒋介石而“投下了很大的本钱”,现在应当继续这种支持。^③

在给贝尔奈斯的一份备忘录中,这两位部长都强烈支持美国应在蒋介石试图接管华北与东北时向他提供进一步的军事援助。他们指出,美国现在从中国撤军将意味着从一些主要的战争目标后退。山海关之战已显示出中共在军事上是软弱的;如果蒋委员长能够得到美国的适当支持的话,就能克服共产党反对他的任何行动。另一方面,两位部长又指出,如果

^① 哈里曼致艾奇逊(私人与秘密通信),1945年10月12日,哈里曼文件,183盒;艾奇逊致哈里曼电,1945年11月9日,哈里曼文件,184盒,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② 麦休斯(Mathews)致贝尔奈斯,1945年11月1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7卷,619-621页;艾森豪威尔致戴德迈,1945年11月20(19)日,同上书,644-645页。

^③ 《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海军部长会议记录》,1945年11月20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7卷,646-647页。

满洲和华北成了一个分立的国家，“那么俄国人就将在远东达到相当于日本最初采取行动时所要达到的目标”。^①

魏德迈是一位有着敏锐的政治感觉的将领，他现在也跳上了主张干预的战车。仅仅一个星期前，当唐山事件发生之后，他曾紧急地提出要将陆战队撤出来。现在，在11月的最后一周，他却对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存在表示了热烈的支持。他在回答马歇尔的问题时表示，不仅有必要让陆战队留在中国，甚至可能还有必要在中国占领更多的港口和城市，以便加速对日本人的遣返工作。魏德迈认为，华盛顿已决定要在中国进行长期的军事干预。^②

福瑞特尔、帕特森和魏德迈等人对遣返日军士兵一事所表现的关心只是一个幌子，是用来掩盖他们想方设法阻止苏联在中国的侵略这个压倒一切的主要关注点的。尤其是，国防部把中共看成了苏联政策的工具，并把对蒋介石提供援助视为美国阻止苏联扩张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这一典型的冷战思维成为美国1945年秋在中国采取行动的基础。

杜鲁门总统现在必须就美国对华政策究竟是应通过政治手段还是军事手段来推行作出决定。他受到了弥漫于国防部的对中共反感情绪的影响，但他对于苏联在中国的活动仍不如他的大多数有地位的对外政策顾问那样关切。杜鲁门总统知道，直接使用美军来支持蒋介石的事业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他因而对此犹豫不决，希望能找到另一种方法来缓和自己顾问们的关切和不安。

^① 帕特森和福瑞特尔致贝尔奈斯的备忘录，1945年11月24日，165卷宗，国防部作战行动司档案，141盒，1部分，336宗，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艾森豪威尔致魏德迈电，1945年11月20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7卷，644-645页；魏德迈致马歇尔电，1945年11月6日，同上书，635-636页；魏德迈致马歇尔电，1945年11月25日，同上书，669-670页。

第六章

马歇尔使命的起源

1945年秋，斯大林的全球战略缺乏明确目标，对华政策摇摆不定；蒋介石在东北对苏联又拉又打；苏联红军对中共部队态度忽热忽冷；苏军强迫中共撤出东北大城市，彭真吼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中共部队在山海关苦战，毛泽东称病退居二线；中国内战乌云密布，杜鲁门决定出面调停国共之争，派遣赫赫有名的马歇尔将军来华。

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他通过签订中苏条约使自己在满洲的领土野心得以合法化，同时又成功地结束了东亚的战事。但到了秋天，斯大林却无法决定应当同美国、中国政府和中共分别保持怎样的关系。

斯大林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同美国的冲突。仅仅六个月前，他还同华盛顿保持着稳定并充满着希望的联盟关系。然而，随着战争在欧洲和亚洲结束，这一联盟却瓦解了。不管斯大林对于避免战后与美国发生冲突曾抱有多么巨大的希望，在8月15日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该做些什么却举棋不定。他所看到的是，美国对苏联在中国所采取行动的怀疑正与日俱增。因而，他时而对美国人施加压力，时而又对他们作出

让步,试图重建与美国的关系。^①

9月上旬,斯大林发现美国不仅准备向苏联在满洲的地位提出挑战,也拒绝让苏联参与对日本的占领。他同时还相信,美国人正有意向蒋介石提供武器装备,以促使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人发起进攻。早在1945年夏天,苏联人就曾小心翼翼地向着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发出警告:美国若是增加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就会在中国引起内战。在苏联人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现在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然而,因为莫斯科正准备与重庆签约,斯大林虽曾打算告诫美国人他们若增加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就会损害苏美关系,但他并未将之付诸实施。^②

8月下旬,斯大林曾希望通过促成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和平谈判来软化美国的态度。这位苏联领导人似乎相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放弃对蒋介石的武力反抗并接受政府中的一些次要位置,华盛顿便会更倾向于同苏联在东亚进行合作。可是,斯大林于8月下旬向哈里曼发出的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的和平谈判作出反应的呼吁却没有获得美方的呼应;他迟迟才作出决定,试图同美国派往满洲的军事使团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但这也未能减轻多少美国人对他的疑心。^③

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斯大林在伦敦外长会议期间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英国和美国对于莫斯科提出的东欧政治解决方案的抵制态度激怒了这位苏联领导人,使他转而采取对抗的方法,以迫使西方领导人作出某些让步。斯大林选择了放弃这次会议的办法来向华盛顿和伦敦发出警告,以便显示大国关系中的危机已经达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为了结束这次危机,美国人与英国人将不得不对苏联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④

^① 马克格(William McCagg)在《斯大林严阵以待,1943-1948》(*Stalin Embattled*)(维恩州立大学,1978)一书68-71页对斯大林的欧洲政策所作的强调与这里的论述很接近。

^② 戴维斯与文诺格拉多夫的谈话记录,1945年7月2日,7月1日-16日卷宗,180盒,哈里曼文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③ 供给处司令官致魏德迈电,1945年9月1日,日本投降卷宗之四,11盒,海军援助文件,藏杜鲁门图书馆;第七舰队司令官致魏德迈电,1945年9月3日,同上。

^④ 关于伦敦外长会议的讨论分析,见叶尔金(Daniel Yergin)《破碎的和平》(*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122-132页,波士顿,1978。

苏联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其整个对外政策的一种反映。8月下旬和9月上旬,苏联人为了使中苏莫斯科谈判的动力能够发展延续下去,一面将他们曾向中共施加压力的情况通报蒋介石,一面从东北以外的所有地区撤出苏联军队。苏联红军与中共在东北的某几个地方所进行的合作,或者是出于当地军事上的需要,或者是因为没有得到来自莫斯科的命令,或者是出于红军军官对中国共产党人同情的结果,而并不是因为苏联人有着援助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的通盘计划。9月下旬,在伦敦外长会议召开和美军在华北登陆的同时,这一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在所有为苏联人所占领的城市中都出现了由中共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机构,但这其实是莫斯科用来向重庆以及美国人施加压力的信号。

斯大林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不知道应当怎样来打自己手中的满洲这张牌。在苏联出兵东北前的那个夏天,苏联新闻媒介曾特别强调,俄国在历史上控制过中国东北。一篇文章着重指出,大连的一切都是由俄国人设计建造的。另一位作者则谈到了他在旅顺的一个博物馆看到“俄国土兵沾满鲜血、布满弹孔的军服”时的情感。斯大林之所以强调俄国在东北的权益,部分原因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因向日本发起进攻而承担新的牺牲。同时,这也表明他本人已越来越看重苏联是一个太平洋大国这一事实,而东北的港口和铁路对此在战略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①

当苏联于1945年8月赢得对日本的胜利后,上述战略思路更清楚地体现出来。在苏联的一家主要新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将满洲比作“楔入我们领土的一个巨大楔子”,经常被人用来对苏联发起进攻。这篇文章在结尾时宣称:“必须一劳永逸地终结满洲被别人用来当做反对我国重要地区的基地与中心的情况。”上述感情上与战略上的两种动机,看来在中苏

^① 萨伯廷(A. Subbotin)《在大连》,载《战争与工人阶级》(*The War and the Working Class*),1945年4月15日,8期,26-27页;米特罗法诺夫(M. Mitrofanov)《上海-满洲》,载《新时报》(*New Times*),1945年6月1日,1期。

谈判的过程中和 1945 年初秋都曾在斯大林思考问题时起过作用。^①

除了战略上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动机外,斯大林在 1945 年年中也越来越意识到,当战后莫斯科与伦敦和华盛顿进行谈判时,满洲是派得上用场的。当 9 月份伦敦外长会议召开时,莫洛托夫在会上顽固地坚持,各大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作出的让步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平衡,这时,苏联控制了中国一部分地区这一事实便成了莫斯科谈判战略的中枢。尽管有中苏条约中的有关条款,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仍越来越强调,当苏联从东北撤军时要取得某些回报。莫斯科的这种做法在 1945 年秋天起了加剧苏美在华冲突的作用。^②

然而,斯大林也意识到,尽管他现在在军事上控制着满洲,但苏方若违反莫斯科条约而将军队留驻东北,便会导致苏联与中国政府和美国的直接冲突。这就意味着苏联军队必须于三个月内撤出满洲,同时也必须在此过程中至少表现出同国民党军队最起码的合作意愿。初秋,当苏美关系变得更为紧张时,双方围绕着苏联在东北地位问题的冲突也变得更为严重。由于大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如果斯大林仍然试图在同英国和美国达成全球范围的战后解决方案时将满洲当做与它们讨价还价的手段,他就不能不承担更大的风险。^③

苏联领导人相信,华盛顿于 10 月初派美军在华北登陆是对红军留驻东北的一种反应。但斯大林又一次不知道对此应当如何应对。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批准在满洲执行一项将更多地依赖于中共支持的政策。在 9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苏联红军对主要由中共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行政当局开始抱接纳的态度;同时,苏军司令部也开始批准红军中的中国部队加入东北的中共武装力量。

在美军在华北登陆的第二天,斯大林便改变了策略,赶紧对蒋介石予

① 阿夫林(V. Avarin):“满洲作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基地”,见《新时报》,1945年8月15日,6期,8页。

② 见陶布曼在《斯大林的对美政策》中所作的对伦敦会议的分析。

③ 关于斯大林和战后大国谈判,见里塞斯(Albert Resis)《斯大林、政治局和冷战的起源》(Stalin, the Politburo,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匹兹堡大学,1988。

以抚慰。莫斯科通知重庆说，苏联即将开始从东北撤军，并要求就撤军的实施问题立即同重庆进行谈判。斯大林的新动作同几天前苏联在伦敦会议上的立场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就在那次会议上，莫洛托夫甚至在私下场合也拒绝同中国外长就东北问题进行商谈。^①

就在中国外长王世杰从伦敦回国后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来到他的办公室，提出了莫斯科对美军出现在华北一事所感到的关切。彼得罗夫警告说，中国在接管东北时不应依赖美国的协助。10月19日，苏联大使馆暗示说，苏联是否在满洲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可能将取决于美国是否从河北和山东撤军。在长春，苏联人也通过拒绝为蒋介石接管东北做任何具体的准备工作而直接向国民党代表表明了不满。对于国民党提出的让国军在苏军尚未撤出前便进入东北地区的一切请求，马利诺夫斯基则一概予以拒绝。^②

然后，斯大林在10月下旬再次以谨慎态度取代了对抗的立场。自伦敦会议后，他在对外政策上的游移不定促使大国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他因而决定要在中国问题上对国民党作出让步。10月29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熊式辉将军表示，莫斯科将允许国民党部队在满洲地区各沿海港口登陆。11月1日，苏联红军大张旗鼓地阻止了中共部队接管吉林市的电话电报局。同一天，苏联人禁止中共在东北发行流通自己的货币。蒋介石在长春的代表意识到，中苏之间的外交气氛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点马利诺夫斯基于11月5日同熊式辉私下会见后表现得更为清楚——就在这次会见中，马利诺夫斯基强调说，他不希望让中共的活动损害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③

蒋介石决定要投下自己的赌注了。随着苏联预定撤军的日期日益迫近，蒋总司令于11月初命令东北行营离开长春南撤。他希望以此向所有

^① 彼得洛夫致宋子文照会，1945年10月1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16页；王世杰日记，9月29日。

^② 王世杰日记，10月9日、19日；张嘉璈日记，10月17日。

^③ 张嘉璈日记，10月29日，11月1日；蒋经国致蒋介石电，1945年10月31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33-134页；熊式辉致蒋介石函，1945年11月5日，同上书，141页；王永成《东北解放区的货币发行与统一》，载《党史纵横》，1988年，4期，45-48页。

人(特别是向美国人)清楚地表明,苏联人正故意阻挠他对东北的接管并正在造成中苏关系的危机。^①

然而,造成国际上对莫斯科的压力只是蒋介石新的东北政策的一个方面。当蒋介石公开他同苏联之间的分歧时,他同时与苏联驻重庆大使开始进行秘密谈判,以便找到一条既能拯救中苏条约又能让他接管东北的途径。蒋介石的新计划是对莫斯科谈判的一种大胆跟进。他将要求斯大林共同参与一项阻止中共接管东北的计划,如果莫斯科同意等到国军各部在苏联占领区各地就位后才撤出红军,他便同意就在满洲向苏方作出重大经济让步的问题进行谈判。^②

老蒋和小蒋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苏联人早在10月上旬就已开始在满洲拆除工厂的机器装备,以便运往苏联。斯大林曾在莫斯科向宋子文提出过“敌产”的问题。马利诺夫斯基则曾在10月中旬向蒋经国宣布,苏联人将把曾获得日本人部分或全部资助的所有工厂均视为“敌产”,这让蒋经国大大地吃了一惊。当欧洲的战后赔款问题于9月间陷入僵局后,苏联人似乎更加快了步伐,以便掏空满洲,把一切对苏联自身战后重建稍有价值的东西统统拿到手。在采取这方面的行动时,莫斯科从来不同重庆进行任何磋商,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许多国民党官员因东北事态的发展而产生的愤怒。^③

老蒋和他的儿子都感到,有可能通过中苏之间某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来取代苏联人往往失去理性的对满洲地区工业的掠夺。鉴于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谈判时没有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蒋介石认为他现在找到了一个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8日;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15日。

^② 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12日、13日;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9日、13日、18日;王世杰与彼得洛夫谈话纪要,1945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45页。王世杰与彼得洛夫的11月13日会谈记录是现在可以找到的关于这些谈判的惟一一份报告,但根据王世杰和张嘉璈的日记,很显然这不过是在11月9日至17日这段时间里彼得洛夫同中国外交部数次接触中的一次而已。

^③ 关于对苏联在东北的掠夺所造成的破坏程度的考察,可见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善后联络处《苏军驻留期内东北工业损失调查报告书》,1947年2月,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268-312页。

可以不蒙受外交上的损失便向斯大林作出新的让步的领域,而这些经济上的让步又可能转而拯救重庆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盟关系。^①

蒋介石的决定是以他对国际局势和东北形势两方面的分析为基础的。蒋委员长认为,苏联同美国之间的外交冲突已经削弱了斯大林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能力,莫斯科因而有可能会对恢复与重庆的合作感兴趣。在蒋介石看来,他可以一面在华盛顿对斯大林提出指责,一面又根据自己的意愿同莫斯科发展更好的关系,而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蒋介石还认为,苏美之间的冲突越是尖锐,斯大林向国民党妥协示好的机会也就越大。

蒋总司令也意识到中共正在东北发展力量,因而时间对重庆来说已变得越来越紧迫。鉴于苏联红军将要撤出东北,国民党部队因而必须尽快进入满洲,并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地位。要将部队运入东北,他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而要接管东北地区,他又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蒋总司令希望能通过对自己的外交行动加以伪装而两者兼得。

至少在当时,蒋介石的建议为斯大林提供了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两个方面予以整合协调的机会。斯大林可以在美军依然留驻华北时不从满洲撤出苏军,但也可以通过同重庆的合作而向华盛顿发出一种积极的信号。这位苏联领导人接受了蒋介石关于立即就经济问题进一步展开谈判的建议。11月13日,彼得洛夫大使通知王世杰,中国空军可以使用长春机场来运送国民党军队。四天后,苏联人又同意将其从东北的撤军推迟一个月,并保证在国民党接管东北各城市时提供协助。11月19日,驻长春的苏军司令官召见了城里各组织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宣布从此刻起“将不再允许(他们)从事反对国民政府的行动”。所有反对国民党的招贴都应予以撕毁,代之以支持蒋介石政府和“国际合作”的招贴。^②

蒋家父子对于苏联采取的新行动遭到了蒋总司令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们的反对。宋子文主张对苏联人采取严厉态度已有一段时间了,正是

^① 张嘉璈日记,11月15日。

^② 王世杰与彼得洛夫谈话纪要,1945年11月13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43页;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17日、19日。

他曾提出撤走东北行营并对苏联在满洲的行为公开提出抗议的建议。现在,他和王世杰都向蒋介石进谏,要求不要在国军进入满洲前便对斯大林作出经济上的让步。在接受最高国防会议成员的询问时,王世杰承认正是苏联人自己希望延长对满洲的占领。但是,尽管王世杰曾就蒋介石新的对苏政策是否明智这一点向蒋本人表示过极大的怀疑,但他仍在同国防会议成员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的谈话中竭力为这一政策辩护。^①

在长春,苏方的主要经济顾问米哈伊尔·斯拉科夫斯基(Mikhail I. Sladkovskii)立即便着手推动经济谈判的进行。早在重庆宣布达成协议的前一天,斯拉科夫斯基便一再向他的中国对手张嘉璈重申,“政治与经济是紧密相连的”。当他们于11月20日第一次举行正式会谈时,斯拉科夫斯基建议道,所有日本拥有的企业都应由中苏双方根据五五对开的原则共同拥有和管理。他并希望张嘉璈留在长春,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当张表示除非“环境”不许可,他将继续留在长春时,斯拉科夫斯基暗示道:“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富有成效的工作来予以解决。”^②

尽管有斯拉科夫斯基所发出的威胁,苏联的态度转变并没有以重庆方面立即作出让步为前提。11月24日,彼得洛夫几乎达到了就苏联前几个月在满洲的政策向王世杰道歉的地步。蒋介石感到,斯大林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苏联在东亚的弱点,并终于拿定主意要同中国政府达成全面的解决方案了。山海关之役获胜后,蒋介石更是相信,中国已处在自民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在日记中将国军在东北取得的军事胜利比作20年前北伐的开始,并设想,建立一个有着安全边界的统一中国的梦想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了。^③

^① 王世杰日记,11月8日;张嘉璈日记,11月28日;王世杰日记,11月27日;关于王世杰自己的看法,见他11月19日的日记。

^② 张嘉璈日记,11月16、20日;斯拉科夫斯基(M. I. Sladkovskii)本人在《苏中经济关系概论》(Ocherki 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SSSR s Kitaiem)对该时期的一般描述并未提及他1945年勒索中国人的行为。他的自传《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Znakomstvo s Kitaiem i kitaitami)把这些谈判简略地描述为苏联人试图帮助中国人重建东北。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4日;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7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885页。

对于蒋介石是否事先便将国军对山海关发动进攻一事通知了苏联人这一点,我们还不甚清楚。这一进攻发生在谈判仍在重庆进行之时,很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莫斯科施加压力。苏联人的反应是,一面声明红军正从南满撤出,一面声称已命令一切“非正规部队”(意为中共部队)撤离这一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城市周边地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表示:“归根结底,我们的目标是协助中国政府在东北建立政权。”^①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发生于1945年11月的种种外交事件是一种双重的灾难。国民党对山海关的进攻比之政府早先的几次进攻行动要大得多,并向中共领导层证明,蒋介石对于中共的全面军事讨伐已经开始了。华北美军在国军进攻期间公开为之提供了帮助,这使得中共的外交战略和军事计划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中共中央将美军的卷入视为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干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认定,华盛顿已批准美军在国民党部队对中共占有地区发动进攻时为之提供直接的支持。

共产党人在山海关之役中打得不好。中共部队的人数比对方少,装备比对方差,并几乎同自己的后方地区没有任何联系,中共指挥员因而几乎看不到自己有取胜的机会。中共中央曾强调指出,山海关不仅有着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也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因而不愿意放弃这一地区,并命令林彪将更多的部队投入战斗。11月20日,当山海关城区以及通往东北的走廊地带已经大多落入国民党部队手中时,延安仍然在敦促东北局组织反攻,以便阻止国民党军队从东面进入满洲。然而,仅仅过了两天,林彪便通知东北局和中央说,他的部队既无力重新夺回山海关,也无力阻止国民党部队向北推进。^②

正当中共部队鏖战于山海关之际,灾难的另一方面也向党侵袭而来。

^① 张嘉璈日记,1945年12月5日;蒋经国致蒋介石电,1945年12月5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897页。

^② 李运昌《忆山海关战役》,载《党史纵横》,1988年11期,16-18页;中央致林彪等人电,1945年11月15日,引自金耀芳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问题上三国四方的关系和斗争》,170页;《中央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后我党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07页;林彪致东北局和中央电,1945年11月22日,引自金耀芳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问题上三国四方的关系和斗争》,170页。

11月17日,驻沈阳苏军司令通知中共东北局首脑人物彭真说,中共必须在一周内从城里撤走,同时,苏联红军将不再允许中共部队驻扎在这一地区的机场和铁路线附近。当中共的代表提出抗议时,苏联人告诉他们说,他们别无选择。苏联将军表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①

东北局很快便获悉,苏联红军指挥官们也向东北地区其他城市的中共领导人发出了类似的信息——11月17日在哈尔滨,11月19日在长春和吉林。甚至连彭真这个一向被称为“冷静得像机器零件”一样的人,也因苏联人的态度而感到狂怒。在同红军将军们会而后回来的路上,彭真大发雷霆。伍修权回忆道,彭真对苏联将军吼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②

彭真不能相信马利诺夫斯基的命令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他因而请求延安就此直接同斯大林接洽。到11月中旬,刘少奇已从患病的毛泽东手中接下了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告诉彭真说,美国和国民党一直在对苏联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看来生效了。几天后,刘少奇直截了当地把局势摊到了东北局面前:苏联红军针对中共在满洲所采取的行动表明,莫斯科在美国的压力下害怕了,中共因而不能指望在刚刚打响的关键性战斗中得到苏联的援助。刘少奇并对彭真和陈云表示,从现在起,中共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将立足点放到党过去两个月间在东北的建树上去,并以此来支撑自己的地位。^③

在东北的所有各城市中,苏联的新政策很快便导致中共人员从领导职位上被赶了下来。例如,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司令官在同一天里被迫使由

^① 伍修权《往事沧桑》,162页。

^② 钟子云《战略后方的哈尔滨》,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下卷,105页;张启龙《创建东满根据地的回忆》,同上书,118页;伍修权《往事沧桑》,162页。

^③ 伍修权《到东北》,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2卷,569页;中央委员会(刘少奇)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9日和23日,引自朱元石《刘少奇与抗战结束后争夺东北的斗争》,144页。朱的文章是建立在对该时期刘少奇个人文件的广泛研究基础之上的,但是同其他能接触到中共中央文件的研究人员一样,他未能获准直接引用这些文件。不过他的引文非常有助于我们排出这些党内联系的时间顺序。

中共人员担任的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统统辞职。中共领导层仍然认为，不应当对苏联红军进行抵抗。延安下达了命令，要求所有干部和部队都尽快从城市中撤出，并不得公开对抗苏军的指令。中共部队在南面正受到近在咫尺的国民党部队的攻击，而美国人正越来越积极地向蒋介石的军队提供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他的同志们不能再冒同时与苏联人发生冲突的风险。^①

尽管中央规定了忍让的政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在一些地区仍变得极为紧张。在辽宁南部的一个城镇，苏军指挥官与中共干部在究竟应由谁获得日军仓库所储存武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这两部分部队都处在撤退的过程中——中共部队在向东撤退，苏军则在向北方撤退——当他们分手时，相互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友好的感情了。在长春，尽管有苏军的命令，中共部队仍然只撤到了城外 20 公里处，并留下了大批干部，对新来乍到的国民党行政当局进行渗透破坏。正如曾在 8 月间发生过的那样，中共的大多数地方部队都没有公开反对苏军，而是试图绕过苏军及其发出的指令而自行其是。^②

在辽宁南部，国民党部队在打赢了山海关之役后正大批蜂拥而至，中共在这里采取了通过破坏铁路线以减缓国民党部队推进速度的战略。在中共部队与蒋介石部队已经开战的情况下，当地的苏军指挥官向中共部队提出了要么撤离铁路沿线、要么接受红军缴械的选择，使中共部队大吃一惊。苏联人还对中共部队指挥员施加压力，要他们不要试图阻止国民党军队的推进。中共部队甚至来不及得到林彪的指示，只得向东退入丛林山区。

中共所面临的外部危机进而造成了党内的危机。1945 年深秋，外部事件发展对党的冲击是如此严重，甚至连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可

^① 钟子云《战略后方的哈尔滨》，105 页；《中央关于准备撤出大城市铁路线控制广大乡村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28 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 卷，218—219 页。

^② 萧华《战争在辽东地区》，载《辽沈决战》，上卷，235 页；贺晋年《深山剿匪记》，同上书，下卷，45 页。

能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①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当时的一些报告来判断,人们几乎看不到对毛泽东的公开批评——考虑到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对于党内反对派所采取的严厉措施,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党内可能有人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存在不满这一点,是在关于军事和政治战略的一般性讨论中露出头来的。^②

看来,毛泽东似乎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些军事指挥员认为,在日本投降后的最初两个月里,主席为了同蒋介石谈判而限制自己军队的行动是做错了。在华北,这种做法使得党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时间,而到头来党从同蒋介石的谈判中又未能得到任何东西。刘少奇向包括李先念和郑位三在内的几位将军发出了一份长电文,赞扬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以便同这些批评相对抗。刘少奇的这一信息是在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的那一天发出的,他告诉将军们说,“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是极精彩、极有价值的”。^③

领导在重庆进行谈判的那班人(尤其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可能也曾对毛泽东的政策产生过不满。12月上旬,周恩来在给中央的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表示,确实曾有可能同国民党达成协议,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运作和一系列军事冲突造成了谈判的破裂。他提议,中共在今后的谈判中应贯彻“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同军事指挥员们的看法不同,周恩来似乎认为毛泽东不愿在军事与战略问题上向国民党作出让步才是中共

^① 当时在延安并同中共上层领导人有着密切关系的李敦敏(Heiso-li Lindsay)在回忆录中谈到1945年秋延安的情况时写道:“我们跟中共领导人相处这么久,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批评毛泽东。有些朋友告诉我们说,党内开过会,讨论毛泽东受到恶评,怀疑他是不是当得了党主席的问题,结果毛泽东只获得刚刚足够的大多数票。”见李敦敏《再见,延安!》,275-276页,香港,1975。

^② 关于40年代中期中共党内的政治纪律,见泰维斯(Fredrick Teiwes)《中国的政治和清洗》(*Politics and Purge in China: Rectifications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64-78页,纽约,1982。

^③ 《刘少奇关于认真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1945年10月1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163-164页。又见《董荣臻回忆录》,596-597页。

在谈判中所犯的主要错误。^①

从11月的某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开始脱开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他的“休养”既是出于养病的需要,但可能也同一种政治上的失落感有关。正如他十五六年后在60年代初期所做的那样,他是利用“退出一线”来思考怎样才能使党走出陷人的泥坑。11月上旬,他在给周恩来的信里写道:“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意见值得考虑。”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在于只要中共仍然受到美蒋同时进攻的压力,党就不能作出任何让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考虑的是,面对这种情况,中共如何才能“在不束缚手脚使将来不好说话的条件之下,可以保留伸缩余地”。^②

发生于11月下旬的一系列事件不仅向中共领导层清楚地揭示了党为争取国际支持与承认所作努力的失败,也指出了在党的未来战略决策中对外关系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毛泽东在山海关之战前也许曾考虑过要对美国采取一种大不相同的新态度的话,那么,1945年初冬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国民党华北战略中所扮演的日益积极的角色已使这种做法成为不可能。刘少奇与中共其他领导人现在相信,要打破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的联盟关系是做不到的;如果党要想获得任何外部支援的话,就只有同苏联改善关系了。

党的领导层在好几次党内指示中总结了这种认识。中央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东北局则在11月26日的一个文件中解释道:

苏联为了顺利地这一斗争,必须首先取得主动地位,在外交上站稳脚步,因此我党或我军在城市中已暴露面貌之干部、组织力量,必须迅速坚决退出城外无红军驻扎之地区,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这是击破美蒋外交攻势、打退美国干涉中国内战

^①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引自《周恩来传》,607页。又见对周恩来与毛泽东在9月谈判期间不同之处的讨论,同上,604页。

^② 《中央关于宣传与谈判等问题致周恩来、王若飞电》(毛泽东起草),1945年11月7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28-29页。

阴谋的必要条件。^①

但是,中共虽在与苏联的联盟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却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放弃自己在满洲的目标。东北局的一个文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尊重苏联外交政策照顾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这一文件还提醒党的干部说,在“一切不影响苏联外交”的条件下,他们仍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如在城市的政权与警察中建立秘密关系,以便为苏联红军的撤退做好准备。^②

陈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北满分局负责人。他在从哈尔滨撤出几天后发给党内干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苏联仍有发生变化的希望。他并表示,如果中共不在苏联人同国民党打交道时给他们带来过多的麻烦,当地的苏联指挥官最终是会“帮助我党在东北发展”的。^③

但是,当党的领导出于在将来同苏联结盟这一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意图而决定接受莫斯科的命令时,延安仍面临着极大的外交困境。对于形势的复杂性,中共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指出:“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然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有鉴于此,中共“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一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种程度的困难”。中共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不使美国卷入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延安因而向各部队发出指示,要它们“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衅借口”。^④

^①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2页;《东北局关于撤退大城市工作的指示》,1945年11月26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08页。

^② 《东北局关于撤退大城市工作的指示》,1945年11月26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08页、210页。

^③ 陈云等人的备忘录,1945年11月30日,载《辽沈决战》,上卷,14-15页。

^④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2页。

早在山海关之战还在进行之中时，中共领导层便讨论了如何开展宣传的问题——这是共产党人所掌握的又一强有力的武器。迄今为止，党在从事反对美国干涉的宣传鼓动时，并没有大力煽动民族情绪，这主要是因为担心同样的情绪会被用来对付中共和苏联在东北的联盟关系。在中共领导人中，周恩来便感到，中共必须更积极地拿起宣传的武器，通过呼吁中国人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图谋，来加强反内战的群众运动。11月5日，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说：“关于揭发内战及美军干涉两点，（中央）已令几个机关动员来做，材料可大增加。”然后，在11月17日——即山海关陷落的那一天，中央又向党在华北与东北的领导与宣传部门发出指示，要他们在宣传中强调，国民党从事内战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而共产党则在为捍卫中国不受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而战。^① 在党面临着严重挑战的时刻，党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

对中共来说，关外的军事形势仍在不断恶化。11月24日，葫芦岛落入了国民党军队之手。第二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县也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不到一星期，蒋介石的部队便挺进到了沈阳以南不到三百里的地方，并控制了渤海湾东岸的全部港口。共产党军队的抵抗受到了几方面因素的影响。苏联人一再向中共部队施加压力，要它们避免同国军发生冲突，并拒绝让它们通过铁路运兵。这样一来，甚至当中共部队在从事防御作战时，比之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第七军与第十三军，也处于极大的不利状态。^②

除了在后勤支援上处于劣势外，中共部队指挥员们似乎也在应当如何对付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战略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延安先前发出的指示，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山海关。当这一点已经成为不可能时，刘少奇在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让东北的中共军事指挥员们自行决定战略问

^① 周恩来致中央委员会电，1945年11月4日。见《中国共产党关于为和平建国而斗争的二十一份文电》，载《党史文献》，1988年，1期，47页；中央委员会致周恩来电，1945年11月5日，同上，48页；《中央关于恢复谈判等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毛泽东起草），1945年11月5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24页；《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宣传攻势的指示》，1945年11月17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01—203页。

^② 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56—60页。

题。林彪是满洲中共部队的最高指挥员,他认为,党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在苏联红军撤出东北各城市时接管这些城市。因此,同东北局陈云、高岗等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不同,他不愿将部队派往容易保卫的边远根据地。林彪的立场最初得到了彭真的支持,但却受到了李运昌、罗荣桓这些曾指挥部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军事指挥员的反对。^①

这场关于军事战略的辩论,在12月中旬于阜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达到了高潮。会上的争论十分激烈复杂。李运昌和罗荣桓对林彪提出了种种批评,其中包括,他没有在国民党军队进入南满时集中部队对之进行打击。林彪极不愿意从中满和西满地区抽调部队去完成任何其他任务,而是希望在重新进占城市时使用这些部队。根据聂荣臻的说法,林彪对与会的军事指挥员们表示:“我的方针已定,不再改变。要配合热河作战,你李运昌去配合吧!”结果,阜新会议在互相争论中结束,未能制订任何战略计划。12月30日,阜新也落入了国民党军队之手。^②

林彪对于自己战略决策正确性的坚持破坏了党的领导层的团结。由于延安早在11月28日便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情况便变得更是如此。刘少奇在有关指示中曾经强调,既要加强主要位于北满的农村根据地,又要保卫国民党军队尚未进入的西满地区。刘少奇作出这样的战略决定,既有政治上的理由,也有军事上的原因。他的最大希望是,通过避免同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同时通过集中力量在苏联红军将要撤出的地区以外站稳脚跟,中共便能够将苏联人安抚下来。中共中央的这位代理主席表示,眼前中共将不得不放弃所有的大城市;彭真则遵循这一思路

^① 《中央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及我党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07页;林彪致中央和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2日,引自丁晓春等《东北解放战争大事日志》,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10期,15页;陈云等1945年11月30日备忘录,载《辽沈决战》,上卷,14-15页;伍修权《往事沧桑》,162-163页。重新描述中共内部关于特别敏感问题的争论仍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在这一问题上,如同林彪在许多事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问题一样,“文革”后的材料大多数与林彪仍是毛泽东接班人之时为人们所接受的事实相冲突。当时林彪被描述成创建农村根据地的主要支持者,反对刘少奇保卫城市的“错误”路线,见周赤萍《解放战争期间的林彪同志》。前引的这些新近公布的文件表明,这一说法几乎完全颠倒了事实,至少与1945-1946年冬季的情况不符。

^② 《聂荣臻回忆录》,603-604页。

进一步提出,中共不能在苏联所控制的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抵抗。^①

彭真之所以发出这样的信息,首先是为了平息东北党组织内对于苏联的批评意见。东北局在—项指示中强调指出,党的领导层已经肯定,苏联的政策并未对中共设置“无理的限制”或表现出“右倾”而是“为了顺利地中美蒋进行—世界性的外交斗争”。中共所受到的挫折只是暂时的,由于—问题所牵涉到的国际性质,不宜公开对之进行讨论。罗荣桓是中共军事指挥员中最有能力,也最受喜欢爱戴的—位。他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提出呼吁,强烈要求党员在中央指示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一定要团结”,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赶下海去”。^②

在中共所面临的军事与外交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刘少奇特别强调指出,党在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问题上以及在根据地内部的政策问题上,都应采取—种温和的政治立场。从11月下旬起,党内—系列学习材料便开始强调“团结群众”的问题,并要求在土地所有制问题及财政问题上避免采取过激的态度。中央在发给各级党组织的—份讨论提纲中指出,党的政策并不是推翻蒋介石,而是要说服他进行改革。—政治信息是以引用毛泽东语录的方式发出的,其中的潜台词则是,党正在回到“七大”路线上来。为了在维护党内团结的同时与重庆方面展开新的谈判,刘少奇捧出了“七大”上那个讲究实际的毛泽东,以之取代那个未能在国共谈判中掌握先机的毛泽东,来作为党在政治路线上的主要象征。^③

刘少奇在为推行新的政治路线作出极大努力的同时,也积极试图改善党所面临的国际局势。11月28日,有关赫尔利辞职以及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作为调停特使来华的消息传到了延安。对中共领导人

^① 《中央关于准备撤出大城市铁路线控制广大乡村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东北局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1945年11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18-220页。

^② 《东北局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1945年11月29日,同上书,220页、222页;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48页。

^③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目前的时局、任务和思想问题的讨论提纲》,1945年12月1日,藏台北调查局档案。又见《朱德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美军在华行动的态度问题答外国记者》,1945年11月28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14-217页。

来说,听到赫尔利走路的报告真是为暗淡时期带来一线光明的好消息。

11月27日下午,当杜鲁门打电话给马歇尔将军时,他在究竟应在中国推行怎样的新政策问题上还没有拿定主意。赫尔利的辞职,以及他向新闻界提出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受到“帝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引导的指控,完全出乎杜鲁门的意外,使得他必须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来。这件事令杜鲁门十分恼火,他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能在中国问题上“盖过”赫尔利的人,而在他和美国内阁的其他成员看来,马歇尔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马歇尔立刻便同意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到中国去。当马歇尔将取代赫尔利的消息正式公布时,美国公众便对赫尔利这位前驻华大使提出的种种指控不再予以注意。马歇尔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位最优秀的人物,而现在将由他来处理棘手的中国问题了。正如麦特·康纳利(Matt Connelly)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在杜鲁门的眼里,乔治·马歇尔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①

“正确的”特使人选是找到了,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制订“正确的”政策。杜鲁门清楚地知道,公众对于派遣美军前往中国的不满情绪正在增加,因此,美国政府很有必要就对华政策发表一项综合性的声明。11月23日,来自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威廉·索姆(William R. Thorn)在给贝尔奈斯的一封信中指出:“在我收到的邮件中,充满了人们提出的要求,大家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陆战队派往中国那些内战正在开打的地区。”其他许多国会议员则通过要求美军从中国撤出而促成了赫尔利的辞职(但是,赫尔利却把这些议员的做法看做是帝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策动的结果,这是他的独特世界观的典型反映)。^②

制订新的对华政策的工作主要是在马歇尔的指导下在国防部进行的。这位新上任的特使和他的顾问们对于苏联在满洲的政策尤其感到关

^① 多诺万(Robert Donovan)《冲突与危机》(*Conflict and Crisi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Truman.*),149-152页,纽约,1977;洛克访谈记录,1967年,79页;康纳利访谈记录,1967年,329页。

^② 索姆致贝尔奈斯函,1945年11月23日,引自切恩(Kenneth S. Chenn)《在中国的困境:1945年美国的政策辩论》(*Dilemma in China: America's Policy Debate*,1945),141页,汉姆顿,1980。关于对议员态度的全面讨论,见同上书,130-165页。

心,这是他们自初秋以来便一直持有的态度。马歇尔使命的目标在于,通过停火和促成各方之间的谈判而使中国政府得到加强,从而使得重庆能够更好地抵制来自苏联的要求。国防部告诉魏德迈将军说:“让满洲变成蒙古是不能允许的。”国防部作战司司长赫尔将军对苏联在中国的意图提出了警告,他对马歇尔将军说:“对于满洲的形势要待中国的内部谈判结束后才能有眉目的说法,(大家)有很深的怀疑。”赫尔认为,甚至当中国的内部谈判仍在进行之时,美国就应当全力对蒋介石占领华北和东北的努力予以支持。^①

马歇尔同时也在听取中国战区指挥官们的意见和看法。魏德迈将军谨慎地通知他的这位前上司,美国正在将国民党军队运往河北,加入对中共部队的进攻行动。他同时还告诉这位新任中国特使,他的司令部还没有将剩留下的日本人送走,因为中国政府需要在与共产党人的战斗中使用他们。魏德迈解释道,在日本军队所承担的任务中,包括有对美军和国民党军队提供支援,以及保卫华北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线。马歇尔没有对魏德迈的电报发表评论,也没有对赫尔利将军关于军事形势的分析提出问题。^②

起初,国务卿贝尔奈斯反对将美国作出更多的军事承诺作为新的对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将几个美式装备的军队运往华北,“将会对达成军事停战目标造成损害”。他指出,中国政府要控制满洲,就需要内部的稳定。可是,国务院的态度很快便由于来自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压力而发生了变化。12月11日,贝尔奈斯同意了国防部帮助蒋介石将军队运往华北和满洲的计划。12月14日,马歇尔将军在同杜鲁门总统的一次会议中就美国的政策作了总结。马歇尔表示,即便他不能让蒋介石同意政治解决的方案,“美国政府仍有必要——通过

^① 马歇尔致李海函,1945年11月30日,《乔治·马歇尔将军中国之行的全部记录,1945年12月-1947年1月》,国家档案馆缩微胶卷,华盛顿,34组,270盒,1卷,7-8页,简称《马歇尔出使记录》;国防部致魏德迈电,1945年11月19日,332组卷宗,中国战区,1540盒,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赫尔利致马歇尔,1945年12月8日,《马歇尔出使记录》,1卷,24页。

^② 马歇尔致魏德迈函,无日期,332组卷宗,中国战区,1540盒,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魏德迈致马歇尔函,1945年12月2日,同上。

我——继续对由(蒋)总司令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提供支持”。^①

这次会议举行后的第二天,杜鲁门终于发表了他准备已久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这一声明主要以当时正在进行的对华政策讨论为基点,但它同时也对洛克8月间的报告作出了呼应。杜鲁门表明,美国陆战队之所以留在华北,是为了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并对他们予以遣返。他同时还强调,美国在华代表的责任在于协助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杜鲁门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并通过谈判来“扩大”政府的基础。在最后这一点上,这位美国总统既宣称他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又批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同时指责共产党通过拥有自己的军队而为达成国内的政治团结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最后,杜鲁门保证,如果中国各党派愿意按照他所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案行事的话,美国就将增加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②

杜鲁门声明的要旨是在于表明,无论从国内或国际上来说,美国政府都有着对中国事务进行干预的意愿和权力。这是一个不会为莫斯科所欢迎的信息。12月19日,《真理报》发出了迄今为止对美国对华政策最强有力的批评,指责美国是在支持中国的“反动派”。《真理报》同时也抨击美国在华北驻军,并毫不含糊地将之同苏联在满洲的利益联系起来。《真理报》的文章指出:“苏联同满洲有共同的边界,而美国同华北却是相距遥远。”^③

斯大林希望将苏联与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存在联系起来的想法,也从苏联对预定于12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中表现出来。当华盛顿通知苏联人,希望将满洲问题列入会议议程时,莫洛托夫马上便提出,美国从中国撤军以及英国从希腊撤军的问题也应当在会议上讨论。在会议举行的第一天,苏联人便试图进一步打破议题

^① 贝尔奈斯致马歇尔电,1945年12月8日,《马歇尔出使记录》,1卷,18页;会议记录,1945年12月11日,同上,43页;与总统会谈记录,1945年12月14日,同上,42页。

^② 《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1945年12月15日,官方文件,150盒,藏杜鲁门图书馆。

^③ 《真理报》,1945年12月19日。

的平衡,提出会议只应当讨论美国撤军的问题,而不应当讨论满洲问题,“因为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特殊协议”。^①

贝尔奈斯所希望看到的,是这次会议至少应能拯救大国之间的合作。他相信,大国之间有可能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妥协。因此,他避免在满洲问题上过分地对苏联人施加压力,坚持等待让苏联人自己采取主动行动。如同这位美国国务卿所盼望的那样,莫洛托夫很快便代表苏联提出了一项方案,建议苏美双方在1946年1月中旬前从中国撤出自己的军队。^②

12月23日,莫洛托夫在会见美国人时又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建议。贝尔奈斯拒绝接受苏联建议的细节部分,但却并不希望就此关闭在中国问题上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大门。莫洛托夫深感失望,便对美国人发出威胁道,苏联不会让红军“不必要地”留驻满洲——他的言下之意显然是,如果美国不从华北撤军,苏联军队也许就有“必要”留在东北。莫洛托夫还指出:“美国在华北驻军是一种新的发展……当苏联政府与中国达成协定时,这个问题并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苏联人的策略激怒了贝尔奈斯。他指出,莫洛托夫一再重复这一说法“只是因为他喜欢听到”他贝尔奈斯的声音。莫洛托夫回答说,贝尔奈斯的声音固然悦耳动听,“但如果双方能在同时撤军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就会变得更悦耳动听了”。当会议结束时,讨论陷入了死胡同。^③

哈里曼却并没有因为贝尔奈斯与莫洛托夫的会谈未能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而感到失望。在会谈的过程中,他曾经几次递条子给贝尔奈斯,强调任何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把蒋介石包括在内。哈里曼担心的是,一年前在雅尔塔所发生的事件会再次重演;同时,他也不喜欢贝尔奈斯同苏联人达成交易的种种企图。哈里曼还对选择马歇尔担任赴华特

^① 莫洛托夫致哈里曼电,1945年12月7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2卷,600页;《美国代表团会议记录》,1945年12月16日,同上书,613页。

^② 苏联代表团备忘录,1945年12月21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2卷,719-720页。

^③ 美国代表团会议记录,1945年12月23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2卷,749页。

使心存担忧,因为在他看来,将军对于“俄国威胁”并没有充分的认识。^①

尽管贝尔奈斯同莫洛托夫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谈过程紧张,但是,会后发表的公报读起来却好像大国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公报宣称,英国、苏联和美国“在苏联与美国军队应当在最早可以实行撤军的时候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公报还强调,三方“一致同意,有必要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与民主的中国,有必要让各种民主力量广泛加入国民政府的所有部门,有必要停止内战”。^②

公报之所以能够产生,部分的原因在于斯大林本人对谈判进行了干预。为了利用中国问题来避免与美国决裂,斯大林于12月23日同贝尔奈斯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这位苏联领导人告诉美国国务卿说:“如果美国希望将军队留驻(中国)的话,只要它将这一点通知苏方,苏联政府便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斯大林很明显地是将中国挑了出来,当做苏美关系发展中特别有希望的地区。他同时警告贝尔奈斯,那些“较小的国家”并不总是“不会卷入促成大国之间冲突的图谋的”。贝尔奈斯对斯大林这种说法的解释是,如果莫斯科会议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某种共同声明,苏联人就可能让美国在中国驻军。贝尔奈斯相信他已在中国问题上找到了妥协的办法,于是在圣诞节前夕通知杜鲁门说:“我们在远东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般性的协议。”^③

12月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国民党来说,从赫尔利辞职到杜鲁门声明的发表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正向前步步推进,苏联看来也愿意甚至在反对中共的情况下同重庆进行合作。对于失去了赫尔利这位美国大使这一点,蒋介石感到遗憾。但国民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魏道明告诉蒋总司令说,马歇尔是不会推

^① 手写记录,1945年12月23日,哈里曼文件,185盒,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哈里曼访谈记录,19页。

^②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1945年12月28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年,2卷,821页。

^③ 会谈备忘录,1945年12月23日,同上书,757页;会谈备忘录,1945年12月19日,同上书,686页;贝尔奈斯致杜鲁门电,1945年12月24日,私人文件,187盒,藏杜鲁门图书馆。

行一种新的政策的。^①

11月27日上午,魏大使会见了杜鲁门,当时这位美国总统尚未得知赫尔利辞职的消息。这次会见是应魏道明的要求而举行的,其目的在于要从杜鲁门那里得到对于蒋介石11月23日给他的一封长电文的答复。在这份电文中,蒋介石指责苏联人利用中共控制满洲和华北,并呼吁美国立即向他提供援助,帮助他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运往北方。杜鲁门在会谈中向魏道明保证,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援助——但他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同时,他还强调自己是支持赫尔利的看法的。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魏道明想当然地便认为杜鲁门已经知道了赫尔利将要辞职。他因此将杜鲁门对于赫尔利的称赞解释为美国对华政策将不会发生变化。^②

在重庆,蒋介石的看法是,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使华将大大加强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中国事务的卷入。这种看法的基础是魏道明的报告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中国派出永久性军事顾问团的计划(这一计划于12月2日被泄露给了新闻界)。蒋介石认为,美国进一步卷入中国事务将在他与中共的冲突中使他的地位得到加强。但同时他又担心,马歇尔的到来会给他他在东北推行自己的外交战略带来危险——美国人也许会像他们在8月份时威胁要做的那样,对国民党的对苏外交战略施加种种限制。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在华盛顿对苏联提出指控,以便争取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又继续同莫斯科保持秘密接触。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美国人过深地卷入中国事务之前,便能够同斯大林达成一项广泛深远的解决方案。

为了达成解决方案,蒋介石准备派遣儿子蒋经国到莫斯科同斯大林直接进行谈判。这位总司令特别感兴趣的是,要搞清斯大林在满洲经济合作问题上究竟有什么愿望。他也相信,为谈判定下日程也将为他的部队赢

^① 魏道明致蒋介石电,1945年11月2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56-157页。

^② 《美国军事顾问团赴华的详细计划》,1945年11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1330-15,《马歇尔出使记录》,1卷,249页;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1945年12月2日,同上,505页;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6日。

得时间,使他们在打击东北的中共力量时不必害怕因此会造成与莫斯科关系的复杂化。12月7日,王世杰向彼得洛夫大使提出了蒋经国访苏的建议。苏联很快就表示,同意让小蒋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便立即来访。^①

考虑到儿子将要访问克里姆林宫,蒋介石竭尽全力稳定与苏联人的关系。他指示自己在满洲的代表避免向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提及中共问题,并命令外交部避免在诸如外蒙古和新疆的问题上同苏联人发生争执。王世杰认识到,通过同苏联人打交道所能得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便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这位外交部长私下表示的希望是,马歇尔使命能加强中美两国政府在对付苏联时的合作。他在日记中评论道,杜鲁门之所以选择马歇尔将军为自己的代表,显然是同白宫对于苏联在满洲的意图日益感到不安有关的。^②

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在看待马歇尔使命时并没有这么乐观。当王世杰给蒋介石带来马歇尔获得任命的消息时,国民党右翼的一位领袖陈立夫正在与蒋一起共进午餐。陈立夫立即觉得这一任命有问题,并向蒋、王二人表示,有必要通知美国人,中共的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现在连苏联人都已经认识到他们不应为中共提供援助了,蒋介石更应该告诉美国人,不要通过谈判来拯救共产党人。陈立夫说,马歇尔是个庞然大物,“他可以强使我们就范”。^③

赫尔利的辞职对延安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尽管刘少奇和周恩来(以及国民党官员们)知道,人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政策马上会跟着发生变化。但仅仅是令共产党人憎恨的赫尔利的离去本身就构成了庆祝的理由。在重庆出版的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对赫尔利的辞职发出欢呼,并希望华盛顿抛弃反动的错误政策——而赫尔利正是这一政策的推动者和象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4日、6日;王世杰与彼得洛夫会谈纪要,1945年12月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66页。

② 蒋介石致张嘉璈和蒋经国电,1945年12月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67页;蒋介石致王世杰电,同上书,157-158页;王世杰致蒋介石电,1945年12月12日,同上书,150-151页;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9日。

③ 《陈立夫访谈记录》,2卷,15页。

征。作为改变政策的第一步，“站在反民主反人民的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一边”的美军陆战队应当从中国撤走，因为这是“赫尔利和(美国)反动派对美国士兵和人民的一种侮辱”。^①

然而，对延安来说，发生于11月下旬的重大外交新闻并非来自华盛顿，而是来自莫斯科。苏联人引人注目地重演了曾在8月下旬发生过的事件，突然重新对中共表示了兴趣。从11月27日(亦即赫尔利辞职的那一天)起，斯大林向延安发出了一系列的信息，表明他仍然希望在满洲同中共进行合作。12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说：“苏方在东北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即便严拒美军人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显然已经告知延安，苏联人将阻止美军进入东北。对刘少奇来说，来自莫斯科的这些信息也表明大国之间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并未完全消失，这就至少使得美国不会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干涉。看来，在满洲满足红军要求的政策已经开始得到回报。^②

尽管刘少奇相信斯大林所采取的主动行动造成了赫尔利的辞职，但更有可能的是，苏联之所以转变政策是因为斯大林现在感到他同国民党的关系已得到了改善。莫斯科如今已经避免了与蒋介石的直接冲突，它也就有了本钱可以冒同中共重建关系的风险(至少是在下层重建关系)——只要这种关系不至于影响到斯大林的全盘外交。莫斯科要是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它正在抛弃中共的印象，那对它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

来自莫斯科的信息促使刘少奇相信，苏联人和美国“进步力量”已经挫败了赫尔利的政策，马歇尔使华因而可能预示着美国将停止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12月上旬，延安在发给各地党政军领导人的一项指示中强调，有必要在长城以南地区采取守势，以便促进同政府举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党的领导层同时决定派遣周恩来以出席政协会议中共代表团团长的

^① 《新华日报》(重庆版)，1945年11月30日。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将赫尔利的辞职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胜利”。载《解放日报》(延安版)，1945年11月30日。

^② 中央(刘少奇)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7日，引自朱元石《刘少奇与抗战结束后争夺东北的斗争》，144页；《中央关于再开谈判之门给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12月1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3页。

身份返回重庆,从而清楚地表明延安已为谈判做好准备。^①

中共领导人一直在急切地等待国际局势出现积极变化的征兆,他们把杜鲁门的声明解释为美国的政策正进一步朝着好的方向转变。中共中央对这一声明的公开反应十分积极,包括了党的新闻宣传中几个月来对美国所使用过的一些最为友好的言辞。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报告说:“如果马歇尔能利用这个机会,共产党人便会投入美国的怀抱。”^②

在国内,中共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在延安看来,即便当时还无法改变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基本政策,华盛顿的这一决定仍是中共的一大收获。以杜鲁门的声明为背景,马歇尔的到来为中共与国民党开始新的谈判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延安命令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美国官员的联络,并对在华美方人员采取“友善态度”。^③

从政治上来说,国民党为其在1945年11月和12月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得出结论,认为政府和美国人应对发动一场全面内战承担责任。这种情绪同人们对于政府腐败和无能的既存抱怨结合在一起,便导致在好几个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在一些示威的背后有共产党人所从事的组织工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示威参加者远远超出了共产党同情者的范围。昆明的示威游行于11月25日开始,大批要求结束内战的大学与高中学生受到了警察与宪兵的攻击。^④

①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及谈判问题致董必武、王若飞电》,1945年12月9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4页;《中央、军委关于粉碎国民党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指示》,1945年12月12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37-239页。

② 《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的谈话》,1945年12月17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5-36页;耶顿致魏德迈电,1945年12月20日,《中国战区政策——1945年9月-1946年1月》,332卷宗,1542盒,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③ 《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47页。

④ 《燕京新闻》,1945年12月13日;威廉姆斯致费正清电,1945年12月14日,梅尔比文件,1盒,《中国综合,1938-1945》,藏杜鲁门图书馆;胡佩珊《中国内战》,44-52页。关于共产党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问题,见同上书,80-89页;易克《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战略》,269-271页。

对于昆明学生的残酷压制激起了其他城市的学生骚动。许多学生集会都谴责美国对中国的干涉。在昆明,一位学生发言人告诉记者说,所有参加抗议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昨晚横飞的子弹是美国制造的”。在成都,示威者们来到美国新闻署的楼外,呼喊要求美军从中国撤走的口号。美国新闻署在发给重庆的报告中说:“直到战争结束一直协助美军担任翻译的学生们……在楼墙上写下了几个醒目的大字——‘从中国滚出去!’”^①

^① 费正清致毕格斯塔夫,1945年12月6日,梅尔比文件,1盒;威廉姆斯致费正清,1945年12月14日,同上,藏杜鲁门图书馆。

第七章

苏联撤军与内战的来临

蒋介石再派蒋经国去莫斯科，斯大林警告说：美国人想的是要把中国当做工具，你们注定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马歇尔到中国不过三周，便促使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但内战却并未止息；蒋介石为取得对中共大打出手的“行动自由”，在东北与苏联决裂；毛泽东与中共对和平不再存任何幻想，决心同蒋介石干到底；随着苏军撤出东北和四平战役打响，一场惨烈的内战终于不可避免。

当蒋经国步入克里姆林宫大厅同斯大林举行首次会谈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是一项内容含混不清的使命。他同时也知道，自己能从主人那里得到的回报是非常有限、非常不明朗的。他此次是奉父亲之命来到莫斯科的，但他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苏方，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让步。老蒋之所以安排这次访问，一方面是为了巩固与莫斯科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企图了解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在满洲获得斯大林的合作。蒋介石对于再同苏联人做一次交易是感兴趣的，但这一回他希望斯大林首先摊牌。^①

^① 蒋经国《访苏交涉记》，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12-113页；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909页。参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74-75页，台北，1974。

蒋经国对苏联外交和东北形势的洞察力均比其父敏锐。小蒋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娶了一个俄国夫人，并在过去十年间一直仔细关注着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演进。他在满洲就职期间就已经察觉到，如果代价适当的话，苏联人是愿意同国民党合作的。但那时小蒋对于老蒋是否愿意或能够付出必要的代价同苏方进行合作尚不清楚。在启程前往莫斯科前，他曾希望能从父亲那里得到较为明确的指令。他在东北的工作经历使他确信，中共在那里的实力正在不断增长。他知道，如果国民党要想同苏联人达成交易的话，就必须赶快采取行动。^①

正如蒋经国所料，斯大林并不愿意轻易摊牌亮底。结果，他的访问只是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发泄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提供了一个讲坛。斯大林对蒋经国说：“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把中国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但尽管斯大林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他却反复重申自己并不反对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然而，他斥责美国在华北驻扎军队。这位苏联领导人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准许美国在中国驻军，东北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②

在蒋经国与斯大林会晤期间，驻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洛夫通知中国外交部长，苏联已经采纳蒋委员长的建议把红军撤离的日期延迟至2月1日。王世杰听取这位苏联大使传达这一消息时，真是大大地吃了一惊。这位外交部长从未以政府的名义提出过这种建议，他愤然要求对方告知这是谁提出的。彼得洛夫说，在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和张嘉璈就曾以委员长的名义提出了这一请求。^③ 不管王世杰对于委员长的这一秘密外交（秘密到连对自己的外交部长都保密的程度）是多么沮丧，他意识到事实已无法改变。王世杰于12月31日通知彼得洛夫，他的政府接受苏方的建议，但却小心翼翼地回避承认这一建议本是出自中方。^④

^① 蒋经国日记，1945年11月3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00-111页；蒋经国致蒋介石电，1945年12月5日，同上书，158-159页。关于蒋经国早年在苏联的情况，参见蔡省三《蒋经国与苏联》，香港，1976。

^② 蒋经国《访苏交涉记》，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12-113页。

^③ 彼得洛夫致王世杰函，1945年12月29日，同上书，7编，1册，169-170页。

^④ 王世杰致彼得洛夫函，1945年12月31日，同上书，7编，1册，171页。

在向彼得洛夫作出这一书面答复前不久,王世杰获悉了莫斯科外交部长会议公报。在王世杰看来,这一公报的文本是“成问题的”,并害怕它的某些内容是在支持中共的要求。这位外交部长同时还担心,苏联人与美国人已在莫斯科拿中国政府做代价达成了秘密协定。^① 尽管莫斯科外长会议的背景与雅尔塔会议迥然不同,重庆和华盛顿两方的官员们还是生怕1945年初的事件会再次重演——那时,斯大林与罗斯福试图制订一项使两大国都感到满意的对华政策。

在中共看来,莫斯科公报正是为王世杰所惧怕,却为毛泽东在“七大”上预言为不可避免的大国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公报肯定了斯大林的说法,即他已在中国问题上赢得了美国人的政治与军事让步;这对延安来说,则意味着中共与苏联紧密结盟的政策正在发生效应。延安对莫斯科的决定公开表示出了欢迎的态度,并且声称这一决定“是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适合的”。^②

中共领导层内部对三国公报的反应则更为积极。中共中央通知周恩来及中共重庆代表团说,美国与苏联已在莫斯科就国共停火问题达成协议,这意味着国民党必须接受停止内战。然而,延安方面对于莫斯科协定中所涉及的“扩大”政府及美苏撤军实际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尚无把握。中共中央告诉重庆代表团,美国已决定派遣马歇尔将军赴华执行上述协议,但延安对这一使命的具体内容还不甚清楚。^③

在苏联人把东北的共产党干部赶出城外几周里时,中共的士气下降到了几年来的最低点。然而,到12月下旬,中共领导层的乐观情绪重新燃起。先是苏联的政策,随后是美国的政策都开始向着对其有利的方向转变。在中国内部,蒋介石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他所实行的政策使广大的城市居民产生了敌对情绪。最后,由于毛泽东果断地参与了东北军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2日。

^②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三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协议的谈话》,1945年12月30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38-39页。

^③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及谈判问题致董必武、王若飞电》,1945年12月9日;《中央关于政协可能解决某些问题我方纲领应部分修改的指示》,1946年1月5日,同上书,34页、39页。

事战略问题的辩论,党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毛泽东作为中共领导层内主要政治决策人的再度崛起是由满洲危机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当时尽管刘少奇想尽了各种办法,却无法使东北地区的军事将领们在战略上达成一致。刘少奇缺乏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威望,而这正是毛泽东在党内的主要力量所在。到阜新会议召开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已不得不承认,只有主席重返政治领导岗位,才有可能使东北的所有将领们服从延安的命令。^①

12月28日,毛泽东为了支持刘少奇的主张向东北地区的中共军事将领和政治领导人发出了一份电报。他指出:共产党不应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上。注意到党在东北各基层组织所存在的种种不满情绪和意见分歧,毛泽东着重强调了党的分裂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的“政治局势”而决定,党目前应在满洲边缘地区建立基层组织,而不要向国民党在城市中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毛泽东指出,中共的主要任务仍是抵抗国民党对中共位于东北和热河的根据地发起进攻。^②

12月下旬的外交事件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两个超级大国并不愿冒由于中国的内战而致使整个东亚局势陷入不稳定的风险。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后,中共领导层认为并不一定要放弃党的独立自主地位,便有可能通过与国民党谈判来达成某种解决方案。苏美之间若达成协定,则对中共达到其政治目的会有所帮助。主席本人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现在都相信,他在“七大”上曾经预言过的那个时期终于到来了。^③

当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1日抵达重庆时,他并不知道中国的各党派

^① 刘少奇致东北局负责人的三份电报,1945年11月20日、12月24日、12月31日,载《刘少奇选集》上卷,373-376页;“七大”选出的政治局成员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彭真、林伯渠、高岗、康生和张闻天。其中,只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康生在1945年6月到1946年6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延安。参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487页。

^②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载《毛泽东选集》,4卷,1177-1180页。

^③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停国共矛盾始末》,204-206页;章文晋《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59-60页。

是如何看待他的使命的,也没有任何实现其使命的具体方案。实际上,他的使命的目标本身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于不管怎么去理解似乎都是可以的。将军首先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杜鲁门总统要求他在中国实现和平,二是他在国防部的同僚们想要使苏联人尽快撤出满洲。马歇尔希望能一一实现上述两个目标。^①

将军把停火问题看做是当务之急。他同时也意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就需要在向国共两党提出任何正式要求之前首先促使他们重新开始谈判。在与蒋介石首次会晤时,马歇尔已就恢复和谈问题向委员长施加压力。对于委员长关于共产党如何与苏联相勾结来阻挠中国统一的长篇议论,他置之不理,反而说,美国人民并不愿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他又补充道,他希望蒋介石能够尽快与中共重新开始对话。^②

与马歇尔的会面给蒋介石留下的印象是,将军要求他率先采取行动以促成和谈。这位国民党领袖迟迟不愿与共产党重新开始谈判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基于几个月前谈判失败的经验,一是出于当时的军事进攻计划。然而他认识到,对于马歇尔的要求他很难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他的政府需要美国在外交、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他懂得,马歇尔所得到的指令是促成和谈,而他则一定要把握住不让这位赫赫有名的美国使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他的政府。^③再者,蒋介石还意识到,重开谈判的倡议会使他在中国赢得政治上的先机。目睹了12月上旬“既驯服又无知”的学生们在反内战抗议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愤怒情绪,蒋介石深知,以武力对抗共产党并不是一种得人心的做法——在那些刚刚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尤其如此。^④

马歇尔的计策奏效了。蒋介石在与这位美国特使会晤后便命令自己的顾问,要他们向周恩来和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一项停战提案,共产

^① 麦尔比日记;麦尔比《天命:中国内战实录》,72-73页。从1945年11月到中国内战结束,麦尔比任职于美国驻华使馆。

^② 蒋介石和马歇尔谈话纪要,1945年12月21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5卷,下册,907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45年12月20日,同上书,910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45年12月16日,同上书,903页。

党方面则于1月3日提出了对案。不出所料,国民党坚持要求在停战期间自由向华北和东北地区调动部队,而中共则要求,在停火期间所有部队均应留驻原地。^①

马歇尔在国共两党恢复接触之初有意避免正式介入,但在此时他却向周恩来和国民党首席代表张群将军宣读了他亲自起草的一份草案。这份草案请求双方作出让步,但主要的让步则必须由中共方面作出。马歇尔要周恩来同意让国民党部队在美国协助下自由调往东北。^② 尽管周恩来对马歇尔的大部分建议欣然接受,但在东北问题上,这位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却提议完全将这一地区排除于正式协定之外。周恩来说,如果不这么做,那就必须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然而,在当时由周恩来、张群和马歇尔组成的正式三人小组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周恩来终于在东北问题上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1月8日,周恩来同意在停火令中加入一项备忘录,说明这一命令“并不妨碍国军为恢复中国主权而进驻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③

当周恩来表示出愿意让政府拥有在华南不受限制地调动部队的权力时,马歇尔感到签订和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迅速将双方一致同意的要点以停火令草案的形式递交给了蒋介石,并表示他本人对此是支持的。蒋介石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这一既成事实。由周恩来、张群和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于1月10日在这一文件上签字。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向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自1月13日午夜起实现停火。^④

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马歇尔将军已经使他赴华的基本目标之一得到了实现。不言而喻,停火协定使将军本人声望大振。马歇尔此时感到他是有能力应付中国的局势的,并且自以为已经用事实证明那些曾

^① 《政府向中共提出的三点建议》,无日期;《中共的反建议》,1946年1月3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9卷,3页、10页。

^② 周恩来和马歇尔谈话纪要,1946年1月3日,同上书,11-17页。

^③ 周恩来和马歇尔谈话纪录,1946年1月5日,同上书,20-25页;《三人委员会备忘录》,1946年1月10日,同上书,126页。

^④ 蒋介石和马歇尔谈话纪要,1946年1月9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8-9页;《三人委员会备忘录》,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9卷,125-126页。

经预言他的使命无法完成的人们的错误。对于中国政治几乎一窍不通的马歇尔不会理解,这一停火协定不仅是由于他的调停策略发生了效应,也是中国国内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他的参与虽然对协议在此时签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却并不足以迫使国共两党作出进一步的让步。^①

然而,马歇尔确实认识到了,要使协议生存下去就必须强制实施停火。在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后,他建议三人小组在北平建立一个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联合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部,对一切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作出报告。军调部将派出低一级别的“三人小组”到停战因某一方发动进攻而受到威胁的地方去。马歇尔希望,美国的参与将足以使停战局势获得巩固。^②

谈判进展迅速,以至于北平军调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开始投入工作了。在马歇尔助手亨利·白罗德(Henry Byroade)上校的指挥下,美国在中国所有可供调动的运输机都被用来运送中共和国民党代表到北平去,同时还运去了军调部所需的装备设施。他还包下了城内的两个主要旅馆,把两方面的代表团分别安置在其中的一个。在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的第二天,军调部的运作就开始了。^③

谈判如此迅速地便达成协议,美国人又如此迅速地建立起了停火控制机制,这颇令延安方面和蒋委员长感到吃惊。就在蒋介石已答应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他还打算在协定生效之前攻下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一带的几个军事重镇。12月间,委员长便决定,要从正面向沈阳挺进的国军部队中调拨一部分力量(当时沈阳已为国民党部队所占),利用中共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摧毁这几个与满洲相邻地区的中共根据地。1月7日,他命令在北方统率部队的杜聿明将军加强对热河和察哈尔的攻势。与此同时,傅作义的部队继续从西面发起进攻,占领了位于绥远东部的中共战略

① 马歇尔致杜鲁门电,1946年1月10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29-132页。

② 《三人委员会备忘录》,无日期,同上书,127-128页。

③ 白罗德(Henry Byroade)口述历史(1988年),33页,藏杜鲁门图书馆。

重镇集宁。正是在这天夜里，停火协定开始生效。^①

延安方面也觉得停战的具体时机并不太好，因为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发动反攻以收复失守于国民党部队的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的部分地区。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力量强大，毛泽东则正想向全党展示一下，只要党能在战略上保持高度统一，便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就在不甚情愿地接受停火令的同时，中共驻华北地区部队指挥员聂荣臻向延安提出了收复集宁的请求，得到了延安的批准。1月14日，聂荣臻迅速调动集结于上述三个地区的中共部队，向集宁发起了进攻。^②

军调部为阻止集宁争夺战而作出的种种尝试揭示了马歇尔在方式方法上的长处与弱点。军调部派“三人小组”到张家口与聂荣臻会面，但这位中共将领将小组人员留在张家口达36小时之久，直到他的部队于1月17日凌晨收复集宁。然后，他在允许“三人小组”进入集宁的同时指示中共指挥员清扫战场并否认那里曾经发生过战斗。尽管停火局势是在双方总的监视之下，但这类武装冲突在整个华北地区却依然接连发生。^③

就在双方在停火令上签字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重庆召开了。这个有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会议是毛泽东与蒋介石1945年10月谈判的一个产物，其宗旨则在于讨论诸如召集国民大会、制订新宪法和整编军队等问题。蒋介石一向反对召集这类会议的主张，所以一直在阻挠会议的举行。但如今，委员长却打算通过对公众要求召开这一会议的认可来谋取政治利益。他虽然并不指望这一会议会产生多么重要的结果，但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将大多数与会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的。^④

但委员长这一次却打错了算盘。在停火协定突然达成的推动之下，政

^① 《周恩来传》，611-612页；蒋介石致杜鲁明电，1946年1月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72页。

^② 《中央关于坚决保卫承德问题给程子华、肖克等的指示》，1946年1月3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259页；《聂荣臻回忆录》，618-619页。

^③ 《聂荣臻回忆录》，619-620页；题为“白罗德”口述历史，34页。关于其他冲突，参见甘重斗《军调部驻赵庄我代表被殴事件经过》，载《山东党史资料》，1987年3期，128-132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46年1月22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13页；郭荣超《在重庆的失败：中国战后的政治谈判》，235-237页。

政治协商会议在1月间就有关国共冲突的一切主要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周恩来巧妙地抓住会议的有利时机,与许多非国民党的党派建立起了工作关系,并公开建议实行一系列符合民心的改革。譬如,他在1月15日提交的一份有关共同政治纲领的计划便赢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这一计划中对宪政和社会公正的一般性赞同成为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纲领的核心部分。^①在1月31日的闭幕式上,大会还呼吁政府于5月5日召开经选举而产生的国民大会,并要求立即扩大政府以便容纳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最后这一项是政治协商会议迄今为止所通过的最重要的一项决议,其中规定,国民党成员在政府内不得超过半数,其余的名额则由其他各党派分配。事态的发展看来远比人们所预料的要快得多。^②

中共领导层对重庆的形势发展感到欢欣鼓舞。尽管停火协定对其在军事上有所不利,但延安还是将之视为自己在政治上的一大胜利,并且期望协定能够持续下去。中共报刊将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10日召开称之为日本投降以来的最大喜事。周恩来就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问题过程中所作的报告更促使了乐观情绪的产生。延安曾授予重庆代表团以进行谈判广泛权力,而周恩来的策略看来是对此的一个很好的回报。^③

1月27日至2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议的议题并不是讨论中共是否应接受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在延安的领导人们看来,接受这些决议已是不必再加讨论的了。中共的五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之所以举行会晤,主要是为了讨论对国共谈判的明显进展应如何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作出解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政治协商会议所显示出的达成协议的潜在可能性表明,中国的政治局势自去年秋季以来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共冲突达成和平解决的前景已近在咫尺。^④

^① 郭荣超《在重庆的失败:中国战后的政治谈判》,281-300页;周恩来等《和平建国纲领草案》,1946年1月16日,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文件汇编》,44-49页。

^② 《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协议》,同上书,58-70页。

^③ 《新华日报》(重庆版),194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三人小组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17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49页。

^④ 《周恩来传》,615页。

中央于2月1日向各地党组织发出的通知反映了这一结论。通知指出,政治协商会议上所达成的协定“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一新时期的基础是在莫斯科奠定的,在那里三大国解决了与中国有关的国际问题并决定“以马歇尔为代表”对中国内战进行调停。而三大国之所以能够在莫斯科达成和解方案,又是以中共和苏联的力量为基础的。在中国和美国依然存在着反对这一和解趋势的反动势力,但是,中共是有能力逐步地解决这方面的矛盾的。

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中央因而强调:“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央进一步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工作中应特别注意防止犯“左倾”关门主义。^①

中央最为重要的指示是下达给东北分局的那一项。在延安书记处的会议上周恩来曾提出警告说,至今为止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马歇尔都还未采取实际步骤解决东北问题。毛泽东深知,国民党将领们对于中共在满洲的军事力量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他因而预料到,蒋介石将企图在和平协定完全生效前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控制。此刻,毛泽东通知东北地区的中共领导人,党必须与重庆达成妥协。中央于1月26日告诫林彪:“如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②毛泽东还认为,莫斯科会议公报意味着苏联将积极地参与东北问题的解决。他指出:“苏联不会助我在东北内战,但可助我与国民党获得妥协。”毛泽东告诉林彪:“苏联和美国都不容许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长期内战。”^③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70-74页。

^② 《周恩来传》,615页;《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电;《中央对目前东北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52-53页、54-56页。

^③ 《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电;《中央对目前东北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52-53页、54-56页。根据我的调查,这些电报以及1946年初中共致东北局的大部分重要电报都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

毛泽东特意警告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员，不要让正在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切断中共与苏联、蒙古军队的联系。他希望中共部队与正在撤出东北的苏联红军保持紧密联系，从而使中共部队能够在苏军撤出的地区秘密地扎下根来。毛泽东同时还相信，国军由于害怕与苏联人发生冲突而不会攻打驻扎在红军撤退路线附近的共产党部队。他要求中共军事将领们力求使党在东北的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协调起来。^①

尽管要真正解决东北问题还需时日，但在2月初，中共领导层对于国民党会将同中共的军事对抗局限在东北本身感到胸有成竹。毛泽东认为，国民党部队甚至在满洲境内也不会再对中共发动全面进攻，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因而能够在苏联战线的后方秘密地开展政治工作。这一论断是导致毛泽东和刘少奇作出和平新时代已在中国到来的重要宣言的主要原因。尽管毛泽东后来试图指责刘少奇在这一时期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毋庸置疑的是，正是毛泽东本人在中共领导层内部最为明确地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设想，并领导全党为从事新形式的政治活动而作了大量的准备。^②

中共还尽了最大的努力向国内和国际的公众舆论宣传自己对于各种事件的看法。在接受国内外报界采访时，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赞扬了蒋委员长、马歇尔及美国政府对于在中国实现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在就宣传问题向党的各级部门发出的指示中，中共中央则强调，蒋介石目前还愿意在民主体制内进行工作，但他只是一个暂时的同盟者。^③

在一次特别重要的访谈中，刘少奇从美国驻延安的观察小组中挑选了一名会讲中文的成员有吉(Kaji Ariyoshi)，直接向美方代表讲解中共的观

^① 《中央对目前东北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54-56页。

^② 《袁荣臻回忆录》，597-598页；张琦《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2期，204-208页；参见Shum《中共走向政权之路》，243-244页。

^③ 《中央关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向民主方面转变暂时停止宣传攻势的指示》，1946年2月7日；《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东北形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的主张的谈话》，1946年2月13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76-82页；《周恩来传》，618-620页。

点。刘少奇表示：“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和平现在已经实现了。中国已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我们认为，一个和平民主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共将允许在其控制的地区进行政治上的自由竞争，并指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里展开公开活动。刘少奇对于将为这种公开性付出的代价并不存在幻想，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秘密警察会采取“非法手段”，斗争也可能引起流血。但他强调说：“内战是不会发生的。”虽然他在以后的一次谈话中曾提到“有可能会倒退到黑暗的反动状态”，但仍然表示，“在中国实行了一段时期的民主以后”，这种倒退的可能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目前）主要的任务是起草宪法，以便实行与美国和英国相类似的议会和内阁体制”。^①

在重庆，周恩来也在忙于宪法方面的问题。然而，他感到国民政府本身的改组应是当务之急。2月初，周恩来花费了大量时间与其他非国民党党派讨论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他已准备好了一份中共出任部长人选的名单，他本人将担任农林部部长。此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及其他政治人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民政府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付诸实施。^②

蒋介石面临着一系列困难的抉择。他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想得并不多。他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少数代表具有“爱国意识”和“正义感”。然而，他还是要照本接受大会的决议，否则就会使中共在宣传攻势上占上风并面临与马歇尔关系恶化的危险。国民党内一些右翼分子的地位由于国军对共产党所取得的军事胜利而有所加强，他们则担心，蒋介石会放弃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去换取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元首地位。陈立夫等人警告委员长说，接受政协会议的决议将会导致党内危机。^③

他们的告诫并没有被置若罔闻。早在2月4日，蒋介石就要求国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设法修正四天前刚刚通过的几项决议。据蒋介石说，

^① 有吉致费正清和康纳斯函，1946年2月3日，《中国（一般文件）1946年（1月至5月）》，麦尔比文件，1盒，藏杜鲁门图书馆。

^②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49-51页。蒋匀田曾任1946年1月政协协商会议的联络秘书。

^③ 蒋介石日记，1946年1月22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13页。

这些决议从根本上违背了孙中山的教导。接着,委员长又于2月10日作出了最后决定。在国民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会议上,他对政协会议的决议逐一地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强调,为国民大会广泛授权的主张“最为不妥”,因为“我国民情散漫,公民智识更未普及,假设……随时号召各地之选民行使四权,则国家基础即随时摇动,而陷于不安之状态”。他还告诉与会者,如果他贯彻实施政协会议决定而“制成一种不合党纲、不合国情之宪法”,那么,“他日本党同志必有揭五权宪法之名义而革命者,吾人将无法加以制止”。^①

然而,蒋介石仍旧想使与中共的谈判继续下去,因为公开的决裂会对其外交关系造成损害。马歇尔曾经提出,如果蒋介石在政治解决的协议上签字,美国会以大量贷款和增加军援作为回报。蒋介石担心,若对政协会议的各项决议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即便不会打消至少也会削弱美方提供大量新援助的积极性。再者,这还可能把美国的注意力从委员长当前最想集中精力解决的满洲和苏联撤军问题上引开。

1月间,蒋介石对马歇尔这位美国特使越来越感到不悦。他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对我国国情隔阂异甚。”他还担心,这位正在迫使他与中共达成一项更为广泛协议的将军恐怕是受了“美使馆新闻处费正清”等人的影响,而在他看来,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与他的政府作对。同时,蒋介石和他的顾问们还担心,同他们先前的指望不同,马歇尔似乎对苏联的举动并不感兴趣。王世杰惊奇地发现,这位将军对中苏问题根本不积极,而是把全部的时间花在调停工作上。^②

蒋介石在听取了蒋经国从莫斯科归来后的汇报以后,内心深受困扰。委员长本来期望,斯大林能像去年夏天那样对与国民党合作提出他的最低要求,从而为完成中苏谈判奠定一个基础。当蒋经国报告说斯大林除了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外没有再谈什么时,蒋介石感到,苏联人已经决定不进行谈判,而是要通过使用武力并与中共合作来获取他们想要在满洲得

^① 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38页,40-43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46年1月23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26页;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30日。

到的东西。从这一分析出发,委员长的结论只能是,斯大林在蒋经国访苏最后一天邀请他访问苏联不过是一个陷阱。^①

然而,即便在蒋介石从情报机关得知红军在2月1日前不会从东北撤走之后,对国民政府来说要与苏联公开进行对抗仍是十分困难的。与1945年10月以来的情形相似,蒋介石所面临的问题始终在于,一旦苏联撤军,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力量尚未强大到足以抵挡中共去占领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正像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表明的,他一方面害怕苏方会违背撤军协议,另一方面又生怕他们撤走之后会让共产党人捷足先登。这两方面的忧虑弄得老蒋心神不宁。^②

在2月的头两个星期过去以后,委员长渐渐地下定了最后决心去敦促苏联立即撤军,尽管这意味着为了谋求东北的控制权将要展开一场艰苦的战斗。蒋介石此时已经看出,继续与莫斯科玩弄外交把戏将无补于事。蒋经国访苏的结果使得蒋介石坚信,要通过同斯大林合作而由苏联和国民党在东北前途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此外,蒋介石还收到了大量情报,都说明苏联红军与共产党在北满的合作正在不断加强。^③

再者,蒋介石还想要迫使马歇尔插手东北问题。他从来自华盛顿的报告中获悉,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在满洲的意图正越来越感到忧虑;他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马歇尔却对此显得如此漠不关心。委员长当然不知道马歇尔的态度其实是由他的谈判策略所决定的——在将军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他完全意识到中国面对“俄国低层次渗透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④

^① 蒋介石日记,1946年1月1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26页。1946年1月,当蒋介石下令不再向苏方作出任何新的让步时,重庆方面同苏联官员关于在满洲进行中苏工业合作的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致张嘉璈电,1946年1月7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7卷,上册,412页。

^② 杜鲁门致蒋介石电,1946年1月30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上册,172页;蒋介石日记,1946年1月28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30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上册,577-583页,发表了重庆方面于1946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处理苏联与中共关系的一系列军事情报。

^④ 马歇尔致杜鲁门电,1946年1月24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9卷,143页。

最后,委员长还受到公众要求政府对苏联在东北的行径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压力的影响。2月上旬,第一批中国和西方的新闻记者被允许进入满洲采访,他们发回了许多有关苏联人暴力抢劫的报道。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尽管有政府1945年8月的说法,但苏联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似乎将变得漫无止境。另外,也是在2月初,雅尔塔秘密协定被公开了,这既加重了人们对苏联人动机的怀疑,又增强了公众对于民族孱弱的意识。^①

公众对于东北问题的这种新意识导致了在重庆及中国南方其他一些城市举行的一系列反苏集会。毋庸置疑,一些示威活动是由国民党右翼分子组织的,成了他们与中共斗争的一部分。然而,与发生于1945年12月的反美集会一样,这种对苏联在满洲政策的抗议活动也在党派组织之外获得了支持。在不少大学里,学生们用罢课来抗议莫斯科的政策和雅尔塔协定,而大多数非共产党的报刊都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蒋介石根本无法摆脱来自公众的压力。当他看到请愿书像潮水般涌来,他的部长们遭到报界的攻击时,他横下一条心,要在满洲与苏联人展开对抗。委员长当然也知道,同苏联的任何冲突都可以被用作反共的宣传武器。^②

3月6日,外交部第一次就苏联违反中苏协定正式提出抗议,要求红军立即从东北撤军。^③这一抗议意味着蒋介石过去一年来所实行的外交战略已以失败告终。迫于斯大林要求美国撤军的压力,这位国民党领袖发现他不可能在不损害与华盛顿关系的前提下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如今他所希望的是,即便他不得不动用武力来对付中共,国民党与美国人的同盟仍能够保持下去。

就在蒋介石与苏联人决裂的前两周,三人小组在一项将中共武装部队并入国军的计划上达成了协议。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这简直不可思

^① 例如,1946年2月14日《纽约时报》和《大公报》。

^② 杨《雅尔塔协定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169-191页;《大公报》,1946年2月23日。1946年2月20日,亲国民党的《时事新报》对宋子文进行了点名攻击,指责他要对中苏条约负责。关于就苏军占领东北向蒋介石办公室的请愿示威,见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1(2)454。

^③ 中华民国外交部致驻苏使馆照会,1946年3月6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87页。

议。周恩来接受了将中共部队从华南全部撤走,并同意以大致 1:6 的比例将华北和东北的中共部队并入国军。这一协议的内容还包括逐步解散分布于各地的中共部队、美国向国军提供训练和装备以及对所有这一计划外的部队解除武装等。^①

这一协议是马歇尔在中国所取得的最大成功。他曾将达成这样一项协议看做是进一步达成各种政治协定的基础,并机智地把握住了由政协会议所带来的势头,直接把这项关于军队规模和比例的全面协议拿到了手。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歇尔对他在中国进行调停时所处环境的历史根源全然视而不见,而这对他推动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却是很有帮助的。这位将军热衷于讨论草案的技术方面,不给双方发表政治声明和相互反驳留下任何时间,这就迫使双方拿出具体方案,并使得任何一方都很难找到借口来拖延谈判。马歇尔还为促进和谈创造出了一种友好的气氛。周恩来曾把赫尔利看做是一个十足的废物,但却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对这位美国新特使的技巧和正直持有高度评价。马歇尔同样对于周恩来评价甚高。他写道,周恩来在谈判中的言行使他相信距达成一项持久协议已近在咫尺。2月下旬,这种信心驱使马歇尔极力促使蒋委员长去达成进一步的协议。^②

马歇尔对苏联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感到关切。他告诉杜鲁门,美国在中国的目标必须是“尽快使中国统一起来,以便消除它目前在面临苏联秘密攻击时所处的软弱地位”。马歇尔表示:“我还认为,在这件事上我们的政府必须马上为中国做更多的事,而不仅仅是向中国提出建议。”^③为了做“更多的事”,马歇尔将军希望既要增加美国对中国的物质援助,又要协助蒋介石占领东北。他认为向中国提供经济支援尤为迫切,因为在他看来,这会缓和中国内部的紧张局势,从而使得革命无从发生。

^① 三人委员会军事小组会议记录,1945年2月21日,载《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1946年,9卷,265-277页。

^② 章文晋《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62-64页。

^③ 马歇尔致杜鲁门电,1946年2月9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9卷,426-429页。

同时,他也希望美国能在把苏联逐出满洲方面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为了给向中国提供这些援助扫清道路,寻求支持,将军计划于3月间返回华盛顿。然而,马歇尔知道,不论有无美国的援助,东北发生内战都将使蒋介石占领这一地区的努力变得异常困难。因此,在将停战协定扩大到东北的问题上,他没有任何不同看法。^①

蒋介石的意见却很不相同。他感到,倘若把停战协定扩大到东北,就会使东三省的大部分地区落入共产党手中,并会阻碍国军进驻苏军撤出的区域。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停火小组到东北去。与此相反,他却到处游说争取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支持,以便对苏联人施加压力并使共产党接受政府对满洲的控制。3月上旬,他对马歇尔表示:“现在满洲问题的结局将取决于美国对俄国立场的坚定性……软弱的表现将意味着满洲在实际上将不再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打出苏联这张牌以后,蒋介石的感觉是,他在解决东北问题上的时间已是越来越少了。要么他让自己的部队很快进驻满洲中部和北部,要么红军就会把这些地区的控制权交付中共。目前,他可能迅速将更多的人力、物力送到东北去的惟一办法是通过美国的协助;他希望,通过表现出以武力恢复满洲控制权的决心,他能够推动美国采取行动。^③

对于国民党接受那个关于军事改组的协定,蒋介石感到懊悔,这使他几乎丧失了对马歇尔会对他的事业给予支持的信心。马歇尔要求把停火协定扩展到东北地区,更使他感到沮丧。蒋介石在日记中评论道,马歇尔对于“共党为苏俄之工具”认识不清,其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维护共党势力”。他还抱怨马歇尔并未随时向他通报华盛顿的真正意图。^④

2月下旬,随着国军对共产党的有限抵抗发起进攻,东北地区的零星武装冲突不断增加。但是,国军尚未对中共的任何主要基地发起进攻,而只是向共产党在满洲西部的几个主要据点迫近。周恩来反复请求马歇尔

① 马歇尔致杜鲁门电,1946年2月4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206-207页。

② 会谈记录,1946年3月10日,同上书,528-529页。

③ 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70-71页。

④ 蒋介石日记,同上书,58页,60页,62页。

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使其停止攻势,但马歇尔却只是向委员长提出了一些非正式的建议。^①

马歇尔意识到,东北的局势正变得越来越严峻。他试图在3月13日前往华盛顿之前找到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他告诉蒋介石,满洲的战事可能会损害他获得美国经济援助的机会。这时,委员长才同意派遣停战小组到东北去,但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共必须同意国军在整个东北地区自由调动。谈判仍旧陷于僵局。^②

周恩来对于蒋委员长打算在满洲使用武力一直是深信不疑的,但他也曾认为,蒋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在谈判中的实力地位,而不是为了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到了3月初,周恩来开始产生了另外的想法。在过去的一年里,周恩来一直是中央委员会中力主与国民党和谈的最为坚决的支持者,并曾把政协会议达成协议视为自己政治生涯的一个高点。现在,连他也开始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的可能性产生了疑虑,这就表明,中共对于蒋介石的警觉正在迅速增长。^③

整个2月期间,中共领导层仍然相信和平已近在咫尺,党既要为武装部队的改编作准备,又要使自己去适应各种新形式的政治竞争。在接受了军事改组的协定后,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诚心诚意要付诸实施,这始终是中共历史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用聂荣臻的话来说,中共军事指挥员中没有人愿被看成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到“文革”中,所谓1946年初曾忽视武装斗争更成了党的一些元老受到上纲上线批判的由头。^④

从目前所有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包括军事指挥员

^① 姚夫等人编《解放战争纪事》,90-94页。

^② 马歇尔-蒋介石会谈记录,1946年3月10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9卷,528-529页。

^③ 《周恩来传》,622-623页。

^④ 《聂荣臻回忆录》,397-398页。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林彪指责刘少奇在1946年春曾对于同国民党合作抱有“幻想”。参见马涛《刘少奇同志在创建东北根据地中的重大贡献》,15-22页;关于林彪和毛泽东的看法,参见周赤萍《东北解放战争中的林彪同志》,449-450页。

们)当时的看法是,接受对中共部队进行整编是为了达成政治协定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还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即便党的部队逐步并入国军,党的纪律仍会保持下去,大体上就像20年前国共合作时那样。延安通知中共指挥员们,部队的复员工作必须立即开始;在那些将要并入国军的部队中,党的支部必须停止公开活动。^①

这些恰恰是1945年9月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所不愿作出的让步。毛的内心变化表明了他对于自己所领导的党将会从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及马歇尔的调停中受益是多么充满信心。毫无疑问,延安还是在囤积武器装备以预防最坏情形的发生,同时也向各级指战员发出了以防万一的秘密指示。但是,当个别指挥员拖泥带水、行动迟缓时,毛泽东亲自出面,要求他们服从大局。^②

毛泽东仍旧没有找到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因而对于应当如何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举棋不定。他仍然希望苏联能够把国民党和中共撮合到一起就满洲问题进行和谈,就像马歇尔在中国其他地区的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是,莫斯科却于2月间表明在东北地区国共纠纷的问题上苏联将“坚不出面”。对毛泽东来说,第二种可行方案是让由美国率领的停战小组进驻东北。但是,马歇尔似乎没有能力逼迫蒋介石接受这一建议,而中共也尚未获得莫斯科对这一计划的批准。^③

2月间发生的反苏示威游行给中共造成了进一步的困难,并使得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在与公众关系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蒙上了阴影。一些先前曾支持中共的著名自由知识分子,这时公开地警告中共,不要在东北与苏联人合作。在一些场合,愤怒的群众在国民党秘密警察的协助下对中

^① 《周恩来传》,618-622页;姚夫《解放战争纪事》,85-95页;《董荣臻回忆录》,598-599页;亦参见《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3月15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84-86页。

^② 《董荣臻回忆录》,598-599页。

^③ 《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12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77-78页。

共办公机关和报刊进行围攻。^①

周恩来凭借着他对于公众关系的敏锐直觉马上便意识到，党有必要公开表示自己是希望苏联尽快从东北撤军的。他在重庆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不成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一定要强调是国民党政府一直在阻挠苏联撤军。在延安，党的领导人花了不少时间才发出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指示。2月25日，他们通知各级党组织采取这样的立场：反苏的态度不利于东北问题的解决，对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中苏于1945年8月签订的条约应当予以赞扬。指示的结尾强调，党并不反对国军和平开入东北，反对的是“反动派在东北打内战”。^②

到了3月初（特别是在苏联于3月15日通知延安红军将开始全面撤离之后）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中共在满洲势必面临大规模的进攻。这时他必须决定应当在苏联即将撤离的地区采取何种战略。他一定仔细作过盘算，和平的可能性是否已大到足以让中共主动限制自己的部队进入满洲北部和中部，从而把希望寄托于苏联撤军完毕之前达成国共和解之上。

在东北的中共领导人已经制订出了一个广泛而全面的接管北满的军事计划，并请求延安批准他们在苏联撤军刚刚开始时就付诸实施。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有关东北问题的报告显得越来越悲观，毛泽东却依然犹豫不决，仍然指望马歇尔的调停能产生个结果。^③

3月中旬发生的三个事件促使毛泽东对党的总战略加以修正，而更倾向于使用武力。第一件事是马歇尔放弃了僵持不下的谈判而返回华盛顿。马歇尔对国共和谈所施加的个人影响力的消失使中共领导人确信，满洲危机的政治解决已是遥遥无期。第二，毛泽东断定，尽管和谈仍在重庆继

^① 《新民报》，1946年2月28日；《大公报》（重庆版），1946年2月23日；亦参见杨《雅尔塔会议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191—192页。

^② 史米斯致贝尔奈斯电，1946年2月23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9卷，440—441页；《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宣传反攻中应注意事项的指示》，1946年2月25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83—84页；《解放日报》，1946年2月25日。

^③ 中共中央北满分局陈云等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25日，转引自丁晓春等人编《东北解放战争大事日志》，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10期，18页。

续进行,美国人却已在准备向东北运送更多的国民党部队。这一似乎来自华北地区党的情报机关的消息使毛泽东确信,美国对东北的政策正在走向强硬化,而这是新近美苏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急转直下所导致的一个结果。^①

最后,3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表明,党内右派的势力正在上升。实际上,蒋介石在很多问题是国民党右翼的同谋或煽动者。例如,委员长拒绝接受政协决议的态度就为党内领导人所共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蒋介石在接受了王世杰和宋子文提出的在中苏关系上采取更为强硬态度的许多建议之后,却不去为这两人因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中苏协定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而受到的批评作辩护。结果,与中共达成政治和解的政策(王世杰和宋子文是支持这一政策的两位主要人士),在此次会议上被彻底否决。^②

中执委最终变成了政治上权宜之计的工具,它虽然通过了有关政协会议的决议,但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却在这上面附加了一系列条件,从而使得与共产党的妥协成为不可能。其中一项附加条款规定,联合政府的所有成员都须经国民党中央执委批准,而新的国民大会也将几乎完全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在4月18日中执委会议闭幕那天所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严厉斥责蒋委员长纵容国民党内的几个集团破坏政协会议的协定。随后,在仍旧未达成任何有关派遣停战小组到满洲去的协议的情况下,周恩来动身前往延安商议对策。^③

马歇尔的离开、美国增加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以及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议的结局都使毛泽东感到,他的党正处在关系重大的转折点上。如果延安放弃在苏联撤军后立即对满洲北部和中部控制权的争夺,那么,在遇到来

^① 《中央关于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反对修改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6日;《中央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给各地的指示》,1946年3月18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86-87页、88-89页。

^② 郭荣超《在重庆的失败:中国战后的政治谈判》,337-338页、361页。

^③ 同上书,338页;周恩来记者招待会,1946年3月18日,转引自戴维恩斯致马歇尔电,1946年4月4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9卷,162-163页。亦请参见周恩来的评论,载《新华日报》(重庆版),1946年3月19日。

自国民党的种种挑战时,中共除了奉行纯粹政治性的战略外就再没有别的选择了。但从近期所发生的事件来看,中共是否应该将自己束缚于纯粹的政治斗争之中呢?毛泽东对此犹豫不决。3月16日,延安方面告知中共重庆代表团,蒋介石显然已经开始与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沆瀣一气;一旦内战爆发,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中共都务必防止来自公众的指责。但第二天,毛泽东又在一份冗长而内容纷杂的电文中告诫分布在各地地区的中共部队指挥员:“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但也“不怕打内战”。^①

3月20日至25日在延安举行的一次会议对于决定党的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会议的结果是部分地修正了先前的决定。党的领导人一致同意,不能一味地单方面限制党在东北的军事活动,恰恰相反,“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长全线”。与此同时,延安担心马歇尔会取消调停,周恩来认为,这会使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化为乌有。正在延安的周恩来通知重庆的中共代表应准备作出某些让步(最好是在华南地区),以满足美方求得迅速进展的意愿。^②

延安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中共领导人开会之际,蒋介石也在对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作出抉择。他从来自东北的报告中得知,由于中共在接管长春和哈尔滨时处在远比国军有利的地位,那里的情况已变得越来越严峻。3月22日,苏联人通知他,最后一批红军将于4月底以前撤离满洲,有关情报也证实了苏联人的这一意图。如果蒋介石想要依靠自己的军队占领东

^① 《中央关于坚持实行政协决议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6日;《中央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给各地的指示》,1946年3月18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86-87页、88-89页。

^② 《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保卫北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3月2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356页;《周恩来关于进行宣传攻势及在谈判中要强硬问题致董必武、王若飞电》,1946年3月22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90-91页。亦请参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226-227页;里顿·安德森《延安与列强》,155-157页。

北,他就必须赶快采取行动。^①

当蒋介石作出决定的时候,他最为关心的是国际上而不是国内对于他诉诸武力的反应。他根本不相信在重庆进行的谈判会有什么结果,而是期望在收复满洲的问题上公众会站在他的一边。在国际上,同斯大林决裂使他的手脚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但他感到自己正在玩弄的是一场有风险的游戏。此时,为了要占领东北并迫使共产党接受他的政府的领导权,他需要由美国取代苏联来对他提供支持。^②

3月下旬所获得的情报使蒋介石深信,美国的政策正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转变,这使他得以更为从容地作出在东北动用武力的决定。魏道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告说,杜鲁门政府现在把他与苏联的冲突视为具有全球性质,不论马歇尔在华盛顿留下了何种印象,只要国民政府与苏联人发生冲突,就可以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3月30日,吉伦将军(即马歇尔返回华盛顿期间的代理人)告诉蒋介石,美国将根据蒋过去的请求,再运送两个军的国民党部队到满洲去。第二天,国民党新一军开始对四平一带由中共占领的地区发起攻势,企图打开通向长春的路线。^③

四平战役是中国内战的首次战役。中共在抵抗中显示出了阻止国民党政府夺取东北控制权的决心,而国民党则表现出了要摧毁共产党抵抗力量的意愿。然而,双方仍旧希望使内战仅仅局限于那一地区。蒋介石指望共产党在看到他在东北的军事实力之后会屈从于他的政府,而毛泽东这方面则希望来自超级大国的新动议会迫使蒋介石接受政协协议。但是,在那一时刻,这两位领袖都下定决心动用一切可能调动的军事力量来实

^① 董彦平致蒋介石电,1946年3月8日;熊式辉致蒋介石电,1946年3月18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81页、66页、77页;彼得洛夫致王世杰电,1946年3月27日;董彦平致蒋介石电,1946年3月2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上册,191-192页。参见1946年3月报告,载《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陈中日记》,1946年1-12月。

^② 蒋介石日记,1946年3月23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81页。

^③ 魏道明致蒋介石电,1946年3月21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80页;吉伦(Gillem)致马歇尔电,1946年3月30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9卷,717页。

现自己在东北的目标。^①

战斗持续了数日之后，四平仍旧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其部队阻塞了国民党进攻长春的道路。毛泽东赞扬了林彪的作战战略并向这位东北军事指挥员保证，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党是联合一致的。毛泽东指出：“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需坚决克服。”主席敦促林彪立即向长春和哈尔滨进发。^②

到此时为止，党的领导层在满洲使用武力的决定上的确表现出了高度的统一。周恩来早先曾有两次对毛泽东凭借军队的做法存有异议，而今也同意了主席的看法，认为不可能再回避正面迎击来自蒋介石的军事挑战。他早在4月2日便已告诫延安，绝不可以让国民党军队通过四平。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周恩来相信在东北的军事较量最终仍有可能使蒋介石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他也估计到满洲的战事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③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从宣称和平解决不可逆转转变为完全投身于东北内战。在这两个阶段掌舵的是同一位领袖。毛泽东在1月间曾对和平的到来充满信心，而到了4月又转而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坚信不疑。他告诉林彪：“不要浪打，打则必胜。”^④这正是毛泽东具有杰出政治说服力的一个实证。他有能力保持党的统一，并使自己在整个时期都始终处于党的领袖地位。

然而，党内普遍接受了这种从以一种理论为基础的看法迅速跳向另一看法的做法，这就表明，40年代中期中共在政治上尚未成熟。在不到一

^① 蒋介石日记，1946年4月19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册，112页；《中央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的指示》（毛泽东起草），1946年4月20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97页。亦见《中央关于如何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给陈毅的指示》（毛泽东起草），1946年4月11日，同上书，95-96页。

^② 中共中央致林彪并告彭真电（毛泽东起草），1946年4月6日；中共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4月8日，引自丁晓春《东北解放战争大事日志》，19页。

^③ 周恩来致东北局的电报，1946年4月2日，引自《周恩来传》，623页。

^④ 毛泽东致林彪并告彭真电，1946年4月6日，引自丁晓春《东北解放战争大事日志》，20页。

年的时间里,党曾两次为和平的到来作准备;然后,却又不得不卷入一场他主观上并不想打、在武器装备上亦未准备好的战争。在这两个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对于党的领导层作出误判和制订有问题的政策均起了重要的误导作用。

延安在4月下旬对政治形势的重新评估表明党的领导层已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当林彪的部队在东北节节取胜之际,延安重新回到了在抗战期间所发展起来的持久战思想。在分析形势与党的政治前途时,毛泽东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国内政治和社会这两方面的发展上。当林彪所部于4月25日占领哈尔滨之后,中央委员会马上通过了一系列纲领性的决议,下令加紧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并在城市加强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如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的那样,延安领导人此时想的是要把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当做内战的武器。^①

党仍然认为,就对战争结局的影响而言,国际关系所起的作用虽然很重要,但却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中央委员会在于5月3日和15日向各中央局下达的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中着重指出,如果党没有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目前在东北所取得的成功便是不可能的。现在美国在东北内战中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延安的看法是:“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祖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倘若如此,即便在中共与国民党在东北进行有限内战的同时,中共根据地仍然可以同美国发展经济关系。中央委员会指出,这种贸易往来对于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②

希望避免与美国人发生直接冲突是毛泽东希望在重庆的谈判继续进

^① 《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99-104页;亦参见《中央转发东北局对目前东北工作的指示》以及《东北局对目前东北工作的指示》,1946年3月23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384-386页;列文《胜利之砒:满洲的共产主义革命》,203-207页;胡素珊《中国内战》,246-248页。

^② 《中央关于时局与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央关于发起要求美国执行莫斯科决议运动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5月28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104页、105-106页;《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1946年5月3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卷,396-397页。

行下去的主要原因——甚至当他对通过谈判立即达成解决方案已经丧失信心之后依然如此。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他还强调说：“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①

然而，1946年春中共对外关系的着重点仍然放在苏联和驻扎满洲的红军上。特别是在2月间蒋介石与莫斯科公开决裂以后，苏联人与中共的关系大大地接近起来。在东北的中共领导人观察到，红军已完全停止了使用武力来对中共进行威胁，而是转而向中共提供种种小恩小惠，诸如开辟通讯线路和交换情报等。苏联的这种新姿态使延安有理由相信，中共将能够在不与莫斯科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便接管红军撤离的地区。^②

是什么促使斯大林在1946年春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全球和局部两方面的考虑都在苏联对华政策上起了作用；但是，就像1945年秋天时的情况一样，苏联对华政策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很不协调。斯大林并不想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同时他也认识到，华盛顿影响中国政治的能力远远胜过自己。但是，他对美国军事势力向中国的扩张心存恐惧，这就促使他采取行动，其结果不仅破坏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而且也加重了美国对苏联在东亚地区动机的怀疑。^③

对于马歇尔使命、莫斯科公报的内容以及在中国建立新的联合政府的前景，斯大林都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是，他此时的重要目标是美国撤军。他的外交用意之一就是通过施加压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共正是他可以用来向国民党和美国人施加这种压力的一个工具。1月间，斯大林吩咐他

① 《中央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给周恩来的指示》（毛泽东），1946年4月20日，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97页。

②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3-10页；中共中央北满分局陈云等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25日，引自丁晓春《东北解放战争大事日志》，25页。

③ 里塞斯在《斯大林》一书的分析中，强调美国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意图产生了误解，参见该书22-27页。

的驻华代表“扩大你们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联络”。^①

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通过让他的军队继续留驻满洲可以迫使重庆和华盛顿为美国和苏联同时从中国撤军作出安排,因此,当蒋介石要求莫斯科说明苏联为从东北撤军在经济上的要价到底有多大时,斯大林对此置之不理,并且在2月1日之后继续占领着满洲的北部和中部地区。正如2月27日《真理报》所述:苏联军队“将会在美国军队离华之前而不是之后撤离”。^②

斯大林既没有预见到美国对其对华政策的可能反应,也未能料到苏美关系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有所改善之后,会在1946年早春急剧恶化。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莫斯科在3月初决定,在中苏之间没有达成任何经济协议的情况下,便从满洲单方面撤军。^③

正如史蒂夫·列文(Steven I. Levine)所指出的,苏联的撤军也标志着中共攻占满洲中部和北部努力的开端。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料到国共双方在红军撤离地区的冲突会演变为一场全面的内战,也没有故意就此进行策划。恰恰相反,当斯大林在3月初作出决定的时候,国共即将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尚存。这位苏联领导人肯定觉得,假如红军已经撤走的话,中苏关系在新的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会比撤军尚未完成有一个更好的开端。^④

从3月22日彼得洛夫通知王世杰苏联撤军的具体日程安排,到4月30日最后一批红军部队跨过中苏边界,两国政府的正式关系始终是冷冰冰的,但还算正常。斯大林显然不愿意向蒋介石政权作出任何让步,但也不愿留下任何可能触发外交事端的把柄。红军始终未介入国共双方的战

^① 洛佐夫斯基(Lozovsky)致康斯坦丁诺夫(Konstantinoff)电,1946年1月10日,332卷宗,《驻南京海军武官兼海军作战部长,1946年6月30日》,1535盒,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是为美国海军情报人员所截获的几件由莫斯科发往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电报中的一件。

^② 《真理报》,1946年2月27日。

^③ 关于中苏经济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参见1946年3月1日和5日张嘉璈日记;关于各大国在欧洲的关系,参见哈伯特(Fraser J. Harbutt)《铁幕:邱吉尔、美国和冷战的起源》(*The Iron Curtain*),209-232页,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88。

^④ 梁思文《胜利之砧:满洲的共产主义革命》,78-79页。

斗,而是把城市的控制权交付给了来自重庆的代表和国民军部队。^①

当斯大林期望中国实现和平的时候,他本人的行动却促成了战争的发生,这就证明苏联对外政策缺乏技巧。在长春,当国民党军队从苏联人手里接管了这座城市后,经数日激战而于4月18日向中共投降。红军于4月25日从哈尔滨撤离,4月28日该城即被林彪占领。在这两座城市中的大部分国民党军官选择同红军一起越过边界,最后取道莫斯科和伏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返回中国。^②

杜鲁门在1946年初也认为,和平将会在中国实现。他对于马歇尔将军将使这个国家“恢复正常”并在那里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感到胸有成竹。1月11日,他告诉内阁成员们说:“中国的情况良好。”刚从莫斯科返回的国务卿贝尔奈斯赞同总统的看法,并且预言道,斯大林是“打算实践他与中国的协议的,而且不会故意采取任何举动破坏我们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而作出的努力”。^③

但是,在这位总统对国共冲突解决的可能性抱以希望的同时,他对苏联满洲政策的疑虑也在不断增长。杜鲁门对斯大林越来越不信任,并且否决了贝尔奈斯在莫斯科达成新协议的企图。在这位美国总统看来,苏联超越2月1日期限继续占领满洲的决定,正为邱吉尔在3月初的“铁幕”讲话中所谈到的苏联扩张主义政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实例。^④杜鲁门的军事顾问们更是为总统对苏联的疑心火上加油。战争计划联合委员会早在1月8日就告诉杜鲁门,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华北是为了防止苏联在那里的

^① 彼得洛夫致王世杰电,1946年4月3日和23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1册,193页,195-197页;《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部日志,1946年1月-10月》,1946年4月报告,540.9.5090,BMH。据蒋经国宣称,斯大林在3月间再次向蒋介石发出了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但再次为蒋所拒绝,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75-76页。

^② 姚爽《解放战争纪事》,105-107页。

^③ 杜鲁门致贝尔奈斯电,1946年1月5日(未发出);菲雷尔《不供公开发表的文件》,78页;内阁会议记录——白官文件,康纳利文件,1盒,藏杜鲁门图书馆;贝尔奈斯致马歇尔电,1946年1月4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9卷,18页。

^④ 福雷斯特日记,1946年2月27日,载米利斯(Walter Millis)编《福雷斯特日记》(The Forrestal Diary),141页,纽约,1951;关于1946年初杜鲁门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全局的看法,参见哈伯特《铁幕:邱吉尔、美国和冷战的起源》,183-208页。

进一步扩张。几周后,美国军事情报机构断定,苏联正在准备把华北及满洲纳入“它的安全区域的范畴之中”,并且正在利用中共实现这一目标。^①

1946年2月、3月间,满洲问题加上伊朗和巴尔干半岛问题把美国对莫斯科外交政策的一连串怨气推向了顶点。雅尔塔有关东亚问题协定的公布以及关于苏联在满洲大规模掠夺行径的新闻报道均发生在2月中旬,两者对于杜鲁门政权形成对苏采取强硬路线的共识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此时,没有哪位美国上层官员愿意把自己同罗斯福的东亚政策联系起来。贝尔奈斯曾因为与雅尔塔有关联而蒙受耻辱并又由于过去奉行对苏妥协政策而遭受攻击,他就苏联继续军事占领满洲的行为提出了一系列抗议。^②

除了使用更为强硬的政治辞令以外,1946年初杜鲁门政府对于苏联在中国所起作用的基本对策并没有什么改变。马歇尔使命旨在削弱苏联在中国的影响,直到内战爆发之前,总统始终认为国共冲突问题的解决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苏联秘密发动进攻”的潜在可能性。^③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从中国撤军以及东北内战的爆发使华盛顿确信中共只不过是苏联政策的一件工具。4月中旬从延安被召回的美国观察小组在其总结报告中声称:“苏联正在对其最大的从属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发挥着指导性作用,这在过去是如此,在将来仍旧如此。”这篇报告以及中共军队在满洲取得的出人意料的胜利都使杜鲁门政府坚信,苏联人正在对中共提供武器装备上的援助并为之出谋划策。^④

如果不是马歇尔指责国民党的愚蠢行为造成了谈判破裂的话,杜鲁门在4月中旬以后对蒋介石政权提供军事援助的意愿也许会更加强烈。马歇尔在4月22日返回重庆后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蒋介石“本来曾有很

^① 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第416/1号文件(修订稿)《以俄国政策为背景看美国的军事地位》,附件B,31页;联合情报委员会第341号文件《苏联政治与军事行动的目标与结果》,1946年1月31日,218卷宗,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

^② 贝尔奈斯致凯尔电,1946年3月5日,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8卷,1113-1114页。

^③ 谢皮利(Shepley)致马歇尔电,1946年3月7日,同上书,1946年,9卷,511页。

^④ 《延安观察组的最后报告》,1946年4月15日,同上书,777-779页。

好的时机在满洲实现和平,但他却没有利用这种机会”。马歇尔在5月、6月继续进行调解工作期间,曾向华盛顿提出建议,反对美国再度增加对蒋介石的已经十分庞大的物资援助。^①

马歇尔将军尽管带有杜鲁门政府那种对苏联意图先入为主的偏见,却并不相信蒋介石政府在美苏对抗中会是一个强有力的盟友。他向杜鲁门提供的信息以及苏联完成从东北撤军,使得蒋介石政权不再成为全球冷战的一个直接焦点。但是,两个超级大国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而形成对峙的局面,却将在中国经历惨烈内战的三年期间持续存在下去——此刻,这场内战还只是在中国刚刚开始。

^① 《会谈纪要》,1946年4月22日;马歇尔致杜鲁门电,1946年5月6日,同上书,9卷,789页,815-818页。

结 束 语

造反、大国干涉和冷战

毛泽东和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是一场“人民揭竿而起”的革命的胜利；蒋介石的失败，是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崩溃的结果；与此同时，冷战在全球范围兴起对中国内战的结局也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得执政者难以垄断国际资源，使得造反者有可能获得外部支援；美国人不喜欢蒋介石，斯大林不相信中共能在内战中获胜，但美苏到头来依然站在国共背后卷入中国内战，这正是冷战的逻辑在起作用！

马歇尔将军在中国一直逗留到1947年1月。但是，同他在1946年所取得的成果相比较，他在通过调停而使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将军是一位骄傲而又固执的人，他拒绝承认自己无法用政治办法来解决国共之间的冲突。从1946年10月起，他便知道进一步的调停是无用的，因而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向美国公众解释为什么在谈判失败之后美国仍应继续向蒋介石政权提供支持。^①

与此同时，内战愈演愈烈。1946年5月19日，四平落入国军之手；四天后，国民党部队又占领了长春。战争在6月间经历了短暂的停顿之后，毛泽东试图将国民党军队从其正在东北发动的攻势中引开去，战火渐渐

^① 白罗德口述史记录，42页，藏社鲁门总统图书馆。

向华北和华中蔓延。1947年年中,当林彪部在东北发起反攻后,中共的军事态势逐步得到了改善。这以后,共产党在1948年秋冬的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中打断了国民党军队的脊梁。到1949年初,当蒋介石的残余部队南逃时,国民党政权开始为在台湾建立最后的落脚点进行准备工作。^①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主席和他的听众们都知道,中共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无疑还知道,他们成功的源泉在于党在过去30年间所建立起来的来自人民的支持。对毛泽东也是对研究中国革命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们来说,一个关于中共获得胜利的最基本的事实是,正是人民群众为反对社会不公正、政府腐败无能以及外国统治揭竿而起的暴力行动,促成了这一革命的发展。根据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在10月1日这一天出现在天安门上,确实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已经站起来了”。^②

作为对于三年内战中共产党取得胜利和国民党遭致失败的原因的总结,上述关于“人民揭竿而起”的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要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作出全面的解释,还必须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正如关于中共党史的一些新研究所揭示的,中共在中央和地方各个层次驾驭中国政治的能力对于战胜国民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③

在以往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在对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进行探讨时往往忽略了国际关系所起的作用。本书则指出,当二次大战结束之际,对外政策在国共两党的战略制订中都占据了关键性

^① 目前,仍然没有一本关于1946-1949年中国内战的综合性的英文专著。查辛(Lionel Max Chassin)在《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征服》(*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一书中,提供了关于内战的综述。胡佩璋的《中国的内战》一书,则集中论述了政治方面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一书以胜利者的身份叙述了内战军事方面的情况。国民党方面的看法则反映在《戡乱战史》一书中。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报》,1949年10月1日,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

^③ 有关英文著作,参见陈永发《制造革命》和梁思文《胜利之砧:满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关于这一课题的英文著作介绍,参见哈特福德(Kathleen Hartford)和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导言: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载哈特福德和戈德斯坦编《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

的地位。国共两党都希望利用大国的干预来为自己服务,并以此阻止内战的爆发。中国的这两个党为获得国外的支持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同大国之间的冲突联系在一起,创造了将存在15年以上的国际间结盟的一种新模式。冷战国际体系在中国的崛起也导致了中国内战于1946年爆发。蒋介石同苏联结盟的失败,促使他放弃发掘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潜在可能,其结果则是作出对中共开战的决定。由于美国固执地坚持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毛泽东在1946年初终于相信,中共要依靠大国的干预来避免内战是行不通的。中共在国内政治中的成功以及同莫斯科关系的改善,使得党有能力对蒋介石于1946年至1947年间的军事挑战作出回应,并在两年后最终击败这一挑战。

在1944-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共的决策过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除了1945年的最后两个月以外,毛泽东对所有的重要信息和文件(特别是与外交问题有关者)均事必躬亲、亲自审阅。他独特的声誉是建立在他既是政治战略家又是军事战略家的声誉之上的。在党的所有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才与前线指挥员保持着与党的书记处及政治局同样密切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里,毛泽东已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际问题上来。在政治上取得了对于王明一伙的完全胜利之后,主席将他以前对手关于国际形势的一些典型的重要论点吸收了过来。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同著名的“国际派”周恩来紧密合作,这也使得外交事务得到了他更多的重视。最后,美国对中国战事的日益卷入促使毛泽东相信,大国在战后仍将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积极参与的角色。

从1944年开始,毛泽东便坚定地相信,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将成为战后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开创和平时代的基石。诚然,他仍然认为,国际间“斗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如同他在国内同蒋介石的联盟也会时时陷入斗争一样。但是,这些斗争将不会改变大国在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的潮流。在这一即将到来的时期,中共将利用自己在抗战时期所积聚的政治力量去争取更多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将会使中共受益匪浅。

毛泽东关于对外事务的分析起初是牵强而肤浅的。在他作出这些分析时，他既不懂得外交上的交互影响如流水常变、永无定型，也不了解构成外国领导人动机的想法与思维。造成这种解释上缺陷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毛泽东缺乏关于国际问题的资讯，而在于他不了解大国对于自己在东亚利益上的基本看法。在毛泽东看来，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在国际问题上不停地进行着角逐，而国际形势的实际状况则是由角逐双方各自的得分或失分所决定的。毛泽东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场角逐始终是非常复杂的，并往往在秘密情况下进行。他因而认为，要从新闻报道或私下谈话中获知大国间实际上存在着何种协议与冲突是不可能的。

对于国际政治的这种“神秘化”看法使得毛泽东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猜测和凭空的想像，而不是延安所能得到的情报的基础之上。结果，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常常会对外交实践的特点作出错误的判断，并且只是根据那些符合他们总的想法的报告来采取行动。1945年8月和12月，延安两次在制订国内战略时以斯大林关于美国人的幻象式“理解”为依据。1946年2月，当马歇尔保证说华盛顿将支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时，毛泽东又因而便相信和平是不可避免的。

中共的决策进程也因为毛泽东对于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看法的变化而受到损害。毛泽东的分析可以在几天里便从一种立场转到另一种立场，似乎很不把自己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认真表述的看法当做一回事。有的时候，毛泽东灵活的思想方法以及他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看法的能力是中共的福音，就像他在1945年夏天对党的军事力量进行动员时的情况那样。但有的时候，毛泽东脑子的突然拐弯也会使党面临灾难性的威胁。在1945年秋天以及在毛泽东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发动一系列大运动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但在40年代，毛泽东仍然能够从错误中汲取教训。1945年9月至10月同国民党谈判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外交上的挫折使毛泽东得出结论：只要蒋介石仍然得到美国与苏联的支持，中共就别想在中国取得政权。在山海关之战开始前，他已在就中共应作出怎样的让步以减少同美国冲突的问题进行思考。毛泽东对苏联的政策感到失望，并认为，蒋介石之所

以敢于发动内战,莫斯科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当国民党军队于1945年11月中旬在华北发起攻势时,延安的感觉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建议和支持,国民党是不会这么干的。这又使得毛泽东和刘少奇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打破重庆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盟。

一个看来矛盾的现象是,正是苏联采取的最有害于中共的行动却促成了延安与莫斯科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1945年11月下旬,斯大林命令中共将其干部撤出东北各大城市,造成了中共与苏联关系的高度紧张,并迫使刘少奇和临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其他领导人必须在服从还是抵制苏联政策的问题上作出抉择。由于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此时已开始了对中共的大举进攻,刘少奇只有很小的回旋余地。他只能服从苏联人的意志,并希望这样的做法能够阻止斯大林进一步倒向国民党一边。

1945年末至1946年初,莫斯科向延安发出了善意的信息,这使得刘少奇并随之也使得毛泽东认识到,中共的对苏政策是有收获的。中共与苏联联系的加强以及同时期国民党与莫斯科关系的恶化,毛泽东有能力同蒋介石以武力夺取东北的图谋进行对抗。但毛泽东也知道,莫斯科政策多变。中共要想防止让1945年秋冬那样的挫折再次发生,就必须为自己同苏联的友谊付出代价,避免在国际上和国内实行为斯大林所“坚决反对”的政策。

1946年这一年标志着中共与苏联实际结盟时期的开始,结盟将一直持续到50年代后期。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从1946年初起,延安与莫斯科所发表的公开声明调子越来越相似,这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在毛泽东对苏政策的调整与他对马歇尔使命的支持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矛盾之处。直至1947年年中,苏联人对于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一事始终是持赞同的态度的。

苏联人于1946年4月同意让中共接管东北各城市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对中共占领长春和哈尔滨提出反对,便是重庆和莫斯科之间的联盟已经崩溃的信号。虽然苏联人依然并未向中共提供多大的政治与物质支持,但由于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的破裂,使得毛泽东有可能在不对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提出挑战的情况下与国

民党在东北展开角逐。^①

毛泽东曾经相信,由于延安与莫斯科之间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苏联人在红军参战后将会同中共紧密合作。然而,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同斯大林部队的接触使他认识到,要得到苏联人的合作就只有向他们作出让步。中共与苏联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曾被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用来解释中共的政策行为。但是,当莫斯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不再是一种遥远的理想典范的时候,这种因素的重要性也开始消褪。对于毛泽东来说,苏联在1945年所奉行的对华政策创造了一种情势:中共既离不开同苏联的联盟关系,但又发现这种关系既不平等也充满坎坷,而构成关系基础的则是远胜于共同意识形态信仰的实际的妥协让步。^②

毛泽东在试图得到苏联支持的同时,也继续希望避免同华盛顿全面决裂。在他看来,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进步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美国的政策既缺乏一致性也难以预料。甚至在美国于1945年10月开始军事上的干涉后,毛泽东仍命令中共指挥员避免与美军发生冲突,寄希望于美国的政策能够重新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转变。^③

毛泽东对马歇尔头几个月的调停所作的解释是,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已不像先前那么敌对。但是,鉴于美国在1945年秋曾公开对蒋介石在冀东所发动的攻势表示支持,毛泽东不敢说美国政策在马歇尔使命初期出现的变化是“进步力量”在华盛顿占了上风的缘故。相反,他将马歇尔使命看做是苏美妥协的结果,这使得华盛顿向莫斯科作出让步,赞同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对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有深刻的理解,因而对于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不感兴趣。当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陷入僵局而大国之间的关系

^① 苏联与中国东北根据地之间的商业往来,如同中共干部在苏联学校中受训一样,称为1946年下半年以后中共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参见《东北局关于三年来中苏关系的总结》,1949年6月11日,引自金耀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问题上三国的关系和斗争》,179页。

^② 关于与此不同的一种看法,参见戈德斯坦《中美关系,1948-1950》,119-142页。

^③ 里顿·安德森强调,毛泽东1945年在同美国打交道时表现出了谨慎的高度。参见《延安与列强》,164-165页。

也于1946年晚春进一步恶化时,毛泽东得出了苏美妥协已经崩溃的结论。在这一新形势下,他知道美国人将会对蒋介石以武力压服中共的行动予以支持。中共的报刊广播于1946年夏对美国政策进行声讨,其目的既是为了向华盛顿发出警告,告诉美国人共产党人不会在军事压力下屈服,也是为了向苏联人发出信号,表明中共对莫斯科的忠诚。这一宣传攻势意在使中共避免与美国人发生冲突并限制与国民党的战争。^①

中共领导人既不希望看到内战的发生,也没有策划过发动内战。如果蒋介石不曾拒绝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或者不曾采取向满洲推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也许不会批准林彪占领长春和哈尔滨的计划。但是,当蒋介石加大对中共的军事压力时,林彪的看法渐渐赢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到1946年4月中旬,毛泽东已经对谈判失去了信心,而认为同国民党的战争不可避免。

正是蒋介石自己发动了那场导致其政权的政治与军事崩溃的战争。他一贯反对向中共作任何重要的让步,并坚持共产党“叛匪”要么归顺政府,要么就与政府交战。蒋委员长的主要目标是要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在1946年春天,他感到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手段。

但是,正如蒋介石的整个生涯已经证明的,他更是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他并不愿意看到一场全面内战的发生;直到1945年底,他一直试图在不必打仗的情况下使共产党人归顺于他。虽然他相信自己的军队要比中共的军队强大得多,但他仍然对于自己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些弱点有着惊人的清醒认识。例如,他知道许多地方领袖对于重庆充其量也只有着暧昧含糊的忠诚,他也知道腐败与浪费正在侵蚀着自己政府的财政状况。为了不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希望能迫使中共接受他的权威,而不必将有限的资源用于重新燃起的战火。

蒋介石的算盘是,他要利用大国对其政权的支持而使延安认识到继续反对他是无用的。1944年至1945年间,他一直在有力而巧妙地推行着这一战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果我们考虑到蒋介石的政权已经由于

^① 新华社总社致各分社,1946年6月16日,载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1卷,65-66页;也见《解放日报》,1946年6月1日和3日。

日本的无情进攻而变得多么虚弱的话,则我们便不得不对他争取美国与苏联支持的能力刮目相看。

雅尔塔协定和莫斯科条约都包含着国际上对于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同蒋介石后来的说法正相反,他本人当时对这些协定的看法是相当积极的,并还在这些协定的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主要由于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到1945年底,蒋介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统一中国。

当斯大林要国民党在苏联的合作与美国的军事支持之间作出选择时,蒋介石的国际战略开始陷于瓦解。这使得蒋介石在1946年初相信,他除了用武力对付中共以外,已无他路可走。对国民党的这位领袖来说,马歇尔的调停以及人们为在中国实现和平而提出的种种建议都只不过是对于军事行动的恼人的骚扰。在重庆与莫斯科决裂之后,蒋介石知道他只有通过打仗才能取得对于东北的控制。

同毛泽东一样,蒋介石是冷战的一位后到者。他并不认为同时与苏联人和美国人进行合作有什么矛盾之处;他相信,只要驾驭得法,他就能同时得到这两个大国的支持。他强烈地意识到苏美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但同时却感到,苏美之间的这种对抗对他的政权是有利的,中国则应当避免站在任何一个大国的一边反对另一个大国。

直到1946年初,蒋介石仍然拒绝听取国民党内亲美的上层外交人士的意见,坚持认为同苏联进行合作是可能的。如果斯大林让他有任何理由相信同苏联的合作是会产生积极效果的话,那么,委员长本来是会继续为此而进行努力的。蒋介石对苏联的看法是,这是一个不友好但却讲求实际的大国;它希望从中国得到特殊的让步,不会因为意识形态上同中共的合作而失去得到这种让步的机会。蒋介石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很愿意在中国充当苏联的工具,但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莫斯科,斯大林因而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兴趣。

蒋介石将对外政策视为受到实际利益驱使的一场游戏。他相信,如果他要获得某个外国的合作,他就必须作出相应的让步。他觉得自己知道斯大林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无非是像从前的沙皇那样从中国获得领土上的让步。美国的意图则要难以捉摸得多。

蒋介石从来不把中国和美国看做是天然的盟友。他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赞赏。由于罗斯福和马歇尔想要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对他们在个人感情上也极不喜欢。可是，蒋介石需要美国的援助；为了从美国决策者那里得到这种援助，他将自己的政权描绘为对于美国战后的东亚计划是不可或缺的——先是美国与日本作战时的盟邦，后是美国与苏联对抗时的盟国。虽然蒋介石并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赢得美国的合作，但他越来越相信，即便中国发生内战，杜鲁门也将继续对国民党政权提供援助。

1945 - 1946 年间，蒋介石的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成功的。他先后得益于赫尔利作为大使的极端无能和美国军方的反苏偏见，因而即便在他反对美国对华政策时，他仍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训练、装备并帮助运送他的军队，为他提供情报，还负责为他守卫交通线。总之，比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美国人在和平时期成了关系更为紧密的盟友。

然而，蒋介石的对外政策却由于冷战的发生而未能成功地推行下去。不管国民党口头上怎么说，它必须同时依靠美苏两家的支持才能够发展自己的实力地位并避免内战的爆发。当同苏联的联系纽带消失、内战到来时，对外政策就再也不能对国民党在战后所经历的政治失败予以补偿了。尽管蒋介石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但由于他的专制统治，他在经济上的举措失当，以及他对于大多数中国人的要求基本上是无动于衷，国民党政权最后仍然瓦解了。

直到 1944 年，斯大林对于中国的发展仍然没有什么兴趣。他在东亚的关注中心是日本，所担心的是日本这个敌国会向苏联的远东各省份发起进攻。到 1944 年底，德国已处于战败的边缘，日本的力量也已大大削弱。此后，斯大林的目标才从避免日本发动进攻转变为准备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除了彻底打败日本之外，斯大林还希望将苏美联盟扩展到东亚。他也希望能建立苏联在满洲的影响，但又不愿意因苏联在满洲的要求而损害与华盛顿或重庆的关系。恰恰相反，斯大林似乎一度曾相信，《雅尔塔协定》不仅将保证使苏美之间的合作得以继续下去，也将为在中苏之间达成成为罗斯福所认可的广泛协议打下了基础。

斯大林在 1945 年夏于莫斯科举行的中苏谈判中提出的要求大体上是

温和的。为了避免与美国人发生冲突,斯大林希望在红军对日开战前便同重庆达成特殊的协议。为了达成这种协议,斯大林又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同蒋介石妥协。最后签订的条约因而并不是苏联一相情愿的产物。这笔交易的达成是因为莫斯科和国民党政权都对之感兴趣。^①

斯大林未能在东亚制订一种前后一致的战后外交战略,这不仅摧毁了他同蒋介石的联盟,也大大促成了冷战的到来。起初,当中苏谈判正在莫斯科进行时,他便对美国人向他施加压力的企图作出了过度的反应,拒绝当苏军在满洲发动进攻时同美国进行任何军事上的合作。然后,由于在欧洲经济与政治解决方案问题上的冲突,斯大林开始将苏联在满洲的地位视为同华盛顿进一步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却忽略了同蒋介石的交易。

斯大林将美军在华北登陆看做是对苏联在满洲存在的直接挑战。作为对此的一种反应,他试图恢复苏联同国民党在东北的合作,以避免使中美同盟的矛头指向苏联。最后,斯大林坚持要求所有的美军从中国撤退,并以此作为蒋介石为获得苏联的友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迫使蒋介石与莫斯科决裂。

斯大林从不相信中共真正有能力在中国夺取政权。在他看来,在一个由帝国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共产党若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都不可能取得胜利。鉴于美国军队(而非苏联军队)在中国除东北以外的所有地区几乎无处不在,斯大林相信,如果内战在中国爆发的话,中共便会被击垮。他不希望中共为夺取政权而对蒋介石提出挑战,而是希望中共以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为转移来设计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活动。^② 根据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共打交道的经验,斯大林完全不知道中

^① 关于斯大林在处理东欧共产党政权时的做法,参见库辛(Vladimir V. Kusin)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论文。载麦考利(Martin MacCauley)编《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Communist Powers in Europe, 1944-1949*),73-95页,纽约,1977。

^② 关于斯大林对西欧共产党人所作的相应言论,参见斯普里亚诺(Paolo Spriano)《斯大林和欧洲共产党人》(*Stalin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sts*),270-281页,伦敦,1985。希腊1943-1946年间的局势同中国有某些相似之处,而斯大林对希腊的政策则是同他在中国的行动一致的。参见斯塔弗拉基斯(Peter Stavrakis)《莫斯科和希腊共产主义》(*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 1944-1949*),48-65页,99-101页,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9。

共是否会听从自己的劝告。结果,在苏联于1945年8月前所进行的外交和军事规划中,中共没有任何地位。^①

斯大林对中共的忽视造成了红军初入满洲时对中共的政策缺乏协调。然而,斯大林到9月中旬便认识到,他可以利用中共在东北的存在迫使重庆和华盛顿为取得苏联的合作而付出更大的代价。换言之,苏联同意让中共在满洲建立行政机构也标志着莫斯科为履行8月的协议而期盼蒋介石和杜鲁门作出更大的让步。

当斯大林在11月间由于来自华盛顿和重庆的压力而退让时,中共再次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红军将中共所建立的行政机构从东北各城市中赶了出去,斯大林则告诉延安应寻求同蒋介石达成妥协。这位苏联领导人甚至可能还曾命令红军指挥官在驱逐中共部队时应当尽可能严厉一些,以便试探延安领导人的“国际主义”及对莫斯科的忠诚程度。^②

斯大林将赫尔利辞职和杜鲁门的1945年12月15日声明解释为华盛顿将减少对中共的敌对的迹象。这一关于美国政策将发生变化的看法促使斯大林对莫斯科与延安之间的关系进行修补。中共已表明了自己对莫斯科的忠诚。斯大林所希望的是,当中共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员时,将会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斯大林同重庆的决裂导致了他作出从东北撤出苏军的决定。1946年1月以后,斯大林便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将把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与美国结盟的基础之上;即便苏联作出在满洲同国民党合作的保证,也不足以阻止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存在。因此,苏军继续留在东北已变得毫无意义,这只会增加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于苏联动机的怀疑,并妨碍莫斯科同新政府建立更好关系的机会。从东北撤军则可以改善亲苏力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可以让中共控制北满,使其在军事上讨价还价的地

^① 王延科《战后斯大林“不准革命”的原因初探》,载《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4期,63-75页。

^② 一些中方人士认为,苏联的粗暴行动意在试探中共的反应。见任修权《往事沧桑》,162-163页。

位得到加强。

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和中苏莫斯科谈判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苏联在1945年8月间的军事胜利相比较,战后苏联的对华政策是极不成功的。斯大林不仅失去了影响中国政府的能力,也因为外交举措的前后不一致而冒犯了华盛顿,从而使杜鲁门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支持。^①

除了目标上的前后不一致以外,斯大林的政策风格也要对上述失败负责。苏联的这位领导人看来不能让任何其他人代他作出对外政策上的决定,结果,任何问题只要没有像同中共的关系或中苏经济谈判等问题那样引起他的直接关注,就会处于无人处理的境地。此外,斯大林粗暴以及咄咄逼人的个人行为也常常使得他不能实现一些紧迫的政治目标。^②

同斯大林的动摇不定相比,杜鲁门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制订与推行对苏政策时要首尾一致得多。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要限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并防止苏联军事势力在满洲长久存在下去。

杜鲁门作为政治领袖却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例如急躁轻率、缺乏说服别人的能力、不严谨等。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抹煞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构成是高度一致的。在罗斯福死后还只有几个星期,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层官员便已表示要改变罗斯福在东亚同苏联合作的政策,并想方

^① 我在这里得出的结论同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在《俄国走向冷战之路》(*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尤其参见该书308-310页)的看法形成了有趣的对照。马斯特尼强调,斯大林作为外交家的能力同西方领导人的无能恰成对比。其他一些不惟他那样把冷战发生的责任归之于斯大林的学者们却在这一点上附和他的看法。例如,参见马克格《斯大林严阵以待》,68-69页。

^② 马克格对1945-1946年间苏联的对外政策决定提出了另一种全面解释。在他看来,斯大林对于全球稳定的强调受到了党内更年轻、也更“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代领导人的挑战——他们相信,应当对各国革命提供支持(马克格《斯大林严阵以待》,68-71页,159-161页)。哈恩(Werner Hahn)和拉南(Cavriol Ra'anan)也强调,派系分立是苏联战后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他们三人在不同的派别分别有着怎样的不同立场,以及哪些领导人属于哪一派别的问题上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参见哈恩《苏联战后政治:日丹诺夫倒台和温和派的失败》(*Postwar Soviet Politics: The Fall of Zhdanov and the Defeat of Moderation, 1946-1953*), 19-25页,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2;拉南《苏联国际政策的形成:日丹诺夫时期的派别争论》(*International Policy Formation in the USSR: Factional "Debates" during the Zhdanovschina*), 35-42页,汉姆顿,1983。

设法地限制苏联的影响。哈里曼、格鲁和国防部的计划制订者们都将美国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及外交支持视为遏制苏联的最好手段。哈里曼在1945年夏中苏莫斯科谈判中对于中方立场的支持则是对于雅尔塔协定的最后一击，同贝尔奈斯关于为外交目的而使用原子弹的主张相比较，这也是一个更好的信号，表明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①

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星期里，美国从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发展到保证在军事上向他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根据国防部的指示，美军不仅在国民党接管华北与沿海地区时予以协助，甚至还替蒋介石占领主要城市。到11月下旬，在蒋介石的军队与共产党的军事对抗中，美军为前者提供了装备和运输，使之得到了加强。

在作出这些决定的过程中，杜鲁门总统没有起任何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就美国对华政策制订的特殊细节或大体轮廓而言，他都几乎完全没有参与；他个人在其中的影响则只是限于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极不喜欢。1945年秋天，当杜鲁门的大多数顾问都因苏联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度而引起警觉时，他本人则在这一点落后了一步。这里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他之所以任命马歇尔使华，并不是为了对莫斯科和重庆发出一个外交上的信号，而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对他的政策的批评。

对于国防部为马歇尔使命设计基本政策的那些官员们来说，他作为特使的主要任务是要限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马歇尔则在评价理解苏联

^① 有的学者强调，贝尔奈斯和杜鲁门在1945年秋利用美国的核优势对苏联施加压力。参见阿尔彼洛维茨(Ger Alperovitz)《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纽约，1985；舍温(Martin J. Sherwin)《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原子弹和大国联盟》(A World Destroyed: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Grand Alliance)。关于这些学者之间的辩论以及对他们的批评，参见沃克(Samuel Walker)《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研究新成果》，载《外交史杂志》(Diplomatic History)，1990年，冬季号，97-114页。一些对阿尔彼洛维茨提出批评的学者指出，美国当局使用原子弹主要并不是出于外交目的。然而，他们这么做有时却模糊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1945年夏天美国对苏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参见马多克斯(Robert James Maddox)《从战争到冷战》(From War to Cold War: The Education of Harry S. Truman)，科罗拉多，1988。在《联盟的终结》(The End of an Alliance: James F. Byrnes, Roosevelt,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2。一书中，梅塞(Robert I. Messer)对1945年夏战争结束期间美国的政策作了最为平衡的分析。

政策的问题上和他的同事们的意见完全一样。他之所以推动美国改变政策,即从向蒋介石提供全面的军事支持到既向他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又要他施行改革,就是为了使蒋介石成为美国在冷战中更有效和值得信赖的盟友。

可是,由于蒋介石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政权的生存而不是与苏联的冲突,马歇尔失败了。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尽管蒋介石抵制改革,但美国还是决定在军事上继续向他提供援助,这就大大削弱了马歇尔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政府的能力。然而,美国政策在更大范围内的不一致对中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正是苏美关系的破裂使蒋介石清楚地认识到,他不可能再通过同时从美苏两大国得到援助来打败自己的敌人。这一认识使得蒋介石不再把美国的调停放在眼里,而是诉诸战争。但到头来,蒋介石自己的政权却过于脆弱而未能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来。

本研究揭示,1946-1949年的中国内战是随着冷战的出现而发生的。然而,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国共两党向冷战二元政治的逐渐转变均是大国施加压力的结果:来自美国或苏联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接受援助者要站在他那一边参加冷战。

国共两党都认为,来自国外的援助对于自己的事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都试图通过作出政治上和领土上的让步来获得这种援助。民族主义确实在中共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都有一席之地,但并没有阻止这两个党中的任何一个在争取得到外国援助时对“民族”利益忽略。^① 国共两党在1945-1946年间为争取外国支持所作的种种尝试,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当权统治者与造反者在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处于平衡时所采取的战

^① 高龙江强调了民族主义思想对国共两党外交所起的重要作用。参见他的《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3-5页。他指出,民族主义对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都起了推动作用,这是对的。但是,他却未能对国共两党领导人外交政策实践中的事实与言论作出适当的区分。

略(这方面的好例子是17世纪中期和19世纪晚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①

到1946年年中,苏美两大国的领导人已将中国内战同两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利益冲突联系在一起。冷战时期的一种典型的认识,亦即两个超级大国卷入了一场全球性的冲突并各自都得到了附属国家的协助,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大约同时发展起来。从1945年年中起的那一年里,两大国逐渐埋葬了在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一切希望,并将他们在中国的冲突转变为两大国全球冲突的许多组成部分之一。^②

近年来关于早期冷战的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苏美冲突全球化的进程很早便开始了。虽然华盛顿和莫斯科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的关注中心是在东欧和中欧,但双方要知道自己关于各自意图和能力的认识是否正确,最重要的检验却是在中国、朝鲜、伊朗和希腊等其他地区进行的。在重写早期冷战历史的过程中,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发现,在苏美两国对于世界其他边缘地区的政策中,也存在着我在本书中予

^① 关于明明的情况,参见戴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洪业》(*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1卷,290-318页,加利福尼亚大学,1985。关于晚清的例子,参见史密斯(Richard Smith)《雇佣兵和清朝大臣》(*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 The Ever-Victorious Arm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纽约州,1978。还请参见奥斯特哈歇尔(Jürgen Osterhammel)《中国与国际社会》(*China and die Weltgesellschaft*)一书,1-20页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特点的讨论。关于蒋介石早期寻求对外联盟的努力,参见柯伟林(William Kirby)《德国与国民党中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斯坦福大学,1984。

^② 入江昭指出,东亚国际体系于1948年便进入了冷战阶段(参见入江昭《冷战在亚洲》,164-165页)。加布里奥在对美国决策者的观念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冷战冲突的开端要早得多(参见加布里奥《冷战始于亚洲》,177页)。我同意加布里奥的看法,即亚洲的主要国际行为者在1945年秋天就开始想到冷战了。但我也要指出,中国内战的开始标志着冷战观念在美国人、苏联人和中国人中占了上风。学者们看来尚未能就冷战开始的时机达成一致的看法——即便在人们已作过很多很好研究的欧洲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在研究意大利时,密勒(James Edward Miller)在《美国与意大利》(*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 1940-1950*)一书中指出,美国是在于1947年3月宣布奉行杜鲁门主义后出于真诚的动机而开始反对共产主义的干涉行动的(参见该书223-234页)。哈伯特别认为,冷战思维是在1946年春突然发生突破而产生的(参见《铁幕:邱吉尔、美国和冷战的起源》,209页)。

以揭示的那种现象：苏联犹豫不决，美国咄咄逼人。^①

诚如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mings)所指出，对华盛顿来说，冷战的“初期形势”出现于1945年，而不是1947年或那以后。^②在美国政治领导人看来，造成全球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一年。在苏联这方面，斯大林未能在这一年就自己的对外政策作出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必要调整。他并未试图为打消美国的怀疑而制订一项谨慎的、目标明确的对外政策；相反，他的外交忽急忽缓，在采取激烈措施和妥协行动之间大幅度地摇摆不定，这既加深了美国的担忧，也更使得苏联陷于孤立。到1946年年中，斯大林及其助手们都相信，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都已成为美国向苏联发起大举进攻的舞台。^③

本书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对外政策在中国共产党40年代中期的革命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在革命斗争中强调国际方面的情况，不仅在本世纪中期东亚地区的革命运动中可以看到，更是冷战时期第三世界革命政党政策中的普遍现象。我们对于对外政策在革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对手)思维中所起作用的这种新认识，将促使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对外事务对国内政治冲突的影响时提出新的问题。^④

既然国民党在1945年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拥有优势(其中最有利的是看来的又是它所得到的外交上的支持)，那么，为什么赢得内战胜利的又是中共

① 关于朝鲜，参见卡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1卷，382-390页、428-444页；李(Erik van Ree)《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ne Zone: Stalin's Policy in Korea, 1945-1947*)，阿姆斯特丹大学，1988年博士论文，223-231页。关于伊朗，参见利特尔(Mark Hamilton Lytle)《伊朗和美国联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 1941-1953*)，138-152页，纽约，1987。关于希腊，参见斯塔弗拉基斯《莫斯科和希腊共产主义》，48-126页。斯塔弗拉基斯认为，斯大林的希腊政策虽然在理念上前后一致，但因太复杂而很难付诸实施。他指出，斯大林的政策不仅为苏联外交带来了许多挫折，也给希腊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灾难。

② 卡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2卷，10-11页。

③ 例如，参见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于1946年9月27日致苏联外交部的“长电报”。电文译文载《外交史杂志》，1991年，冬季号，527-537页。

④ 关于40年代的东亚，参见斯纳森(Stein Tønnessen)《1945年的越南革命》(*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of 1945*)，411-417页；卡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1卷，382-403页、436-437页，2卷，325-331页。有关战后时期的比较研究，参见文安立《对革命的再思考》，载《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Studies*)，1992年，11月号。

呢？仅仅以共产党人在中国受到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这一点还不足以对此作出充分的解释。中国的情况和以后许多亚非国家的情况一样，政府因冷战而不可能对来自外国的援助加以垄断，这也就为造反者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机会。正如越南的吴廷艳、安哥拉的罗伯托，特别是阿富汗的卡马尔政权一样，蒋介石未能像前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政府那样从享有广泛的国际支援中得到好处。^① 另一方面，发生于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的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很少有希望能同一个外部大国建立联盟，相形之下，冷战造成的两极化以及大国冲突的规模则为第三世界的造反者利用国际上的大国体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打开了大门。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或战略上的有利之处、或经济上的利益等，东南亚、中南亚、南部非洲以及中东的革命运动才有希望从大国那里得到政治上的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这种结成同盟的新的可能性也极大地改变了造反者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保证了新生革命政权的生存。^②

直至 60 年代或 70 年代，大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国内冲突的干预不仅仍是冷战的推动力量，也是第三世界各国内部各种力量为争夺政治统治地位的斗争发展的动因。在一个革命的政治变化时代，大国能够对之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有其局限性。关于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正在发展中，我们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到苏美冲突的地区性方面，便能有许多重要而及时的新发现。

^① 关于越南问题，参见卡欣(George McT. Kahin)《美国如何卷入越战》(*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93-121 页，纽约，1986；海林(George Herring)《美国最漫长的战争》(*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90-95 页，纽约，1986。关于安哥拉问题，参见赖特(George Wright)《美国对安哥拉的政策》(*U. S. Policy toward Angola: The Kissinger Years, 1974-1976*)，3-13 页，里兹大学，1990。关于阿富汗，参见布拉谢尔(Henry S. Bradsher)《阿富汗和苏联》(*Afghanistan and the Soviet Union*)，221-237 页，杜克大学出版社，1983；罗昂(Olivier Roy)《伊斯兰教和阿富汗抵抗运动》(*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121-124 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

^②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旧政权”都未能成功地利用外部援助。在韩国和希腊，正是大国决定性的干预才保证了旧政权得以生存下去。

参考书目

档案与手稿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藏：

熊式辉文件

顾维钧文件

李宗仁文件

台湾新店“法务部”调查局档案

纽约海德公园罗斯福图书馆藏：

安娜·罗斯福·海尔斯塔德(Anna Roosevelt Halstead)文件

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文件及书信

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文件及日记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文件

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文件

台北史政编译局档案：

062.23 5000.3 中苏外交问题专辑

540.9 5090 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部日志

546.44439.2 苏俄对日攻势作战之研究

密苏里州独立城哈里·杜鲁门图书馆藏:

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文件
埃本·埃耶斯(Eben A. Ayers)文件
马修·康纳利(Matthew J. Connelly)记录及文件
罗斯·康威(Rose A. Conway)文件
乔治·艾尔希(George M. Elsey)档案及文件
埃德温·洛克(Edwin A. Locke)档案及文件
约翰·梅尔比(John F. Melby)文件
海军助理档案
萨缪尔·罗森曼(Samuel I. Rosenman)文件
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文件
白宫对外发布的文件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包瑞德(David D. Barrett)文件
奥利佛·卡德威尔(Oliver J. Caldwell)文件
张嘉璈文件
中国问题文件汇编
萨顿·克里斯蒂安(Sutton Christian)文件
劳克林·居里(Lauchlin B. Currie)文件
胡世泽文件
约翰·莱克(John P. Lake)文件
李效黎(Hsiao-li Lindsay)回忆录
韦尔伯·彼得金(Wilbur J. Petzkin)文件
宋子文文件
理查德·韦格尔(Richard D. Weigle)文件
伊万·耶顿(Ivan D. Yeaton)文件

哈佛大学哈顿图书馆藏：

约瑟夫·格鲁(Joseph C. Grew)文件

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藏：

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文件

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E. Davies)文件

阿夫雷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文件

华盛顿美国海军部海军陆战队指挥部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藏：

第三军第一海军师记录

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藏：

第 59 组文件：国务院综合记录

第 107 组文件：陆军部长办公室记录

第 165 组文件：陆军部一般及特殊人员记录

第 218 组文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

第 226 组文件：战略情报局记录

第 332 组文件：美国陆军记录

南卡罗来纳克莱森大学库伯图书馆藏：

詹姆斯·贝尔奈斯(James F. Byrnes)文件

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藏：

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日记及文件

中国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宗号 1：国民政府

全宗号 18：外交部

全宗号 707：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

全宗号 761:军事委员会
全宗号 763:军事委员会外事局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6卷上册

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王世杰日记
董彦平文件

访问记录

沃尔顿·巴特沃斯(W. Walton Butterworth)访谈录,藏杜鲁门图书馆。
亨利·巴罗得(Henry Byrode)访谈录,藏杜鲁门图书馆。
陈立夫访谈录,藏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中心。
柯乐博(O. Edmund Clubb)访谈录,藏杜鲁门图书馆。
马修·康纳利访谈录,藏杜鲁门图书馆。
董彦平访谈录,藏台北中央研究院。
乔治·艾尔希访谈录,藏杜鲁门图书馆。
阿夫雷尔·哈里曼访谈录,藏杜鲁门图书馆。
顾维钧访谈录,藏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中心。
埃德温·洛克访谈录,藏杜鲁门图书馆。
约翰·梅尔比访谈录,藏杜鲁门图书馆。
德维特·佩克(DeWitt Peck)访谈录,藏华盛顿美国海军部海军历史中心。
约翰·瑟维斯访谈录,藏杜鲁门图书馆。
路易斯·伍兹(Louis E. Woods)访谈录,藏华盛顿美国海军部海军历史中心。

威廉·沃顿(William A. Worton)访谈录,藏华盛顿美国海军部海军历史中心。

报刊(1944年6月1日-1946年7月1日)

《大公报》
《消息报》
《解放日报》
《新时报》(*New Times*)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真理报》(*Pravda*)
《时事日报》
《时事新报》
《战争与工人阶级》(*Voyna I rabochi klass*)
《新华论坛》
《新华日报》

书籍与第二手资料

Alperovitz, Gar. *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Expanded and updated ed. New York: Penguin, 1985.

阿尔彼洛维茨《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修订版。

Banac, Ivo. *With Stalin Against Tito: Cominformist Splits in Yugoslav Commun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巴纳克《和斯大林一起反对铁托: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问题上的分裂》。

Barbey, Daniel E. *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 Annapolis, Md.: U. 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69.

巴比《麦克阿瑟的两栖海军》。

Beal, John Robinson. *Marshall in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比尔《马歇尔在中国》。

Beloff, Max.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 - 195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贝洛夫《苏联的远东政策, 1944 - 1951》。

Benson, Linda.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 - 1949*.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0.

本森《伊犁暴动: 新疆穆斯林对中国权威的挑战, 1944 - 1949》。

Bohlen, Charles E. *Witness to History, 1929 - 1969*. New York: Norton, 1973.

波伦《为历史作证, 1929 - 1969》。

Boorman, Howard,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3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布尔曼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 3卷本。

Borg, Dorothy and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Partner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7 - 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博格和海因里克编《不确定的年代: 1947 - 1950年的中美关系》。

Borisov, O. *Sovetskii Soizuz I Man, chzhurskaia revoliutsionnaia baza, 1945 - 1949*. Moscow: Mysl, 1975.

鲍利索夫《苏联和满洲革命根据地, 1945 - 1949》。

Borisov, O. B., and B. T. Koloskov. *Sovetskie-kitaiskie otnosheniia, 1945 - 1980*. Moscow: Myal, 1980.

鲍利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 1945 - 1980》。

Buhite, Russell D. *Decisions at Yalta: An Appraisal of Summit Diplomacy*.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86.

布海特《在雅尔塔的决定: 对最高级外交的评估》。

Buhite, Russell D. "'Major Interest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Taiwan, and Korea, 1943 - 195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78), No. 3, pp. 425 - 451.

布海特《重要利益: 美国对中国、台湾和朝鲜的政策, 1945 - 1950年》, 载《太平洋历史评论》, 1978年, 第3期, 425 - 451页。

Buhite, Russell D.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布海特《帕特里克·赫尔利和美国对华关系》。

Buhite, Russell D.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 - 1954*.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3.

布海特《苏美在亚洲的关系, 1945 - 1954》。

Byrnes, James F. *All in One Lifetime*. New York: Harper, 1958.

贝尔奈斯《一生经历》。

Byrnes, James F. *Speaking Frankly*. New York: Harper, 1947.

贝尔奈斯《实话实说》。

蔡省三《蒋经国与苏联》, 香港, 时代书店, 1976。

Cardwell, Oliver J. *A Secret War: Americans in China, 1944 - 1945*.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2.

卡德维尔《秘密战争：美国人在中国，1944 - 1945》。

曹延博(音)《巩固第十根据地的哈尔滨公安武装》，载《哈尔滨文史资料》，第8期，127 - 132页。

Chang, Carsun.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man, 1952.

张君勱《中国的第三势力》。

Chassin, Lionel Max.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Translated by Timothy Osato and Louis Gel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查辛《共产主义征服中国：内战史》。

陈伯达《挽救祖国的危机》，1946年7月，藏台北调查局。

陈平《从坚持“无人区”到进军东北——谈冀热辽的特殊战略地位》，未发表论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撰文，1985。

《陈云文选，1929 - 194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 -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陈永发《制造革命：1937 - 1945年华东和华中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

Cheng Tien-fong.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7.

程天放《中俄关系史》。

Chern, Kenneth S. *Dilemma in China: America's Policy Debate, 1945*. Hamden: Archon Books, 1980.

切恩《在中国的困境：1945年美国的政策辩论》。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 - 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齐锡生《战时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与政治崩溃，1937 - 1945》。

Chiang Ching-kuo. "My Encounter with Stalin", In Dun Li, ed., *Modern China: From Mandarin to Commissar*, pp. 296 - 307. New York: Scribners, 1978.

蒋经国《我与斯大林的接触》，载《现代中国：从达官贵人到政委》，第296 - 307页。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p. *The Collected Wartime Message of Gnerolissimo Chiang Kai - shek, 1937 - 1945*. 2 vols. New York: John Day, 1946.

“中国宣传部”编《蒋委员长战时言论，1937 - 1945年》，2卷本。

周赤萍《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的林彪同志》，载中国问题研究中心（香港）编《林彪选集》，449 - 450页，香港，1970。

Clements, Diane Shaver. *Yalt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克莱门茨《雅尔塔》。

Cohen, Warren I. "American Observers and the Sino-Soviet Friendship Treaty of August 1945".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66), 35: 347 - 349.

孔华润《美国观察家和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条约》，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66年（第35卷），347 - 349页。

Compton, Boyd, comp.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 - 19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2.

坎普顿编《毛泽东的中国: 党的整风文献, 1942 - 1944》。

Coox, Alvin D. *Nomonhan: Japan against Russia, 1939*. 2 vol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库克斯《诺门坎: 日本对俄作战, 1939》, 2卷本。

Cuming, Bruce.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1990.

卡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 2卷本。

Dallek, Rober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 -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达莱克《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 1932 - 1945年》。

德州地区出版署《鲁北烽火》,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5。

丁晓春、戈德福、王世英编: “东北解放大事记”,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丁晓春等《东北解放战争大事日志》, 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 1985年第10期, 8 - 26页。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 载《中共党史资料》, 第17期, 197 - 210页。

丁志、王丹保(音)《法库县党政军民对过去斗争历史回顾》, 载中共铁

岭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烽火前沿》，136 - 140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Dornes, Jurgen: *Vertagte Revolution: Die Politik der Kuomintang in China, 1923 - 1937*.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9.

多摩斯《推迟的革命：1923 - 1937 年国民党中国的政治》。

董维康等《蒋经国在大陆》，职工教育出版社（北京），1988。

Donovan, Robert J. *Conflict and Crisi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Truman, 1945 - 1948*. New York: Norton, 1977.

多诺万《冲突与危机：杜鲁门总统，1945 - 1948》。

Dubinskii, A. M. "Osvoboditel' nalia missiia Sovetskogo Soiuzna na Dal' nem Vostoke (1945)". *Voprosy Istorii* (August 1965), pp. 49 - 61.

杜宾斯基《苏联在远东的解放使命，1945》，载《历史问题》，1965 年 8 月号，49 - 61 页。

Eastman, Lloyd E.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1927 - 1937".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易劳逸《南京十年的国民党中国，1927 - 1937》，载费正清和费维恺编《剑桥中国史》，第 13 卷。

Eastman, Lloyd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 - 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和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 - 1949》。

Elsay, George. *Roosevelt and China: The White House Story (The President and*

U. S. Aid to China - 1944 . Wilmington, Del: M. Glazier, 1979.

埃尔塞《罗斯福与中国: 白宫故事(总统及其政府在1944年对中国的援助)》。

Erickson, John. *The Road to Berlin: Continuing the History of Stanli' s War against Germany*.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3.

埃里克森《通向柏林之路: 继续斯大林对德战争的历史》。

Fairbank, John K. ,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s. 12 and 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d 1986.

费正清和费惟恺编《剑桥中国史》, 12卷、13卷。

冯蕙《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经过》, 载《文献和研究》, 1986年第2期, 10-16页。

Ferrell, Robert H. , ed. *Dear Bess: The Letters from Harry to Bess Truman , 1910 - 1959*. New York: Norton, 1983.

菲雷尔编《亲爱的贝丝: 哈里·杜鲁门致贝丝·杜鲁门的信件, 1910-1959》。

Ferrell, Robert H. , ed. *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Penguin, 1982.

菲雷尔编《不供公开发表过的文件, 哈里·杜鲁门私人文件》。

Fischer, Louis. *The Road to Yalta: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 1941 - 194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菲舍尔《通向雅尔塔之路: 1941-1945年的苏联对外关系》。

Forbes, Andrew D. W.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

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1911 - 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福布斯《中国中亚地区的军阀和穆斯林：民国时期新疆政治史，1911 - 1949》。

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1944 年第 4 卷，远东，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65。

1944 年第 6 卷，中国，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67。

1945 年第 2 卷，政治经济事务综述，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67。

1945 年第 7 卷，远东：中国，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69。

1946 年第 8 卷，远东，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71。

1946 年第 9 卷，远东：中国，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72。

波茨坦会议卷，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60。

德黑兰会议卷，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61。

雅尔塔会议卷，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55。

符浩《回忆“三人小组”在德州》，载《山东党史资料》，1987 年第 3 期，99 - 116 页。

傅继泽《军调部第十八执行小组在泊镇》，载《山东党史资料》，1987 年第 3 期，117 - 127 页。

福建省档案馆等编《闽浙赣党史文献资料选编》，第 1 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Gallicchio, Marc S. *The Cold War Begins in Asia: American East Asian Policy and the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加里奇奥《冷战始于亚洲：美国的东亚政策与日本帝国的崩溃》。

甘重斗《军调部驻赵庄我代表被殴事件经过》，载《山东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128-132页。

Garver, 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高龙江《1937至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

Garver, John W.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88), No. 113, pp. 29 - 59.

高龙江《第二次统一战线的起源：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载《中国季刊》，1988年3月（第113期），29-59页。

Garver, John W.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Xi'an Incid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July 1991), No. 26, pp. 145 - 176.

高龙江《苏联与西安事变》，载《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91年7月（第26期），145-176页。

耿天《回忆呼兰建政剿匪斗争》，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2期，120-137页。

Gilberg, Trond, ed., *Coalition Strategy of Marxist Parties*.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吉尔伯格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联合战略》。

Glanz, David M. *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eavenworth Papers No. 7. Fort Leavenworth: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1983.

格兰茨《八月风暴：1945年苏联在满洲的战略进攻》。

Glanz, David M. *August Storm: Soviet Tactical and Operational Combat in Manchuria, 1945*. Leavenworth Papers no. 8. Fort Leavenworth: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1983.

格兰茨《八月风暴：1945年苏联在满洲的策略和作战行动》。

Goldstein, Steven M.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8 - 1950: Lost Chance or No Chance?"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pp. 119 - 142. Wilmington, Del: SR Books, 1989.

戈德斯坦《中美关系，1948 - 1950：失去了机会还是没有机会？》，载何汉理、袁明编《1945 - 1955年的中美关系：对关键性十年共同进行重新评价》。

郭德权《抗战时期驻美武官回忆实录》，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

Hahn, Werner G. *Postwar Soviet Politics: The Fall of Zhdanov and the Defeat of Moderation, 1946 - 1953*.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哈恩《苏联战后政治：日丹诺夫倒台和温和派的失败，1946 - 1953》。

Harbutt, Fraser J. *The Iron Curtain: Churchill,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哈伯特：《铁幕：邱吉尔、美国和冷战的起源》。

Harding, Harry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l: SR Books, 1989.

何汉理、袁明编《1945 - 1955年的中美关系：对关键性十年共同进行重新评价》。

Harriman, W. Averell and Eli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 - 1946*.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哈里曼和阿伯尔《前往会见邱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 1941 - 1946》。

Hartford, Kathleen and Steven M. Goldstei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pp. 3 - 33.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9.

哈特福德和戈德斯坦《导言: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载哈特福德和戈德斯坦编《星星之火:中国农村革命》。

何宝路《俄国侵略东北纪实》,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

He Di.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44 - 1949."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 1944 - 1949》,载何汉理和袁明编《1945 - 1955年的中美关系:对关键性十年共同进行重新评价》。

《黑龙江历史大事记, 1945 - 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Herken, Gregg.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 - 195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2.

哈根《致胜的武器:冷战中的原子弹, 1945 - 1950》。

Herring, George C., Jr. *Aid to Russia, 1941 - 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海林《援助俄国, 1941 - 1946》。

胡锡奎《时局变化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30日，藏台北调查局。

Hua Qingzhao. "Truman's China Policy as Viewed Through Chinese Ey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December 1989.

华庆昭《中国人眼中的杜鲁门对华政策》，提交给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论文，旧金山，1989年12月。

黄荣海《跨海北上》，载《战斗在渤海平原》，509-51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Hunt, Michael and Odd Arne Westa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Field Report on New Historical Sources and Old Research Problems". *China Quarterly* (Summer 1990), No. 122, pp. 258 - 272.

韩德、文安立《中国共产党和国际事务：一个关于新史料和旧的研究问题的专题报告》，载《中国季刊》，1990年夏季号，第122期，258-272页。

Iriye, Akira.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4.

入江昭《冷战在亚洲：历史导论》。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74。

蒋经国《我的父亲》，台北，无出版者，1956。

蒋南翔《一场争取青年的历史性斗争》，载《党史纵横》，1988年第4期，10-16页。

蒋群章(音)《宋子文莫斯科谈判札记》，载《中国一周》，1952年第100

期,14-16页。

蒋永敬《宋子文史达林中苏条约谈判纪实》,载《传记文学》,1988年第320期、321期、322期,76-82页、79-86页、72-80页。

蒋永敬《王世杰与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载《传记文学》,1988年,第319期,109-110页。

冀鲁豫工商第九分局《时事研究提纲》,1945年6月,藏台北调查局。

冀鲁豫区党委:《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1946年4月4日,藏台北调查局。

冀鲁豫四地委会《新时期与我们的任务》,1946年3月5日,藏台北调查局。

《近现代沈阳报纸简介》,载《沈阳文史资料》,第4期,173-179页。

金蕴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问题上三国四方的关系和斗争》,载《中共党史资料》,1988年,第28期,150-179页。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3卷本,天津人民出版社,无出版年代。

居之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综述》,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3期,33-41页。

《戡乱战史》,4卷本,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0-1981。

Kirby, William.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 A. : Stanford Uni-

versity Press, 1984.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

孔令博(音)《试论东北抗日战争的作用与贡献》，载《党史纵横》，1988年第9期，23-29页。

Krymskaia konferentsiia rukovoditelei trekh soiuznykh derzhav, SSSR, SShA i Velikobritanii, 4 - 11 Fevralia 1945 g. : Sbornik dokumentov. 2 vols. Moscow: Politizdat, 1979.

《苏联、美国、英国三国首脑的克里米亚会议，1945年2月4-11日：文件汇编》，2卷本，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79。

Kuhfus, Peter M. "Der Risiken der Freundschaft: China und der Jalta - Mythos,"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84), No. 7, pp. 247 - 286.

库夫斯《友谊的风险：中国与雅尔塔神话》，载《波鸿东亚研究年鉴》，1984年第7期，247-286页。

Kuo, Jung-chao. "Failure at Chungking: Political Negotiations in Post-war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1987.

郭荣赵《在重庆的失败：中国战后的政治谈判》，牛津大学博士论文，1987。

冷青(音)《大连抗盟分会组织武装活动》，载《大连地下党史料选编》，大连党史资料丛书之二，1986。

Lensen, George Alexander. *The Strange Neutrality: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 - 1945*. Tallahassee, Fla.: Diplomatic Press, 1972.

兰森《奇怪的中立：二战中的苏日关系，1941-1945》。

Levine, Steven I. *Arise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 - 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梁思文《胜利之砧：满洲的共产主义革命，1945 - 1948》。

Levine, Steven I. "Comments" [on Chin-tung Liang's paper]. In Paul K. T. Sih, ed.,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of 1945: The Inside Story*, pp. 398 - 404. Hicksville, N. Y.: Exposition Press, 1977.

梁思文对梁敬敏论文的评论，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 - 1945》。

Levine, Steven I. "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Hsueh Chun-tu, ed., *Dimens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77.

梁思文《一个关于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调停活动的新观点：马歇尔访华和满洲》，载《外交史杂志》。

Levine, Steven I. "Soviet-American Rivalry in Manchuria and the Cold War". In Hsueh Chun-tu, ed., *Dimens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77.

梁思文《苏美在满洲的对抗和冷战》，载薛君度编《论中国外交政策》。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李洪文（音）《东北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36 - 43页。

李作鹏《在林彪同志领导下》，载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林彪选集》，第434 - 435页，香港，1970。

李小莉(音)《营救美国飞行员纪实》，载《山东文史资料》，1986年第18期，67-69页。

李勇《中共七大推迟召开的情况和原因》，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60-61页。

李运昌《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2卷，540-56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详。

李运昌《李运昌同志回忆阜新军事会议情况》，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8期，43页。

李运昌《忆山海关战役》，载《党史纵横》，1988年第11期，16-18页。

梁敬徽《史迪威事件》，台北，1982。

Liang, Chin-tung.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of 1945: The Inside Story". In Paul K. T. Sih,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45*, pp. 373 - 397. Hicksville, N. Y.: Exposition Press, 1977.

梁敬徽《中苏友好条约与1945年的联盟：秘闻》，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林明琴(音)《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荣桓同志》，载《罗荣桓传》编写组编《回忆罗荣桓》，473-4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

《林彪选集》，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香港，1970。

李效黎未出版回忆录，胡佛研究所档案。

刘成东(音)《我在哈尔滨工作的前前后后》,载《哈尔滨文史资料》,第8期,42-75页。

郭晨、刘传政《李立三》,工人出版社,1984。

刘汉等《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1987。

刘立凯、杨开葆(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载《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刘毅《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农村政体》,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73-78页。

刘勇路(音)等《张学思将军》,解放军出版社,1985。

Lytle, Mark Hamilton. *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 1941 - 1953*. New York: Hornes & Meier, 1987.

利特尔《伊朗和美国联盟的起源,1941-1953》。

马德茂(音)等《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中共产党的十次让步》,载《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5期,8-13页。

马洪五(音)等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档案出版社,1987。

马涛《刘少奇同志在创建东北根据地中的重大贡献》,载《党史纵横》,1988年第6期,15-22页。

马芷荪《赫尔利来华与1944年国共谈判》,载《党史研究资料》,1984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McCagg, William O. *Stalin Embattled, 1943 - 1948*.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马克格《斯大林严阵以待,1943 - 1948》。

McCauley, Martin, ed. *Communist Power in Europe, 1944 - 1949*.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77.

麦考利编《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1944 - 1949》。

Mackinnon, Stephen R. and Oris Friese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麦金农和弗里森《中国报告:三四十年代美国新闻业的口述史》。

McMahon, Robert J. "The Cold War in Asia: Toward a New Synthesis?" *Diplomatic History* (Summer 1988), 12(3): 307 - 327.

麦克马洪《亚洲的冷战:趋向于一个新的综合?》,载《外交史杂志》。

Maddox, Robert James. *From War to Cold War: The Education of Harry S. Truma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8.

马多克斯《从战争到冷战:哈里·杜鲁门的教育》。

Malinovskii, R. Ya. *Budapest-Vena-Pragg: Isoriko-memuarnyi trud*. Moscow: Nauka, 1965.

马林诺夫斯基《布达佩斯 - 维也纳 - 布拉格:历史回忆材料》。

Manser, Richard. "Roosevelt and China: From Cairo to Yalta". Ph. D. dissertation, Temple University, 1986.

曼塞尔《罗斯福与中国：从开罗到雅尔塔》。

《毛泽东选集》，4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

《毛泽东集》，10卷本，东京，1971-1972年重印本。

《毛泽东集补卷》，8卷加2卷本，东京，1983-1985。

《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Mao Tse-tung's Oral Report to the Seventh Party Congress: Summary Notes (April 24, 1945)*".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even Levine.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Winter 1977-1978), 10(4): 3-27.

《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总结发言》，梁思文译并写导言，载《中国法律和政府》杂志。

《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特点》，载《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37-38页。

Mastry, Vojtech. *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Diplomacy, Warfar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m, 1941-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马斯特尼《俄国走向冷战之路：外交、战争和共产主义政治，1941-1945》。

Mayler, Paul D. *Eureka Summit: Agreement in Principle and the Big Three at Teheran, 1943*. Newark, DL: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7.

梅尔《最高级会议终于召开了：原则上的协议和德黑兰会议的三巨头，1943》。

Melby, John F. *The Mandate of Heaven: Record of a Civil War, China 1945 - 1949*. Carden City, N. Y.: Anchor Books, 1971.

梅尔比《天命：中国内战实录，1945 - 1949》。

Messer, Robert I. *The End of an Alliance: James F. Byrnes, Roosevelt,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梅塞《联盟的终结：贝尔奈斯、罗斯福、杜鲁门和冷战的起源》。

Messer, Robert I. "Roosevelt, Truman, and China: An Overview". In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梅塞《罗斯福、杜鲁门和中国：综述》，载何汉理、袁明编《1945 - 1955年的中美关系：对关键性十年共同进行重新评价》。

Miller, James Ed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 1940 - 1950: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Stabiliz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密勒《美国和意大利，1940 - 1950：趋向稳定的政治和外交》。

Millis, Walter,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New York: Viking, 1951.

密里斯编《福雷斯特日记》。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牛军《马歇尔调处与东北内战》，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34-44页。

Osterhammel, Jürgen. *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 Munich: C. H. Beck, 1989.

奥斯特哈默尔《中国与国际社会：从十八世纪到当代》。

潘仲群《“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及有关文献的札记》，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58-61页。

Paulson, David Mark. “*War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The Shandong Base Area, 1937 - 1945*”.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2.

鲍尔森《华北的战争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3-10页。

Pepper, Suzanne.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 - 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Ra'anan, Gavriel D. *International Policy Formation in the USSR: Factional "Debates" During the Zhdanovschina*.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83.

拉南《苏联国际政策的形成：日丹诺夫时期的派别争论》。

Read, Anthonyson. *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 - 1941*. New York: Norton, 1988.

里德《致命的拥抱：希特勒、斯大林和苏德条约，1939-1941》。

Reardon-Anderson, James.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 - 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里顿·安德森《延安与列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1944 - 1946》。

Ree, Erik van. "Socialism in One Zone: Stalin's Policy in Korea, 1945 - 194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88.

李《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朝鲜政策，1945 - 1947》。

任东来《不平等的同盟：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1937 - 1946》，南京大学博士论文，1988。

Resis, Albert. *Stalin, the Politburo,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 - 1946*.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no. 701. Pittsburgh: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8.

里塞斯《斯大林、政治局和冷战的起源，1945 - 1946》。

Schaller, Michael.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沙勒《美国占领日本：冷战在亚洲的起源》。

Schaller, Michael: *The U. S. Crusade in China, 1938 - 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 - 1945》。

Schram, Stuart.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施拉姆《毛泽东思想》。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青岛解放前夕的社会状况与民主运动》，载《山东史志资料》，1983年第1期。

Shaw, Henry I. Jr.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 1945 - 1949*. Reprint. Washington, D. C. : Historical Branch, F-3 Division, Headquarters, U. S. Marine Corps. 1968.

肖《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 1945 - 1949》。

Sherwin, Martin J. *A World Destroyed: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Grand Allia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舍温《一个被摧毁了的世界: 原子弹和大国联盟》。

Sherwood, Robert E.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Rev. ed. In 2 vols. New York: Bantam 1950.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Shum Kui-Kwo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oad to Power: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1935 - 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Shum《中国共产党人的夺权道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 - 1945》。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所和中共党史教研组:《重庆谈判资料选编》，其“前言”写于1979年。

Sih, Paul K. T.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45*. Hickville, N. Y. : Exposition Press, 1977.

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 1937 - 1945》。

Sladkovskii, M. I. *Ocherki 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SSSR s Kitaiem*. Moscow: Vneshtorgizdat, 1957.

斯拉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论》。

Sladkovskii, M. I. *Znakomstvo s kitaem i kitaistami*. Moscow: Mysl, 1984.

斯拉科夫斯基《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

Smith, Richard. *Mercenaries and Mandarines: The Ever-Victorious Arm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illwood, N. Y.: KTO Press, 1978.

史密斯《雇佣兵和清朝大员：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

Sovetsko-amerianskie otnosheniia vo vremia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1941 - 1945: Dokumenty i materialy. Moscow: Izd - vo polit. Lit - ry, 1984.

《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苏美关系，1941 - 1945：文献和史料》。

Spriano, Paolo. *Stalin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sts*. Translated by Jon Rothchild. London: Verso, 1985.

斯普里亚诺《斯大林和欧洲共产党人》。

Stalin, Iosif. *Sochineniia*. Moscow: 1947.

斯大林《著作》。

Stavrakis, Peter. *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 1944 - 1949*.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斯塔弗拉基斯《莫斯科和希腊共产主义，1944 - 1949》。

Stueck, William. "The Marshall and Wedemeyer Missions: A Quadrilateral Perspective". In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斯塔克《从四方关系的角度看马歇尔和魏德迈访华》，载何汉理、袁明编《1945 - 1955年的中美关系：对关键性十年共同进行重新评价》。

唐凯《解放和保卫山海关之战的重大意义》，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8期，19页、35-37页。

汤从列(音)《兵伐日寇，师出关东：冀热辽东路部队进军东北始末》，载《军史资料》，1985年第8期，53-57页。

Tang, Tsao.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唐言(音)《东北问题之真相》，南京时代出版社，1946。

Taubman, William. *Stalin's American Policy: From Entente to Detente to the Cold War*. New York: Norton, 1982.

陶布曼《斯大林的对美政策：从结盟到缓和再到冷战》，诺顿出版社，纽约，1982。

Teiwes, Fredrick C.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s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 - 1965*. White Plains, N. Y., : M. E. Sharpe, 1979.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风与党从正常状态的衰落，1950-1965》。

Thorne, Christopher.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 -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索恩《某种联盟：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1945》。

Tonnesson, Stein.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of 1945: Roosevelt, Ho Chi Minh, and De Gaulle in a World at War*. London: Sage, 1991.

汤纳森《1945年的越南革命：战争世界中的罗斯福、胡志明和戴高

乐》。

Tuchman, Barbara W. "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 An Essay in Alternatives".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2, pp.44 - 64.

塔克曼《如果毛泽东曾来了华盛顿：一篇关于其他可能选择的论文》，载《外交事务》杂志。

Tuchman, Barbara W.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 - 1945*.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2.

塔克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 - 1945》，班顿书店, 纽约, 1972。

Ulam, Adam.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Viking, 1973.

乌拉姆《斯大林及其时代》。

Urban, Joan Barth. *Moscow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From Tagliatti to Berlinguer*.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厄本《莫斯科与意大利共产党》。

Vladimirov, P. P. *Osobyi Raion Kitnia*. Moscow: Movosti, 1973.

弗拉基米洛夫(即孙平)《中国特区, 1942 - 1945》。

Vnotchenko, L. N. *Pobeda na dal' nem vostoke*. Moscow: Voennoe, 1971.

甫诺琴科《在远东的胜利》。

Volk, Richard. *Die Franzosischen Kommunisten und die Befreiung Frankreichs, 1943 - 1945*. Frankfurt a. M. ; Peter Lang, 1984.

李查德《法共与法国解放》。

Walker, J. Samuel.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Bomb: A Historiographical

Update". *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 1990), 14(1): 97 - 114.

沃克《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研究新成果》,载《外交史杂志》。

王彬《回忆青岛的停战谈判》,载《山东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90 - 98页。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王廷科《战后斯大林“不准革命”的原因初探》,载《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4期,63 - 75页。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

王树庆(音)《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载《哈尔滨文史资料》,第8期,205 - 216页。

王文《北进第一支队》,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2卷,503 - 51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无出版日期。

王益《抗战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初探》,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3期,31 - 35页。

王永成《东北解放区的货币发行与统一》,载《党史纵横》,1988年第4期,45 - 48页。

王泽民《北进敌后武工队》,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2卷,519 - 53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Westad, Odd Arne,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 - 1963*. Washington, D. C. and Stanfor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文安立编《战友：中苏同盟的兴衰，1945 - 1963》。

Westad, Odd Arne. "Rethinking Revolutions: 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November 1992).

文安立《对革命的再思考：冷战在第三世纪》，载《和平研究杂志》。

Wilbur, C. Martin. "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 - 1937". In Ho Ping-ti and Tsou Tang, eds., *China in Crisis*, 1:203 - 26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韦慕庭《国民党政权领导下的军事分离主义与重新统一的进程，1922 - 1937》，载何炳棣、邹说编《危机中的中国》，第1卷。

Womack, Brantley. *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1917 - 1935*.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2.

沃梅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 - 1935》。

吴俊《李明信与“八·二八”反革命暴动》，载《哈尔滨文史资料》，第5期，85 - 96页。

伍修权《到东北》，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2卷，565 - 56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

Wylie, Raymond F.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 -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威利《毛泽东主义的兴起: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追寻,1935 - 1945》。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萧超然等主编《中共党史简明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87。

肖锋《战地日记几则》,载《战斗在渤海平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谢爽秋《1944年中外记者团延安行》,载《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14 - 17页。

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1931 - 1956》,3卷本,无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前言”写于1981年。

徐焰《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的发展研究》,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12期,1 - 7页。

徐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解放全东北的必由之路》,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5期。

徐焰《苏联出兵东北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3。

徐志《接管锦州概况》,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2卷,585 - 58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杨国庆、白刃《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共产国际》，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69-95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杨易辰《铁岭中心县委工作琐忆》，载中共铁岭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烽火前沿》，26-2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杨一凡等《谈谈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杨芸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7。

Yang, Emily. "The Impact of the Yalta Agreement o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1945 - 1946". Ph. D. dissertati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1979.

杨《雅尔塔协定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1945-1946》。

Yergin, Daniel.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叶尔金《破碎的和平：冷战和安全国家的起源》。

Yick, Joseph Kong Sang. "The Urban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ase of Beijing-Tianjin, 1945 - 1949".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88.

易克(音)《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战略:对1945-1949年的北平、天津的个案研究》。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联合出版社,1976。

Zakharov, m. V. ed. *Final: Istoriko-memuarny ocherk o razgrome imperialisticheskoi iapony v 1945 godu*. Moscow: Nauka, 1969.

萨哈罗夫编《最后一幕:1945年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历史回忆汇编》。

曾克林《我们是怎样取得东北这一个战略基地的》,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2卷,570-58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曾克林《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4-14页。

曾名前(音)《铁岭工作情况回顾》,载中共铁岭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烽火前沿》,72-7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Zhang Baijia. "Chinese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37 - 1945". In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pp. 14 - 30.

章百家《中国对美政策,1937-1945》,载何汉理、袁明编《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

章百家《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手稿。

Zhang Jia' ao (Chang Kia-ngau).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 Translated by Dolores Z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Donald G. Gillin.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9.

张嘉璈《在满洲的最后机会：张嘉璈日记》。

张立文《接收热北重镇赤峰市》，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2卷，572-58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张琦《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190-208页。

张庆泰编《忆林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张寿山《大连各界抗日同盟分会的活动》，载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整编委员会编《大连地下党史料选编》，出版地、出版日期不详。

章文晋《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59-65页。

张秀山《陈云同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载《党史纵横》，1988年第11期，8-15页。

张一波、袁鲁毅《“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5期，173-188页。

张玉法、沈松桥《董文琦先生访问记录》，台北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之十二，1986。

张注洪《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

赵素芬《周保中年谱》，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5期，203-270页。

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郑旭《接收承德》，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2卷，590-59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整编委员会编《大连地下党史料选编》，大连党史资料丛书之二，大连，1986。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编《美国应从内战场面站开》，1946年7月1日，藏台北调查局档案。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目前的时局、任务和思想问题的讨论提纲》，1945年12月1日，藏台北调查局档案。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中共铁岭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烽火前沿》，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下）人民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中国共产党关于为和平建国而斗争的二十一份文电》，载《党的文

献》，1988年第1期，41—57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第3编，战时外交，3卷本，台北，1980。

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卷本，台北，1985。

第7编，战后中国，4卷本，台北，1980。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8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3卷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1卷本，第1卷序言写于1979年。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卷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987，内部版。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卷本，档案出版社，1984—1986。

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

朱元石《刘少奇与抗战结束后争夺东北的斗争》，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124—145页。

卓兆恒《“停战协定”是1月10日签订的》，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2期，79—80页。

译者后记

冷战是几乎涵盖了整个 20 世纪下半叶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冷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这种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广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冷战的结束拉开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使得学者们有可能打破冷战环境和思维定势的束缚,从一种“后冷战”的历史高度出发,对于冷战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随着 80 年代后中国伴随改革开放而对有关历史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以及苏联解体后俄国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解密,学者们得以第一次获得了通过“多边档案研究”的方式,对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的一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的兴起。挪威学者文安利(Odd Arne Westad)于 1993 年出版的《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一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本在国际上受人注目、引起很大反响的专著。

文安利是近十年来在西方国际冷战史研究中涌现出来的最负盛名的年轻学者。他于 1989 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 1990 年至 1998 年担任挪威诺贝尔和平研究所研究部主任,1998 年起担任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他精通包括英、俄、德、法及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多边档案研究”新学术潮流的主要推动者。《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一书是在广泛利用美、苏及中国国、共等各方面原始资料的基

础上写成的,是他的主要代表作。1944-1946年,是中国国内形势、东亚局势和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结束,一方面,国共两党在为战后双方的政治军事角逐进行准备;另一方面,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也在为建立对自己有利的东亚国际关系新结构而奔忙。这两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在联系。根据文安立的想法,当斯大林和罗斯福于1945年2月在建立“雅尔塔体系”这一基本问题上达成协议时,他们的战略思维仍然处于“前冷战”的状态,其建立东亚国际新结构的设计则是以苏美共同打败日本、在战后继续“大国合作”为基础的。然而,雅尔塔体系在东亚的命运却受到了中国国内情势发展的制约。蒋介石为了切断苏联在战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援助,在于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中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作为回报,斯大林在抗战胜利后便迫使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但是,由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种种深刻矛盾而孕育起来的国共对抗却并没有因此便化解。恰恰相反,反而是国共两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冲突的不断升级与发展,迫使苏美两大国不得不在国共对抗的问题上“站队表态”,从而使得国共之争转变为冷战形成中最早促使苏美战时同盟发生破裂的重大国际事件之一。反过来,苏美冷战的兴起又对国共内战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中国共产党能够制订并实行以全力争夺东北为中心的大战略,便是同苏联随着冷战兴起而奉行与国民党(以及站在国民党背后的美国)敌对的政策分不开的。用文安立的话来说,正是冷战造成了中国内战中“执政者难以垄断国际资源,造反者有可能得到外部支援”的局面。

以往,中外学术界对于苏美冷战以及中国内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却从没有人像文安立这样,利用苏、美、国、共四方面的原始资料,并采用被他称为“四维分析”的研究模式,对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和层面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会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的原因。

好事多磨,本书的翻译也历经了不少周折。早在本书于1993年出版后,我们便希望能将它介绍给国内读者。然而,当上海一位任中学历史老师的朋友在完成相当一部分译文的初稿后,未经复印的手写稿子竟在学

校的一次大扫除中被人当做“废纸”全部处理掉了。以后，一位来自国内某重点大学的“高才生”在申请来我们任教的南伊利诺大学读研究生时，表示愿意重新翻译这本书。可是，当他交出序论与第一章的译文初稿时，我们发现其中文理不甚理想……。我们本来早已有着排得满满的教书与研究计划，但鉴于中国的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此书，只能亲自担负起翻译全书的任务。

我们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对全部原始资料都在可能的情况下作了核对，但因我们身处国外，无法看到一部分80年代在国内出版的党史出版物，因此对一些引文作者的姓名不得已而用了音译，希望读者见谅。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曾就原文及译文同文安立教授反复磋商，并蒙他根据新资料对原书内容与注解作了修订更新，又为中译本撰写了序言，我们谨向这位老朋友表示感谢。本书翻译过程中曾得到牛军、章百家、黄展敏、宋妍、崔美敏、任勇、李迪等的帮助，亦在此一并致谢。

陈兼 陈之宏

1999年10月于美国炭谷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 – 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By Odd Arne Westad

Copyright © 1993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 2000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with Authorization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挪威]文安立 著

中文简体字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授权

翻译出版版权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与内战

冷战与革命——中国内战的起源

9 787063 244272



ISBN 7-309-03865-7/A·372
定价：17.00元